



真理报

第十三期

2026年4月

马列毛主义将开辟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

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53周岁
生日快乐！菲律宾民族民主
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报刊编辑小组

特别鸣谢：法国人民之火主席：张同志

毛

主

席

语

录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时事评述

- ★ 纪念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建立53周年 1-13
- ★ 纪念列宁同志诞辰156周年 14-27
- ★ 作业本、耳光与应试教育的冷酷机器 28-32
- ★ 破产别破良心债：从华盛玩具广西四厂倒闭
看工人斗争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 33-51
- ★ 流量吃人：零工经济、资本
指挥与直播劳动的异化 52-79

百家争鸣

- ★ 格瓦拉主义批判 80-108
- ★ 论打入主义 109-121

不周山下

- ★ 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 122-124

- ★ 团结起来，支持印度人民反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法西斯莫迪政权！
停止“卡加尔行动”！ 125-126

历史文献

- ★ 雇佣劳动与资本（第五部分） 127-128

导师语录

129



纪念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建立53周年

一、引言：五十三年革命火炬仍在燃烧

2026年，是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the Philippines, NDFP）成立五十三周年。

五十三年，在历史长河中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革命者而言，这五十三年却意味着鲜血、牺牲、地下斗争、山地游击战、群众组织、政治教育，以及无数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前赴后继的坚持。

当今世界，帝国主义依旧统治着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美帝国主义仍然通过金融、军事、政治与文化霸权压迫广大发展中国家；买办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继续压榨工人和农民；修正主义则不断腐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许多曾经高举红旗的组织最终走向议会主义、改良主义乃至彻底投降。

然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菲律宾革命却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道路。

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代修正主义最有力的回击之一。

从1973年成立至今，NDFP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纲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坚持人民战争路线，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指导。这一点，在今天的世界革命运动中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现实已经反复证明：

那些放弃武装斗争、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最终无一例外地蜕变为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一部分。他们沉迷于议会选票、合法主义幻想和改良主义空谈，逐渐失去了革命性，甚至开始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

而菲律宾革命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它没有相信帝国主义会“和平让步”，也没有幻想统治阶级会主动交出权力。菲律宾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国民主阵线深刻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真正的解放只能依靠长期的人民战争，只能依靠工农群众的组织化斗争，只能依靠革命暴力粉碎旧国家机器。

这正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根本问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菲律宾革命五十年的历史，正是这一真理在菲律宾具体条件下的实践。

与此同时，NDFP并不仅仅是菲律宾人民的统一战线组织，它还是当代国际毛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共产党早已放弃革命、陷入修正主义泥潭的今天，菲律宾革命仍然坚持党的建设、人民军建设和革命统一战线建设，坚持通过群众路线发动人民，坚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使其成为世界革命运动中极少数仍然保持连续性的革命力量之一。

当然，菲律宾革命并非没有经历曲折。

它曾遭受残酷镇压，也曾党内出现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与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它面对过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家机器围剿，也经历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但恰恰是在这样的斗争中，菲律宾革命证明了一件事：

真正的革命力量，不在于一时的声势，而在于是否能够在长期斗争中坚持自己的阶级立场，坚持革命路线，坚持与人民群众结合。

今天，当我们纪念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成立五十三周年时，我们纪念的不只是一个组织的历史，更是在纪念一种革命精神——

一种反抗帝国主义、反抗修正主义、反抗剥削压迫的革命精神；

一种扎根群众、长期斗争、不惧牺牲的革命精神；

一种即使在世界革命低潮时期，也依然相信人民终将胜利的革命精神。

菲律宾人民的斗争告诉世界：

革命并没有结束。

只要压迫仍然存在，反抗就永远不会停止。

二、菲律宾革命的历史背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要理解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NDFP）为什么能够存在五十三年，为什么菲律宾革命始终没有熄灭，就必须首先理解菲律宾社会本身的性质。

菲律宾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完整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从马列毛主义的角度来看，菲律宾社会的基本性质，至今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所谓“半殖民地”，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形式上拥有自己的政府、国旗和法律，但实际上却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军事与政治控制之下；所谓“半封建”，则意味着封建土地关系、地主压迫以及农村剥削仍然深深扎根于社会结构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菲律宾革命才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

（1）美帝国主义对菲律宾的统治

菲律宾近代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历史。

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原本正在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人民，本以为能够借机获得民族独立。然而，美帝国主义却直接取代了西班牙殖民者，对菲律宾展开新的殖民统治。

随后爆发的美菲战争中，美军对菲律宾人民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大规模屠杀、集中营、焚村政策与酷刑成为美国“文明输出”的真实面貌。

从那时开始，菲律宾就被纳入了美国资本主义体系。

即使后来菲律宾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这种依附关系也并未真正结束。

美国资本控制着菲律宾的重要经济命脉：

矿业；
农业出口；
金融体系；
能源与贸易；
军事体系。

与此同时，美军长期在菲律宾设立军事基地，将菲律宾变成其在东南亚的重要战略支点。

因此，菲律宾统治阶级从来不是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

他们的利益，不在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在于维持现有的依附体系，从帝国主义那里获得利润与政治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国家机器长期对工农群众采取高压统治，却对美国资本和外国势力极度顺从。

从本质上说，菲律宾国家机器并不是“全民国家”，而是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联合统治人民的工具。

（2）封建土地制度与农民压迫

如果说帝国主义统治是菲律宾革命的外部压迫，那么封建土地制度则是菲律宾人民最直接的内部枷锁之一。

菲律宾农村长期存在严重的土地集中现象。

大片土地掌握在地主、政治寡头和地方家族手中，而广大农民则长期处于：

高额地租；
债务压迫；
低工资劳动；
土地兼并；
农业资本剥削
的状态之下。

许多农民虽然“拥有工作”，但实际上根本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劳动成果。

他们被迫依附于地主与农村高利贷体系，陷入长期贫困。

因此，土地问题始终是菲律宾革命的核心问题之一。

毛泽东曾指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民是最广大的被压迫阶级之一，因此革命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

这也是为什么菲律宾共产党始终坚持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的路线。

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菲律宾革命的问题。

（3）官僚资本主义与腐败国家机器

菲律宾统治阶级不仅依附于帝国主义，同时还形成了严重的官僚资本主义体系。

所谓官僚资本主义，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腐败”那么简单。

它意味着：
国家机器本身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积累资本和压榨人民的重要工具。

菲律宾的政治体系长期被少数家族、财阀与地方政治寡头控制。

选举、议会、地方政府乃至军警体系，很多时候都只是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分配的工具。

所谓“民主”，往往只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竞争，而广大工农群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决定国家方向的能力。

与此同时，菲律宾国家机器长期依赖：

军警镇压；
白色恐怖；
暗杀与绑架；
对工会和农民组织的打击；
对革命者的军事围剿
来维持统治。

这说明，资产阶级国家从来不是什么“中立”的公共机构。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国家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菲律宾，国家机器尤其明显地体现为：
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联合压迫人民的暴力机关。

也正因如此，菲律宾革命者最终得出了一个结论：

人民不能简单地通过议会改良获得解放，而必须通过革命斗争，彻底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新的人民政权。

这，也正是菲律宾人民战争产生的历史根源。

三、菲律宾共产党（CPP）与全国民主阵线（NDFP）的建立

菲律宾革命并不是自发产生的。

它不是单纯的群众愤怒，也不是某种抽象的“民主运动”。菲律宾革命之所以能够从零散反抗发展成为持续数十年的人民战争，其关键正在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共产党被重新建立了起来。

而这一重建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1）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二十世纪中叶，菲律宾原本已经存在共产党组织，即旧菲律宾共产党（Partido Komunista ng Pilipinas, PKP）。

然而，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旧PKP逐渐陷入了现代修正主义路线。

尤其是在赫鲁晓夫集团篡夺苏联共产党领导权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分裂。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开始鼓吹：

“和平过渡”；
“全民国家”；
“全民党”；
“议会道路”；
阶级调和；
与资产阶级合作。

这些理论表面上仍然使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词汇，但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

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无产阶级不可能依靠议会和平取得真正解放。

列宁早已指出：

“无产阶级如果不经过暴力革命，就不能以新的国家机关代替旧的国家机关。”

然而，现代修正主义却试图否定这一点。

在菲律宾，这种修正主义路线表现得尤为明显。

旧PKP逐渐放弃武装斗争，沉迷于合法主义与议会幻想，把革命理解为对现存国家机器的“和平改造”。他们害怕发动群众，害怕农村革命，更害怕真正的阶级斗争。

结果便是：

党逐渐脱离群众，革命陷入停滞，组织不断衰败。

菲律宾革命者最终认识到，如果不彻底批判修正主义，不重新建立真正的共产党，那么革命就不可能继续前进。

（2）菲律宾共产党（CPP）的重建

1968年，以何塞·玛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等革命者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重新建立了菲律宾共产党（CPP）。

这并不是简单的“换一个组织名称”，而是一场路线上的重新确立。

菲律宾共产党明确提出：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马列毛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因为它意味着菲律宾革命重新回到了：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
暴力革命；
人民战争；
群众路线
的道路上。

特别是毛泽东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理论，对菲律宾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菲律宾共产党认识到：

菲律宾与旧中国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帝国主义控制；
封建残余；
农民人口占多数；
国家机器腐败；
资本主义发展畸形；
广大农村处于贫困状态。

因此，中国革命的经验，尤其是人民战争路线，对于菲律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当然，菲律宾共产党并不主张机械照搬中国革命。

恰恰相反，他们强调：
必须把马列毛主义同菲律宾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也是毛主义区别于教条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

革命不是背诵书本，而是把普遍真理运用于具体斗争。

在这一过程中，菲律宾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党的建设原则：

党的绝对领导；
民主集中制；
批评与自我批评；
与群众结合；
反对机会主义；
反对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

与此同时，他们重新组织武装力量，并于1969年建立了新人民军（New People's Army, NPA）。

菲律宾革命从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3）全国民主阵线（NDFP）的成立

随着革命的发展，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共产党虽然是革命的领导核心，但革命本身并不仅仅是共产党员的事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受到压迫的不仅有工人和贫农，还包括：

小资产阶级；
革命知识分子；
青年学生；
妇女；
民族少数；
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宗教进步人士。

因此，革命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1973年，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NDFP）正式成立。

NDFP的建立，标志着菲律宾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联盟组织”，更不是松散的改良主义联合体。

从本质上说，NDFP是：
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革命统一战线。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统一战线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曾指出：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个法宝。”

菲律宾革命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就很容易蜕变为：

议会主义联盟；
民族主义集团；
自由派联盟；
改良主义平台。

而NDFP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革命性质，恰恰在于其始终坚持：

共产党领导、人民战争路线与民族民主革命纲领。

与此同时，NDFP还承担了重要的群众组织功能。

它联合了：

工人组织；
农民组织；
青年学生组织；
妇女组织；
文化团体；
少数民族组织；
海外支持网络。

这些组织共同构成了菲律宾革命的群众基础。

而新人民军（NPA）则是革命的武装支柱。

因此，在菲律宾革命体系中：

菲律宾共产党（CPP）是领导核心；
新人民军（NPA）是主要武装力量；
全国民主阵线（NDFP）则是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三者共同构成了菲律宾革命的整体结构。

也正因如此，菲律宾革命才能在长期镇压之下依然维持连续性，并不断在群众中扎根发展。

四、人民战争路线的伟大实践

菲律宾革命最鲜明、最核心的特点之一，就是它长期坚持了人民战争路线。

在今天这个时代，许多所谓“左翼”组织早已放弃了革命。他们沉迷于议会选举、网络宣传和合法主义幻想，甚至把革命理解成一种道德表态，而不是现实的阶级斗争。

而菲律宾革命则始终坚持一个根本原则：

政权不是靠请求得来的，而是通过革命斗争夺取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菲律宾共产党（CPP）与新人民军（NPA）能够在长期艰苦斗争中维持自身存在的重要原因。

（1）“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菲律宾共产党在重建之后，很快便认识到：

菲律宾的社会结构决定了革命不可能首先在大城市取得胜利。

菲律宾虽然存在城市工人阶级，但广大农村仍然聚集着数量庞大的贫农、雇农与农村劳动群众。与此同时，国家机器在城市中的控制力量远远强于农村。

因此，如果革命力量一开始就试图与国家机器在城市进行正面决战，那么结果往往只能是被迅速镇压。

这也是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冒险主义失败的根源。

他们脱离群众，幻想通过少数人的“英勇行动”迅速改变社会，却忽视了革命最根本的问题：

革命必须依靠群众。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正是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点的分析基础上形成的。

菲律宾共产党借鉴并发展了这一经验。

他们认识到：

广大农村是革命最深厚的土壤；
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
国家机器在农村存在薄弱环节；
革命必须通过长期积累力量，而不是急于求成。

因此，新人民军开始深入农村，建立游击区与根据地。

在那里，革命并不仅仅意味着“打仗”。

真正重要的是：
组织群众。

革命者帮助农民建立组织、开展政治教育、进行土地斗争、建立基层政权、发展群众生产，并逐步削弱地主与反动武装的统治。

也就是说，人民战争不仅是军事路线，更是一种政治路线。

武装斗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暴力本身，而是因为：
只有通过革命武装，人民群众才能真正保卫自己的组织与政权。

（2）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菲律宾革命能够长期存在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其始终强调群众路线。

所谓群众路线，并不是简单地“听群众的话”。

毛泽东曾指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意味着：
共产党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总结群众经验，再把革命路线带回群众之中，使群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而不是脱离群众，自我封闭。

菲律宾共产党非常重视：

群众调查；
政治教育；
基层组织建设；
革命文化工作；
群众会议；
农民协会与工人组织建设。

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中，革命者不仅进行军事斗争，同时还建立：

夜校；
群众法庭；
医疗组织；
合作生产；
群众宣传网络。

这些工作看似“普通”，但实际上却是革命最根本的部分。

因为革命并不仅仅是摧毁旧世界，更是组织新世界。

没有群众组织，武装斗争就会变成脱离人民的军事主义；
没有政治教育，群众运动就容易陷入自发性；
没有党的领导，革命就会被机会主义和地方主义瓦解。

菲律宾革命长期强调：
人民战争的主体不是少数职业革命者，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本身。

这一点，与许多城市小资产阶级“先锋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真正的革命，不是少数人替人民“完成革命”，而是人民群众自己在斗争中成长、组织和掌握权力。

（3）持久人民战争的理论意义

菲律宾革命还证明了一个重要问题：

革命不是短跑，而是长期斗争。

许多革命失败，往往并不是因为革命者“不够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战略耐心。

小资产阶级政治往往具有一种急躁性：
今天幻想立刻胜利，明天遭受挫折便陷入悲观，后天又转向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

而毛主义所强调的“持久人民战争”，恰恰反对这种倾向。

持久人民战争认为：
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积累力量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敌强我弱会逐步转化；
群众会在斗争中成长；
革命力量会逐步扩大；
旧国家机器会逐渐被削弱。

因此，革命不是依靠一次“决定性事件”完成的，而是通过长期阶级斗争逐渐改变力量对比。

菲律宾革命几十年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理论的现实意义。

即使面对：

国家军事围剿；
帝国主义援助；
白色恐怖；
国际革命低潮；
修正主义攻击，
菲律宾革命仍然能够维持自身力量。

这说明：
真正扎根群众的革命，不会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消失。

与此同时，菲律宾革命也不断强调：
人民战争绝不是纯军事主义。

如果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路线、脱离政治工作，那么武装斗争本身也会蜕变。

因此，菲律宾共产党始终强调：

党领导枪；
政治统帅军事；
群众基础决定革命前途。

也正因如此，菲律宾人民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斗争，更是一场长期的政治、组织与阶级斗争。

它不仅在与旧国家机器作战，同时也在培养新的革命力量、新的群众组织与新的社会关系。

这，正是人民战争最深刻的意义。

五、反修正主义：菲律宾革命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

如果说人民战争是菲律宾革命的武器，那么反修正主义就是菲律宾革命能够长期坚持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因为历史早已证明：

许多共产党并不是被帝国主义直接消灭的，而是首先在思想上蜕变，然后才在政治上瓦解。

当一个共产党开始放弃阶级斗争、放弃革命暴力、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它即使仍然保留“共产党”的名称，也已经不再是真正的革命政党。

菲律宾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革命低潮时期依然保持连续性，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始终坚持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1）现代修正主义的危害

二十世纪后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了严重危机。

赫鲁晓夫集团上台后，苏联共产党逐渐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所谓：

“全民国家”；
“全民党”；
“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

这些理论表面上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实际上已经否定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曾尖锐指出：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

而后来的历史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当共产党放弃革命之后，它最终就会演变为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工具。

在菲律宾，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同样十分明显。

旧菲律宾共产党（PKP）逐渐沉迷于合法主义与议会幻想，试图通过改良主义方式改变社会。他们害怕武装斗争，害怕发动群众，最终导致组织脱离人民、革命陷入停滞。

菲律宾共产党（CPP）的重建，本质上就是一次反修正主义斗争。

他们明确指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绝不会通过和平方式放弃权力。

因此：

放弃武装斗争，就是放弃革命；
放弃阶级斗争，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
放弃党的领导，就是让群众运动走向瓦解。

与此同时，菲律宾革命也长期批判托派、机会主义以及各种“左”右倾错误。

因为无论是右倾投降主义，还是脱离群众的冒险主义，最终都会损害革命。

（2）坚持武装斗争的意义

在今天的世界上，许多所谓“左翼”组织已经彻底放弃了革命。

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于：

议会选举；
法律改革；
NGO活动；
网络舆论；
道德呼吁。

但菲律宾革命则始终坚持一个根本观点：

被压迫阶级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真正掌握政权。

这一点，并不是什么“浪漫化暴力”。

恰恰相反，这是对国家本质的现实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指出过：
国家本质上是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关。

菲律宾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够维持统治，并不是因为人民“自愿服从”，而是因为：
他们掌握着军队、警察、监狱与国家暴力机器。

因此，如果革命者完全放弃武装斗争，那么革命最终只能沦为统治阶级允许范围内的“合法反对派”。

菲律宾共产党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始终坚持人民战争路线。

即使在世界革命低潮时期，即使许多共产党已经公开否定武装斗争的时候，菲律宾革命仍然坚持：

建立革命武装；
建立根据地；
发动群众；
长期积累力量。

这一点，使菲律宾革命成为当代世界革命运动中极少数仍然保持连续性的革命力量之一。

——

（3）“纠正运动”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菲律宾革命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它并不是一个拒绝自我批评的组织。

恰恰相反，菲律宾共产党长期强调：
革命党内部同样存在阶级斗争。

这也是毛主义区别于许多僵化教条主义的重要特点之一。

因为革命者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

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军事主义、机会主义等倾向，会不断影响革命组织。

如果党不能主动清理错误路线，那么这些错误最终就可能腐蚀整个革命。

因此，菲律宾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开展“纠正运动”（Rectification Movement）。

这些运动的核心目的，并不是简单“整人”，而是：
通过思想斗争恢复党的革命路线。

例如：

批判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主义；
批判忽视武装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
批判地方主义与山头主义；
批判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
强调群众路线与党的集中统一。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许多革命组织失败，并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因为内部路线混乱、组织涣散、机会主义泛滥。

列宁曾强调：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

而菲律宾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连续性，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不断强调：

党的领导；
纪律；
思想斗争；
批评与自我批评；
与群众结合。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菲律宾革命没有问题。

任何长期革命都必然会面临复杂矛盾。

但菲律宾革命的重要意义正在于：
它并没有因为困难而彻底放弃革命道路，而是在斗争中不断尝试纠正错误、恢复革命性。

这与许多一遇挫折便迅速走向修正主义的组织形成了鲜明对比。

因此，从反修正主义的角度来看，菲律宾革命最大的历史意义之一就在于：

它证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与世界革命低潮的时代里，革命仍然可以坚持，人民战争仍然可以延续，而真正的共产党依然能够存在。

六、菲律宾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启示

菲律宾革命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菲律宾本身。

在今天这个时代，当许多人宣称“革命已经过时”、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时候，菲律宾革命的长期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些论调最直接的反驳。

它说明：

只要阶级压迫仍然存在，革命就不会消失。

而菲律宾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也为世界革命运动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与启示。

（1）革命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

菲律宾革命首先证明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从来不是机械背诵经典，更不是照搬外国经验。

毛泽东曾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菲律宾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重新发展起来，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

它没有简单复制苏联模式，也没有机械模仿中国革命，而是把马列毛主义同菲律宾具体社会条件结合了起来。

菲律宾革命认识到：

菲律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农民占人口多数；
帝国主义控制严重；
农村是革命的重要基础；
革命必须长期化。

因此，他们采取了人民战争路线。

这说明：

革命路线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

与此同时，菲律宾革命也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种，是教条主义。

即把经典著作中的结论机械照搬，而不分析现实条件。

第二种，则是机会主义。

即以“现实”为借口，放弃革命原则，最终滑向改良主义。

真正的革命路线，必须是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具体问题。

这一点，对于今天世界各国的革命者而言，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2）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

菲律宾革命还证明了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被压迫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还包括：

农民；
小资产阶级；
青年学生；
民族少数；
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因此，革命不可能孤立进行。

它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但与此同时，菲律宾革命也证明了另一个关键问题：

统一战线不能脱离共产党的领导。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那么统一战线很容易蜕变为：

自由主义联盟；
民族主义集团；
改良主义平台；
议会主义工具。

这也是许多“左翼联盟”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们害怕强调党的领导，害怕阶级斗争，最后只能不断向资产阶级妥协。

而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NDFP）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革命性质，就在于：它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路线。

这意味着：
统一战线并不是取消党的独立性，而是在保持党的领导前提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毛泽东曾强调：

“又联合，又斗争。”

这说明：
共产党既要联合其他革命力量，同时也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领导权。

否则，革命就会失去方向。

——

（3）长期斗争与革命乐观主义

菲律宾革命还向世界证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

五十多年来，菲律宾革命经历过：

国家军事围剿；
白色恐怖；
大规模逮捕；
革命低潮；
国际环境恶化；
党内错误路线斗争；
帝国主义干涉。

但革命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

为什么？

因为真正扎根群众的革命，不会因为暂时的失败而终结。

这一点，与小资产阶级政治形成了鲜明对比。

小资产阶级思想往往具有强烈的情绪化特征：

顺利时极度乐观；
遭受挫折时迅速悲观；
一旦失败就否定整个革命事业。

而马列毛主义则强调：

革命是长期历史过程。

列宁曾指出：

“革命从来不是直线发展的。”

菲律宾革命恰恰体现了这种长期性。

它并没有因为一时力量弱小就放弃斗争，也没有因为暂时困难就转向投降主义。

这种革命乐观主义，并不是盲目乐观。

恰恰相反，它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基础上。

因为只要：

阶级压迫存在；
帝国主义存在；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
人民贫困存在，
那么反抗就一定会继续产生。

菲律宾革命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证明了：

即使在世界革命低潮时期，即使修正主义广泛扩散，即使革命遭受严重镇压，真正的革命力量仍然能够长期存在。

而这一点，对于今天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七、国际主义：菲律宾人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

菲律宾革命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不仅是菲律宾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时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国际性质。

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全球性的。

帝国主义通过：

金融资本；
跨国企业；
军事联盟；
国际贸易体系；
债务控制；
文化霸权
在全球范围内压迫劳动人民。

因此，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一国之内。

菲律宾革命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展开的。

（1）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菲律宾共产党与全国民主阵线长期强调：
菲律宾革命既是民族民主革命，同时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只关心本国问题，而无视其他国家人民所遭受的压迫。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味着：
革命者必须把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视为共同事业。

因此，菲律宾革命长期支持：

巴勒斯坦人民反抗殖民压迫；
拉丁美洲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干涉；
亚洲、非洲与中东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世界各国工人运动与农民斗争。

与此同时，菲律宾革命自身也得到了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持。

这说明：

帝国主义是国际性的，革命同样必须具有国际性。

列宁曾指出：

“资本已经成为国际的和垄断的。因此工人运动也必须成为国际的。”

而菲律宾革命几十年的坚持，本身就是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2）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

菲律宾革命还深刻体现了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性。

菲律宾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依附与政治动荡状态，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
美帝国主义长期控制菲律宾。

美国不仅通过资本输出控制菲律宾经济，同时还通过军事合作、政治代理人与文化渗透维持自身霸权。

因此，菲律宾革命始终把反帝国主义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但菲律宾革命也指出：

真正的反帝斗争，不能停留在抽象民族主义层面。

因为仅仅反对“外国干涉”，却不反对本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最终只会变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真正的反帝斗争，必须与阶级斗争结合。

这也是马列毛主义区别于狭隘民族主义的重要地方。

菲律宾革命长期强调：

帝国主义与本国统治阶级是相互勾结的；
买办资产阶级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统治的重要支柱；
不推翻本国反动统治，就无法真正摆脱帝国主义控制。

因此，菲律宾革命的反帝路线始终具有明确的阶级性质。

与此同时，这种反帝斗争也需要国际联合。

因为今天的帝国主义体系并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

因此：

世界工人阶级需要联合；
被压迫民族需要联合；
革命组织之间需要建立国际联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重新发展。

菲律宾革命在这一点上，为当代国际革命运动提供了重要经验。

(3) 对中国革命者与世界革命者的启示

菲律宾革命对于今天世界各国革命者，尤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革命者，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它说明：

革命不能脱离群众。

许多组织失败，并不是因为理论不够“激进”，而是因为：

脱离工农群众；
脱离实际斗争；
沉迷于网络政治；
沉迷于小圈子政治；
缺乏长期组织建设。

而菲律宾革命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始终扎根于农村、工人和群众组织之中。

其次，它说明：

革命必须坚持组织原则。

一个缺乏纪律、缺乏路线斗争、缺乏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很容易迅速瓦解。

菲律宾革命长期强调：

党的领导；
民主集中制；
批评与自我批评；
反对机会主义；
群众路线。

这些原则，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菲律宾革命还说明：

即使在世界革命低潮时期，革命本身也并未终结。

今天，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可战胜”，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

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资本主义危机仍在不断加深：

贫富分化扩大；
工人处境恶化；
帝国主义战争不断；
金融资本掠夺全球；
大量人民陷入贫困与失业。

因此，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

而菲律宾革命五十多年的坚持，则向世界证明：

只要压迫存在，人民就会反抗；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革命就不会结束。

八、结语：革命的旗帜不会倒下

五十三年过去了。

从1973年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NDFP）成立至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苏联已经解体；
许多曾经的共产党已经蜕变；
大量革命组织放弃了武装斗争与阶级斗争；
帝国主义则不断宣扬所谓“历史终结”。

然而，菲律宾革命依然存在。

这本身，就已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情：

人民并没有屈服。

即使面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家机器、长期军事围剿、白色恐怖与修正主义攻击，菲律宾革命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道路。

这说明：

真正扎根群众的革命，不会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消失；
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者，也不会因为世界革命低潮而放弃斗争。

菲律宾革命五十三年的历史，是一部人民反抗压迫的历史。

它不仅是菲律宾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史，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场长期斗争中，无数革命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之中，有人在山地游击区牺牲；
有人死于监狱与酷刑；
有人在地下斗争中被暗杀；
也有人在长期艰苦斗争中默默奉献了一生。

他们或许没有留下显赫的名字，但他们的斗争不会被遗忘。

因为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从来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人民群众。

今天，当我们纪念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成立五十三周年时，我们不仅是在回顾过去，更是在思考未来。

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
广大劳动人民依然遭受压迫。
战争、贫困、失业、民族压迫与资本掠夺依然广泛存在。

因此，革命的历史任务并没有结束。

菲律宾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

没有真正的共产党，就不会有真正的革命；
没有群众路线，革命就会脱离人民；
没有武装斗争，被压迫人民就无法真正掌握政权；
没有反修正主义斗争，共产党就会蜕变；
没有长期组织建设，革命就无法持续。

与此同时，菲律宾革命也告诉世界：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革命者依然能够坚持斗争。

因为人民终究不会永远忍受压迫。

帝国主义并非不可战胜；
资本主义并非永恒不变；
修正主义也不可能永远掩盖阶级矛盾。

历史的发展，最终仍然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斗争。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让我们向菲律宾共产党（CPP）、菲律宾全国民主阵线（NDFP）以及新人民军（NPA）的革命战士致敬；

向所有为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事业牺牲的烈士致敬；

向全世界仍然坚持斗争的工人、农民与革命人民致敬。

革命的旗帜不会倒下。

只要世界上仍然存在压迫与剥削，
人民的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

菲律宾人民的革命斗争万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万岁！
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万岁！

纪念列宁同志诞辰156周年

一、引言：列宁的名字为何至今仍让资产阶级恐惧

2026年4月22日，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156周年。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已经解体，许多曾经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早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大量共产党蜕变为议会主义与改良主义组织，帝国主义则不断宣扬所谓“共产主义失败论”与“历史终结论”。

然而，即使在今天，列宁的名字依然让资产阶级感到恐惧。

为什么？

因为列宁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

列宁代表着：

无产阶级革命；
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无产阶级专政；
帝国主义时代的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而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消失。

资本主义并没有终结阶级压迫，反而在帝国主义阶段进一步加深了全球的不平等与剥削。

今天的世界依然充满：

帝国主义战争；
金融资本掠夺；
工人贫困化；
大规模失业；
新殖民主义统治；
国家暴力镇压；
法西斯主义与民族压迫。

因此，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

恰恰相反，帝国主义时代越是发展，列宁主义就越显示出其现实意义。

资产阶级之所以不断污蔑列宁，并不是因为列宁“失败了”，而恰恰是因为列宁真正触碰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问题。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列宁则进一步指出：

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摧毁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

这正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事情。

因此，我们看到：

资产阶级可以允许人们“研究”马克思，把马克思变成大学里的“学术对象”；也可以允许某些改良主义者空谈“社会主义价值”；甚至允许一些左翼政党存在于议会之中。

但他们绝不会真正接受列宁主义。

因为列宁主义不是空洞的道德批判，而是现实的革命理论。

列宁主义明确指出：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议会民主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
帝国主义战争来源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
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先锋队政党；
革命不能依靠改良，而必须依靠阶级斗争。

也正因如此，列宁始终是资产阶级最痛恨的革命家之一。

与此同时，列宁主义对于今天的革命者而言，依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为今天世界左翼最大的问题之一，恰恰是：
修正主义与机会主义泛滥。

许多组织已经放弃：

阶级斗争；
革命暴力；
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建设；
革命纪律。

他们沉迷于：

议会主义；
工会经济主义；
NGO化；
身份政治；
网络政治；
合法主义幻想。

这种倾向，本质上正是列宁当年所批判的机会主义在今天的新形式。

因此，重新纪念列宁，并不仅仅是“缅怀历史”。

更重要的是：
重新回到革命问题本身。

列宁的一生，并不是书斋中的一生，而是革命斗争的一生。

他在地下工作中过；
在流亡中坚持过；
在分裂与路线斗争中坚持过；
在战争与白色恐怖中坚持过；
最终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

十月革命证明了一件事情：

工人阶级不仅能够反抗资本主义，而且能够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一历史意义，并不会因为苏联后来的修正主义蜕变而消失。

恰恰相反，苏联后来的蜕变更加说明：
如果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反修正主义斗争，那么社会主义政权同样可能复辟资本主义。

因此，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立场来看，列宁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今天与未来。

因为：

帝国主义仍然存在；
资本主义危机仍然存在；
阶级斗争仍然存在；
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而只要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列宁主义就不会失去意义。

今天，当我们纪念列宁诞辰156周年时，我们纪念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更是在纪念：
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本身。

第二部分：列宁主义的形成——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它不是某种脱离现实的抽象理论，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重复。恰恰相反，列宁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在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

因此，理解列宁主义，就必须首先理解：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列宁时代必须进一步发展。

（1）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仍然主要表现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大量资本家彼此竞争，工业资本迅速扩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

但随着资本积累与资本集中不断加深，自由竞争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

越来越多的资本被少数大型企业、银行与垄断集团所控制。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

“自由竞争产生集中，而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导致垄断。”

这意味着：
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由竞争体系，而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与此同时，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逐渐融合，形成了金融资本。

金融寡头开始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并通过资本输出而不是单纯商品输出，在全球范围内掠夺利润。

因此，帝国主义阶段具有几个根本特征：

垄断资本统治；
金融资本支配；
资本输出占据重要地位；
国际垄断同盟形成；
世界领土被列强瓜分。

列宁指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和寄生的资本主义。”

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

因为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市场与资源，必然爆发激烈冲突。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矛盾的结果。

列宁深刻揭示了这一点：

帝国主义战争并不是什么“民族保卫战争”，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掠夺战争。

这也是列宁主义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

（2）第二国际的破产

然而，更严重的问题并不仅仅来自帝国主义本身。

真正震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第二国际内部的大规模背叛。

原本，欧洲许多社会民主党都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并长期高喊国际主义口号。

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量第二国际政党却突然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支持帝国主义战争。

他们以“保卫祖国”的名义，要求工人阶级去互相屠杀。

德国工人被迫为德国资本家作战；
法国工人被迫为法国资产阶级作战；
俄国工人则被沙皇政府送上战场。

国际主义口号瞬间被抛弃。

第二国际事实上破产了。

列宁对此极为愤怒。

因为这意味着：
大量所谓“社会主义者”，在关键时刻站到了本国资产阶级一边。

列宁指出：

“机会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这一判断极其重要。

因为列宁第一次系统揭示了：
修正主义并不是单纯“思想错误”，而是一种现实的阶级倾向。

随着帝国主义发展，部分发达国家资产阶级通过超额利润收买了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形成了“工人贵族”。

而机会主义政党，正是这种工人贵族利益的政治代表。

因此，他们害怕革命，害怕阶级斗争，更害怕无产阶级真正夺取政权。

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国际最终会在战争中背叛国际主义。

与此同时，列宁还严厉批判了考茨基主义。

考茨基原本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却逐渐滑向中派机会主义。

他口头上仍然谈社会主义，却拒绝真正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拒绝革命。

列宁指出：

“考茨基主义是机会主义最危险的形式。”

因为它最具有欺骗性。

它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却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秩序。

这一点，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因为现代许多所谓“左翼”组织，实际上依然延续着类似逻辑：

口头激进；
实际改良；
害怕革命；
迷信议会；
回避阶级斗争。

从本质上说，这正是机会主义的新形式。

(3)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面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条件，列宁并没有机械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而是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其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帝国主义理论。

列宁指出：

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政策选择”，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因此：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列宁还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第二国际许多人认为：

社会主义只能首先在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

但列宁则指出：

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链条并不是均衡的。

因此，革命完全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俄国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正因为其内部矛盾尖锐、国家危机严重、帝国主义压迫加深，反而成为革命最容易突破的地方。

这一理论，后来被十月革命所证明。

同时，它也对后来的中国革命、越南革命以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列宁主义由此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它不仅研究资本主义本身，同时也研究：

帝国主义；
世界体系；
殖民地问题；
革命战略；
党的建设；
国家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

也正因如此，列宁主义成为了：

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部分：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

如果说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么列宁对于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则真正奠定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基础。

因为列宁十分清楚：

工人阶级不会自动形成革命意识。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虽然会自发反抗压迫，但这种自发斗争如果缺乏革命理论与革命组织的领导，就很容易停留在：

工资斗争；
工时斗争；
工会主义；
改良主义；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部不满。

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己的革命先锋队。

而这，也正是列宁党建理论的核心。

——

(1) 《怎么办？》与先锋队理论

1902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系统批判了“经济派”与尾巴主义。

所谓“经济派”，主张共产党只应当帮助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例如：

提高工资；
缩短工时；
改善劳动条件。

他们认为：
政治斗争会随着经济斗争“自然发展”。

列宁则尖锐指出：

如果工人运动停留在自发经济斗争层面，那么最终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不是社会主义意识。

他明确写道：

“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这里的“从外面灌输”，并不是说工人阶级不能革命，而是说：
社会主义理论不是资本主义日常生活自发产生的。

革命理论必须通过共产党传播到工人运动之中。

因此，列宁提出：
共产党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而这个先锋队，并不是松散的群众俱乐部。

列宁特别强调：

党是革命家组织与工人组织的结合体。

其中：

革命家的组织是纲；
工人的组织是目。

这意味着：
真正的革命核心，必须由坚定的职业革命家组成。

因为革命不是临时性的情绪爆发，而是长期、严密、危险的阶级斗争。

在沙皇专制统治下，革命者随时面临：

逮捕；
流放；
地下工作；
特务渗透；
组织破坏。

因此，如果没有一支高度集中、纪律严明、理论坚定的革命家队伍，党根本无法长期存在。

与此同时，党又不能脱离工人群众。

革命家的组织必须深入工人运动，组织工人、教育工人、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把自发斗争转变为自觉革命。

也就是说：

革命家的组织是领导核心，
工人的组织则是革命的广泛基础。

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只有革命家而脱离群众，那么党就会蜕变为宗派主义小集团；
如果只有松散群众组织而没有革命核心，那么运动就会沦为尾巴主义和经济主义。

这，正是列宁党建理论最深刻的地方之一。

（2）民主集中制与党的纪律

与此同时，列宁还极其强调党的组织纪律。

因为在列宁看来：

革命党不是讨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组织。

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与地下斗争环境下，一个缺乏纪律的党，最终只能被国家机器轻易瓦解。

因此，列宁提出：
共产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所谓民主集中制，并不是单纯“民主”加“集中”的机械拼凑，而是：
在党内充分讨论基础上形成统一意志，并在行动中保持集中统一。

列宁强调：

“行动一致，讨论自由。”

这一原则意味着：

党内可以展开路线斗争；
可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可以讨论问题；

但一旦形成统一决定，全党就必须统一行动。

否则，革命组织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列宁尤其反对自由主义与小组习气。

因为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往往：

强调个人自由；
拒绝纪律；
热衷空谈；
害怕集中领导；
不愿服从组织。

这种倾向，在列宁看来，本质上会摧毁革命。

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本身是高度集中、有组织、有暴力支撑的。

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反而组织涣散，那么根本不可能与之斗争。

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在长期地下斗争、镇压和战争中坚持下来，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它拥有高度纪律性与组织性。

（3）党与群众的关系

然而，列宁党建理论绝不是单纯强调“集中”而忽视群众。

恰恰相反，列宁始终认为：

共产党必须扎根于群众。

他反复强调：
党不能成为脱离群众的宗派。

列宁指出：

“党是阶级的先锋队。”

但先锋队并不意味着代替群众。

先锋队的任务，是：
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并带领群众前进。

因此，列宁既反对尾巴主义，也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

他曾批评一些人：
只知道空谈“革命”，却不愿深入工人群众实际生活。

与此同时，列宁还特别强调：

共产党不能停留在群众当前的落后水平。

因为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因此，党的任务不是迎合落后意识，而是：
不断提高群众觉悟。

列宁曾指出：

“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那只是欺骗自己。”

这意味着：
共产党既必须联系群众，又必须保持理论与政治上的先进性。

如果党完全迎合群众当前意识，那么党最终就会失去革命方向；
但如果党脱离群众，那么革命又会失去基础。

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功，恰恰就在于：
它既保持了高度集中统一，又始终深入工人群众与士兵群众之中。

也正因如此，布尔什维克党最终能够在1917年真正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第四部分：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

列宁主义不是书斋里的理论，而是在革命实践中被证明的理论。

1917年的十月革命，正是列宁主义最伟大的历史实践。它第一次使无产阶级不是作为被压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是作为统治阶级、作为新社会的建设者登上历史舞台。

十月革命向全世界证明：

工人阶级不仅能够反抗资本主义，而且能够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

（1）1917年的革命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社会的全部矛盾推向了爆发点。

沙皇专制制度腐朽不堪，贵族地主阶级压迫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数百万士兵被送上前线，为帝国主义利益流血牺牲。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制度被推翻。

但问题在于：

沙皇倒台，并不意味着工人和农民已经获得解放。

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本质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权。它不愿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不愿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也不愿真正把权力交给工人、农民和士兵。

因此，俄国形成了特殊的“双重政权”局面：

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另一方面，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建立起来的苏维埃。

这时，革命的核心问题已经变成：

政权究竟归谁？

是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是归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

——

（2）《四月提纲》的伟大意义

列宁回到俄国后，立即提出《四月提纲》。

这份纲领的伟大之处在于：

它没有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而是明确提出革命必须继续前进。

列宁提出：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这句话不是一句普通口号，而是对当时俄国革命任务的集中概括。

它意味着：

不能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
必须把银行和资本置于革命政权控制之下；
必须让工人、士兵和农民通过苏维埃掌握国家权力。

这恰恰体现了列宁最伟大的地方：

他不是机械地套用“阶段论”，而是具体分析具体形势。

在二月革命之后，俄国资产阶级已经证明自己无力完成真正的民主革命任务。继续支持临时政府，就等于把革命交给资产阶级出卖。

因此，列宁坚决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路线。

他们认为革命应该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应该支持临时政府；而列宁则指出，革命必须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这正是布尔什维克与机会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

（3）武装起义与苏维埃政权

到了1917年秋天，革命形势已经成熟。

工人不愿继续忍受资本家的剥削；
农民要求土地；
士兵要求和平；
广大群众已经逐渐看清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本质。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坚决主张发动武装起义。

因为他非常清楚：

政权问题不能用空谈解决。

资产阶级不会主动交出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革命行动夺取政权，就会被反革命力量重新镇压。

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诞生。

从此以后，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书本中的理想，而成为现实的国家政权。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

退出帝国主义战争；
颁布土地法令；
建立工人监督；
打击反革命势力；
建立红军；
开始社会主义建设。

这说明：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为了更换一批统治者，而是为了彻底改造社会关系。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它打破了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证明了无产阶级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可以开始建设新的社会。

——

（4）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它向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证明：

帝国主义并非不可战胜。

它鼓舞了中国、越南、朝鲜、印度、菲律宾、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

从十月革命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主义成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的立场看，十月革命的意义并没有因为苏联后来被修正主义篡夺而消失。

恰恰相反，苏联后来的变质进一步说明：

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终点。

如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如果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这正是毛泽东在继续革命理论中进一步发展列宁主义的地方。

因此，我们纪念十月革命，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而是为了继续推进未来的革命事业。

第五部分：列宁对国家、革命与阶级斗争的理论贡献

列宁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重新恢复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

资产阶级最害怕列宁，并不只是因为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更因为列宁把国家问题讲得极其清楚：

国家不是超阶级的公共机关，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这一点，直接打碎了议会主义、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切幻想。

（1）《国家与革命》的核心思想

1917年，列宁写下《国家与革命》。

这部著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反对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

机会主义者把国家说成是“全民”的、“中立”的、“公共管理”的机关。他们认为，只要通过议会多数、合法改革、和平选举，就可以逐步把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则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国家不是可以简单接管的工具，而是必须被打碎的旧国家机器。

因为这个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包括：

常备军；
警察；
官僚机关；
法庭；
监狱；
资产阶级议会制度。

这些东西不是中立的，而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

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换一个政府、换几个部长、换几个议员，而是要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

这正是巴黎公社给马克思主义留下的重要经验，也是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真正实践出来的东西。

（2）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列宁指出，任何国家都是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专政；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必须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专政。

因此，所谓“纯粹民主”是骗人的。

在阶级社会里，民主总是有阶级内容的。

资产阶级民主表面上给所有人投票权，实际上却建立在资本统治、媒体垄断、金钱政治和国家暴力之上。工人可以投票，但资本家掌握工厂、银行、报纸、警察和军队。

这种“民主”，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外壳。

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揭露了这个外壳。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把民主从少数剥削者手里夺回来，变成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

也就是说：

对工人、农民和劳动群众实行最广泛的民主；
对反革命分子、剥削阶级和复辟势力实行专政；
用新的国家机器镇压旧社会的反抗；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消灭阶级。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

这一点，是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的根本分界线。

（3）国家的消亡与社会主义过渡

列宁并没有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永恒状态。

他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认为国家最终要走向消亡。

但是，国家不是靠空喊“取消国家”就能消亡的。

无政府主义者幻想立刻废除国家；修正主义者幻想和平改良国家；列宁则指出：

只有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剥削阶级反抗，消灭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国家才可能逐步消亡。

换句话说：

不是先消灭国家，然后进入社会主义；
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消灭阶级，最后使国家失去存在的必要。

这也是列宁对无政府主义的根本批判。

无产阶级不能在资产阶级国家面前解除武装。相反，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作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工具。

（4）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的立场来看，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毛泽东后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列宁已经看到：

社会主义不是一夜之间建成的。旧社会的残余、资产阶级思想、官僚主义、商品关系和小生产习惯，都会长期存在。

这意味着，即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也不会自动消失。

后来苏联被修正主义篡夺，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共产党不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发动群众监督国家机关，那么无产阶级国家就可能逐渐蜕变。

毛泽东正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列宁主义，提出：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所以，列宁主义并没有停留在1917年。

它通过毛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纪念列宁，就不能把列宁变成博物馆里的画像，而必须把列宁国家学说同今天的反修正主义斗争结合起来。

因为今天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仍然是回避国家问题。

他们谈“民主”，却不谈哪个阶级的民主；
他们谈“自由”，却不谈哪个阶级的自由；
他们谈“改革”，却不谈国家机器掌握在谁手里。

而列宁主义的锋芒就在这里：

不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没有无产阶级解放；
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
不继续反对修正主义，就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第六部分：列宁与反修正主义斗争

纪念列宁，绝不能把列宁变成一个温和的历史符号。

列宁的一生，就是同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考茨基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影响工人运动的倾向进行斗争的一生。

如果抽掉反修正主义斗争，列宁主义就会被阉割成空洞的纪念口号。

（1）列宁如何批判考茨基与机会主义

在第二国际时期，考茨基曾经被许多人看作“正统马克思主义者”。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了。

他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反对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国内革命战争；他口头上谈阶级斗争，实际上却不敢同本国资产阶级彻底决裂；他口头上维护社会主义，实际上却为社会沙文主义和改良主义提供理论掩护。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判极其尖锐。

因为列宁看到：

最危险的敌人，不一定是公开反共的资产阶级，而是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却取消革命的人。

这种机会主义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无害的、合法的、议会化的东西。

它不否认“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否认通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它不公开反对工人运动，但要把工人运动限制在资产阶级秩序允许的范围内。

这正是列宁主义与考茨基主义的根本分界线。

（2）列宁反对经济主义与尾巴主义

列宁早在《怎么办？》中，就已经同经济主义进行了决裂。

经济派认为，工人阶级应该首先搞经济斗争，争取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改善，政治斗争则可以以后再说。

列宁则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在把工人阶级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

因为单纯的经济斗争，最多只能改善被剥削的条件，而不能消灭剥削本身。

工人当然要为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斗争，但共产党不能停留在这里。

共产党必须把经济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把局部斗争提升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反对尾巴主义。

尾巴主义的特点，就是群众自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群众暂时只关心工资，它就只谈工资；群众暂时不理解革命，它就不敢讲革命。

列宁主义则恰恰相反：

共产党不是群众落后意识的记录员，而是群众前进方向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党必须深入群众，但不能跪在群众自发性面前。

党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也必须用革命理论提高群众，把自发斗争转化为自觉斗争。

（3）列宁反对议会迷与合法主义幻想

列宁并不抽象反对利用议会。

但列宁反对把议会斗争当成主要道路，更反对把议会斗争神圣化。

在资产阶级国家中，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外壳。议会允许工人阶级表达某些不满，但不会允许工人阶级真正掌握政权。

因此，革命者可以利用议会作为宣传阵地，但绝不能把革命希望寄托在议会多数上。

这正是列宁与改良主义者的区别。

改良主义者把议会当作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主义者则把议会看作揭露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场所。

前者把群众引向选票崇拜；
后者把群众引向阶级斗争。

这对今天尤其重要。

今天许多所谓左翼组织，已经完全退化成选举机器。他们一切政治活动都围绕议席、联盟、竞选和合法身份展开，害怕革命口号，害怕国家问题，害怕阶级专政问题。

这种路线，本质上就是现代考茨基主义。

（4）列宁主义与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本对立

列宁去世以后，列宁主义并没有自然安全地保存下来。

相反，修正主义始终试图篡改列宁。

赫鲁晓夫集团上台后，打着“反个人崇拜”的旗号，实际上否定斯大林，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阶级斗争，提出所谓“全民国家”“全民党”和“和平过渡”。

这不是对列宁主义的继承，而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

列宁讲的是阶级国家，他们讲“全民国家”；
列宁讲的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他们讲“全民党”；
列宁讲的是暴力革命与打碎旧国家机器，他们讲“和平过渡”；
列宁讲的是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他们却幻想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到取消阶级斗争。

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苏修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上台。

毛泽东后来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正是对这种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5）今天纪念列宁，就是要反对一切新旧修正主义

今天纪念列宁，不能只是献花、写纪念文章、挂画像。

真正纪念列宁，就是要坚持列宁的革命原则：

坚持共产党领导；
坚持阶级斗争；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反对帝国主义；
坚持反对议会主义和改良主义；
坚持反对党内机会主义路线。

一切把列宁变成“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企图，都是篡改列宁。

一切只讲列宁的组织能力、不讲列宁的革命暴力理论的做法，都是阉割列宁。

一切只纪念十月革命，却否认继续革命和反修正主义斗争的人，最终都会把列宁主义带回第二国际的泥坑里。

因此，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的立场出发，列宁主义必须同毛主义结合起来理解。

列宁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先锋党、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列宁主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揭示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

这条线索是完整的：

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进一步发展为毛主义。

而今天的反修正主义斗争，正是对这条红线的坚持。

第七部分：列宁主义与毛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

纪念列宁，不能把列宁主义孤立起来看。

列宁主义不是一座静止的纪念碑，而是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发展。后来，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中，把列宁主义进一步向前推进。

所以，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的立场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断裂的，而是一条连续的革命红线：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

(1) 毛泽东如何继承列宁主义

毛泽东首先继承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基本判断。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革命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爆发。毛泽东则把这一理论进一步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指出中国革命不能照搬欧洲城市起义模式，而必须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

因此，中国革命走出了：

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
建立革命根据地；
发动农民群众；
长期人民战争
的道路。

这不是对列宁主义的否定，而是对列宁主义的具体化和发展。

列宁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总问题；毛泽东则进一步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2) 毛主义对列宁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对列宁主义最伟大的发展之一，是人民战争理论。

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政权。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革命政权可以首先在农村根据地中建立起来，通过长期战争逐步扩大，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这使革命不再只是一次城市中心的决战，而成为群众长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建设新政权的过程。

同时，毛泽东还发展了群众路线。

列宁强调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党做群众自发性的尾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领导与群众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说明：

党既不能脱离群众，也不能跪拜群众的自发性；
党必须集中群众的经验，把它上升为路线，再带回群众中去。

(3)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毛主义对列宁主义最深刻的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列宁已经指出，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旧社会残余，仍然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但苏联后来的历史表明：仅仅夺取政权并不等于革命完成。

党内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官僚主义会腐蚀社会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法权仍然会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土壤；
修正主义路线一旦上台，就会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正是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因此，革命不能在夺取政权之后停止。

无产阶级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继续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改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继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这正是毛主义高于单纯列宁主义理解的地方。

(4) 为什么今天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今天如果只讲马克思，而不讲列宁，就会滑向第二国际式的改良主义。

如果只讲列宁，而不讲毛泽东，就无法真正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复辟资本主义，也无法回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

因此，今天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主要是毛主义”，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和列宁，而是承认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最高阶段。

毛主义把以下问题推进到了新的高度：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道路；
持久人民战争；
群众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所以，纪念列宁，最终不能停留在列宁本人。

真正纪念列宁，就是沿着列宁开辟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而在今天，这条道路必然通向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列宁的旗帜，只有在毛主义的发展中，才能继续高高飘扬。

八、结语：列宁的旗帜仍然在飘扬

156年过去了。

从1870年列宁诞生，到1917年十月革命，再到今天，世界已经经历了战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主义复辟与全球化扩张。

资产阶级不断宣称：
“列宁已经过时了。”
“革命已经失败了。”
“资本主义没有替代方案。”

然而，现实却一次又一次证明：

列宁所揭示的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帝国主义没有消失；
金融资本统治没有消失；
战争与殖民掠夺没有消失；
阶级压迫没有消失；
资本主义危机没有消失。

因此，列宁主义也没有失去意义。

恰恰相反，在今天这个时代，列宁主义依然是理解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理解资产阶级国家本质、理解共产党建设以及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武器。

列宁最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

他不仅解释了世界，而且真正改变了世界。

十月革命第一次证明：
工人阶级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能够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能够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历史事实，永远无法被资产阶级抹去。

当然，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的立场看，我们也必须看到：

十月革命并不是历史的终点。

苏联后来被修正主义篡夺，恰恰说明：
社会主义时期依然存在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

如果不继续革命，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蜕变。

毛泽东正是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列宁主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因此，今天真正纪念列宁，绝不能停留在空洞赞美上。

真正纪念列宁，就是要：

坚持无产阶级革命；
坚持共产党领导；
坚持阶级斗争；
坚持反帝国主义；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反修正主义；
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今天，许多所谓左翼已经放弃革命。

他们沉迷于：

议会主义；
改良主义；
NGO化；
身份政治；
网络空谈；
合法主义幻想。

他们害怕谈革命，害怕谈国家问题，害怕谈阶级专政，甚至害怕谈共产主义本身。

但列宁主义的锋芒恰恰就在于：

它要求无产阶级真正夺取政权，而不是乞求资产阶级施舍改革。

因此，列宁的名字直到今天仍然让资产阶级感到恐惧。

因为列宁代表的，不是温和改良，而是：
革命。

今天，当我们纪念列宁诞辰156周年时，我们纪念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更是在纪念：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本身。

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
列宁主义就不会消失；

只要帝国主义仍然存在，
世界人民的反抗就不会停止；

只要阶级压迫仍然存在，
共产主义的旗帜就仍然会继续飘扬。

让我们向列宁致敬；
向十月革命的先烈致敬；
向全世界仍然坚持斗争的工人、农民与革命人民致敬。

列宁主义万岁！
十月革命的旗帜永不落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万岁！

作业本、耳光与应试教育的冷酷机器

I. 事件本质的阶级分析：资本主义复辟下无产阶级后代遭受的残酷压迫

同志们！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教导我们：“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今日修正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教育领域已彻底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后代——尤其是像衡州小学2206班这个四年级小学生这样的工农子弟——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阶级压迫。这起跳楼自杀事件，绝非什么“个别教师师德败坏”或“家庭教育失当”的表面现象，而是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在教育战线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集中爆发。它以血淋淋的事实，戳穿了修正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谎言，暴露了走资派复辟后，资产阶级法权如何在学校这个“独立王国”里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无产阶级的未来。

首先，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剥开事件的表象，直指其阶级实质。网传的家长与教师微信聊天记录，清晰记录了教师的暴行：作业只写了“4个”字，就“把本子撕了”“狠狠的打了他一顿”，还恶毒地嘲讽“你可以给他一个袋子，让他去外面捡破烂去”。这哪里是“教育方法不当”？这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子女的体罚与精神羞辱！毛主席早在1966年就尖锐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今日的“人民教师”，表面上拿着公办编制、拿着修正主义国家的工资，实质上已完全异化为资产阶级代理人 and 打手。他们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是为“升学率”“绩效考核”“市场经济”服务。四年级孩子“学习效率慢、作业写得慢、字丑”，在他们眼里不是需要耐心帮助的劳动人民后代，而是“废品”“拖后腿的”，必须用暴力“纠正”——这正是资本主义复辟后，教育领域重新建立的“优胜劣汰”剥削逻辑。毛主席在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的“两个估计”时强调，旧教育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而今修正主义教育更是变本加厉，把工农子弟往“捡破烂”的底层劳动力方向驱赶。

其次，事件中多重压迫的叠加，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如何异化劳动人民内部关系。家长在回复中承认：“每到周末孩子写作业我们也会崩溃，他的慢这么多年来始终改不了，我们有时候也打的很猛。”这不是简单的“家长无知”，而是列宁早就指出的“小生产者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在家庭中的体现——小资产阶级在市场经济压力下，自身被异化，却把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家庭暴力与学校体罚形成共振，共同摧毁了孩子的“自尊心”和身心健康，最终导致跳楼这一悲剧。毛主席教导：“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如果让这些法权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走向资本主义。”

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残余、绩效考核，这些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不仅存在于工厂，更渗透到学校和家庭，把师生、亲子关系扭曲成“管理与被管理”“压迫与被压迫”。孩子不过9-10岁，正处于世界观形成的黄金期，却被贴上“慢”“丑”“没用”的阶级标签，陷入“习得性无助”——这不是个人悲剧，而是整个修正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后代的系统性谋杀。

最后，现场维稳的画面，进一步暴露了修正主义政权的专政性质。4月23日，家属在衡州小学门口雨中维权，拉横幅、烧纸祭奠，穿白布哀悼，却遭遇“数名警察在现场维稳”。这哪里是保护“社会稳定”？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专政对劳动人民反抗的镇压！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修正主义走资派，却用警察、维稳机器来“以维稳压维权”，保护教师这个修正主义教育机器的“执行者”，掩盖事件的阶级根源。这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群众造反夺权形成鲜明对比。那时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现在却是“维稳机器镇压群众”。事件至今无任何官方通报、警方调查结果或校方回应，只在海外社交媒体流传，更证明修正主义政权惧怕真相曝光，惧怕无产阶级觉醒。

同志们！这一事件绝非孤立。近年来类似学生自杀案例层出不穷（如2023年衡阳另一中学事件及其他省份），每一起都印证了毛主席的预言：“走资派还在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发动新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悲剧只会继续重演。无产阶级后代不是修正主义教育的“炮灰”，而是未来革命的火种！只有彻底砸烂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才能让这样的压迫永远成为历史。

II. 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罪恶根源：从文革教育革命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同志们！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明确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今日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已彻底背叛了这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把学校变成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工具。衡州小学这起四年级学生跳楼自杀事件，正是这一制度罪恶的必然产物。它不是“教育改革中的阵痛”，而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以来，教育领域从文革革命成果到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倒退的集中体现。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露其罪恶根源，戳穿修正主义“教育现代化”“双减政策”的伪装，唤醒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

首先，必须进行历史对比，揭露修正主义对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彻底背叛。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亲自发动了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十六条》和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求打破旧教育“关门办学”“死读书”的枷锁，实行“开门办学”、工农兵占领教育阵地、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文革时期，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学生学工学农，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邓小平上台后，抛出“猫论”“摸着石头过河”的修正主义纲领，教育领域首当其冲地复辟：恢复高考、重点校制度、唯分数论、作业内卷，一切以“升学率”和“市场竞争力”为转移。所谓“双减”政策，不过是修正主义粉饰太平的遮羞布——表面减负，实际是把压力从补课班转移到学校课堂和家庭，内卷反而加剧。衡州小学四年级孩子“作业写得慢、字丑”就被撕本殴打，正是这种“唯生产力论”“精英教育”在基层的残酷执行。毛主席早就警告：“教育要革命，不是简单地少上几节课的问题，而是方向路线问题。”修正主义教育把工农子弟当“废品”处理，正是对毛主席路线的公开背叛！

其次，资本主义复辟的制度基础，是这一悲剧的根本制度根源。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特色资本主义道路，教育被全面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学校经费与绩效挂钩、教师工资与升学率KPI绑定、重点校与普通校的两极分化、私有化补课产业链泛滥。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教育领域的全面复活。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走向资本主义。今日修正主义政权非但不限制，反而大力扩张：教师成为“绩效打手”，必须用体罚和羞辱手段“提高效率”，以适应资本主义“优胜劣汰”的劳动力再生产需要。四年级孩子不过9-10岁，就被卷入残酷竞争——慢节奏、字丑被视为“态度问题”而非可能的学习障碍（这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本应通过集体帮助解决），这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掩盖下的阶级压迫。学校硬件再现代化（衡州小学有科技馆、实验室），也只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有用人才”的外壳，内核却是对无产阶级后代的系统性摧残。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包括学校这个意识形态机器；今日中国修正主义教育，正是这种机器的典型形式，它服务于新资产阶级的统治，制造“内卷炮灰”和廉价劳动力后备军。

第三，从反修视角看，此事件的必然性在于：没有持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修正主义复辟就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在1966年就预言：“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赫鲁晓夫式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最先在教育文化领域“和平演变”。林彪一类走资派上台后，“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立王国”重新建立，教师无需再教育、无需劳动化，反而被赋予“专业权威”，可以随意对工农子弟施暴。家长“也打得很猛”的家庭暴力，不过是小生产者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异化的反映——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这种异化与学校修正主义教育形成恶性循环。事件至今无官方通报、只在海外流传，更暴露修正主义政权的本质：害怕群众用阶级观点看问题，害怕把个案上升为制度批判。毛主席教导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类悲剧反复发生（近年全国多起类似学生自杀案例），正是修正主义教育总危机的缩影，证明“走资派还在走”的论断无比正确。

同志们！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罪恶根源，不在于某个“坏老师”或“焦虑家长”，而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复辟的总路线。它背叛了文革教育革命，把学校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只有彻底批判这一制度，才能看清事件的深层根源。修正主义一天不除，工农子弟的血泪悲剧就一天不会停止！

III. 教师行为的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人民教师”异化为资产阶级打手

同志们！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衡州小学这位教师——撕作业本、殴打学生、恶毒辱骂“你可以给他一个袋子，让他去外面捡破烂去”——正是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人民教师”彻底异化为资产阶级打手的最典型例证。这绝不是什么“个人情绪失控”或“师德滑坡”的偶然事件，而是资本主义复辟后，教师阶级地位蜕变、资产阶级法权在学校这个“独立王国”里全面复活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的锐利武器，彻底解剖这一行为的阶级本质，揭露其与文革教育革命的根本对立，从而唤醒广大革命师生和工农群众，认清修正主义“人民教师”面具下的真实面目。

首先，必须深刻批判教师角色的根本蜕变。表面上看，这位教师是“公办教师”，拿着修正主义国家的编制和工资，似乎仍是“人民教师”。但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下，他已完全沦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和教育机器的执行者。毛主席教导我们：“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而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教师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升学率”“绩效考核”“市场竞争力”服务的打手。四年级孩子“学习效率慢、作业写得慢、字丑”，本应是教育者耐心帮助、结合生产劳动进行集体改造的问题，却被视为“态度问题”“拖后腿的废品”，必须用撕本、殴打、羞辱等暴力手段“纠正”。这哪里是教育？这是赤裸裸的阶级压迫！教师的“恨铁不成钢”不过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形式——绩效工资、KPI考核把教师逼成“管理机器”，把对资本主义的忠诚转化为对工农子弟的专政。

毛主席在文革中批判旧教育时指出：“从小学到大学，十六七年，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今日修正主义教师不仅脱离生产劳动，更养成了官僚主义作风和高高在上的“专业权威”，把课堂变成对无产阶级后代进行精神阉割的刑场。撕本殴打的暴力，与“捡破烂去”的羞辱语言，共同构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子女的阶级仇恨——他们不是在“教书育人”，而是在为新资产阶级培养“听话的雇佣奴隶”和“内卷炮灰”。

其次，这一行为与文革“再教育”路线的根本对立，暴露了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彻底背叛。毛主席在《五七指示》和教育革命指示中明确要求：教师必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必须和工农兵结合，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文革时期，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师生一起学工学农、批判修正主义，教师从“师道尊严”的宝座上被拉下来，变成和群众平等的革命同志。而邓小平复辟后，彻底否定了文革教育革命，“教师专业化”“学术自由”等修正主义口号重新上台，教师无需“劳动化”、无需接受再教育，反而被赋予“独立王国”的特权，可以随意体罚、辱骂工农子弟。衡州小学这位教师的行为，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立王国”复活的活生生证明：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的“灵魂工程师”，而是修正主义政权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维稳打手”。家长在聊天中求“考虑一下他的身心健康”，却换来教师的暴力回应，这进一步证明：修正主义教育下，师生关系已异化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抗关系。只有通过新的文化大革命，重新让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让教师接受再教育，才能砸烂这一“独立王国”。

第三，从反修防修的视角看，此类教师行为还有其边缘情况的深刻警示。若教师确有“教学挫败感”，其根源绝不在孩子“慢”，而在于修正主义制度本身未提供真正的阶级教育培训，反而鼓励个人主义“恨铁不成钢”和“绩效至上”。同时，家长“也打得很猛”的家庭暴力，不过是小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下异化的反映——列宁早就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学校暴力与家庭暴力的共振，正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未被限制、反而被扩张的恶果。毛主席警告：“社会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今日修正主义教师的所作所为，正是走资派复辟后，教育领域“和平演变”最彻底的表现。如果不开展持续的阶级斗争，不把教师队伍置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这类打手行为只会越来越多，工农子弟的血泪悲剧只会不断重演。

同志们！教师行为的阶级批判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人民教师”已彻底异化为资产阶级打手，学校已不再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阵地，

而是维护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只有发动群众、开展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才能把教师重新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服务。只有彻底批判和砸烂这一修正主义教育机器，才能让“撕本打人”“捡破烂羞辱”这样的暴行永远成为历史！

IV. 对儿童与劳动人民后代的危害：培养“接班人”还是“炮灰”？

同志们！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衡州小学这起四年级学生跳楼自杀事件，以血的代价暴露了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残酷现实：它不是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在批量制造资本主义复辟下的“内卷炮灰”和廉价劳动力后备军。这个9-10岁的工农子弟，不过因为“学习效率慢、作业写得慢、字丑”，就被教师撕本殴打、家长“打得很猛”、学校贴上“废品”标签，最终走上绝路。这绝非个人“心理脆弱”，而是修正主义教育对劳动人民后代进行系统性精神谋杀和阶级阉割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从心理危害、阶级后果、社会意涵和国际视野四个层面，彻底剖析其对儿童与劳动人民后代的深重危害，戳穿“素质教育”“以人为本”的修正主义谎言，唤醒广大工农群众认清：没有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孩子们就只能成为资本主义机器的牺牲品！

首先，从心理与阶级后果看，此事件对儿童世界观形成的摧残是毁灭性的。四年级孩子正处于性格、世界观形成的黄金期，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教育干部懂得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而修正主义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用“慢”“丑”“没用”的阶级标签制造“习得性无助”。教师的暴力羞辱、家庭的打骂共振，让孩子从“自尊心”被反复践踏，到彻底自我否定，最终以跳楼结束生命。这不是孤例，而是制度性后果：工农子弟被提前打上“底层预备役”的烙印，为资本主义提供听话的“捡破烂”劳动力。毛主席在文革教育革命中强调，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批判资产阶级，让孩子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锤炼革命意志。可今日修正主义学校“关门办学”、唯分数论，把孩子变成考试机器和焦虑容器，摧毁了他们的革命斗志和集体主义精神。心理创伤的阶级本质在于：它不是“个人抑郁”，而是资产阶级法权在儿童心灵上的刻印——八级工资制、绩效至上的逻辑，从学校就开始灌输“优胜劣汰”，让无产阶级后代从小就接受“命该如此”的宿命论，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服务。

其次，更广的社会意涵在于：此类事件反复发生，是修正主义教育加剧两极分化、牺牲工农子弟的铁证。近年来全国类似学生自杀案例层出不穷（包括2023年衡阳另一中学事件及其他省份多起），每一起都证明：修正主义“双减”不过是骗局，实际是把内卷压力从补课班转移到课堂和家庭，工农子弟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毛主席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条件是……要教育干部懂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而今教育却在为新资产阶级培养“精英”和“炮灰”两个梯队：少数“尖子生”成为管理层接班人，绝大多数慢节奏、家庭条件一般的工农子弟则被边缘化、羞辱化，最终沦为“灵活就业”“内卷炮灰”。这加剧了城乡、阶层分化，家长“崩溃”“也打得很猛”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在市场经济下异化的反映，进一步把家庭变成压迫的第二战场。事件现场警察维稳、至今无官方通报，更暴露修正主义政权害怕群众把个案上升为制度批判——害怕工农群众觉醒，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标签下资本主义剥削的血泪控诉。

第三，从国际视野和边缘情况考虑，这一危害具有全球修正主义教育的共同本质。修正主义苏联解体后，教育商品化导致青少年自杀率飙升；今日帝国主义国家同样内卷严重，儿童成为“绩效奴隶”。中国修正主义教育不过是这一国际现象的“中国特色”翻版：表面“公办”，内核却是为全球资本主义产业链提供廉价劳动力。边缘情况更需警惕：若孩子确有学习障碍（ADHD、发育迟缓等），修正主义教育非但不提供特殊集体帮助，反而用暴力“纠正”，这正是“唯生产力论”对“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教育的背叛。若家长“也打得很猛”，则暴露小生产者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列宁语）与学校压迫的恶性循环。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开门办学、劳动教育、心理集体关怀，才能避免此类边缘悲剧。否则，儿童自杀率上升（虽无精确官方数据，但海外报道和民间案例已成趋势），将成为修正主义教育总危机的又一铁证。

同志们！对儿童与劳动人民后代的危害，归根结底是修正主义教育把“接班人”培养阵地蜕变为“炮灰”制造工厂。它不是“教育方法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政权问题。只有发动新的文化大革命，重新让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实行毛主席《五七指示》，才能把孩子们从“内卷炮灰”中解放出来，真正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只有砸烂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育制度，才能让工农子弟的鲜血不再白流！

V. 现实启示与系统性批判：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总危机的缩影

同志们！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向我们发出伟大号召：“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衡州小学这起四年级学生跳楼自杀事件，

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已陷入全面、深刻的总危机。它绝非“局部问题”或“管理失误”，而是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在教育战线上的集中爆发，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整个教育领域从文革革命成果到全面倒退的历史必然。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双减”伪装、维稳本质、“以人为本”谎言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批判，揭示其现实启示，戳穿一切修正主义遮羞布，唤醒广大革命师生、工农群众和劳动人民后代：只有发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把教育从资产阶级专政工具中彻底夺回来！

首先，必须揭露所谓“双减”“素质教育”的修正主义伪装与这一事件的内在联系。修正主义政权高喊“双减”，表面上减轻学生负担，实则把内卷压力从校外补课班转移到学校课堂和家庭内部，进一步强化了“唯分数论”和“绩效至上”。衡州小学四年级孩子“作业写得慢、字丑”就被教师撕本殴打、辱骂“捡破烂去”，正是“双减”后课堂内卷加剧的直接后果：教师KPI仍以升学率和作业完成度为准，工农子弟慢节奏的特点被视为“拖后腿”，必须用暴力“提效”。毛主席早在文革中就批判“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核心，而今修正主义却以“素质教育”为名，行“精英选拔”之实，把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厂。家长“每到周末孩子写作业我们也会崩溃”正是这一伪装的恶果——家庭成了学校压迫的延伸，小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下的焦虑被制度性放大。现实启示是：不破除“双减”这种修正主义花招，不恢复毛主席《五七指示》“开门办学、学工学农”的革命路线，类似悲剧只会以“减负”名义反复上演，成为修正主义教育总危机的常态。

其次，维稳与信息管控的阶级本质，暴露了修正主义政权对教育危机总爆发的恐惧。4月23日家属在学校门口雨中维权、烧纸祭奠，却遭警察“维稳”，事件至今无任何官方通报、警方调查或校方回应，只在海外社交媒体流传。这哪里是“维护社会稳定”？这是资产阶级专政机器对劳动人民正当反抗的镇压！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教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修正主义走资派却用警察、网管、宣传机器“以维稳压维权”，掩盖教师暴力、制度谋杀的真相，防止群众把个案上升为对整个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的批判。信息管控的阶级根源在于：修正主义政权知道，一旦工农群众用马列毛主义观点看问题，就会认清这是“走资派还在走”的活证据。近年来全国多起学生自杀案例均遭类似处理，证明教育危机已成系统性总危机——不是“个别学校问题”，而是修正主义教育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总破产。现实启示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哪里就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只有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破维稳枷锁，才能把血的教训转化为革命动力。

第三，对“以人为本”“身心健康”等修正主义谎言的彻底揭露，是系统性批判的核心。教师行为中家长曾恳求“希望老师能考虑一下他的身心健康，而且孩子打了，也有自己的自尊心”，却换来更猛烈的暴力，这戳穿了修正主义“以人为本教育”的虚伪面纱。毛主席强调：“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修正主义却把“身心健康”变成空洞口号，实际是以资产阶级法权（绩效考核、升学竞争）吞噬儿童自尊，把工农子弟当成“可牺牲的炮灰”。“以人为本”不过是邓小平“猫论”在教育领域的翻版——“人”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是新资产阶级及其子女；“本”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和谐”与“稳定”。事件中家庭暴力与学校暴力的共振，进一步证明：在修正主义制度下，“以人为本”只能是掩盖阶级压迫的遮羞布。现实启示是：此类悲剧不是“教育方法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政权问题。只有砸烂资产阶级法权，恢复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才能让“身心健康”从空谈变成现实。

同志们！衡州小学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总危机的缩影，它以一个9-10岁工农子弟的鲜血，控诉了资本主义复辟在教育战线的全部罪恶。它告诉我们：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开展持续的文化大革命，教育领域“和平演变”就会愈演愈烈，工农后代就会永世为奴。只有认清这一总危机，我们才能从血的教训中汲取革命力量，准备好迎接新的教育革命高潮！

VI. 革命出路：坚持毛主义，反修防修，重建无产阶级教育

同志们！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发出了伟大号召：“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衡州小学四年级学生跳楼自杀的血案，以一个9-10岁工农子弟的生命，彻底宣告了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死刑。它不是“可以改良”的问题，而是必须用革命暴力彻底砸烂的资产阶级专政工具！在马列毛主义指导下，我们必须坚持反修防修的坚定立场，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建无产阶级教育阵地，让教育重新成为培养革命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堡垒。只有这样，类似悲剧才能永远成为历史，工农子弟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首先，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必须发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今日修正主义教育已完全蜕变为新资产阶级培养“内卷炮灰”和“捡破烂”劳动力的机器，教师异化为打手、学生沦为牺牲品、家长陷入异化循环。只有工人阶级重新领导学校，实行“开门办学”，让师生参加生产劳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才能从根子上铲除祸根。

文革时期工人宣传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师生共学共劳的经验证明：只有把学校置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教育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今日必须重启这一革命传统：解散修正主义“绩效考核”体系，废除重点校与升学率KPI，教师必须接受再教育、参加劳动改造，学生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锤炼革命意志。资产阶级法权（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残余）必须在教育领域被限制直至消灭，否则“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只有通过群众运动、造反有理，才能把衡州小学这样的悲剧转化为革命动力，把血的教训变成反修防修的战旗！

其次，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培养五条标准，重建无产阶级教育体系。毛主席明确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第一，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第三，要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第四，要有民主作风；第五，要善于进行自我批评。”这五条是教育革命的根本指针！今日修正主义教育反其道而行之，培养的是“听话工具”和“精英炮灰”，必须彻底推倒重来。学校要恢复“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军营，让孩子们在实践中认识阶级、认识剥削、认识革命。教师队伍必须劳动化、群众化，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立王国”死灰复燃。家庭教育也要纳入无产阶级轨道，打破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用集体主义取代“打得很猛”的暴力循环。只有这样，工农子弟才能从“习得性无助”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革命接班人，而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牺牲品。

最后，革命号召与展望：同志们！衡州小学事件敲响了警钟——走资派还在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全世界马列毛主义者、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必须团结起来，高举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开展反修防修的新高潮！“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哪里就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让每一个学生自杀的血案都成为埋葬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火种！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才能终结这一制度性谋杀；只有新的文化大革命，才能让教育重新成为无产阶级的武器。修正主义教育一天不除，类似惨案必将重演；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迎来红太阳普照的新教育！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万岁！

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万岁！

马列毛主义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破产别破良心债：从华盛玩具广西四厂倒闭看 工人斗争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

一、华盛倒闭事件：资本危机向工人阶级转嫁

4月20日，港资玩具代工企业华盛玩具旗下广西四家工厂突然宣告倒闭。企业方面虽然声称将“优先保障员工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法定权益”，但对于最关键的问题——赔偿标准是多少、具体金额如何核算、何时支付、由谁监督执行——却没有给出明确说明。对于工人来说，这种含糊其辞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危险信号。因为就在此前，华盛旗下东莞工厂倒闭时，据传仅支付了“0.5N”的补偿，这使广西工人完全有理由怀疑：所谓“依法保障”，会不会最终变成打折赔偿、拖延清算、分化工人、消磨斗争？

于是，4月21日开始，广西北流、容县、玉林等地工人陆续集会维权。部分工人阻断道路交通，部分工人登上厂房楼顶，打出横幅：“青春全献给华盛，破产别破良心债，还我血汗钱。”这句话朴素而有力。它不是法律文书里的冷冰冰条款，而是工人阶级亲身经验的集中表达：工人把青春、体力、健康、时间和家庭生活都献给了工厂，资本却在危机到来时试图用一纸破产公告来终结一切责任。

这不是普通的“劳资纠纷”。这也不是某个老板一时经营不善造成的偶然事件。华盛广西四厂倒闭，是代工资本在危机中把损失向工人阶级转嫁的典型表现。资本平时把工人组织进流水线，把他们的劳动凝结为商品、利润和企业积累；一旦订单下滑、资金链断裂、市场环境恶化，资本首先想到的不是承担自己的经营风险，而是裁掉工人、压低补偿、拖延工资，把危机成本甩给那些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种现象不是例外，而是常态。资本盈利时，利润归资本所有；资本亏损时，损失却要工人共同承担。企业订单好的时候，老板不会按照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来分配利润；企业遇到困难时，却要求工人理解、忍耐、让步，甚至接受低于法定和合理标准的补偿。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谓“风险共担”的虚伪性：盈利从不共分，亏损却要共担。

华盛玩具作为长期嵌入国际市场的代工企业，其存在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制造业中一类普遍结构：外向型订单、低成本劳动力、地方招商优惠、劳动密集型生产、全球品牌利润链条。工人每天在车间里完成的不是抽象劳动，而是具体的、辛苦的、重复性的劳动。他们把塑料、零件、布料、包装转化为可销售的商品，而这些商品最终进入国际市场，成为资本积累的一部分。但在整个链条中，工人得到的只是工资，而且往往只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最低部分。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资本不是靠自己的“经营才能”凭空产生利润，而是通过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来实现增殖。机器不会自己创造价值，厂房不会自己创造价值，订单也不会自己创造价值。真正使资本运动起来的，是工人的活劳动。没有工人，所谓华盛玩具不过是一堆厂房、设备、商标和合同；正是工人的劳动，才使这些死的生产资料变成能够增殖的资本。

然而，当危机爆发时，资本立刻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平时它把工人称为“员工”“伙伴”“家人”，危机时却把工人变成账本上的负担、清算表里的债权人、维稳现场里的不稳定因素。所谓企业文化、劳资和谐、共同发展，在倒闭公告面前迅速破产。真正留下来的，是工人要求工资和补偿，而资本试图压缩责任；是工人要求公开透明，而企业含糊其辞；是工人要求血汗钱，而地方机器首先关心秩序。

因此，华盛事件的第一重意义，就在于它撕开了代工资本的温情面纱。它告诉工人：资本与劳动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共同体。资本需要工人时，要求工人服从管理、提高效率、忍受加班、接受低工资；资本不需要工人时，就可以宣布停业、破产、裁撤，把工人推向失业和索赔的不确定性之中。工人阶级若没有自己的组织、自己的政治领导、自己的阶级意识，就只能在一次次企业倒闭中被动追讨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华盛事件不只是一个地方事件，而是当前中国工人阶级处境的缩影。随着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产业链转移、出口订单波动、资本利润率下降，类似的关厂、裁员、欠薪、压低补偿事件只会反复出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每一次震荡，最后都会传导到生产一线，落到工人的工资、就业和家庭生活上。所谓全球供应链的“灵活调整”，对于资本来说是转移工厂、减少成本、寻找更便宜劳动力；对于工人来说，则是失业、欠薪、断缴社保和被迫维权。

这就说明，工人面对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整套制度；不是一个老板，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不是一次偶然倒闭，而是资本主义危机转嫁机制的反复上演。只要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手中，只要工人只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只要企业经营风险可以通过裁员和压低补偿转嫁出去，那么华盛事件就不会是最后一次。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华盛工人的斗争是正义的，工人要求工资、补偿和尊严完全合理。但是，仅仅停留在“要求赔偿”的层面还不够。

华盛事件必须被提升为一场阶级教育。它让工人看到资本的残酷，也让先进分子看到组织工作的紧迫性；它暴露了代工资本的剥削，也暴露了所谓“工人当家作主”在现实中的破产；它证明工人群众具有反抗的力量，也证明这种力量必须被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组织和提升。

华盛可以倒闭，资本可以撤退，但工人的血汗债不能消失。更深一层说，真正应当被清算的，不只是华盛一家企业欠下的工资和补偿，而是整个把工人青春变成利润、再把危机甩给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华盛事件的本质，正是资本危机向工人阶级转嫁；而工人阶级的回答，则必须从索赔开始，但不能止步于索赔。

二、工人索赔的正义性：工资和补偿不是恩赐

华盛工人要求工资、补偿、社保和清算公开，这是完全正当的。工人不是在向资本讨赏，也不是在向企业乞求怜悯，而是在要求拿回自己本来应得的东西。工资不是老板的恩惠，补偿不是企业的施舍，社保不是资本家的慈善，工龄更不是可以被一笔勾销的数字。它们都是工人在长期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权利，是工人用身体、时间、青春和劳动换来的结果。

资产阶级总喜欢把工资说成是企业“养活”工人，好像没有老板，工人就无法生活。但事实正好相反：没有工人，老板的资本就无法增殖；没有工人的劳动，厂房、机器、订单、商标、管理制度都只是死物。资本家不是“养活”工人，而是靠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来维持自身存在。所谓企业利润，归根到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工人的劳动中来的。

因此，当企业倒闭时，工人首先要求工资和补偿，不仅合理，而且具有最基本的阶级正义。工人已经完成了劳动，资本就必须支付工资；工人长期为企业服务，企业结束劳动关系，就必须支付相应补偿；企业过去应当缴纳而没有足额缴纳的社保、加班费、年假工资等，也必须清楚核算。资本不能在盈利时把工人当作生产工具，在破产时又把工人当作可以随便甩掉的包袱。

华盛事件中，最激起工人愤怒的地方，恰恰在于企业没有给出明确赔偿方案。它只说会“优先保障”工资和经济补偿，却不说明到底如何保障、按什么标准保障、何时保障、由谁监督保障。对于工人来说，这种空洞承诺毫无意义。工人不能用一句承诺支付房租，不能用一句承诺养活家庭，不能用一句承诺偿还债务，更不能用一句承诺弥补突然失业造成的生活断裂。

特别是此前东莞工厂倒闭时传出的“0.5N”赔偿，更使工人有充分理由警惕。所谓“0.5N”，本质上就是把工人的工龄和补偿权利打折处理。一个工人在工厂工作多年，付出了青春和体力，最后资本却试图用半个月、几个月工资来打发，这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在二次剥夺工人。工人已经被雇佣劳动制度剥削过一次，不能在企业关门时再被低额补偿剥削第二次。

必须明确指出：赔偿标准不是资本可以随意开价的市场交易。工资、社保、经济补偿具有明确的劳动关系基础。工人不是向老板“谈优惠”，而是要求资本履行责任。企业如果试图以破产、亏损、订单困难为借口压低赔偿，就是把自己的经营失败强行转嫁给工人。工人没有决定企业经营方向，没有决定订单来源，没有决定是否扩张生产，没有决定资金安排，也没有分享资本积累的主要成果；既然如此，工人就没有义务为资本家的失败买单。

资产阶级在这种时候常常会说：“企业也很困难。”但问题在于，企业困难不能成为侵犯工人权利的理由。工人比企业更困难。企业困难，是利润减少、订单减少、资产清算；工人困难，是失业、断粮、房租、家庭开支、孩子教育、老人医疗，是明天怎么活下去的问题。资本的困难是资本增殖受阻，工人的困难是生存条件被破坏。把二者混为一谈，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话语的欺骗。

更何况，在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工人并没有按照自己创造的全部价值获得报酬。工人每天在流水线上重复劳动，创造出超过自身工资的价值，剩余部分被资本占有。资本积累正是建立在这种长期占有之上的。现在企业倒闭了，资本却连最低限度的工资和补偿都想拖延甚至打折，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资本关系的掠夺本质：它不仅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劳动，还在危机时刻试图赖掉劳动者最基本的债权。

因此，华盛工人的索赔行动，绝不是狭隘的“个人利益诉求”。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意义。工人要求的是工资，但揭露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工人要求的是补偿，但揭露的是雇佣劳动关系的不平等；工人要求的是公开清算，但揭露的是资本运作的不透明；工人要求的是一个明确说法，但揭露的是修正主义体制下工人缺乏真正监督权和组织权的现实。

从这一点看，工人斗争首先必须坚持一个底线：不能把工人的正当索赔污名化。任何把工人集会说成“闹事”、把索赔说成“不理性”、把集体行动说成“影响秩序”的说法，都是站在资本和维稳秩序一边。真正不理性的不是工人要求血汗钱，而是资本想在没有明确方案的情况下让工人安静接受命运；真正影响社会稳定的不是工人讨薪，而是资本突然关厂、拖欠责任、制造大规模失业；真正破坏秩序的不是工人的横幅，而是资本把劳动者多年生活基础一夜之间摧毁。

但是，正因为工人索赔具有正义性，我们更不能把它降低为单纯的法律问题。工资和补偿当然要争，具体金额当然要算，清算程序当然要公开；但文章必须进一步指出：为什么工人必须一次又一次用集会、堵路、登楼、拉横幅的方式来讨回应得的东西？为什么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工人在企业倒闭时仍然只能作为弱势债权人等待安排？为什么所谓工会、劳动部门、地方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组织工人、代表工人、监督资本，而是往往首先要求工人“稳定”“理性”“依法表达”？

这些问题说明，华盛事件的意义不止于赔偿本身。它让我们看到，在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工人已经从名义上的主人重新变成雇佣劳动者，从生产资料的主人变成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从国家政治叙事中的“领导阶级”变成现实清算程序中的被动索赔者。这种地位变化，是反修正主义者必须揭露的核心问题。

工人索赔的正义性，首先来自他们作为劳动者的直接权利；但从更高层次看，它还来自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工人不是资本链条上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而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阶级。华盛工人要求血汗钱，是对资本赖账行为的反抗；而这种反抗如果经过无产阶级政党的总结和提升，就能够进一步发展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

这里也必须划清一个界限：支持工人索赔，不等于把斗争停留在索赔；肯定工人经济要求，不等于陷入经济主义；帮助工人争取补偿，不等于把工人运动降格为法律维权。马列毛主义者必须站在工人最直接的利益一边，但又不能只停留在直接利益上。我们要从工资问题中看到剩余价值问题，从补偿问题中看到雇佣劳动问题，从清算问题中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从维权困难中看到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问题。

这正是无产阶级政党与一般工会组织的区别。工会可以围绕工资、补偿、劳动条件提出要求，这是必要的；但党必须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工人的工资总是被压低，为什么企业倒闭时工人总是最先受害，为什么法律上的权利需要通过集体斗争才能落实，为什么所谓“工人当家作主”在现实中沦为空话。工会处理的是眼前权益，党揭示的是历史规律；工会组织的是局部斗争，党领导的是阶级解放。

因此，在华盛事件中，我们既要坚定支持工人提出工资、补偿、社保和清算公开的要求，也要反对把这些要求看成斗争的全部。工人的血汗钱必须讨回，但更重要的是让工人在讨回血汗钱的过程中认识到：他们的苦难不是偶然的，不是某个老板坏，不是某个地方处理不当，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修正主义国家秩序共同作用的结果。

华盛工人索赔的正义性，最终指向一个更深的问题：既然社会财富由工人创造，为什么工人在企业倒闭时却只能被动等待赔偿？既然工人是生产的主体，为什么他们不能监督企业资产和经营决策？既然工人阶级被称为主人，为什么真正发生危机时，他们却没有自己的权力机关和政治领导来保障自身利益？

这些问题不能由资本回答，也不能由修正主义官方工会回答，更不能由自由派法治幻想回答。它们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回答。因为只有党才能把工人的索赔斗争提升为阶级斗争，把零散的经济诉求提升为对资本统治的批判，把一次工厂倒闭事件提升为工人阶级重新认识自身历史使命的教材。

所以，华盛事件的第二重意义就在于：它证明工人索赔是完全正义的，但也证明单纯索赔远远不够。工人要拿回血汗钱，这是第一步；工人要认识血汗钱为什么会被夺走，这是第二步；工人要组织起来，防止这种剥夺反复发生，这是第三步；工人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最终消灭产生这种剥夺的制度，这才是历史方向。

三、自发斗争的局限：经济斗争不能代替政治斗争

华盛工人的斗争具有正义性，也具有现实力量。五千名工人集会索赔，说明工人群众并不是麻木的、沉默的、任人宰割的群体。当资本试图用含糊公告处理工人的工资和补偿时，工人用集体行动迫使企业、地方政府和社会舆论面对问题。这种行动本身就证明：工人阶级只有作为集体出现，才真正具有力量；一个个孤立的劳动者可以被拖延、敷衍、分化，但一旦他们以集体形式站出来，资本和地方当局就不得不回应。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肯定工人自发斗争的积极意义。工人的愤怒不是无根据的，工人的集会不是无目的的，工人的横幅不是空洞口号，而是他们在现实压迫下形成的阶级直觉。工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企业如果不被逼迫，就可能拖延；赔偿如果不被追问，就可能缩水；政府如果不感到压力，就可能只要求“稳定”。这种来自生产现场和生活困境的经验，是任何书斋里的空谈都代替不了的。

但是，马列毛主义者在肯定自发斗争的同时，也必须指出自发斗争的局限。自发斗争能够揭露矛盾，却不能自动解决矛盾；能够产生愤怒，却不能自动形成科学理论；能够迫使资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让步，却不能自动指向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工人群众在现实压迫中会自发反抗，但这种反抗如果没有先进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很容易停留在直接经济要求之内。

华盛顿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工人最直接的诉求，是工资、补偿、社保和清算公开。这些诉求当然正当，也必须支持。但如果斗争只停留在这些诉求上，那么它仍然处在经济斗争的范围之内。经济斗争的特点是围绕工资、工时、补偿、福利、劳动条件展开，它反对的是资本在某一具体环节上的侵害，却未必直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这正是工联主义和经济主义容易产生的地方。工联主义者看到工人索赔，就只谈赔偿标准；看到工人集会，就只谈谈判机制；看到企业倒闭，就只谈劳动仲裁和清算程序。他们把工人运动的全部内容缩小为工资单、合同、补偿金和法律条文，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降格为“争取更好的出卖劳动力条件”。这种观点表面上站在工人一边，实际上把工人永远限制在雇佣劳动制度内部。

经济斗争当然重要。没有经济斗争，工人连眼前的生存利益都无法保卫。但是，如果把经济斗争当作终点，就会产生严重错误。工人今天讨回血汗钱，明天仍然可能在另一家工厂被拖欠；今天争到补偿，明天仍然可能重新进入另一条流水线，被另一个资本家剥削；今天迫使一个企业让步，明天整个制度仍然会继续制造新的华盛顿事件。只要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资本手中，只要工人仍然只能出卖劳动力谋生，只要国家机器仍然首先维护资本秩序，那么单个经济斗争的胜利就始终是不稳定的、局部的、暂时的。

因此，经济斗争必须上升为政治斗争。这里所谓政治斗争，不是简单地在经济口号后面加几个激进口号，也不是把工人当前的实际要求轻率地抛开，而是要在工人的切身斗争中揭示制度根源。党必须帮助工人从“企业为什么不给赔偿”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为什么能够支配工人的命运”；从“为什么补偿方案不公开”进一步认识到“工人为什么不能监督企业资产和经营”；从“为什么警察驱散维权工人”进一步认识到“国家机器到底站在哪个阶级一边”；从“为什么官方工会没有真正组织斗争”进一步认识到“工人为什么需要自己的革命政党”。

这就是政治提升。没有这种提升，工人的愤怒可能会被局部赔偿暂时平息；有了这种提升，工人的每一次斗争都可以变成阶级教育。没有这种提升，工人会把问题理解为某个老板坏、某个工厂黑、某个地方不公；有了这种提升，工人才能看到这些现象背后共同的阶级关系和制度逻辑。

自发斗争的另一个局限，在于它容易被分化。资本和地方当局面对工人集体行动，常见办法就是拖延、分批、许诺、恐吓、挑选代表、制造差异、用个别让步瓦解整体力量。如果工人没有稳定组织，没有统一路线，没有能够经受考验的骨干，

就容易在斗争过程中被拆散。今天一部分人接受方案，明天一部分人等待仲裁，后天一部分人被威胁，最后整体斗争被消磨为零散的个人案件。

这种分化不是因为工人软弱，而是因为自发斗争缺乏持久组织形式。工人群众有巨大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如果不能被组织起来，就会像潮水一样来得猛烈、退得也快。资本和国家机器恰恰善于等待群众疲惫、等待生活压力压倒斗争意志、等待内部意见分裂。没有组织，愤怒就难以持久；没有纪律，集体就容易涣散；没有路线，斗争就容易迷失方向。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党不是在斗争之外指手画脚的旁观者，而是应当成为斗争的政治核心。党要做的不是否定群众自发性，而是把群众自发性提升为自觉性；不是压制工人的直接诉求，而是把直接诉求同阶级斗争的总方向联系起来；不是把自己变成普通工会，而是通过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深入工人，把先进分子团结起来，把局部斗争总结成经验，把经验上升为路线。

毛主义强调群众路线，但群众路线绝不是崇拜自发性。群众路线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科学分析和政治提升，再回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自己的自觉行动。这就意味着，党既要尊重群众的实际经验，又不能拜倒在群众自发意识面前；既要支持工人的经济要求，又不能把经济要求当作最高纲领；既要进入群众斗争，又要领导群众斗争。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自发斗争很容易出现两种偏差。一种是退向改良主义：只求政府协调、企业让步、法律裁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既有制度内部。另一种是退向盲目冒进：只有愤怒，没有组织；只有冲击，没有目标；只有情绪爆发，没有长期建设。这两种倾向看似相反，实际上都说明自发斗争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前者把斗争限制在制度许可范围内，后者则可能使斗争在无准备中被消耗。

马列毛主义反对这两种偏差。我们既不主张把工人斗争驯化成温顺的法律申诉，也不主张把群众愤怒浪费在没有组织、没有方向、没有持久性的行动中。真正的路线应当是：支持工人的直接斗争，保护工人的现实利益，同时通过斗争发现先进分子、建立组织联系、开展阶级教育、积累政治经验，使每一次经济斗争都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工人阶级觉醒的环节。

这也说明，工会的地位必须被正确理解。工会可以在经济斗争中发挥作用，可以围绕工资、补偿、社保、劳动条件组织工人，可以成为党联系工人群众的重要渠道。但是，工会不能替代党。

工会的天然倾向是围绕劳动条件改善展开，而党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解放。工会如果脱离党的领导，就会滑向工联主义；党如果把自己降低为工会，就会丧失政治先锋队性质。

在华盛顿事件中，如果只有工会式思路，那么斗争的最高目标就是争取更好的补偿方案；如果有党的领导，那么斗争就不仅要争取补偿，还要揭露代工资本如何剥削工人、修正主义国家如何维护资本秩序、官方工会如何失职、工人为什么必须形成自己的政治组织。前者只处理结果，后者追问原因；前者只解决个案，后者积累阶级力量；前者只关心赔偿，后者关心工人阶级如何从被动受害者转变为自觉斗争者。

因此，华盛顿工人的自发斗争是宝贵的，但不能被神圣化为足够的。它是起点，不是终点；是信号，不是完整路线；是阶级愤怒的爆发，不是阶级自觉的完成。我们必须从中看到工人群众的力量，也必须看到这种力量需要组织、理论和政治领导。没有群众斗争，党会变成空中楼阁；没有党的领导，群众斗争又会反复陷入经济主义、分散化和被动防御。

华盛顿事件的第三重意义正在于此：它证明工人群众能够在压迫下站起来，但也证明工人阶级要真正改变自身命运，不能只靠临时集会和自发反抗。工人需要组织，但组织不能停留在工会；工人需要斗争，但斗争不能停留在经济索赔；工人需要代表，但代表不能替代政党。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把工人的局部斗争连接成阶级斗争的整体，把眼前的赔偿要求提升为反对资本统治的政治路线。

所以，对于华盛顿事件，我们既要说：工人索赔完全正义；也要进一步说：单纯索赔远远不够。工人必须在斗争中认识资本，认识国家，认识工会的局限，认识党的必要性。经济斗争是学校，但不是毕业；自发斗争是火花，但不是灯塔。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这种火花集中起来，使它不只是燃烧一时，而是照亮工人阶级走向自觉解放的道路。

四、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工会可以替代的

华盛顿事件之所以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次普通的索赔事件，正在于它把一个根本问题摆到了工人阶级面前：当资本突然撤退、企业宣布倒闭、工资和补偿处于不确定状态时，谁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是临时形成的维权队伍吗？是单纯围绕补偿问题进行谈判的工会吗？是地方政府的协调机制吗？还是必须有一个能够把局部经济斗争提升为阶级政治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

从马列主义的立场看，答案是明确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司令部。工会可以组织局部斗争，可以维护直接经济利益，可以成为党联系工人群众的重要桥梁，但工会不能替代党，更不能凌驾于党。因为工会主要处理的是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利益问题，而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作为历史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最终解放方向。

工会面对华盛顿事件，最直接的问题是：工资怎么算？补偿怎么算？社保怎么办？企业资产如何清算？工人代表如何参与谈判？这些问题当然重要，而且必须有人去处理。但如果工人运动只停留在这里，就会被限制在资本主义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工会可以帮助工人争取更好的出卖劳动力条件，却不能单靠自身解决“为什么工人必须出卖劳动力”这个根本问题；工会可以帮助工人讨回应得工资，却不能单靠自身消灭工资劳动制度；工会可以在某一企业、某一行业、某一次斗争中发挥作用，却不能代替政党承担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历史任务。

这正是党与工会的本质区别。工会回答的是“眼前怎样维护劳动者权益”，党回答的是“工人阶级怎样获得解放”；工会面对的是具体劳动关系中的局部矛盾，党面对的是整个阶级社会的根本矛盾；工会以经济斗争为主要活动领域，党则以政治斗争、理论斗争和组织斗争为核心任务。把二者混同，就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降低为劳资谈判；把工会抬高到党的位置，就是把阶级解放降低为权益维护。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会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工人群众反抗资本压迫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工人维护工资、工时、福利和劳动条件的必要工具。另一方面，如果工会脱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它又极易被资本主义制度吸收，变成劳资协调机构、改良主义机关，甚至变成压制工人激进行动的缓冲器。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工会如果没有革命路线领导，就会倾向于把斗争限制在“合法”“可谈判”“可协调”的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缩小为改善雇佣劳动条件。

因此，必须明确：工会不是独立的政治中心，而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工会的正确地位，是作为党联系工人、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培养工人骨干的工具。它应当在党的政治领导下开展经济斗争，在经济斗争中发现先进分子，在群众斗争中传播阶级意识，在具体权益斗争中服务于无产阶级整体事业。工会一旦脱离党的领导，就会产生工会独立主义；工会一旦把自己看得高于党，就会产生工联主义和机会主义；工会一旦只承认工资斗争而拒绝政治斗争，就会事实上替资本主义制度维持秩序。

华盛事件如果仅仅由工会逻辑来处理，那么最终就会变成一个赔偿方案问题。赔偿多一点，斗争就被认为胜利；赔偿少一点，斗争就被认为失败。这样的尺度太低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提出更高的尺度：这次事件是否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认识？是否揭露了代工资本的剥削本质？是否暴露了修正主义国家机器和官方工会的真实角色？是否发现、培养、团结了一批先进工人？是否使工人从“我要补偿”进一步走向“我们为什么总是被资本支配”？如果没有这些政治成果，那么即使经济上取得一定赔偿，斗争仍然是不完整的。

党之所以高于工会，不是因为党可以脱离群众、命令群众，而是因为党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代表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能够把分散的局部斗争纳入阶级斗争的总体路线。工人群众在斗争中产生朴素愤怒，这是宝贵的；但朴素愤怒不等于科学认识。工人群众能够感受到资本压迫，这是现实经验；但现实经验不等于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系统理解。只有党，才能把群众经验加以总结、提升、集中，再转化为有方向、有纪律、有战略的阶级行动。

这正是列宁主义政党原则的核心，也是毛主义群众路线的正确理解。群众路线不是否认党的领导，而是要求党从群众斗争中汲取材料，经过理论加工和路线提升，再回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斗争。群众中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这些经验如果不经集中，就仍然是分散的；群众中有正义的愤怒，但这种愤怒如果没有方向，就可能被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工联主义甚至盲目冒进所利用。党不是群众之外的东西，而是阶级中最先进、最有组织、最有理论自觉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党必须领导群众组织，包括工会。

工会服从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否定工会的作用。恰恰相反，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会才能摆脱狭隘经济主义，真正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工会可能只会收集诉求、安排谈判、等待协调；有了党的领导，工会才能在这些工作之外承担阶级教育、骨干培养、组织建设和政治动员的任务。没有党的领导，工会容易被合法框架驯化；有了党的领导，工会才能利用合法斗争而不迷信合法斗争，进行经济斗争而不止步于经济斗争。

在华盛这样的事件中，工会的任务应当是具体的、群众性的、执行性的：收集工人诉求，整理欠薪和补偿情况，团结工人保持集体立场，防止个别分化，推动公开清算，维护工人的直接利益。但党的任务则更高：分析事件的阶级本质，指出资本转嫁危机的规律，揭露修正主义官方叙事，批判工联主义局限，把斗争经验上升为政治教育材料，把先进工人引向更高层次的组织和理论自觉。工会做的是联系群众的工作，党做的是领导阶级的工作。

如果把工会置于党之上，或者把工会看成可以独立决定政治路线的中心，那么后果必然严重。第一，政治路线会被经济诉求牵着走，党会变成工会的秘书处。第二，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会被局部行业、局部企业、局部群体的短期利益所遮蔽。第三，革命目标会被劳资谈判目标取代。第四，干部会逐渐从革命者退化为谈判专家、调解员和事务官僚。第五，工人运动会资本主义制度吸纳，成为“可管理的不满”。

这种危险必须坚决反对。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做工会的尾巴，不能把自己的路线建立在群众自发意识之上，更不能为了短期动员而放弃政治领导。党当然要倾听工人、服务工人、扎根工人，但倾听不是尾随，服务不是附庸，扎根不是放弃领导。党必须能够在工人最直接的利益诉求中指出更深的阶级方向，在群众最朴素的愤怒中锻造更高的政治自觉。

华盛事件也说明，工人阶级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谈判机构，而是一个政治领导核心。面对资本撤退，单靠工会只能问：“赔多少钱？”面对国家维稳，单靠工会只能问：“怎样合法表达？”面对官方拖延，单靠工会只能问：“程序如何推进？”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工人没有掌握企业？为什么工人只能等资本清算？为什么国家机器优先维护秩序？为什么工人阶级在名义上是主人，现实中却没有权力？为什么每一次危机都由工人承受？”

这些问题决定了党不可替代。工会可以处理劳动关系内部的问题，但党必须处理阶级统治的问题；工会可以组织工人争取补偿，但党必须组织工人认识并反对产生这种剥夺的制度；工会可以代表工人在某一事件中发声，但党必须代表无产阶级的历史方向。没有党，工人运动就会在一次次经济斗争中循环；有了党，经济斗争才能成为阶级觉醒和组织积累的环节。

因此，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立场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最高地位。工会必须服从党的路线，服务党的群众工作，接受党的政治领导。任何把工会独立化、中心化、政治化为与党平行组织的倾向，都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原则的削弱。任何把工人运动降低为工会运动的观点，都是对阶级斗争的窄化。任何用工会事务代替党的建设、用劳资谈判代替政治路线、用经济诉求代替革命目标的做法，都是必须批判的机会主义。

华盛事件的第四重意义，正是在于它迫使我们重新确认这个原则：工人阶级需要工会，但更需要党；工会能够维护工人的局部利益，但党才能代表工人的根本利益；工会能够组织眼前斗争，但党才能领导历史斗争。工会是党的附属群众组织，是党深入工人阶级、开展群众工作、积累斗争经验的工具；党则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阶级斗争的政治核心和历史方向。

所以，华盛工人的斗争不能被局限为工会斗争。它必须被提升为党的政治教育材料、组织建设材料和路线斗争材料。我们支持工人通过集体力量讨回血汗钱，但我们更要指出：讨回血汗钱只是开始，认识血汗钱为何被夺走才是关键；组织工会只是必要环节，建设无产阶级政党才是根本任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的经济斗争才能摆脱工联主义的限制，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五、工会的正确地位：党的附属群众组织

华盛事件进一步说明，工人斗争不能没有组织，但这种组织不能停留在自发状态，更不能把工会神圣化、独立化、最高化。工会当然是必要的。没有工会或类似的群众组织，工人面对资本时就会更加分散，更容易被个别谈话、分批承诺、法律程序和生活压力逐一瓦解。但是，必须明确：工会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会也不是独立于党的政治中心。工会的正确地位，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附属群众组织。

这里的“附属”，不是说工会没有作用，更不是说工会可以被轻视。恰恰相反，正因为工会直接联系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直接处理工资、工时、补偿、社保、劳动条件等现实问题，所以它对于党开展群众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工会的重要性来自它作为党的群众工作工具，而不是来自它自身可以代替党的政治领导。工会必须在党的路线下活动，在党的政治方向下组织群众，在党的总体战略中发挥作用。

工会的基本特点，是它以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工人进入工会，往往首先不是为了讨论国家政权、生产资料所有制或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工资、工时、加班费、补偿金、劳动保护、社保缴纳、工作环境。这种直接性决定了工会具有广泛群众性，也决定了它天然容易停留在经济斗争范围内。工会越是广泛，越要处理各种不同觉悟水平、不同生活处境、不同诉求强度的工人群众；这就使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最高承担者。

而党则不同。党不是一般群众组织，而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党必须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有统一的政治路线，必须有组织纪律，必须能够从局部事件中看出总体矛盾，从经济斗争中看出政治任务，从工人眼前利益中看出阶级历史利益。党不能满足于做工人情绪的记录员，也不能只做工人诉求的代言人。党的任务，是把群众的分散经验集中起来，把群众的直接愤怒提高为阶级意识，把群众的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

因此，工会和党的关系，不能颠倒。正确关系应当是：党领导工会，工会联系群众；党制定路线，工会贯彻路线；党把握方向，工会组织具体斗争；党培养先进分子，工会提供群众基础；党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工会维护工人的直接利益。

如果没有工会，党容易脱离工人群众，变成少数先进分子的自我循环；如果没有党，工会容易陷入经济主义、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变成资本主义秩序内部的压力调节器。二者都不可缺少，但二者绝不平等。工会必须服从党，服务党，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开展群众工作。

在华盛事件中，工会式组织可以做很多具体工作。例如，统计每个工人的工龄、工资、欠薪、社保、补偿情况；组织工人形成统一诉求；防止企业用单独谈话分化工人；要求公布清算方案；监督补偿支付；帮助工人保存证据；协调群众情绪，防止斗争被恐慌和谣言左右。这些工作都很重要，也必须有人承担。

但是，如果工会只做这些，就仍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工作最多只能回答“怎样拿到补偿”，却不能回答“为什么工人一次又一次被迫索赔”。它最多只能解决眼前的一笔债，却不能揭示整个制度不断制造血汗债的根源。它最多只能在一个企业倒闭后帮助工人争取较好结果，却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被资本反复抛弃的命运。

所以，工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把这些具体工作变成阶级教育。统计欠薪，不只是为了算账，还要让工人看到自己多年劳动如何被资本占有；争取补偿，不只是为了拿钱，还要让工人看到资本危机如何向劳动者转嫁；反对分化，不只是为了维持谈判力量，还要让工人看到集体组织的重要性；监督清算，不只是为了保障支付，还要让工人认识到生产资料和企业资产为什么长期不受工人控制。

这就是党领导工会的意义。党不是替代工会去做每一项具体事务，而是给工会工作注入政治方向。没有党的领导，工会工作会变成事务主义；有了党的领导，工会工作才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没有党的领导，工会干部容易变成材料员、调解员、谈判员；有了党的领导，工会干部才可能成长为工人阶级中的政治骨干。

必须警惕一种错误倾向：把工会的群众性误认为政治正确性。有人会说，工会联系工人最广，因此工会天然代表工人；工会人数最多，因此工会应当决定路线；工会掌握实际诉求，因此党应当服从工会。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群众性不等于先进性，人数多不等于路线正确，直接诉求不等于历史方向。工人群众中既有先进分子，也有中间分子，也有暂时落后的意识；工会作为广泛群众组织，必然反映这种复杂性。如果党放弃领导，把路线决定权交给工会的自发倾向，结果必然是把先进路线降低到群众当下平均意识水平。

无产阶级政党恰恰不能只反映群众的平均水平，而要提高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党要从群众中来，但不能停留在群众原有意识中；

党要到群众中去，但不是把群众的自发意识原样归还给群众，而是把经过集中和提升的路线带回群众。工会如果不接受党的领导，就很容易把“群众现在能接受什么”变成路线的上限，把“眼前最容易争取什么”变成斗争的全部，把“避免冲突、争取协调”变成行动原则。这样一来，工人运动就会被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牵着走。

工会独立主义的危险，正在这里。它表面上强调工人的自主性，实际上否定党的政治领导；表面上反对“外部干预”，实际上把工人局限在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内部；表面上尊重工人直接诉求，实际上放弃把直接诉求提升为阶级斗争的任务。工会独立主义最终必然滑向工联主义，而工联主义最终又会滑向改良主义。它会把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缩小为争取更好工资、更好补偿、更好合同、更好谈判条件。这样一种路线，不能真正解放工人，只能让工人在雇佣劳动制度中获得暂时缓和。

在修正主义体制下，官方工会更清楚地暴露了这种危险。名义上它代表工人，实际上它往往首先服务于“稳定劳动关系”；名义上它维护权益，实际上它常常避免真正组织斗争；名义上它是群众组织，实际上它可能成为行政体系和资本秩序的附庸。这样的工会不是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而是修正主义国家管理工人的工具。它不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反对资本，而是把工人组织进可控秩序之中。

因此，我们说工会应当是党的附属组织，并不是为现存官方工会辩护，而是要从根本上区分两种工会：一种是修正主义秩序下的官僚化工会，它附属于国家和资本秩序；另一种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工会，它附属于党的革命路线。前者把工人束缚在稳定框架内，后者把工人组织进阶级斗争中。前者害怕工人的主动性，后者要把工人的主动性提升为自觉组织。前者调和阶级矛盾，后者揭露并组织阶级斗争。

这一区分非常重要。反对工会独立主义，并不等于支持官僚工会；强调工会附属于党，并不等于让工会附属于行政机关、地方政府或资本集团。恰恰相反，真正的工会必须摆脱资本和修正主义国家机器的控制，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工会不能中立。工会要么在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秩序中成为调解工具，要么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成为阶级斗争工具。所谓“中立工会”，在阶级社会中只是一种幻想。

在华盛事件中，如果有真正受党领导的工会，它就不会只是在工人愤怒爆发后被动处理诉求，而应当在平时就深入工厂、联系工人、了解劳动条件、掌握企业情况、发现先进分子。一旦企业出现关厂迹象，工会应当在党的指导下组织工人形成统一认识，防止企业突然撤退，要求公开账目和资产安排，推动工人集体监督清算过程，并把整个斗争转化为对代工资本和修正主义劳动秩序的政治揭露。

但是，这些任务的完成，不能依靠工会自身自产生。它需要党的路线，需要党的干部，需要党的理论教育，需要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工会本身不能保证方向正确。一个工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开始时很激进，也可能在谈判、妥协、事务、压力和合法框架中逐渐变质。它可能从斗争组织变成协调组织，从群众组织变成干部小圈子，从反抗资本的工具变成替资本管理工人不满的机关。

因此，党必须领导工会，也必须监督工会。党要防止工会干部脱离群众，防止工会事务主义，防止工会小官僚化，防止工会把经济斗争绝对化。工会干部如果只会谈判、不懂阶级教育；只会算补偿、不懂剩余价值；只会找政府协调、不懂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只会维护局部利益、不懂无产阶级整体利益，那么这样的干部就必须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工会的战斗性，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服从正确的政治路线。

这一点也关系到产业工人路线。党要深入产业工人，不能只靠宣传文章，也不能只靠少数先进分子孤立活动，而必须有能够广泛联系群众的组织形式。工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它是党进入工人日常生活、工作场所和具体斗争的桥梁。但是桥梁不能变成司令部。桥梁的作用，是连接党和群众；司令部的作用，是决定方向和战略。把桥梁当成司令部，就会使整个运动失去政治中心。

所以，工会应当承担的是群众组织职能，而不是最高领导职能。它可以反映诉求，但不能决定党的路线；可以组织行动，但不能取代党的领导；可以培养骨干，但骨干必须进一步接受党的政治教育；可以参与谈判，但谈判必须服从党的总方向；可以处理经济斗争，但经济斗争必须服务于阶级斗争。

华盛事件中的工人集会，是工人群众自发力量的表现；而我们从中学到的组织结论，就是必须把这种自发力量通过正确组织形式固定下来、提升起来。这个组织形式不能只是临时维权群，不能只是单纯工会，更不能是官方调解机制，而应当是以党为核心、以工会为群众组织、以先进工人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方向的整体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处于领导地位，工会处于附属地位，群众斗争处于基础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会的地位既不能被低估，也不能被拔高。低估工会，就会使党脱离工人群众；拔高工会，就会使党丧失政治领导。正确路线是：党高于工会，党领导工会，工会服务于党联系和组织工人群众。工会是必要工具，但不是最终目的；工会是群众组织，但不是政治先锋队；工会可以保护工人的直接利益，但只有党才能领导工人实现根本利益。

华盛事件的第五重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这种组织关系的必要性。工人需要团结，需要代表，需要具体的权益组织；但如果这种组织没有党的领导，就容易被经济主义限制，被合法程序拖住，被地方维稳吸收，被工会干部官僚化腐蚀。只有把工会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使工人的索赔斗争不只是一次讨债，而成为阶级意识发展的环节，成为产业工人路线推进的环节，成为反修正主义斗争的环节。

因此，文章必须明确提出：在华盛事件以及类似工人斗争中，工会的正确角色不是独立领导者，而是党的附属群众组织；不是路线制定者，而是路线执行者；不是工人运动的最高形式，而是党领导工人群众的重要工具。工会可以帮助工人讨回血汗钱，但必须由党告诉工人血汗钱为什么会被资本夺走；工会可以组织工人维护权益，但必须由党领导工人认识权益被剥夺的制度根源；工会可以服务眼前斗争，但必须服从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任务。

六、反对工联主义和工会独立主义：不能把工人运动降格为劳资谈判

华盛事件中，工人要求工资、补偿、社保和清算公开，这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这场斗争理解为一次“劳资纠纷”，只是把它归结为“企业应该按标准赔偿”，只是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赔偿金额、谈判程序和政府协调上，那么我们会把一场具有阶级教育意义的事件降低为普通法律维权案例。这正是工联主义和工会独立主义的危险所在。

所谓工联主义，就是把工人运动局限在工资、工时、福利、补偿、劳动条件等经济问题上，把工人阶级的斗争缩小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争取更好的出卖劳动力条件。它不否认工人受苦，也不一定反对工人斗争，但它拒绝把斗争提升到政治高度，拒绝追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拒绝承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它看见工人被欠薪，却不看见雇佣劳动制度；看见补偿被压低，却不看见生产资料所有制；看见企业经营困难，却不看见资本主义危机转嫁机制；看见政府协调，却不看见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

工联主义的表面语言往往很“实际”。它会说：工人现在最关心的是拿钱，不要谈太高；先解决赔偿，不要政治化；先依法维权，不要激化矛盾；先找政府协调，不要讲制度问题。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为工人着想，实际上却把工人限制在最低限度的防御斗争之内。它承认工人可以争取一点补偿，却不允许工人认识自己为什么总是被迫索赔；它承认工人可以反对个别企业违法，却不允许工人反对产生这种违法和剥削的整个制度。

在华盛事件中，如果采取工联主义路线，那么文章的结论最多就是：企业应当依法赔偿，政府应当积极协调，工人应当理性维权，工会应当发挥作用。这种结论看似完整，实际上非常贫弱。它没有回答为什么资本可以突然撤退，为什么工人没有监督企业资产的权力，为什么官方工会平时不能真正代表工人，为什么地方当局首先关心秩序，为什么每当危机发生时，工人总是最后知道、最先受害、最难索赔。

这就是工联主义的根本问题：它只处理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出来的结果，却不追问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它把工人斗争变成补漏洞、修裂缝、求调解，而不是把斗争变成揭露制度、组织阶级、准备更高斗争的学校。它的全部眼光都停留在“怎样让资本少欺负工人一点”，而不是“怎样结束资本统治工人的制度”。

工会独立主义则是工联主义的组织表现。它认为工会应当独立于党，甚至应当成为工人运动的中心；它把工会的群众性当成天然正确性，把党的领导看成多余甚至有害；它主张工会按照工人的眼前要求自行决定方向，而不是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路线。这种观点看似尊重工人群众，实际上是否定先进理论、否定先锋队、否定阶级政治领导。

工会独立主义常常用“工人自己决定”“不要外部政治干预”“工会只代表工人利益”这样的说法来包装自己。但问题在于，在阶级社会里，没有所谓脱离政治的工会。工会不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法律框架、修正主义国家机器、资本谈判规则和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所谓“独立”，往往只是从党那里独立出来，却向资本主义秩序靠拢过去。

这正是必须讲清楚的。工会如果不服从党，并不会因此变成纯粹的工人组织。它会在实际运行中被各种力量塑造：政府要求稳定，资本要求谈判，法律要求程序，舆论要求理性，干部要求保位，群众要求眼前结果。没有党的政治领导，这些压力就会共同把工会拉向妥协、保守和事务主义。最后，工会也许仍然使用工人语言，但它的实际功能已经变成管理工人不满、调节劳资冲突、维护生产秩序。

华盛事件中的官方工会如果没有真正站出来组织工人，恰恰说明修正主义体制下的工会已经失去了革命群众组织的性质。它不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武器，而是国家管理劳动关系的部件。这样的工会当然不是我们所说的党领导下的工会。它附属于修正主义国家，而不是附属于无产阶级政党；它服务的是稳定，而不是阶级斗争；它调解的是矛盾，而不是组织工人认识和改变矛盾。

因此，我们反对工会独立主义，并不是为了维护官方工会，而是为了建立真正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官方工会的问题不在于它“不够独立”，而在于它附属于错误的阶级力量；真正的解决方向不是让工会变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独立中心，而是让工会摆脱资本和修正主义国家机器的控制，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成为党深入工人群众的组织形式。

工联主义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它会降低工人阶级的历史眼界。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然要争工资、争补偿、争劳动条件；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绝不是永远争取“较好的被剥削条件”。如果工人运动的最高目标只是工资高一点、补偿多一点、合同规范一点、企业少黑一点，那么工人阶级就永远被困在雇佣劳动制度之中。这样的斗争即使取得局部成果，也无法改变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出卖者的地位。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把问题提得更高。工资斗争要支持，但要指出工资关系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表现；补偿斗争要支持，但要指出补偿只是资本解除劳动关系后的最低责任；社保斗争要支持，但要指出工人的生存保障不应依赖资本和市场；清算公开要支持，但要指出工人应当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企业资产长期由资本单方面控制。每一个经济问题，都必须被提升为政治问题；每一次局部斗争，都必须被纳入阶级斗争的总框架。

这不是脱离实际，而是真正把实际斗争提高到应有水平。所谓“不要政治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最喜欢的政治化。因为它要求工人只谈钱、不谈权；只谈个案、不谈制度；只谈法律、不谈阶级；只谈协调、不谈斗争。它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伪装成中立背景，把国家机器伪装成中立裁判，把工人的政治意识压低到纯粹索赔水平。反对这种“不要政治化”，正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

工联主义还会制造一种幻觉：仿佛只要有强大的工会，工人问题就能解决。这是错误的。强大的工会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仍然可能成为改良主义堡垒。它可以组织大规模谈判，却不一定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可以拥有庞大会员，却不一定提高阶级意识；可以争取高工资，却不一定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可以拥有专业干部，却可能变成一套小官僚机构。工会的规模不能替代路线，工会的合法地位不能替代阶级立场，工会的谈判能力不能替代党的领导。

因此，判断一个工会是否真正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不能只看它是否为工人谈判，也不能只看它是否组织过维权，而要看它是否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否服从正确政治路线，是否把经济斗争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是否培养工人先进分子，是否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秩序。如果没有这些，即使它口头上代表工人，也仍然是改良主义的工会。

在华盛事件中，真正的党领导下的工会路线应当是：坚决支持工人索赔，但反对把索赔作为终点；坚决组织工人维护直接利益，但反对把直接利益同根本利益割裂；坚决利用法律和谈判手段，但反对对法律和谈判产生迷信；坚决要求公开清算和足额赔偿，但同时揭露代工资本体系和修正主义国家机器的阶级本质。这样的工会才不是普通劳资协调机构，而是党的群众工作阵地。

反过来，如果工会只会说“我们帮助大家争取合理补偿”，却不敢说“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制造这种剥夺”；只会说“请大家依法表达诉求”，却不敢说“国家机器首先维护资本秩序”；只会说“我们会向上反映”，却不敢组织工人形成自己的集体力量；只会说“保持冷静”，却不敢教育工人认识阶级矛盾，那么这样的工会即使名义上为工人服务，实际上也已经落入工联主义和修正主义框架。

工联主义还容易同机会主义结合。机会主义者最喜欢把自己包装成“务实派”。他们会批评革命路线“太高”“太远”“不接地气”，然后把斗争压缩到眼前可以谈判的范围内。他们害怕明确提出党的领导，害怕批判官方工会，害怕揭露修正主义国家，害怕把工人经济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于是，他们把退让说成成熟，把尾随说成群众路线，把没有原则说成灵活策略，把不敢斗争说成保护工人。

这种机会主义必须被揭露。真正的群众路线不是尾随群众当下意识，而是把群众经验集中起来并提高；真正的务实不是放弃原则，而是在具体斗争中贯彻原则；真正保护工人不是让工人永远停留在低水平维权，而是帮助工人形成组织力量和政治自觉。如果为了所谓“现实可行”而放弃党的领导、放弃阶级分析、放弃反修正主义立场，那么这种现实主义不过是向资本秩序投降的另一种说法。

当然，反对工联主义，并不意味着轻视经济斗争。相反，正因为经济斗争是工人群众最直接、最广泛、最容易参与的斗争形式，党才必须重视它、进入它、领导它。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经济斗争，而在于谁来领导经济斗争，经济斗争服务于什么方向，是否通过经济斗争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如果经济斗争由党领导，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校；如果经济斗争由工联主义支配，它就会变成制度内部的调节机制。

这一区分必须贯穿对华盛事件的分析。我们不能站在旁边空喊抽象口号，不管工人的工资和补偿；但也不能只做赔偿计算员，把文章写成劳动法说明书。正确写法应当是：从工资和补偿切入，揭露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从企业倒闭切入，揭露资本主义危机转嫁；从工人集会切入，说明群众斗争的力量和局限；从官方协调切入，揭露修正主义国家机器；从工会缺位或软弱切入，论证党领导下群众组织的必要性。

这样，华盛事件就不会被窄化为“工人要钱”，而会成为说明党的领导必要性的现实材料。工人确实要钱，因为那是他们的血汗；但工人不能只要钱，因为他们的血汗之所以被剥夺，背后有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工会确实要组织索赔，因为这是现实任务；但工会不能只组织索赔，因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不是在每次被剥削后讨回一点损失，而是终结反复产生剥削的制度。

因此，文章在这一部分必须明确批判：任何把华盛事件降格为单纯赔偿问题的观点，都是不充分的；任何把工会抬高为独立政治中心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任何把党降格为工会助手的观点，都是机会主义的；任何否认经济斗争必须上升为政治斗争的观点，都是工联主义的表现。

华盛事件的第六重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工人斗争面临的路线分歧。一条路线是工联主义路线：只谈赔偿，只谈协调，只谈法律，只谈工会，不谈党，不谈阶级，不谈国家机器，不谈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条路线是马列毛主义路线：支持赔偿斗争，但把赔偿斗争提升为阶级斗争；重视工会工作，但把工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利用合法手段，但不迷信合法框架；从具体事件中揭示普遍规律，从局部斗争中积累阶级力量。

我们必须选择后一条路线。因为只有这条路线才能使工人阶级不再一次次陷入被动索赔，不再被限制在资本允许的范围内，不再把自己的历史使命交给工会事务和法律程序。工人阶级需要工会，但工会必须服从党；工人阶级需要经济斗争，但经济斗争必须上升为政治斗争；工人阶级需要讨回血汗钱，但更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领导，终结血汗钱不断被夺走的制度根源。

所以，反对工联主义和工会独立主义，不是理论上的枝节问题，而是关系到工人运动方向的根本问题。华盛工人的斗争若被工联主义解释，就只是一次索赔事件；若被马列毛主义解释，就会成为揭露资本统治、批判修正主义、强调党的领导、推进产业工人路线的重要教材。我们必须把后一种解释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政党手中。

七、修正主义国家与官方工会的破产：谁真正站在工人一边？

华盛事件不仅暴露了代工资本的残酷，也暴露了修正主义国家机器和官方工会的破产。企业突然倒闭，数千工人失业，工资、补偿、社保和清算方案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最应当第一时间站出来，理应是所谓代表工人的官方工会，理应是口口声声宣称“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机关。然而现实恰恰相反：工人不得不自己集会、自己拉横幅、自己阻断道路、自己登上楼顶，用集体行动把问题推到社会面前。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修正主义劳动制度最有力的控诉。

如果工人真的是“主人”，为什么他们在企业倒闭前不知道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如果工人真的是“主人”，为什么企业可以单方面宣布停业，而工人只能在事后追讨工资和补偿？如果工人真的是“主人”，为什么他们不能监督资产转移、债务安排和清算方案？如果工人真的是“主人”，为什么一到集体维权，首先出现的不是工人自己的权力机关，而是维稳力量和行政协调？

这些问题无法用“个别地方处理不当”来解释。它们暴露的是整个修正主义体制的阶级本质。修正主义口头上还保留社会主义词汇，实际上已经把工人重新变成雇佣劳动者，把生产资料重新交给资本支配，把国家机器改造成维护资本积累和社会稳定的工具。工人仍然被称为“工人阶级”，但在现实中，他们只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出卖者；工人仍然被说成“国家主人”，但在现实中，他们连自己的工资补偿都要通过集体抗议来追讨。

这就是修正主义最虚伪的地方：它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名词，却掏空了社会主义的阶级内容；它保留了工人阶级的象征地位，却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实际权力；它保留了工会、劳动法、调解机制、法律程序，却使这些机构和程序服从于资本秩序和维稳逻辑。它不是公开宣布自己站在资本一边，而是用“依法”“协调”“稳定”“理性表达”这些词，把阶级矛盾包装成行政管理问题。

在华盛事件中，当局介入协调，看似是在处理问题。但我们必须追问：这种协调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以工人的集体权利为中心，还是以社会秩序为中心？是首先冻结企业资产、防止资本逃避责任，还是首先防止工人行动扩大？是组织工人选出真正代表，还是把斗争引导进可控程序？是公开清算、公开监督、公开赔偿标准，还是让工人等待消息、分批处理、逐渐消散？

修正主义国家机器在这类事件中的常见角色，不是公开镇压一切，而是把矛盾行政化、程序化、分散化。它会承认工人有“合理诉求”，但反对工人用集体力量表达；它会要求企业“妥善处理”，但不一定立即公开强制措施；它会劝工人“依法维权”，但工人如果不集会、不施压，法律程序往往就变成拖延程序；它会安排协调会议，但协调的真正目的常常是防止事态扩大，而不是把工人组织成有力量的一方。

这里必须指出：所谓“稳定”不是中立概念。在阶级社会中，稳定总是有阶级内容的。对资本来说，稳定意味着工厂可以平稳关停、资产可以有序处置、舆情可以降温、交通可以恢复、政府招商形象可以维持。对工人来说，稳定应当意味着工资稳定、生活稳定、补偿稳定、社保稳定、就业稳定、家庭稳定。可是现实中，修正主义国家机器往往首先维护前一种稳定，而不是后一种稳定。

当工人的生活已经被企业倒闭打碎时，谁还在要求工人保持“稳定”？当资本突然宣布停业时，为什么不说资本破坏稳定？当工人集会索赔时，却说工人影响秩序；当企业拖欠责任时，却说企业经营困难。这里的语言差别，正是阶级立场的差别。所谓秩序，不是抽象秩序，而是资本撤退的秩序；所谓稳定，不是工人生活的稳定，而是资本社会的稳定。

官方工会的破产更为明显。工会如果真正代表工人，就应当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提前发现问题，向工人公开情况，组织工人监督企业资产，推动集体谈判，防止工人被突然抛弃。企业宣布倒闭后，工会更应当立即站到工人前面，要求公开工资、补偿、社保和清算明细，组织工人代表，保障集体行动不被分化。可是现实中，官方工会往往并没有发挥这种作用。它不是斗争的发动者，而是事后的协调者；不是工人的战斗组织，而是稳定劳动关系的附属机关。

这说明，官方工会早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的群众组织，而是修正主义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不是组织阶级斗争，而是调和阶级矛盾；不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反对资本，而是把工人纳入可管理、可协调、可降温的框架之中。这样的工会越是庞大，越能说明修正主义官僚机器对工人运动的控制；这样的工会越是“合法”，越能说明它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秩序。

真正的工会应当是党的群众工作工具，而不是国家管理工人的工具。真正的工会应当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不是接受地方政府、企业管理层和修正主义官僚系统的支配。真正的工会应当把工人从分散状态组织成阶级力量，而不是把工人的集体行动拆散成个体申诉、法律材料和行政调解。华盛事件中官方工会的缺位，正说明它已经丧失了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资格。

这也进一步证明：工会本身并不天然先进。一个工会究竟站在哪个阶级一边，不取决于它的名称，而取决于它服从哪条路线、附属于哪个阶级力量。附属于修正主义国家机器的工会，即使名义上代表工人，实际也会服务于维稳；附属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会，才可能成为工人斗争的工具。工会不是超阶级的。它要么被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吸收，要么被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不存在抽象中立的工会。

因此，我们对官方工会的批判，不能停留在“它不作为”这一层。不是简单地某些干部懒惰、官僚、无能，而要指出它的阶级属性已经发生变化。它的“不作为”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它作为修正主义劳动秩序组成部分的必然表现。它之所以不愿真正组织工人，是因为真正组织工人必然会触及资本利益和地方维稳逻辑；它之所以只愿协调，是因为协调可以把阶级矛盾重新纳入可控程序。

这里也必须批判一种幻想：认为只要“改革官方工会”，工人问题就可以解决。这种幻想本质上仍然停留在修正主义框架内部。官方工会之所以软弱，不只是因为制度设计不完善，而是因为它所服从的政治路线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要国家机器服务于资本积累，只要工会服从这个国家机器，只要工人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会改革就很容易变成形式调整，而不能改变它的阶级功能。

在华盛事件中，真正的问题不是“官方工会为什么没有更积极地调解”，而是“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真正掌握自己的组织”。真正的问题不是“地方政府为什么没有更早介入”，而是“为什么工人的命运要等待地方政府介入”。真正的问题不是“法律程序如何更顺畅”，而是“为什么工人争取基本权利还要被拖进漫长程序”。真正的问题不是“企业怎样更负责任地破产”，而是“为什么资本有权决定工人的生死饭碗”。

修正主义国家最害怕的，正是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它希望工人只问赔多少钱，不问谁掌握生产资料；只问什么时候发钱，不问为什么资产清算不受工人监督；只问政府能不能协调，不问政府为什么首先维护秩序；只问工会能不能帮忙，不问工会为什么不领导斗争。它把工人的视野限制在个案处理上，把阶级矛盾限制在行政程序中。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打破这种限制。党要指出，华盛事件不是制度运转中的小故障，而是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后的必然产物。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把工人重新投入资本逻辑之中。企业可以按利润规律开设和关闭工厂，资本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转移风险，地方政府可以围绕招商和稳定运转，而工人则被要求在失业后依法、理性、耐心等待。这种结构本身就是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的否定。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方向下，工人不应只是企业破产后的债权人，而应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经济的主人；工人不应只是被动等待补偿，而应有权监督企业经营、资产处置和劳动安排；工会不应只是调解机构，而应是党领导下组织工人参与阶级斗争和生产管理的群众组织；国家不应是维稳机器，而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镇压资本对工人的剥夺，保障劳动者掌握社会权力。

这正是反修正主义立场必须强调的地方。修正主义的危险，不只是它在理论上背叛马克思主义，更在于它在实践中恢复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同时继续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它让工人在口号中当家作主，在现实中被资本开除；让工人在宣传中受到尊重，在维权中受到驱散；让工会在制度中拥有地位，在斗争中没有力量；让国家在名义上代表人民，在实际运行中维护秩序和资本。

华盛事件把这种矛盾暴露得非常清楚。企业倒闭时，工人不是作为主人参与决策，而是作为被通知者接受后果；工人不是通过自己的组织掌握局面，而是通过集会索赔争取回应；地方政府不是首先发动工人监督资本，而是出面协调和维持秩序；官方工会不是领导者，而是缺位者或附属者。这一切都说明：所谓“工人阶级领导”的官方叙事已经破产。

因此，文章在这一部分必须提出一个鲜明结论：华盛事件不是单纯证明资本家无良，而是证明修正主义国家和官方工会都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资本的背叛是公开的，修正主义的背叛则更加隐蔽。资本至少公开追求利润，而修正主义一边讲工人主人地位，一边允许工人成为资本危机的牺牲品。这种背叛更需要被揭露。

无产阶级政党在这里的任务，就是揭露这种虚伪，打破官方叙事，把工人从对政府协调和官方工会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党不是要否定工人利用现有法律和程序争取权益，而是要告诉工人：法律和程序只是可以利用的斗争场域，不是你们解放的根本保证；官方工会和政府协调可以被迫发挥一定作用，但它们不是你们的根本依靠；真正可靠的，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是在党领导下形成的阶级力量。

华盛事件的第七重意义，就在于它证明了反修正主义斗争不是抽象理论争论，而是同工人每天的生存问题直接相关。修正主义不是书本里的错误概念，而是现实中让工人失去主人地位、被迫向资本索赔、被官方工会冷落、被维稳逻辑压制的制度事实。反修正主义，就是要重新把工人阶级放回历史主体的位置；就是要揭露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维护资本秩序的国家和组织形式；就是要建立真正受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人群众组织。

所以，面对华盛事件，我们必须问：谁真正站在工人一边？资本当然不站在工人一边；地方维稳机器也不能真正站在工人一边；官方工会如果服从修正主义秩序，也不能真正站在工人一边。真正能够始终站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一边的，只能是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把工人的眼前索赔同阶级解放联系起来，把对资本家的愤怒同对修正主义制度的批判联系起来，把一次地方关厂事件同整个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

八、党如何领导工人斗争：把经济索赔提升为阶级组织

华盛事件已经说明，工人群众有反抗的要求，也有集体行动的力量。但是，工人群众的力量如果没有正确路线的集中，没有组织形式的固定，没有政治方向的提升，就容易在事件结束后重新分散。一次集会可以迫使企业和地方当局回应，一次维权可以争取一定赔偿，但如果

没有党来总结经验、培养骨干、建立联系、提高认识，那么斗争过后，工人仍然会回到孤立状态。资本则会等待下一次危机，再一次把损失转嫁给工人。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斗争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总结斗争经验。党不能只在事件发生时表示同情，也不能只停留在喊几句支持口号，而要把整个过程当作阶级斗争的教材来分析：企业是如何突然宣布停业的？工人最初是如何得知消息的？赔偿方案为什么不透明？工人采取了哪些集体行动？地方政府如何介入？官方工会是否出现？资本和行政力量是否试图分化工人？工人中哪些人表现出坚定性、组织能力和群众威信？哪些环节暴露了工人斗争的弱点？

这种总结不是旁观者的评论，而是为了下一次斗争积累经验。没有总结，斗争就只是一次情绪爆发；有了总结，斗争才能变成阶级记忆。工人阶级不能每一次都从零开始，不能每一次都在企业倒闭后临时摸索，不能每一次都被资本和地方机器牵着走。党必须把分散的经验集中起来，使工人知道：资本常用什么手段逃避责任，地方当局常用什么方式降温，官方工会常表现出什么局限，工人应当怎样保持统一立场，怎样防止分化，怎样把经济要求与政治认识结合起来。

党领导工人斗争的第二项任务，是发现和培养先进工人。每一次群众斗争中，都会有一部分工人表现得更坚定、更清醒、更有组织能力。他们可能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理论认识，但他们在现实斗争中敢于站出来，能够联系群众，能够表达诉求，能够在压力下保持立场。这些人是工人阶级中最宝贵的力量。党必须重视他们、教育他们、团结他们，使他们不只是临时维权代表，而是逐渐成长为阶级斗争骨干。

这里必须强调，先进工人不是自然形成的。斗争可以产生先进分子，但先进分子要真正成长，还必须接受理论教育、组织训练和政治路线锻炼。如果没有党的培养，维权骨干可能在事件结束后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甚至被资本和官方机制吸收，变成普通谈判代表、调解中介或事务干部。只有党才能把他们从一次事件中的积极分子，培养为具有长期意识、组织纪律和阶级立场的工人骨干。

党领导工人斗争的第三项任务，是把经济诉求政治化。这不是脱离工人实际，也不是用抽象口号取代具体要求，而是在具体要求中揭示阶级本质。工人要求工资，党就要说明工资关系背后的剩余价值剥削；工人要求补偿，党就要说明资本为什么可以随意解除劳动关系；工人要求清算公开，党就要说明工人为什么没有监督企业资产的权力；工人面对警察和维稳压力，党就要说明国家机器并不是中立裁判，而有自己的阶级功能。

如果不进行这种政治提升，工人就可能把华盛事件看作一个孤立个案，认为问题只是某个老板坏、某个企业经营失败、某个地方处理不好。但如果经过党领导下的教育和总结，工人就能看到：华盛不是孤立的，欠薪不是偶然的，低额补偿不是个别的，官方工会软弱不是简单失职，地方维稳也不是单纯行政习惯。这些现象背后，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修正主义国家秩序共同作用的结果。

党领导工人斗争的第四项任务，是建立群众组织形式。工人不能只在危机爆发时才临时聚集，也不能每一次都依靠短暂的愤怒维持团结。临时集会有力量，但不稳定；临时代表有作用，但容易被分化；临时群组传播快，但缺乏纪律和持续性。党必须通过群众组织，把工人日常联系起来，使斗争经验能够保存，使先进工人能够互相认识，使工人群众在平时就具有一定的组织纽带。

在这里，工会作为党的附属群众组织就具有重要意义。工会可以在日常层面联系工人，了解工资、工时、劳动强度、社保、管理压迫、裁员迹象等问题；可以在斗争发生时迅速整理诉求、组织讨论、统一意见；可以在事件之后保存经验、继续联系群众、开展教育工作。但是，工会必须明确服从党的领导。工会的任务是群众工作，党的任务是政治领导。工会不能自成中心，不能独立决定路线，更不能把党变成自己的后勤机关。

党领导工人斗争的第五项任务，是防止斗争被法律程序和行政协调消磨。法律和程序可以利用，但不能迷信。工人当然可以要求仲裁、诉讼、清算、公示、执行，但如果所有力量都被导入漫长程序，而工人的集体力量被拆散，那么所谓“依法处理”就可能变成拖延和消耗。党必须教育工人认识到：法律是斗争的一个场域，而不是解放的根本保证；程序可以作为工具，但不能代替组织；谈判可以进行，但不能代替阶级力量。

这并不是否定具体维权，而是要求工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外部机构的善意上。资本会利用程序拖延，地方政府会利用协调降温，官方工会会利用调解消解斗争，法律语言会把阶级矛盾改写成债权债务纠纷。党必须在这些过程中保持政治清醒，使工人既能利用现有手段争取利益，又不被现有手段所限制；既能提出具体赔偿要求，又不放弃对制度根源的认识。

党领导工人斗争的第六项任务，是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右的机会主义，即害怕斗争、迷信协调、回避阶级政治，只要求工人安静等待结果，把斗争压缩为法律申诉和温和谈判。另一种是“左”的冒进主义，即只有愤怒，没有组织；只有冲动，没有计划；只强调行动强度，不重视群众基础和长期建设。前者会把工人运动驯化为改良主义，后者则会把群众力量浪费在无准备的爆发中。

马列毛主义的路线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偏向。党既不能做群众自发意识的尾巴，也不能脱离群众实际去强加空洞口号；既不能把斗争降格为劳资协调，也不能把群众推向没有准备的盲动。正确路线应当是：从工人的现实诉求出发，通过群众组织把他们团结起来，通过理论教育把他们提高起来，通过政治领导把经济斗争引向阶级斗争。

党领导工人斗争的第七项任务，是掌握解释权。每一次工人斗争发生后，都会有不同力量争夺解释权。资本会说这是市场困难、经营失败；地方政府会说这是需要依法协调的群体性事件；自由派会说这是法治不完善；改良派会说这是劳动保护不足；工联主义者会说这是赔偿谈判问题。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提出自己的解释：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危机向工人转嫁的表现，是修正主义国家机器维护资本秩序的表现，是工人阶级需要独立政治领导的表现。

解释权不是书面宣传的小事。谁解释事件，谁就影响工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谁解释事件，谁就影响下一次斗争的方向。假如工人接受资本的解释，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只是市场波动的牺牲者；假如接受自由派解释，他们就会把希望寄托在法律改革；假如接受工联主义解释，他们就会把目标限制在赔偿谈判；只有接受马列毛主义解释，他们才会把自己的苦难同资本主义制度、修正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联系起来。

党领导工人斗争的第八项任务，是把局部斗争纳入长期路线。华盛事件不是孤立的，将来还会有更多关厂、欠薪、裁员、社保断缴和补偿纠纷。党不能每一次都只是被动回应，而要把这些事件连接起来，形成产业工人路线的一部分。哪里有集中的产业工人，哪里有长期劳动压迫，哪里有频繁劳资冲突，哪里就应当成为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点。

这种长期路线要求党深入工人，而不是只在事件发生时发表文章。党必须了解工人的生活，了解工人的语言，了解工人的恐惧和顾虑，了解不同工种、不同年龄、不同工龄、不同户籍和不同家庭负担工人的差异。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才不是外在命令，而能真正扎根群众。党的政治领导越要坚定，群众工作就越要细致；党的路线越高，进入群众的方式就越不能空洞。

在这一过程中，工会的附属地位必须始终明确。工会可以成为党接触工人、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的重要形式，但不能把党的工作降低为工会事务。党不能只围绕工资单转，不能只做补偿计算，不能只参加谈判，不能只关心个案胜负。党必须通过这些具体事务培养阶级意识、发展组织联系、锻炼骨干、揭露制度矛盾。工会工作是入口，不是终点；群众事务是基础，不是全部；经济维权是学校，不是毕业。

党领导工人斗争的第九项任务，是使工人从被动受害者转变为主动组织者。资本主义制度最希望工人保持被动：被通知、被裁员、被欠薪、被安抚、被协调、被分流。党则必须使工人认识到，他们不是等待赔偿的个体债权人，而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阶级力量。工人只有在组织中，才能从孤立个人变成集体力量；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从集体不满变成政治斗争；只有在政治斗争中，才能从防御性维权走向主动改变社会。

华盛工人的横幅说“青春全献给华盛”，这句话本身已经包含着深刻的阶级事实。工人的青春被资本吸收进生产过程，变成商品、利润和企业积累；当资本不再需要他们时，又试图把他们作为成本甩掉。党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朴素控诉提升为科学认识：不是某一家企业吞噬了工人的青春，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工人的生命时间变成资本增殖的材料。工人要夺回的不仅是补偿金，更是作为阶级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

因此，党领导工人斗争，不能只是在斗争之后说几句正确的话，而必须贯穿于斗争的整个过程：平时联系群众，危机前发现苗头，事件中支持工人形成统一诉求，斗争中防止分化和机会主义，事件后总结经验、培养骨干、巩固组织、开展教育。这样的领导不是空洞的政治宣言，而是把党的路线落实到群众斗争的每一个环节。

当然，这种领导必须始终坚持原则性和群众性的统一。党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轻视工人的眼前利益。工人要工资，党就必须支持；工人要补偿，党就必须支持；工人要公开清算，党就必须支持。谁轻视这些直接诉求，谁就不可能真正领导工人。但是，党也不能被直接诉求所限制。支持工资斗争，不等于只谈工资；支持补偿斗争，不等于只谈补偿；支持工会工作，不等于把工会抬高到党的位置。

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斗争的辩证法：从经济斗争出发，但不止步于经济斗争；依靠群众组织，但不让群众组织取代党；尊重群众经验，但不尾随群众自发意识；利用合法空间，但不迷信合法秩序；争取眼前利益，但始终指向根本解放。

华盛事件的第八重意义，正在于它说明：工人斗争一旦发生，真正的问题就不只是“赔多少钱”，而是“谁来领导”。如果由资本和政府解释，它就会被降温；如果由官方工会处理，它就会被协调；如果由自由派解释，它就会被法治化；如果由工联主义者主导，它就会被经济化。只有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它才能被提升为阶级斗争的教材，成为工人阶级组织化和政治化的起点。

所以，党领导工人斗争，归根到底就是要完成三个转化：第一，把工人的分散不满转化为集体力量；第二，把工人的经济诉求转化为阶级意识；第三，把工人的临时抗争转化为长期组织。没有这三个转化，斗争即使取得局部赔偿，也会很快消散；完成这三个转化，哪怕一次斗争遭遇挫折，也会留下组织、经验和先进分子。

华盛可以倒闭，工人可以失去一个工作场所，但如果工人通过斗争认识了资本、认识了国家、认识了工会局限、认识了党的必要性，那么这场斗争就不会白白发生。资本希望工人在失业后各自散去，党则要使工人在斗争后更加团结；资本希望工人只记住赔偿金额，党则要使工人记住阶级教训；资本希望事件结束，党则要把事件变成新的开始。

九、从华盛事件看产业工人路线：党必须深入真正的生产现场

华盛事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现实处境的一次集中暴露。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深入产业工人，不深入工厂、车间、物流、建筑、制造、外卖、清洁、运输等真正的劳动现场，那么它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不可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只停留在学生圈子、知识分子圈子、网络舆论圈子、泛左翼讨论圈子里，那就必然脱离工人阶级，脱离革命的物质基础。

产业工人路线，不是口号，而是党的生命线。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理论游戏，马列毛主义也不是小资产阶级青年自我感动的道德姿态。它必须同现实生产过程中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工人在哪里被资本压榨，党就必须到哪里去；工人在哪里被拖欠工资、裁员、压低补偿、剥夺社保，党就必须到哪里去；工人在哪里被资本和修正主义国家机器共同压制，党就必须到哪里去。

华盛事件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发生在产业工人身上。这里不是抽象的“人民”，不是模糊的“弱势群体”，而是直接参与生产、直接创造商品价值、直接被资本组织进劳动过程的工人阶级。华盛工人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边缘被压迫，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被剥削。他们每天的劳动，正是资本增殖的基础；他们被关厂抛弃，也正是资本主义危机转嫁的结果。

因此，党分析华盛事件，不能只把它看成一次社会新闻，更不能只把它看成一篇宣传文章的材料。它应当成为党的产业工人路线的现实教材。它提醒我们：工人阶级仍然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阶级力量之一；工厂、车间、生产线、工业园区，仍然是阶级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关厂、欠薪、裁员、补偿、社保、劳动强度，仍然是工人群众最直接、最尖锐、最容易产生斗争的问题。

如果党离开这些问题，只在抽象层面谈革命，谈路线，谈理论，谈纲领，那么这种党就会逐渐变成悬浮的政治小圈子。真正的党必须知道工人每天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工资如何计算，加班如何安排，社保是否缴纳，宿舍条件如何，车间管理如何，工人之间如何联系，企业如何分化工人，地方政府如何介入劳资冲突，官方工会如何发挥或不发挥作用。没有这些具体认识，就没有真正的产业工人路线。

产业工人路线首先要求党把工作重心转向生产现场。不是把工人当成文章中的象征，不是把工人当成口号里的“先进阶级”，而是把工人当成必须长期联系、长期教育、长期组织、长期依靠的阶级主体。工人不是宣传对象而已，更不是同情对象而已。工人应当成为党的社会基础、组织基础和斗争基础。没有产业工人，党就没有真正的阶级根基；没有工人骨干，党就无法真正从小资产阶级革命小组转化为无产阶级政党。

华盛事件中的五千名工人，之所以能够形成集体维权，说明产业工人天然具有集体性。资本主义大生产把工人集中到同一企业、同一车间、同一产业链中，使他们面对共同的工资制度、共同的管理压迫、共同的倒闭风险和共同的补偿问题。这种客观共同处境，是工人阶级能够形成集体斗争的物质基础。小资产阶级容易分散，个体劳动者容易孤立，而产业工人由于生产过程本身的组织性，更容易在危机中形成共同诉求和集体行动。

但是，客观集体性不等于自觉组织性。工人被资本集中在一起，并不自动意味着他们已经具有阶级意识。资本把工人集中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剥削；党则要把这种被资本集中起来的劳动群众，转化为自觉的阶级力量。资本用生产线组织工人，党要用政治路线重新组织工人；资本用工资制度把工人束缚在雇佣劳动中，党要用阶级教育使工人认识工资制度的本质；资本用管理纪律控制工人，党要用无产阶级组织纪律使工人服务于自己的解放事业。

这就是产业工人路线的核心：不是从外部幻想工人会自发完成历史任务，而是通过党的长期工作，使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华盛工人知道自己被欠债、被抛弃、被不公对待，这是自在的阶级经验；但要进一步认识到这种不公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修正主义国家秩序，就需要党的理论教育和组织领导。没有党，工人可能只要求华盛赔偿；有了党，工人才能从华盛事件中认识所有类似事件背后的共同规律。

产业工人路线也要求党反对小资产阶级化。许多所谓左翼组织，口头上最爱谈工人，实际工作却围绕学生、知识分子、网络争论、小圈子活动展开。他们在语言上崇拜工人，在组织上远离工人；在理论上承认工人阶级领导，在实践上却由小资产阶级情绪和兴趣决定方向。这种倾向如果不被纠正，党就会逐渐丧失无产阶级性质，变成一个用工人名义说话的小资产阶级团体。

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断改造自己的阶级基础。它不能满足于有几个会写文章、会讲话、会引用经典的人。文章和理论当然重要，但如果这些理论不能进入工人群众，不能服务工人斗争，不能培养工人骨干，那么它们就会变成自我欣赏。党的理论工作必须服务于产业工人路线，必须把深刻理论变成工人能够理解、能够运用、能够在斗争中检验的武器。

华盛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材料。通过它，可以向工人说明：为什么企业盈利时利润不归工人，倒闭时损失却压到工人身上；为什么劳动合同看似平等，实际上一方掌握生产资料，一方只能出卖劳动力；为什么官方工会在关键时刻软弱；为什么地方政府首先要求秩序；为什么个人仲裁难以对抗集体性的资本撤退；为什么工人需要自己的组织；为什么工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为什么只有党才能把这些斗争连接成长期路线。

这类教育必须从工人的生活经验出发。不能一上来就堆砌概念，而要从工资、补偿、社保、工龄、加班、关厂、清算这些具体问题讲起。工人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饭碗和家庭，这是完全合理的。党的任务不是嘲笑这种直接利益，而是从直接利益中引出阶级分析。真正的政治教育，不是用抽象口号压倒工人，而是帮助工人把自己已经经历的痛苦理解为社会制度的结果。

产业工人路线还要求党重视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先进工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生产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一开始只是敢说话、敢组织、敢质疑、敢要求公开账目；但这些品质如果同党的理论教育结合，就可以发展为阶级骨干。党应当把斗争中的积极工人作为重点联系对象，引导他们从维权骨干转变为政治骨干，从企业内部代表转变为阶级斗争干部。

这一步非常关键。没有工人骨干，党的产业工人路线就只能停留在外部宣传。只有当工人自己的先进分子成长起来，党在产业工人中的根才算真正扎下去。外部知识分子可以帮助写文章、总结经验、提供理论，但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能力必须在斗争中培养出来。党要做的是把先进理论同先进工人结合起来，而不是用少数小资产阶级干部代替工人本身。

这也说明，党必须有耐心。产业工人路线不是一次事件、一次宣传、一次集会、一次文章就能完成的。它需要长期联系，长期积累，长期信任，长期教育。工人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自动接受党的全部路线，也不会因为一次斗争就立刻形成完整政治意识。党必须在反复斗争中证明自己：谁真正站在工人一边，谁能帮助工人总结经验，谁能在压力下坚持原则，谁能不把工人当工具，谁能真正把工人培养为历史主体。



产业工人路线也要求党正确处理工人直接利益和党的政治任务之间的关系。党不能只在需要政治宣传时才出现，不能只把工人斗争当成证明自己路线正确的材料。党必须实实在在支持工人的眼前利益。工人要工资，党必须支持；工人要补偿，党必须支持；工人要防止资产转移，党必须支持；工人要不被打击报复，党必须支持。只有这样，工人才会相信党不是空谈者，而是真正同他们站在一起。

但是，党也不能因为支持眼前利益而丧失政治方向。直接利益斗争必须同长期阶级目标结合起来。党既要帮助工人拿回应得的工资和补偿，也要帮助工人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这种被拖欠、被抛弃、被压低补偿的命运就会反复发生。党既要进入工人的经济斗争，也要防止自己被经济斗争吞没。党要在斗争中成长，但不能变成单纯维权机构。

从华盛事件看，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条件具有复杂性。一方面，工人有强烈的现实不满，企业关厂、欠薪、裁员、补偿缩水都可能激发集体行动；另一方面，工人缺乏独立组织，官方工会不能真正代表工人，地方维稳压力大，法律程序容易消磨斗争，资本有各种分化手段。这种条件要求党既要坚定，又要细致；既要有政治高度，又要有群众工作能力；既要反对改良主义，又要避免脱离群众实际。

产业工人路线不是冒险主义路线，也不是经济主义路线。冒险主义只看到工人愤怒，幻想立即爆发更高斗争，不重视组织积累和群众基础。经济主义只看到工人眼前诉求，把斗争限制在赔偿、工资和合同中，不敢提出党的领导和政治方向。真正的产业工人路线，是在工人现实斗争中积累力量，在经济斗争中进行政治教育，在群众组织中培养骨干，在长期联系中建设党的阶级基础。

这条路线也要求党反对把工会当成终点。工会可以是进入产业工人的重要形式，但不是产业工人路线的最高完成。工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就会把产业工人路线降低为行业维权路线；如果有党的领导，它才能成为党联系和组织产业工人的桥梁。产业工人路线的核心不是“建立工会”本身，而是通过工会和其他群众形式，把产业工人组织到党的政治路线之下。

华盛事件尤其说明，工人斗争需要提前布局，而不是事后感慨。企业宣布倒闭时再去寻找工人，往往已经晚了。真正的产业工人路线应当在平时就进入生产现场，在企业还正常运转时就了解情况，在工人还没有爆发斗争时就建立联系，在资本危机迹象出现时就有一定准备。这样，等到危机爆发时，工人就不会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党也不会只是事件后的评论者。

当然，在现实条件下，这种工作会很困难。资本管理严密，地方控制强，工人生活压力大，许多人害怕失业和报复，官方工会也可能阻碍真正的组织工作。但困难本身不能成为放弃产业工人路线的理由。越是困难，越说明工人阶级需要真正的党；越是压制，越说明经济斗争必须提升为政治斗争；越是缺乏组织，越说明党必须把组织工人作为核心任务。

华盛事件也提醒我们，不能只关注大城市白领、小资产阶级青年或校园政治。真正的阶级矛盾往往在制造业工厂、县城工业区、外向型代工厂、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最尖锐地表现出来。这些地方的工人可能不掌握复杂理论语言，但他们的生活经验直接接触资本主义剥削。他们每天面对的不是抽象资本，而是具体的工资、工时、主管、机器、订单、宿舍、社保和裁员。党如果不能同这些现实结合，就谈不上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因此，从华盛事件出发，文章必须提出明确的组织结论：党的建设必须同产业工人结合；工会工作必须服务产业工人路线；宣传工作必须面向生产现场；理论教育必须从工人现实经验出发；组织培养必须重视先进工人；斗争总结必须转化为长期联系。只有这样，党才不会停留在口号中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会逐渐成为真正扎根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

华盛事件的第九重意义，就在于它用现实证明：工人阶级不是历史舞台上的旁观者，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最直接的承担者。工人的每一次索赔，每一次集会，每一次横幅，每一次对工资和补偿的要求，都包含着更深的阶级问题。党必须深入这些斗争，把它们从零散事件变成阶级经验，从阶级经验变成组织力量，从组织力量变成政治路线。

归根到底，产业工人路线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党到底依靠谁？如果党依靠小资产阶级情绪，它就会摇摆；如果党依靠网络舆论，它就会漂浮；如果党依靠学生圈子，它就会不稳定；如果党依靠官僚化工会，它就会被吸收。党只有依靠产业工人，依靠真正处在生产关系核心位置的无产阶级群众，才能获得坚实的阶级基础。

所以，华盛事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提醒。它提醒我们，资本正在生产现场制造新的矛盾；工人正在现实压迫中形成新的反抗；官方工会和修正主义国家无法真正代表工人；党如果不进入这些斗争，就会错失与工人阶级结合的机会。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必须把眼睛从抽象争论转向工厂，把脚步从小圈子转向工人，把文章从自我表达转向阶级教育，把组织建设从形式扩张转向产业工人路线。

华盛工人的斗争告诉我们：生产现场才是阶级矛盾最真实的课堂，产业工人是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依靠。党必须到那里去，在那里学习，在那里组织，在那里培养骨干，在那里把经济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只有这样，党的领导才不是纸面上的领导，工会的附属地位才不是组织图上的安排，而是真正落实到工人阶级斗争中的现实力量。

十、结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

华盛玩具广西四厂倒闭事件，表面上是一场企业破产后的工人索赔斗争，实质上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代工资本的残酷，照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危机面前的脆弱处境，也照出了修正主义国家和官方工会在关键时刻的阶级本质。资本可以用“经营困难”“资金链断裂”“市场不景气”解释自己的撤退，但工人不能用这些话支付房租、养活家庭、弥补失业损失，更不能用这些话抹去多年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华盛事件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所谓“企业共同体”是虚假的。企业盈利时，利润归资本所有；企业亏损时，损失却被推给工人承担。工人在生产线上付出青春、体力和健康，资本则把这些劳动转化为商品、订单和利润；等到资本无法继续增殖时，工人又被当作成本、债务和不稳定因素处理。这不是个别企业的道德失败，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必然逻辑。

因此，工人索赔完全正当。工资不是恩赐，补偿不是施舍，社保不是慈善，工龄不是可以被资本随意打折的数字。华盛工人要求血汗钱，是对资本赖账行为的反抗；他们拉起“青春全献给华盛，破产别破良心债，还我血汗钱”的横幅，是工人阶级朴素而深刻的控诉。它说明工人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自己不是资本的“家人”，而是被资本使用、消耗、抛弃的雇佣劳动者。

但是，文章必须进一步指出：仅有索赔是不够的。工人要讨回应得的钱，这是第一步；但如果斗争只停留在赔偿金额上，那么即使取得局部胜利，也不能改变工人反复被资本压迫、拖欠、裁撤和抛弃的命运。今天是华盛，明天还会有别的工厂；今天是0.5N的危险，明天还会有新的打折赔偿；今天是广西工人集会，明天还会有别的地方工人被迫走上同样道路。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这种危机转嫁就会不断重演。

这正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替代的原因。工会可以组织工人争取工资和补偿，但党必须告诉工人：工资和补偿为什么总是被资本拿来拖延、压低和讨价还价。工会可以帮助工人整理诉求、参与谈判、维护直接利益，但党必须把这些直接利益同阶级斗争、国家机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无产阶级解放联系起来。工会可以处理经济斗争，党则必须领导政治斗争；工会可以维护局部利益，党则必须代表阶级整体利益和历史利益。

所以，工会必须是党的附属群众组织，而不能成为独立政治中心。工会一旦脱离党的领导，就会滑向工联主义，把工人运动限制在工资、补偿、合同和谈判之内；一旦接受修正主义国家和资本秩序的支配，就会变成调解矛盾、维持稳定、管理不满的工具。真正的工会，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成为党联系工人、组织工人、教育工人、培养先进工人的桥梁。桥梁不能代替司令部，群众组织不能代替先锋队，经济维权不能代替政治领导。

华盛事件也再次证明，修正主义所谓“工人当家作主”已经破产。如果工人真是主人，为什么企业倒闭前他们无法监督经营状况？如果工人真是主人，为什么资产清算、赔偿方案和停业决定都由资本和行政力量主导？如果工人真是主人，为什么他们必须通过集会、堵路、登楼、拉横幅才能迫使社会注意自己的血汗债？这种现实说明，工人阶级已经被重新置于资本支配之下，而官方叙事仍然用社会主义词汇掩盖雇佣劳动和资本统治的事实。

反修正主义不是抽象口号，而是从这样的现实中生长出来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要揭露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维护资本秩序的国家机器和官方工会；就是要反对把工人斗争降格为劳资协调，把阶级矛盾降格为法律程序，把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降格为赔偿谈判；就是要重新确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重新把产业工人放在党的工作中心，重新把经济斗争提升为政治斗争。

华盛工人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它不应只是一次孤立的维权事件。它应当成为阶级教育的材料，成为产业工人路线的警钟，成为党的建设任务的提醒。党必须深入工厂、深入车间、深入生产现场，联系真正受资本压迫的工人群众，发现先进工人，培养工人骨干，把分散的愤怒变成组织，把临时的抗争变成经验，把经济索赔变成阶级意识。没有这种工作，工人每一次都会在资本危机后被迫重新开始；有了这种工作，每一次斗争都会为下一次积累力量。

因此，我们对华盛事件的结论必须是明确的：工人要讨回血汗钱，但不能止步于血汗钱；工人要建立组织，但不能止步于工会；工人要维护权益，但不能止步于权益维护。工人阶级要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治司令部，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路线。

华盛可以破产，工厂可以关闭，资本可以撤退，但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会因此结束。相反，正是在一次次关厂、欠薪、裁员和索赔中，工人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本的本质，看到修正主义的虚伪，看到官方工会的局限，看到党的必要性。资本希望工人在拿到或拿不到补偿后各自散去；党则必须使工人在斗争中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觉醒起来。

最后可以用这样一段收束全文：

华盛事件告诉我们：没有组织，工人的愤怒会被分散；没有工会，工人的直接利益难以集中表达；但没有党的领导，工会和经济斗争都无法超出资本主义秩序的边界。工会可以帮助工人讨回血汗钱，党却要领导工人消灭不断制造血汗债的制度。工会可以组织一时一地的维权，党却要组织整个阶级的历史解放。华盛工人的横幅写着“破产别破良心债”，而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真正应当破产的，是代工资本的统治，是修正主义的虚假工人叙事，是一切把工人青春变成利润、再把危机甩给工人的旧制度。工人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从索赔者变成组织者，从受害者变成斗争者，从被资本抛弃的人变成改造世界的人。

流量吃人：零工经济、资本指挥与直播劳动的异化

一、导言：她倒下的不是私人直播间，而是平台资本的新车间

3月9日，山西榆次一名39岁女装带货主播在直播过程中突发不适，随后被送医抢救，最终不幸离世。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发生在直播间里的个人悲剧：一个长期从事女装带货的劳动者，在新春后首场直播中突然身体不支，生命戛然而止。可是，如果我们只把这件事理解为“个人身体原因”“工作太拼”“创业不易”，那就等于主动接受资产阶级舆论给我们的解释框架，把一个具有深刻阶级含义的事件降格为个人命运的不幸。

她倒下的地方，看似是一个私人直播间，实际上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新型生产现场。她面对的看似是手机、镜头、衣服、灯光和观众，实际上是平台、算法、流量、订单、退货率、转化率、竞争压力和生活压力共同构成的资本命令。传统工厂里，工人站在机器旁；直播经济里，主播站在镜头前。形式变了，但劳动者被资本支配、被市场驱赶、被生产节奏吞噬的本质并没有变。

直播带货常常被包装成“个人创业”“自由职业”“新经济机会”。资产阶级叙事会说：她有自己的账号，有自己的直播间，有自己的货品，有自己的粉丝，所以她不是工人，而是一个小老板、一个创业者、一个自我奋斗的人。可是，这种说法只看见了表面的经营形式，却看不见背后的资本关系。一个人是否真正自由，不取决于她是否坐在办公室还是站在直播间，不取决于她有没有一个名义上的“老板”，而取决于她是否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身体和劳动成果。

在零工经济中，资本的统治方式变得更加隐蔽。资本家不一定直接站在劳动者面前发号施令，平台也不一定以传统雇主的身分出现。可是，平台掌握流量入口，算法决定曝光机会，市场决定价格压力，同行竞争决定劳动强度，订单转化决定收入水平，粉丝黏性决定她能不能停播。于是，一个看似“自由”的主播，实际上被一整套资本主义机制牢牢捆住。她不是没有被指挥，而是被一种无形的资本指挥所支配。

这正是零工经济的欺骗性。它把劳动者从传统厂房里释放出来，却把他们重新关进平台、账号、流量和竞争之中；它取消了肉眼可见的监工，却用数据指标、推荐机制和收入不稳定来代替监工；它不再公开命令劳动者加班，却让劳动者在竞争压力下自己命令自己；它不一定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工时表，却吞噬劳动者的整个生活日。

因此，这名主播的离世不能被简单解释为“她自己太拼了”。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一个普通劳动者必须如此拼命？为什么她的生存必须同流量、订单和销售额紧紧捆绑？为什么休息会变成一种奢侈？为什么身体不适不能及时使劳动停止？为什么许多零工劳动者明知道累，却仍然被迫继续干下去？这些问题不能从个人性格里找到答案，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找到答案。

直播间里的劳动，不是轻松娱乐，也不是单纯表演。一个中小带货主播往往要承担选品、试穿、拍摄、直播、剪辑、打包、客服、售后、维护粉丝、观察数据、研究同行等多重劳动。她不仅要消耗体力，还要持续输出情绪；不仅要展示商品，还要展示自己；不仅要卖衣服，还要把自己的声音、表情、耐心、亲和力和生活时间一并投入商品流通过程中。她的身体成为展示工具，她的情绪成为销售材料，她的人格成为账号资产，她的生活时间成为平台资本运转的燃料。

这就是资本主义异化在平台时代的新形式。马克思早已指出，在资本主义下，劳动者创造的对象会变成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劳动者。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己越贫穷；物的世界越增值，人的世界越贬值。在直播经济中，这个规律表现得非常清楚：主播越努力直播，平台越获得数据；主播越努力销售，商品流通越快；主播越努力维护粉丝，账号体系越牢固；主播越努力牺牲休息，平台生态越繁荣。可是，她自己的身体、睡眠、健康、生活和自由时间却越来越少。

这里的“越辛苦，得到越少”，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每多播一场就一定少赚一分钱。它的真正含义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劳动者越把生命投入劳动过程，这个劳动过程就越作为不属于她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她。她创造了流量，却被流量统治；她经营了账号，却被账号绑架；她促进了商品销售，却越来越被商品节奏驱赶；她越想通过劳动获得生活，自己的生活却越被劳动吞没。

所以，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直播事故，而是一个时代的阶级症状。直播间不是私人空间，而是平台资本的新车间；主播不是完全自由的小老板，而是零工经济中被资本关系支配的劳动者；流量不是中立技术，而是资本命令的数字化形式；竞争不是自然规律，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外化为劳动者之间互相压迫的形式。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我们必须拒绝把这类事件个人化、道德化和偶然化。我们要看到，在所谓“灵活就业”“数字经济”“个人创业”的光鲜词汇背后，

是资本把劳动者拆散成一个个孤立账号，再通过平台、算法、流量和竞争把他们重新纳入同一个资本指挥之下。劳动者看似自由，实际更加孤立；看似自主，实际更加无保障；看似为自己劳动，实际在不断强化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平台资本体系。

这名主播倒下时，直播间还在，商品还在，平台还在，流量机制还在，竞争仍然继续。这正是资本主义最冷酷的地方：个体劳动者的身体会崩溃，但资本的机器不会自动停止；劳动者的生命会被消耗，但商品流通仍然继续；一个账号倒下，还会有无数账号被推入同样的竞争场。资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世而停止增殖，除非劳动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揭露并反抗这种制度。

因此，本文的出发点不是哀叹个人命运，而是揭露制度根源。她的离世应当成为我们理解零工经济、平台资本、劳动异化和修正主义“灵活就业”叙事的切入口。我们要追问的不是“她为什么不多休息”，而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让休息变得如此困难”；不是“她为什么这么拼”，而是“为什么劳动者必须用身体和生命时间去换取不稳定的生存机会”；不是“平台能不能更人性化一点”，而是“为什么平台资本有权支配无数劳动者的劳动节奏和生活方式”。

这就是文章要揭示的核心：零工经济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经济，而是资本家隐身为平台、算法、流量和竞争的经济；直播间不是自由创业的舞台，而是资本主义协作被打散、数字化、个体化之后的新车间；劳动者越辛苦，平台越繁荣，商品世界越膨胀，而劳动者自己的身体、时间和生活却越被掏空。

二、零工经济不是分散小生产，而是资本指挥下的社会化协作

要理解这名主播为什么会倒在直播间里，不能只盯着她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也不能只盯着她一个账号的经营压力，而必须把她放回整个零工经济的劳动结构中去。所谓零工经济，表面上是一群分散的个人各自接单、各自直播、各自经营、各自承担盈亏；但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它并不是分散小生产的简单复活，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协作在平台时代的新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协作”部分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不是孤立劳动者的简单相加，而是许多工人在同一资本的指挥下共同劳动。许多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在同一资本家指挥下劳动，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和逻辑起点。这里最关键的不是工人是否彼此认识，也不是他们是否主观上意识到自己构成一个整体，而是他们的劳动已经被同一个资本组织起来，成为资本增殖过程中的环节。

传统工厂中，这种协作很容易被看见。工人集中在一个厂房里，共用机器、流水线、管理制度和工时安排。一个工人在裁剪，一个工人在缝纫，一个工人在包装，一个工人在搬运，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组织上统一，在资本家的指挥下构成一个整体劳动机体。资本家并不只是购买一个个孤立工人的劳动力，而是把他们组合起来，使他们作为“总体工人”发挥作用。

但是到了平台资本主义和零工经济时代，这种协作的外观发生了变化。主播可能在自己的直播间里，骑手可能城市道路上，网约车司机可能在车里，客服可能在家里，剪辑和运营可能在另一座城市，服装生产工人可能在工厂，仓储和物流工人可能在转运中心。他们不再全部处于同一厂房之内，也不一定签订同一个形式上的劳动合同，更不一定认识彼此。于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说：你看，这不是工厂劳动，这是自由职业；这不是资本指挥，这是个人经营；这不是雇佣劳动，这是灵活就业。

这种说法正是零工经济的欺骗性所在。空间上的分散，并不等于资本指挥的消失；形式上的自主，并不等于实质上的自由；没有一个传统老板站在面前，并不等于没有资本统治。平台资本不需要把所有劳动者都集中到同一个车间里，仍然可以通过平台规则、算法分配、流量入口、订单系统、价格机制、评价体系和竞争压力，把他们组织进同一个资本增殖过程。

直播带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个女装主播表面上只是自己对镜头试衣服、讲款式、卖商品，但她的劳动并不是孤立的。她背后连接着服装生产工人、批发市场、供应链、物流、仓储、客服、支付平台、短视频平台、推荐算法、数据系统、消费者评价和退换货流程。她的直播只是商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流通过程中的一个节点。没有服装工人的生产，她没有货可卖；没有物流工人的配送，商品无法到达消费者；没有平台算法的推荐，观众无法进入直播间；没有支付系统，交易无法完成；没有售后系统，商品流通无法闭合。

所以，一个主播的直播间，看似是个体劳动空间，实际上是社会化劳动链条的交汇点。她的劳动之所以能够实现，不是因为她孤立地拥有某种“创业自由”，而是因为她被纳入了一个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体系。这个体系不是由她支配的，而是由平台资本、商业资本、供应链资本和市场竞争共同支配的。

这就必须回到马克思关于协作的基本思想。协作创造出一种单个劳动者无法产生的集体力量。许多劳动者的劳动被组织起来，就会形成超过个人劳动简单相加的社会生产力。在工厂里，这种社会生产力表现为流水线效率、分工协作和共同劳动；在直播经济里，这种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平台规模、数据流量、商品周转速度、直播销售能力和供应链反应速度。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社会生产力并不属于劳动者自己。它表现为资本的力量。工人共同劳动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被资本占有，并作为资本的力量反过来统治工人。直播经济中也是如此：无数主播、运营、客服、快递员、服装工人和平台技术劳动者共同支撑起了直播电商的繁荣，但这种繁荣不表现为劳动者共同掌握的力量，而表现为平台估值、平台流量、平台规则、平台数据和平台控制力。

主播越多，平台越强；劳动者越努力，平台数据越丰富；商品周转越快，资本增殖越顺畅；直播间越繁荣，平台对劳动者的控制力越强。劳动者共同创造了平台经济的社会力量，但这种力量反过来要求每一个劳动者继续服从平台、追逐流量、延长劳动时间、压缩休息空间。这里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异化的基本结构：劳动者创造出来的社会力量，不归劳动者自己支配，而作为异己力量统治劳动者。

零工经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协作伪装成个体自由。传统工厂里，工人一眼就能看见自己被组织在一个资本家下面；直播经济里，主播却很容易以为自己只是在为自己打工。她会说：“这是我的账号，我的直播间，我自己选货，我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播。”可是，她能不能获得流量，不由她决定；她能不能被推荐，不由她决定；她的商品能不能卖出去，要受价格战、退货率、同行竞争和平台规则支配；她停播会不会掉权重，也不由她决定。她拥有账号的表面形式，却不掌握账号生存的根本条件。

这就是形式自由与实质从属的矛盾。主播形式上不是工厂雇员，实质上却受平台资本支配；形式上可以自由开播，实质上被流量和收入压力逼迫着持续劳动；形式上是自我经营，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身体、情绪和生活时间投入资本的流通过程。她不是站在传统车间里的工人，但她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协作体系之中；她不是被一个厂长直接命令，但她仍然被资本逻辑统一指挥。

因此，零工经济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是资本主义对劳动组织形式的重新改造。它不是消灭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而是把这种对立变得更加隐蔽。它不是让劳动者获得了自由，而是让劳动者在表面自由中承担更多风险。它不是取消了协作，而是把协作打散在无数账号、手机、道路、车辆和直播间中，再用平台系统重新连接起来。劳动者的空间被分散了，资本的控制却集中起来了；劳动者的身份被个体化了，资本的力量却社会化地增强了。

这里尤其要批判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错误理解：把主播简单看成“小老板”。确实，一些主播可能有自己的货品、灯光、设备、库存，甚至雇人帮忙，看起来不像传统雇佣工人。

但是，只要他们不能支配平台规则，不能支配流量入口，不能支配市场价格，不能摆脱竞争压力，不能保障自己的稳定收入和休息权，他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他们更多是带着小生产者外壳的半无产阶级化劳动者，是被平台资本和商业资本共同支配的零工劳动者。

他们承担了经营风险，却没有掌握资本权力；他们承担了劳动强度，却无法决定劳动条件；他们承担了市场压力，却不能控制市场规则；他们看似自己给自己打工，实际上是在替平台生态、商品流通和资本增殖承担成本。这种状态比传统雇佣劳动更狡猾，因为它把资本的压力转化为劳动者的自我压力，把资本的命令转化为劳动者的自我管理，把资本的风险转嫁为个人奋斗的代价。

从这个角度看，这名主播倒在直播间里，并不是一个孤立个体在一个孤立空间中的偶然失败，而是整个零工经济协作体系的残酷显影。她的直播间里看似只有她一个人，实际上站在她背后的是平台规则、供应链压力、商品流通速度、同行竞争、粉丝维系和收入不稳定。她表面上是在独自直播，实质上是在资本指挥下同无数分散劳动者一起参与社会化劳动。

这正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新车间。这个车间没有固定围墙，城市和网络就是它的空间；这个车间没有统一厂牌，账号和平台就是它的标识；这个车间没有传统监工，算法和竞争就是它的纪律；这个车间没有明确下班铃声，流量和订单会把劳动日延伸到整个生活日。主播、骑手、司机、客服、仓储工、剪辑、运营、服装工人，都被这个新车间以不同形式组织起来。

所以，文章在第二部分必须明确提出：零工经济不是“没有协作”的个体劳动，而是“看不见协作”的资本主义协作；不是“没有资本指挥”的自由劳动，而是“资本指挥隐身化”的平台劳动；不是“小生产回归”，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在数字平台条件下的新形态。

这也为后文分析异化奠定基础。因为劳动越是社会化，劳动者越是共同创造巨大的平台力量；而这种力量越不归劳动者所有，就越会作为异己力量反过来压迫他们。主播们共同创造流量生态，却被流量生态支配；共同推动商品流通，却被商品周转速度追赶；共同养大平台资本，却被平台规则分割、排名、淘汰。这就是资本主义协作在零工经济中的根本矛盾：劳动是社会化的，控制权却是资本的；劳动者是分散的，资本指挥却是统一的；劳动者越辛苦地共同创造平台繁荣，他们越被平台繁荣所反过来支配。

三、资本家的命令没有消失，只是变成算法、流量和竞争

如果说传统工厂里的资本指挥是看得见的，那么零工经济中的资本指挥就是隐身的。在工厂里，资本家的命令可以通过厂规、监工、考勤、工时表、产量指标、罚款制度表现出来；工人知道是谁在催促自己，知道谁在监督自己，知道谁规定劳动节奏。可是在直播带货这种平台劳动中，资本家的命令并不总是以某个具体老板的声音出现，而是变成算法、流量、曝光率、成交转化率、退货率、粉丝留存、账号权重和同行竞争。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指挥消失了。恰恰相反，它只是从直接命令变成了间接强制，从人格化的老板变成了非人格化的系统，从“厂长叫你加班”变成了“数据逼你加播”。表面上，没有人站在主播面前说：“你今天必须播够十小时。”但平台会通过流量分配告诉她：你不播，就没有曝光；你停播，就会掉权重；你状态不好，观众就会离开；你转化率下降，系统就会减少推荐；你不跟上同行节奏，就会被市场淘汰。

这种形式更加隐蔽，也更加残酷。传统资本家命令工人劳动时，工人至少能看见命令的来源；平台资本命令劳动者时，命令被伪装成客观数据、市场反馈和个人选择。工人不是被迫劳动，而是“自己决定再播一会儿”；不是被监工强迫加速，而是“自己觉得数据还不够好”；不是被老板要求保持笑脸，而是“自己知道粉丝喜欢热情一点”。资本命令被内化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命令，这正是平台资本主义比传统工厂更阴险的地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协作时指出，随着许多雇佣工人在同一资本下共同劳动，资本家的指挥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因为协作劳动必须被组织、协调、统一，资本便把这种组织职能据为己有。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是剥削者，也表现为指挥者；他像工业生产中的将军一样，把许多劳动者的活动组合起来，使他们服务于资本增殖。

在传统工厂里，这个“将军”就是资本家、经理、厂长、主管、监工。而在直播带货中，这个“将军”换了形式。它不一定坐在办公室里，不一定发出书面命令，不一定通过劳动合同直接规定工时。它表现为平台后台的数据，表现为推荐机制，表现为直播间人数波动，表现为系统排名，表现为账号权重，表现为竞争对手的直播时长和价格。资本家的指挥从人格化变成系统化，从口头命令变成数字反馈，从外部强制变成自我驱动。

所以，不能因为主播没有传统老板，就说她不受资本指挥。资本主义发展到平台经济阶段，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资本可以不通过传统雇佣关系直接指挥每一个劳动者，却仍然能够通过平台规则组织他们的劳动。平台不一定购买主播全部劳动力，但它控制主播进入市场的条件；平台不一定发工资，但它控制流量入口；平台不一定直接规定劳动时间，但它通过算法和竞争惩罚休息者、奖励持续在线者；平台不一定承担劳动保障责任，却能规定劳动强度。

这是一种更“高级”的资本指挥。它把资本家的命令拆散为无数看似中立的数据指标，让劳动者无法直接反抗一个具体老板，而只能面对一个冰冷的系统。传统工人可以说“老板压榨我”，但零工劳动者常常只能说“今天流量不好”“平台不给推”“账号数据差”“同行太卷”。资本关系被技术语言遮蔽了，阶级压迫被数据波动掩盖了，资本命令被说成市场规律和算法结果。

但是，算法不是中立的。算法服务于平台资本的增殖，它的目的不是保护劳动者的健康、休息和尊严，而是提高停留时间、交易转化、用户黏性和商品流通效率。平台推荐什么、压低什么、奖励什么、惩罚什么，都不是纯技术问题，而是资本增殖目标在技术系统中的体现。算法不过是资本意志的机器化形式，是资本命令的数字化表达。

过去，监工可以用眼睛盯着工人是否偷懒；现在，平台用数据盯着主播是否停播、观众是否流失、订单是否减少。过去，厂长通过工时表延长劳动日；现在，平台通过流量机制迫使主播自愿延长直播时间。过去，资本通过罚款制度惩罚“不合格”工人；现在，平台通过限流、降权、减少推荐、流量波动惩罚“不活跃”账号。形式不同，本质一样：劳动者必须按照资本规定的节奏活动。

更进一步说，在直播带货中，资本家的命令不仅表现为平台算法，也表现为商品流通本身的压力。商品要卖出去，库存要清掉，粉丝要维护，售后要处理，评价要稳定，退货率要控制。每一个环节都构成对主播的压力。她如果不直播，商品就不能周转；如果不保持热情，观众就不下单；如果不快速响应售后，账号口碑就会下降；如果不持续更新内容，粉丝就会流失。于是，她的整个生活被商品流通节奏吞噬。

资本命令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时间纪律。传统工厂中，劳动日有明确起止，虽然资本会延长劳动日，但劳动和非劳动之间还有相对清晰的界限。直播经济中，这条界限被打碎了。开播是劳动，准备开播也是劳动；直播是劳动，直播后的复盘、打包、售后、回复粉丝也是劳动；今天的数据影响明天的流量，明天的流量又迫使今天继续准备。劳动不再局限于直播时段，而是侵入休息时间、家庭时间、睡眠时间和情绪空间。

这就是平台资本指挥的另一个特点：它不只指挥劳动者的手，也指挥劳动者的生活节奏。它要求主播在该休息时继续想着选品，在该吃饭时盯着数据，在该睡觉时处理客户，在身体疲惫时仍然保持笑脸。劳动者越是以为自己在“经营自己的事业”，就越容易把全部生活投入资本增殖过程。资本不再只是占有劳动时间，而是试图占有整个生活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主播的高强度劳动就不能被解释为单纯的个人勤奋。她确实可能非常拼命，但这种拼命并不是纯粹个人性格造成的，而是资本命令内化后的结果。她不是自由地选择把身体推到极限，而是在平台规则、收入压力、竞争压力和商品周转压力下，被迫把“多播一点”“再坚持一下”“今天不能停”当成自己的决定。资本的强制越是被包装成个人选择，劳动者越难意识到自己是在被强制。

这正是“自我剥削”这个说法容易误导的地方。表面上看，主播是在自己压迫自己；但更深层次看，是资本主义关系让劳动者不得不自己压迫自己。所谓自我剥削，不是没有资本剥削，而是资本剥削通过竞争和市场压力转化为劳动者的自我驱动。她逼自己熬夜，是因为平台和市场惩罚停下的人；她逼自己保持笑脸，是因为商品销售要求情绪劳动；她逼自己不断上新，是因为同行竞争已经把速度提高到新的标准。

所以，我们不能用道德语言说“她不懂爱惜身体”。这太浅薄，也太冷血。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劳动者必须把身体放在资本增殖之后？为什么休息会被看成损失？为什么平台经济让劳动者一旦停下就害怕被流量抛弃？为什么一个人明明已经疲惫，却仍然认为自己必须继续直播？这些问题背后，是资本命令的隐身化和内化。

在传统资本主义工厂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比较直接。老板要延长工时，工人可以反对；老板要压低工资，工人可以罢工；老板要提高劳动强度，工人可以组织起来斗争。而在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常常面对的是一个看似没有主体的压迫结构。她不是被某一个老板骂，而是被数据淘汰；不是被某一个主管扣工资，而是被流量减少；不是被某一个厂规处罚，而是被市场竞争挤出。资本的面孔消失了，但资本的力量扩大了。

这也说明，平台资本主义并没有让阶级矛盾消失，而是让阶级矛盾更加难以被直接识别。资本隐藏在技术、市场和竞争背后，让劳动者误以为自己面对的是命运、运气、能力不足、流量不好、观众不买账。这样一来，劳动者很容易把制度压迫理解成个人失败，把资本强制理解成自我要求，把结构性风险理解成创业代价。

马列毛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被遮蔽的资本关系重新揭示出来。我们必须指出：平台不是中立媒介，算法不是中立工具，流量不是自然资源，竞争不是超历史规律。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平台经济中的表现形式。平台掌握规则，算法分配机会，流量决定收入，竞争提高强度，最终共同构成资本对零工劳动者的指挥体系。

这名主播倒在直播间里，正是这个指挥体系的残酷显影。她不是在一个完全私人化的劳动空间中孤立倒下，而是在资本命令已经深入身体、情绪和生活节奏的劳动过程中倒下。她的头痛、疲惫、身体不适，不能简单被看成个人身体偶然事件，而应被放到长期高强度直播劳动、情绪劳动、作息紊乱和竞争压力中理解。即使我们不能医学上武断断言劳动直接造成死亡，也必须政治经济学上看到：这种劳动制度正在不断把普通人的身体推向极限。

资本家的命令没有消失，只是变得更难被指认。过去，资本命令从老板口中说出；今天，它从后台数据中弹出。过去，资本命令写在厂规里；今天，它写在算法逻辑里。过去，资本命令通过监工执行；今天，它通过流量和竞争执行。过去，工人被迫服从老板；今天，零工劳动者被迫服从一个看似无人的资本系统。

因此，文章必须揭露这种形式变化背后的阶级本质。平台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是弱化了资本指挥，而是把资本指挥扩展到了更广阔、更隐蔽、更深入的层面。它不只要劳动者完成任务，还要求劳动者自己设计任务；不只要劳动者工作，还要求劳动者把整个自我变成工作的一部分；不只要劳动者服从命令，还要求劳动者把资本命令误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在这种意义上，算法和流量就是新的监工，竞争就是新的鞭子，账号权重就是新的工牌，直播间就是新的车间。平台资本把劳动者拆散成孤立个体，再用数据和市场把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它让每个主播都看似独立，却让每个主播都在同一套资本规则下劳动；它让每个劳动者都以为自己在为自己拼命，却让他们共同推动平台资本的扩张。

这一部分的结论应当非常明确：零工经济不是没有资本命令，而是资本命令隐身化；不是劳动者获得自由，而是劳动者把资本命令内化为自我驱使；不是老板消失，而是老板变成平台、算法、流量和竞争。只有看清这一点，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直播劳动走向深刻的异化：劳动者越努力，平台越强大；劳动者越服从数据，数据越反过来统治劳动者；劳动者越把生命投入直播间，直播间越作为异己力量吞噬她的生活。

四、竞争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外化：劳动者互相压迫，资本隐藏其后

在直播带货和整个零工经济中，最常被拿来解释劳动者高强度劳动的词，就是“竞争”。有人会说：直播行业本来竞争激烈，主播自己要拼，要卷，要抢流量，要争订单；如果她不拼，自然会被别人取代。这种说法看似现实，实际上却把资本主义竞争当成了自然规律，好像劳动者之间天生就应该互相追赶、互相压价、互相消耗身体。可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竞争不是自然界的风雨雷电，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在市场表面上的外化。

所谓竞争，表面上是一个劳动者对另一个劳动者的竞争，一个主播对另一个主播的竞争，一个账号对另一个账号的竞争；但在本质上，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劳动者的强制。资本不总是直接命令每一个主播延长直播时间、压低价格、保持兴奋、牺牲休息；资本让竞争来替它完成这些命令。于是，资本的要求就不再表现为某个老板的专断，而表现为“市场就是这样”“同行都这样”“不播就没流量”“不卷就活不下去”。

这正是竞争的迷惑性。它把资本关系隐藏起来，把劳动者推到彼此对立的位置上。主播看到的是别人在播更久、别人价格更低、别人话术更狠、别人上新更快、别人更会制造情绪、别人更能熬夜；她感受到的直接压力来自同行，而不是来自抽象的资本。于是，她被迫延长直播时间，被迫压低利润，被迫加快节奏，被迫牺牲睡眠，被迫把身体推向极限。看上去，是主播之间在互相竞争；实际上，是资本通过竞争来支配主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说明，竞争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强制规律加到各个资本和行动者身上。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规律并不总是直接用“规律”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竞争让每一个人不得不服从它。一个资本家不愿提高劳动强度，另一个资本家提高了，他就会被市场淘汰；一个主播不愿延长直播时间，另一个主播延长了，她就会失去流量；一个卖家不愿降价，另一个卖家降价了，他就会失去订单。于是，每个人都被迫执行资本的规律，哪怕没有人主观上想成为资本的工具。

这就说明，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把社会关系伪装成个人能力，把制度强制伪装成自由选择，把资本压力伪装成同行压力，把阶级矛盾伪装成个体之间的成败较量。一个主播失败了，舆论不会说平台资本的规则制造了压力，而会说她“不够努力”“不懂运营”“不会抓流量”；一个主播累倒了，舆论不会首先追问劳动制度，而会说“她太拼了”“没有照顾好身体”。资本就这样躲在竞争背后，把一切后果推给劳动者个人。

在直播行业中，这种竞争尤其残酷。主播之间竞争的不只是价格和商品，更是时间、身体、情绪和人格。谁能播更长时间，谁就更可能留住流量；谁能更亢奋，谁就更可能留住观众；谁能把价格压得更低，谁就更可能成交；谁能更快上新，谁就更可能抓住消费冲动；谁能更亲密地称呼观众，谁就更可能维系粉丝关系。于是，竞争不再只是商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劳动者身体和精神承受能力之间的竞争。

这就使直播劳动带有一种极端异化的性质。主播不是单纯在卖商品，她还要把自己变成商品流通的工具；她不是单纯在劳动，她还要在竞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情绪、语气、形象、作息和身体状态。竞争逼迫她不断追问：我是不是播得不够久？我是不是不够热情？我是不是价格不够低？我是不是回复不够快？我是不是粉丝维护不够勤？资本的鞭子不再抽在背上，而是抽进了人的心里。

这就是零工经济比传统工厂更隐蔽的地方。在传统工厂中，劳动者和资本的对立更容易被看见：老板要压工资，工人反对；老板要延长工时，工人反对；老板要加快流水线，工人反对。但在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常常把压迫理解为竞争，把竞争理解为自我提升，把自我提升理解为个人奋斗。于是，剥削关系被心理化了，阶级压迫被个体化了，资本命令被内化了。

平台资本非常依赖这种竞争。因为只要劳动者彼此竞争，平台就可以坐收其利。主播们为了争夺流量不断延长直播时间，平台获得更长用户停留；主播们为了争夺订单压低价格，平台获得更高交易规模；主播们为了维护账号不断生产内容，平台获得更多数据和内容供给；主播们为了不被淘汰不断提高劳动强度，平台却可以把这一切说成“市场活力”和“创作者生态”。劳动者互相追赶，资本则在上方掌握规则、分配流量、收集数据、占有成果。

所以，竞争不是削弱平台资本，而是强化平台资本。主播越多，竞争越激烈；竞争越激烈，主播越依赖平台流量；主播越依赖平台流量，平台越有权力决定谁能被看见、谁被埋没、谁获得曝光、谁被淘汰。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越强，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越强。平台不需要直接压迫每一个主播，只需要设置规则，让主播们自己把彼此推向更高强度的劳动。

这就是资本指挥的无主化。没有一个老板站出来说：“你们互相压价吧，你们互相熬夜吧，你们互相卷死吧。”但竞争结构已经把所有人推向这个方向。每个劳动者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应对市场，实际上是在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制。

每个主播都觉得自己只是为了不掉队，实际上是在共同抬高行业的劳动强度。每个人都为了生存多坚持一点，结果整个行业的生存标准就被提高一点；每个人都为了自保多牺牲一点，结果所有人的休息空间都被压缩一点。

这就是所谓“内卷”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舆论喜欢把“内卷”讲成一种文化现象，好像只是人们太焦虑、太好胜、太不懂生活。可是从马克思主义来看，内卷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竞争在劳动者之间造成的互相压迫。劳动者不是天生喜欢互相折磨，而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迫把别的劳动者当成威胁，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筹码，把休息当成损失，把健康当成可以暂时透支的成本。

在直播带货中，这种内卷直接表现为劳动日的无限延长。一个主播如果每天播四小时，另一个播六小时，第三个播八小时，第四个播十小时，那么行业竞争会不断把“正常劳动时间”往上推。平台不需要明文规定必须直播十小时，竞争自然会逼迫劳动者这么做。只要长时间直播能够带来更多曝光和成交，短时间直播就会显得“不努力”；只要不休息的人还能继续撑着，想休息的人就会被视为“不够拼”。这就是竞争把资本命令转化为道德压力的过程。

更残酷的是，这种竞争不仅发生在劳动者之间，也发生在劳动者内部。主播会把自己分裂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疲惫的身体，一个是命令身体继续工作的“经营者”。身体说累了，账号说还不能停；身体说头痛，流量说再坚持一下；生活说需要休息，订单说今晚还有机会；人的需要和资本的需要同一个劳动者身上发生冲突。最后，劳动者被迫站在资本一边反对自己的身体。这就是资本主义异化最深刻的地方之一。

所以，当我们说“竞争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外化”时，意思正是：竞争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强制表现为劳动者之间、甚至劳动者自身内部的外在压力。资本不再需要时时刻刻亲自出场，因为竞争已经替它完成了统治。资本不再需要公开说“你要牺牲健康”，因为竞争会让劳动者自己得出这个结论。资本不再需要承认自己剥削劳动者，因为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会把剥削伪装成能力差异。

这名女装主播的悲剧，就发生在这样的结构中。她不是在一个自由市场里轻松地选择多播少播，而是在平台流量和同行竞争的压力下，被迫把高强度劳动当成生存条件。她不是单纯“太努力”，而是处在一个不努力就可能掉队、停下来就可能失去流量、休息就可能损失收入的系统中。她的身体承担的是个人劳动强度，背后却是整个行业竞争秩序和平台资本逻辑的压力。

这里必须批判成功学式的冷血解释。成功学会说：你要学会平衡生活和工作，要懂得管理时间，要照顾身体。这些话表面温和，实际上把制度问题转化成个人管理问题。仿佛劳动者只要更聪明一点、更自律一点、更会安排一点，就能在平台经济中获得自由。可是问题在于，当竞争本身已经惩罚休息、奖励透支、鼓励持续在线时，所谓“平衡”就不再只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阶级关系问题。

一个被资本竞争压迫的人，不是简单“不懂休息”，而是休息本身被资本主义关系变成了奢侈。一个主播不是不知道熬夜伤身，而是她知道不熬夜可能没有流量；不是不知道身体重要，而是她知道收入不稳定会威胁家庭生活；不是不知道应该停下，而是平台和市场告诉她，停下就可能被别人取代。把这种处境说成个人选择，就是替资本主义洗白。

自由派也会把问题说成“行业监管不足”或“平台责任不清”。这些问题当然存在，但如果只谈监管，不谈竞争的资本主义根源，就仍然没有触及本质。平台为什么鼓励高强度竞争？因为竞争能够提高平台活跃度、交易量和用户黏性。主播为什么被迫互相压价、互相延长时间？因为平台资本主义把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交给流量和订单。监管可以缓和某些极端后果，但只要资本主义竞争逻辑存在，劳动者仍然会被迫互相追赶。

修正主义叙事则更虚伪。它一方面把直播带货、灵活就业说成“新业态”“新机会”“就业新空间”，另一方面却不愿承认这种新业态把劳动者推入无保障竞争。它只歌颂某些主播暴富的神话，却不谈无数中小主播的熬夜、焦虑、低利润、退货、库存和健康损耗。它把竞争叫作活力，把过劳叫作奋斗，把去保障化叫作灵活，把资本关系叫作新经济。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撕开这一层幻象。竞争不是中立的，平台不是中立的，流量不是中立的，市场不是中立的。它们共同构成资本主义支配劳动者的机制。主播们不是彼此的根本敌人，她们共同面对的是平台资本、商业资本和资本主义竞争秩序。只有把这种认识讲清楚，劳动者才能从互相竞争的孤立状态中走出来，认识到他们有共同处境和共同敌人。

这也正是党和工会工作的切入点。平台资本把劳动者变成孤立账号，让他们在排名、流量、价格和成交中互相竞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揭示这种竞争背后的资本关系，把劳动者从彼此敌视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认识到真正压迫他们的不是另一个同样疲惫的主播，而是把所有主播都推向疲惫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会作为党的附属群众组织，也不能只做服务和慰问，而要在党的领导下帮助这些零工劳动者认识共同利益、共同压力和共同斗争方向。

因此，这一部分的结论应当非常明确：竞争不是劳动者的自然状态，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外化；主播之间的互相追赶，不是自由竞争的美好图景，而是资本通过市场形式实现对劳动者的集体压迫；平台资本躲在竞争背后，让劳动者互相压价、互相延长劳动时间、互相抬高生存门槛，最后把制度压迫伪装成个人奋斗。

只有看清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名主播倒下的意义。她不是败给了某一个具体同行，也不是败给了自己的“不会休息”，而是被整个零工经济竞争结构推到了身体极限。她的离世，是平台资本主义竞争机制的残酷显影：资本隐藏起来，劳动者互相追赶；资本坐收成果，劳动者承担损耗；资本把竞争说成自由，劳动者却在这种“自由”中失去身体、时间和生活。

五、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者越辛苦，属于自己的东西越少

在前面几部分中，我们已经看到：零工经济并不是分散小生产的复活，而是资本指挥下的社会化协作；平台资本的命令没有消失，而是变成了算法、流量和竞争；竞争也不是自然状态，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外化为劳动者之间的互相压迫。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指出：这一切最终表现为资本主义异化。也就是说，劳动者越劳动，越把自己的生命力量投入商品、账号、平台和市场，越会发现这些由自己劳动支撑起来的东西，反过来变成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作过非常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越变成廉价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不是一句抽象的哲学判断，而是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真实写照。劳动者把自己的体力、时间、智慧和生命活动投入劳动产品之中，但劳动产品并不属于劳动者，而是属于资本；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世界越强，劳动者自身就越被这个世界压迫。

直播带货中的异化，正是这一规律在平台时代的表现。主播越努力直播，平台越获得数据；主播越努力卖货，商品流通越快；主播越努力维护粉丝，账号体系越牢固；主播越努力牺牲休息，平台生态越繁荣。可是，这一切并不真正回到主播自己手中。平台的数据不属于她，流量规则不属于她，推荐机制不属于她，商品供应链不属于她，市场入口不属于她。她付出的劳动越多，越是在强化一个不属于自己、却反过来统治自己的体系。

这就是资本主义异化的核心：劳动者创造出的力量，作为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劳动者。主播辛辛苦苦经营账号，账号却反过来要求她不断更新、不断直播、不断维护；

她追逐流量，流量却反过来决定她能不能生存；她服务粉丝，粉丝黏性却反过来变成她不能停下的压力；她卖出商品，商品周转速度却反过来推动她更快上新、更长时间直播、更频繁地展示。她创造了一个劳动对象，但这个劳动对象不再受她支配，而是开始支配她。

所以，“一个工人越辛苦，他得到的越少”，并不能只从当天收入多少来理解。不是说主播每多播一小时，现金收入一定马上减少；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劳动者越辛苦，越可能失去对自身生活的支配。她可能今天多卖了一些货，多赚了一点钱，但她失去的是睡眠，是健康，是休息，是陪伴家人的时间，是不被流量追赶的生活，是身体作为人的身体而不是销售工具的状态。她得到的可能是短期收入，失去的却是更深层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完整性。

资本主义贫困也不能只理解为收入低。马克思所说的贫困化，不只是工资账面数字的问题，也是人的世界被物的世界压倒的问题。一个劳动者可以在某些日子赚到钱，但仍然是贫困的，因为她的生活被劳动吞没了，她的时间不属于自己，她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她的情绪不属于自己，她的劳动成果反过来作为平台规则和市场压力统治她。她越是为了生存而拼命劳动，越是发现自己被更深入地卷入这种劳动循环之中。

直播带货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异化劳动者的产品，也异化劳动者的身体。女装主播的身体不是单纯作为劳动的承载者存在，而是直接变成商品展示的工具。她要不断试穿、转身、讲解、展示版型、展示尺码、展示效果。她的身体被纳入商品流通过程，成为商品实现价值的媒介。身体本来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但在资本主义直播劳动中，它被改造成销售装置，被镜头、灯光、商品、观众目光和成交率重新塑造。

于是，身体不再首先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属于直播节奏。她累不累，不是最重要的；衣服展示得好不好，才是重要的。她身体是否不适，不是最重要的；直播能不能继续，才是重要的。她是否需要休息，不是最重要的；今天流量窗口能不能抓住，才是重要的。在这里，身体作为人的身体被压低了，身体作为资本增殖工具被抬高了。这就是身体的异化。

同时，直播劳动还异化劳动者的情绪。传统工厂主要榨取工人的体力和时间，而平台直播进一步榨取劳动者的情绪、语气、表情和人格。主播必须热情，必须耐心，必须亲切，必须兴奋，必须制造购买冲动。哪怕她疲惫、焦虑、头痛、生活中有压力，她也必须在镜头前维持一种可销售的情绪状态。她的笑容不再只是笑容，而成为转化率的一部分；她的亲切不再只是人与人的交流，而成为维护粉丝关系的手段；她的耐心不再只是个人品质，而成为平台劳动的要求。

这是一种更深入的异化。劳动者不仅出卖劳动力，还出卖情绪状态；不仅提供劳动时间，还提供可消费的人格表演。她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让消费者愿意停留、信任、下单的人。久而久之，人格本身被账号化，生活本身被内容化，情绪本身被商品化。她不是简单地“卖衣服”，她还要把自己变成帮助衣服销售的符号。

这种人格异化，在零工经济中非常普遍。主播要有“人设”，博主要有“定位”，骑手要有“服务评分”，司机要有“好评率”。资本不再满足于购买劳动者的某一段劳动时间，而是要求劳动者把自己的性格、外貌、语言、情绪、社交方式都纳入商品流通和服务评价系统中。人越努力把自己变成市场需要的样子，越远离作为真实人的自己。她越努力经营账号，她自己的生活越被账号淹没。

时间的异化也极其严重。直播带货看似只有开播时才是劳动，但实际并非如此。开播前要选品、对货、准备衣服、搭配、布景、拍短视频；开播中要试穿、讲解、互动、催单、控场；开播后要打包、售后、复盘、看数据、维护粉丝、研究同行。劳动时间已经不再有明确边界。劳动日从直播间蔓延到整个生活日。吃饭时想货，睡前看数据，醒来想流量，生病也担心停播影响账号。

资本主义在这里完成了一种更彻底的侵入：它不仅占有工作时间，而且侵入休息时间；不仅占有身体在场的时间，而且占有心理持续紧张的时间；不仅要求劳动者工作，而且要求劳动者随时准备工作、随时关注数据、随时回应市场。所谓“灵活就业”的灵活，实际上是劳动边界的消失。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什么时候工作，但代价是她几乎永远无法真正停止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常常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疲惫。她们不一定每天都在传统意义上“上班”，但她们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不一定有主管盯着，但数据和收入压力始终盯着；不一定有人命令她们加班，但她们自己会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停。劳动者被迫成为自己的监工，成为自己的老板，成为自己的压迫者。而这种“自我压迫”的背后，正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劳动者越辛苦，平台越繁荣。平台获得更多内容、更多数据、更多成交、更多用户停留、更多商业价值。可是劳动者得到的是什么？她得到的是更强的依赖、更高的竞争标准、更不稳定的收入、更疲惫的身体、更少的生活时间。她每一次努力，都会提高自己和同行下一次必须达到的门槛。她今天多播两小时，明天就可能变成行业默认要求；她今天压低价格，明天就可能变成消费者预期；她今天牺牲休息维护粉丝，明天就可能成为账号生存的必要条件。

这正是资本主义异化与竞争结合后的恶果。劳动者不是简单地被资本剥夺一次，而是在每一次努力中都帮助资本建立更高的压迫标准。她越努力适应平台，平台越强；平台越强，她越必须适应。她越努力战胜竞争，竞争越被加剧；竞争越激烈，她越必须更努力。劳动者的努力，不是通向解放，而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不断加固自己的枷锁。

这并不是否定劳动者的勤劳，而是揭露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劳动者的勤劳。勤劳本身不是罪，奋斗本身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勤劳并不首先服务于劳动者自身的全面发展，而是服务于资本增殖。劳动者越勤劳，资本越积累；劳动者越能忍，资本越敢提高强度；劳动者越会自我牺牲，资本越能把这种牺牲制度化。资本主义最恶毒的地方，就是把劳动人民的坚韧变成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

所以，这名主播的离世不应被理解为“太努力的个人悲剧”，而应被理解为异化劳动的极端显影。她的身体在直播过程中突然崩溃，仿佛是身体用最残酷的方式拒绝继续充当资本增殖的工具。劳动者的身体不是无限的，情绪不是无限的，生命时间不是无限的。可是平台资本和竞争机制却把劳动者当作可以不断压榨的流量节点、销售机器和内容生产者。身体最终崩溃，正是这种制度性压榨的残酷提醒。

当然，我们不能在医学上武断地说，某一种劳动强度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具体病因需要医学判断。但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指出：长期高强度劳动、作息紊乱、情绪紧张、收入压力和竞争压力，构成了零工劳动者普遍面临的生存环境。这种环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产物。即使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以如此悲惨的方式倒下，许多人也在以慢性的方式被消耗、被掏空、被迫用身体偿还资本的要求。

在这里，资产阶级舆论会继续把问题个人化。它会说：“要注意身体。”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它远远不够。问题不是劳动者不知道身体重要，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迫使劳动者把身体放在收入之后、流量之后、订单之后、竞争之后。它会说：“创业要有节奏。”但问题不是节奏掌握不好，而是平台资本和市场竞争本身就在破坏正常节奏。它会说：“不要过度劳累。”但问题是，如果不劳累，许多劳动者就可能没有收入、没有流量、没有生存机会。

修正主义叙事则会把这种劳动包装成“新业态就业”“灵活就业”“数字经济活力”。它只看见平台交易额，看不见劳动者的身体损耗；只看见就业人数，看不见就业保障缺失；

只看见创业故事，看不见失败者和倒下者；只看见商品世界的繁荣，看不见人的世界的贬值。这正是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它用发展和就业的语言掩盖资本主义异化，用新经济的光环遮蔽旧剥削的升级。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反过来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以劳动者身体的透支为代价，不能把劳动者推向无保障的市场竞争，然后把这种竞争称为自由；不能让劳动者在平台资本面前孤立无援，然后把这种孤立称为创业；不能把人的生命活动变成商品流通的燃料，然后把商品世界的繁荣称为社会进步。判断一种制度是否进步，不能只看商品卖得多快、平台增长多快、交易额多高，而要看劳动者是否真正掌握自己的劳动和生活。

异化劳动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劳动不再是人的自由生命活动，而变成谋生的强制、资本的手段和异己力量的来源。一个人本应通过劳动发展自己的能力、丰富自己的生活、参与社会共同创造；但在资本主义下，她越劳动，越被自己的劳动结果压迫。她劳动创造平台繁荣，平台繁荣反过来要求她继续劳动；她劳动创造账号价值，账号价值反过来绑架她；她劳动创造商品销量，商品销量反过来加快她的节奏。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让主播更健康地带货”，虽然这可以作为局部要求；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打破这种异化关系，使劳动者重新掌握自己的劳动、时间、身体和社会关系。这可不是个人养生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平台自律能够解决的，更不是官方慰问能够解决的。它需要组织，需要阶级意识，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需要把分散的零工劳动者从竞争和孤立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认识到共同处境和共同敌人。

工会在这里可以发挥作用，但必须明确：工会不能停留在服务型、登记型、福利型组织，不能只做提醒休息、送温暖、搞宣传。工会如果不接受党的领导，就容易把异化劳动的问题降格为劳动保护问题，把资本主义关系问题降格为行业规范问题。真正的工会必须作为党的附属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把劳动者的健康、工时、收入、社保、休息权等具体诉求同反对平台资本统治、反对零工经济去保障化、反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联系起来。

这一部分的结论必须鲜明：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就是劳动者创造的力量反过来统治劳动者。直播带货中的劳动者越辛苦，平台越繁荣；商品世界越膨胀，劳动者自己的身体、时间和生活越被掏空。她看似通过劳动经营自己，实际上在不断强化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资本体系。

所以，这名主播倒在直播间，不只是个人身体的崩溃，也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一个残酷象征。她倒下时，商品仍然在，平台仍然在，流量机制仍然在，竞争仍然在。资本主义会试图迅速遗忘她，把她变成一条新闻、一声叹息、一句“注意身体”。

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这件事留下来，把它解释为阶级教育材料，告诉所有零工劳动者：你们的痛苦不是个人失败，你们的疲惫不是自然命运，你们的互相竞争不是永恒规律。真正的问题，是你们共同创造的劳动世界被资本夺走，并作为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你们。

六、从《资本论》的协作到异化：社会劳动的力量表现为资本的力量

前面我们已经从异化劳动的角度说明：劳动者越把生命投入直播间、商品、账号和流量，越会发现这些由自己劳动支撑起来的东西反过来支配自己。现在还必须进一步把这种异化同《资本论》中关于协作的分析联系起来。因为零工经济中的异化，并不是单个劳动者心理上的痛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被资本占有之后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协作”部分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孤立劳动的简单相加，而是许多劳动者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进行协作。协作本身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即单个劳动者分散劳动时无法产生的集体力。许多人共同劳动，互相补充，互相衔接，形成一个总体劳动过程，这种总体劳动所产生的力量，远远超过每个个人劳动能力的机械相加。

在一般意义上，协作本身并不是坏事。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离不开共同劳动。一个人不可能独自完成复杂的社会生产；人通过协作扩大自己的能力，通过共同劳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发展社会关系。问题不在于协作本身，而在于：这种协作由谁组织、为谁服务、成果归谁占有、力量由谁支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协作不是由劳动者自由联合起来为自身共同利益服务，而是由资本组织起来为资本增殖服务。许多工人的共同劳动创造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这种生产力不表现为劳动者自己的力量，而表现为资本的力量。工人越是共同劳动，资本越强大；工人越是协作，资本越能指挥他们；工人越是创造出社会化生产力，这种生产力越作为资本的属性反过来统治他们。

这正是《资本论》中从协作走向异化的关键逻辑。资本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剥削一个个孤立工人，而是把工人组织成总体劳动者，然后把总体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据为己有。于是，工人自己的集体力量，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变成了资本家的力量；工人的联合，在资本那里变成了统治工人的工具；工人创造出的生产体系，反过来作为异己力量支配工人。



传统工厂中，这一点表现得比较直观。许多工人在同一车间里共同操作机器、配合流水线、完成生产过程。单个工人离开整体生产线，力量是有限的；但一旦进入资本组织的协作体系，他们就创造出巨大的生产能力。可是，这种生产能力并不属于工人集体，而属于资本。工厂越大，机器越先进，分工越细，协作越紧密，资本家的力量越强，工人对资本的依赖也越深。

平台经济和直播带货只是把这种逻辑换了一种形式。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统一厂房，但同样存在社会化协作。一个女装主播看似一个人在镜头前展示衣服，实际上她背后有服装生产工人、档口批发商、摄影剪辑人员、平台技术人员、仓储物流工人、客服人员、支付系统、推荐算法、数据分析、消费者评价体系。她的劳动只有同这些环节结合起来，才可能完成商品的销售和价值实现。

这就说明，直播带货不是孤立小买卖，而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主播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她站在镜头前，但她的劳动与服装厂工人的劳动、物流工人的劳动、平台技术劳动者的劳动、客服人员的劳动、仓储人员的劳动、内容运营人员的劳动连接在一起。无数分散劳动者共同维持着直播电商这台机器的运转。

但是，这种社会化协作的成果归谁所有？不是归这些劳动者共同所有，而是表现为平台资本、商业资本和品牌资本的力量。主播和其他劳动者共同创造了交易额、用户停留时间、平台数据、流量生态、供应链速度和消费习惯，但这些成果并不归他们掌握。平台掌握流量入口，商家掌握商品和价格，资本掌握数据和规则，劳动者则被分割成一个个账号、岗位、订单和任务。

因此，平台经济中的协作越发达，劳动者反而越被平台控制。平台掌握的数据越多，劳动者越透明；平台规则越复杂，劳动者越难摆脱；商品周转越快，劳动节奏越紧；直播生态越繁荣，主播越不敢停下；平台体量越大，单个劳动者越微小。劳动者共同创造的社会力量，不仅没有成为劳动者自己的力量，反而成为资本压迫劳动者的力量。

这就是资本主义异化在社会化协作层面的表现。单个主播的辛苦劳动，强化了账号；无数主播的辛苦劳动，强化了平台；整个零工劳动群体的辛苦劳动，强化了平台资本主义的统治。劳动者越协作，资本越强；劳动者越共同创造，资本越集中占有；劳动者越使平台繁荣，平台越反过来规定他们的劳动条件。

在这里，“劳动者越辛苦，得到越少”有了更深一层含义。一个主播越辛苦，她不只是消耗自己的身体，也是在为平台提供更多数据、内容和交易机会；许多主播越辛苦，

平台越能够扩大规模、优化算法、增强控制能力；平台越强，主播越依赖它。于是，劳动者的辛苦并没有积累成他们自己的共同力量，而是积累成资本对他们的更强支配。

这正如传统工厂中的工人共同创造了大工业的生产力，但这种生产力却以机器体系、厂房、资本规模和管理权力的形式站在工人对面。在直播经济中，劳动者共同创造了平台生态，但这个生态以算法、流量池、账号权重、数据评价和竞争排名的形式站在主播对面。工人的集体力量被资本夺走以后，就变成了统治工人的系统力量。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零工经济的分散形式并没有否定社会化劳动，反而使社会化劳动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加隐蔽。传统工厂中，工人至少能看见自己处于一个共同劳动过程里；但平台经济中，劳动者被分散成一个个账号、一个个骑手、一个个司机、一个个主播、一个个接单者。他们共同维持同一个平台体系，却常常误以为自己是孤立个体。他们实际上处在同一个资本主义协作结构中，却被平台表现为互相竞争的个人。

这种分散化，正是资本统治的有利形式。因为劳动者越难意识到自己共同劳动，就越难意识到自己有共同利益；劳动者越被表现为独立账号，就越容易互相竞争；劳动者越被迫自负盈亏，就越容易把失败归咎于自己；劳动者越看不见协作，就越看不见资本对协作成果的占有。

所以，我们不能被零工经济的外观迷惑。所谓“一个人一个账号”，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一个独立生产世界。每一个账号都嵌入平台，每一个直播间都嵌入商品流通体系，每一个主播都嵌入社会化劳动链条。资本主义的协作不是消失了，而是被打散在无数数字化节点中；资本主义的指挥不是消失了，而是通过平台规则重新集中；劳动者的共同力量不是消失了，而是被资本转化成平台权力。

这种协作与异化的统一，正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本质。劳动者只有共同劳动，平台才能存在；但平台一旦存在，就作为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劳动者。平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技术中介，而是无数劳动者共同劳动的凝结物。可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下，这种凝结物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资本。于是，劳动者面对平台时，仿佛面对一个外在的、不可抗拒的、独立于他们的力量。

这和马克思分析商品、货币、资本时揭示的逻辑是一致的。人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下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的共同劳动表现为资本自身的力量。平台经济中，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算法、流量、评分、订单、数据和账号系统中介化了。主播和消费者之间，主播和同行之间，主播和供应链之间，主播和平台之间，本来都是社会关系，但在资本主义下却被表现为数据关系、排名关系、流量关系、价格关系。

于是，劳动者很难直接看见资本主义关系本身。她看到的是流量下降，不是资本统治；看到的是同行竞争，不是生产关系；看到的是账号权重，不是劳动异化；看到的是销量波动，不是社会化劳动被资本占有。资本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社会关系隐藏在物的形式和数字形式后面，使劳动者把压迫误认为自然，把资本命令误认为数据，把自身被统治误认为个人运气不好。

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上必须揭示这种隐藏关系。党要告诉零工劳动者：你们不是孤立账号，你们共同构成平台资本的劳动基础；你们不是彼此天然敌人，你们共同受资本支配；你们不是靠个人能力在自由市场中竞争，而是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外化出来的竞争场中被迫互相追赶；你们创造的平台力量不属于你们，所以才反过来压迫你们。

如果没有这种揭示，劳动者就会继续把自己的痛苦理解为个人失败。主播会以为自己不够努力，不够会运营，不够懂流量，不够能熬夜；骑手会以为自己跑得不够快，接单不够多，路线不够熟；司机以为自己服务不够好，在线时间不够长；所有人都会被资本引导去自责，而不是去认识共同处境。资本最希望劳动者这样理解世界，因为只要劳动者互相竞争和自我责备，他们就不会组织起来反抗资本。

因此，从《资本论》的协作理论看平台零工经济，我们能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零工劳动者的分散，并不否定他们构成一个社会化劳动整体；相反，正因为他们构成一个社会化劳动整体，平台资本才能存在。平台资本不是每个劳动者之外的神秘力量，而是他们共同劳动成果在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异化形式。劳动者越共同创造平台，平台越作为资本站在他们对面。

这也说明，反抗平台资本不能停留在单个劳动者自我保护层面。个人少播一点、多休息一点、换一个平台、改进运营方法，当然可能在局部上缓解压力，但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化劳动成果被资本占有的结构。只要平台掌握流量、规则、数据和市场入口，单个劳动者就仍然处在被支配地位。只要劳动者被分散为竞争个体，他们共同创造的力量就会继续表现为资本力量。

真正的出路，是把这种被资本占有的社会化劳动重新组织为劳动者自己的阶级力量。资本通过平台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但这种组织是为了资本增殖；党则必须通过阶级路线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资本组织协作，是为了让劳动者共同创造资本的力量；党组织群众，是为了让劳动者重新夺回这种社会力量。

这里工会的作用仍然重要，但必须再次明确其地位。工会可以联系零工劳动者，可以反映他们的收入、休息、社保、健康和劳动安全诉求，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孤立状态。但如果工会不受党的领导，它就容易只停留在改善平台规则、争取行业规范、提供服务福利的层面，而不能揭示社会化劳动被资本占有这一根本问题。真正的工会必须作为党的附属群众组织，把劳动者的直接诉求同阶级意识结合起来。

例如，对主播来说，直接诉求可以是合理直播时长、平台透明规则、社保保障、职业健康保护、收入稳定机制；但党必须进一步指出：这些诉求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平台资本占有了社会化协作的成果，同时把风险和损耗推给劳动者个人。对骑手、司机、快递员也是一样。不能只谈“保障权益”，还要谈为什么权益总是被平台压缩；不能只谈“平台责任”，还要谈平台资本为什么能够支配社会劳动。

从这个角度看，直播间里的死亡就不只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平台协作体系的裂缝。她的倒下揭示了一个事实：平台资本看似轻盈、数字化、灵活，实际上建立在无数劳动者身体和时间的消耗之上。它看似只是一个技术中介，实际上是社会化劳动被资本占有后的统治形式。它看似提供机会，实际上把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力量变成压迫劳动者的力量。

这一部分的结论应当这样收束：协作本来是人类共同劳动的力量，但在资本主义下，协作的力量被资本占有，表现为资本的力量；零工经济本来依赖无数劳动者的社会化劳动，但在平台资本主义下，这种社会化劳动的成果表现为平台权力、算法规则和竞争压力。劳动者共同创造了平台，却被平台支配；共同创造了流量，却被流量追赶；共同创造了商品流通的繁荣，却被这种繁荣反过来吞噬身体和生活。

所以，从《资本论》的协作到资本主义异化，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规律：劳动者的社会力量在资本主义下被剥夺，并作为异己力量站在劳动者对面。平台经济不是对这一规律的超越，而是这一规律的数字化、分散化和隐蔽化。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揭示这种关系，并把分散劳动者重新组织成自觉阶级力量，劳动者创造的社会力量才可能不再表现为资本的力量，而重新成为劳动者自己的力量。

七、直播劳动的异化：身体、情绪、人格和生活时间都成为资本材料

如果说前一部分说明了社会化协作如何在资本主义下表现为资本的力量，那么这一部分就要进一步说明：这种资本力量并不是抽象地压在劳动者头上，而是具体地进入劳动者的身体、情绪、人格和生活时间之中。直播带货的残酷之处，正是在于它不仅要求劳动者“工作”，还要求劳动者把自己整个人变成资本增殖的材料。

传统工厂中的工人，主要是在一定时间内出卖劳动力。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使工人在机器、流水线和生产纪律下创造剩余价值。工人的身体当然会被消耗，工人的时间当然会被占有，但工厂劳动至少还保留着比较明显的边界：上班是在工厂，下班离开车间；劳动是在机器旁，生活在工厂之外。当然，资本主义从来都在试图延长劳动日、压缩休息时间，但劳动和生活之间仍然有一条可见的边界。

可是到了直播带货和零工经济中，这条边界被进一步打碎。主播的劳动不只发生在开播的几个小时。开播前的选品、试穿、搭配、拍摄、布景、预热视频，是劳动；开播时的讲解、互动、催单、展示、控场，是劳动；下播后的打包、售后、复盘、看数据、维护粉丝、研究同行，也是劳动。甚至她的日常穿搭、生活状态、情绪表达、亲和力和私人时间，都可能被转化为账号运营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直播劳动把人的整个存在都拉进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中。身体不只是劳动的承担者，身体本身成为展示商品的工具；情绪不只是人的自然状态，情绪本身成为转化率的一部分；人格不只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人格本身成为账号资产；生活时间不再是劳动之外的时间，而是被平台资本持续侵入、开发和利用的资源。

首先是身体的异化。女装主播的身体，在直播过程中并不只是“她自己的身体”。她要不断试穿衣服，展示版型，展示身材效果，展示面料垂感，展示尺码差异。她要站立、转身、换装、讲解、对着镜头保持状态。身体被改造成商品展示装置，成为帮助商品实现价值的媒介。她越能展示，商品越容易成交；她越能维持镜头前的身体状态，账号越有竞争力。

在这里，身体作为人的身体退居其次，身体作为资本增殖工具占据中心。她累不累，不如直播效果重要；她是否需要休息，不如流量窗口重要；她身体是否发出警告，不如订单转化重要。资本主义异化在这里表现得极其直接：身体本来属于劳动者自己，是生命存在的基础；但在直播劳动中，身体被资本借走、改造、展示、消耗，并被迫服从商品销售的需要。

这名主播在直播过程中突发不适，正使这种身体异化显得格外刺目。她在展示服装时身体发出危险信号，直播被迫中断。这个场景具有象征意义：人的身体终于以疾病和崩溃的形式，打断了资本要求它继续作为销售工具运转的节奏。身体不是无限的，生命不是流量机器，人的承受力不是平台后台可以随意刷新的一项数据。可是资本主义直播劳动恰恰把身体当成可以持续投入、持续消耗、持续展示的材料。

其次是情绪的异化。直播带货要求主播不断输出情绪。她不能只是平静地介绍商品，而要热情、亲切、兴奋、耐心、可信、会调动气氛。她要喊“姐妹们”“宝宝们”，要制造紧迫感，要承接观众情绪，要处理质疑，要回应评论，要维持直播间活跃。她的笑容、语速、语气、表情、耐心，都成为劳动过程的一部分。

在这里，情绪不再只是人的自然表达，而成为销售技术。笑容不只是笑容，而是停留时长；热情不只是热情，而是转化率；耐心不只是耐心，而是客户维护；亲切不只是亲切，而是粉丝黏性。劳动者必须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加工成可消费、可交易、可计算的东西。她即使疲惫，也要表现得有活力；即使焦虑，也要表现得稳定；即使身体不舒服，也要尽可能维持直播间情绪。

这种情绪劳动比单纯体力消耗更加隐蔽。一个人搬货累了，别人还能看见；一个人情绪被持续榨取，往往被说成“服务态度”“职业能力”“会不会做直播”。资本不只要求劳动者用手劳动，还要求劳动者用脸劳动、用声音劳动、用情绪劳动。人的内心状态被纳入商品流通过程，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第三是人格的异化。直播带货不是简单销售商品，很多时候还要销售“人设”。主播要让观众觉得她可信、亲近、懂穿搭、有眼光、会替粉丝考虑。她要形成一个稳定的人格形象，使观众愿意反复进入直播间。于是，人的人格被账号化。她不只是一个现实中的人，也被迫成为一个可以被消费、被关注、被评价、被期待的账号形象。

这会造成更深层的异化。劳动者不是在劳动中自由发展自己的个性，而是按照市场、粉丝和平台需要塑造自己。她要问的不是“我真实地想怎样生活”，而是“观众喜欢我怎样表现”；不是“我今天身体和情绪如何”，而是“今天直播间需要怎样的状态”；不是“我作为一个人需要什么”，而是“账号需要什么”。人的个性不再属于人，而属于账号运营逻辑。

在平台经济中，人格越来越被资本化。一个人越能把自己包装成可识别、可消费、可持续输出的人设，就越有市场价值。可是这种“价值”并不是人的自由发展，而是人格被商品关系改造后的价值。人为了生存被迫成为品牌，为了流量被迫成为内容，为了订单被迫成为角色。她越努力经营这个角色，越可能被这个角色反过来束缚。

第四是生活时间的异化。直播带货的劳动边界极其模糊。很多主播并不是播完就结束。下播之后还有售后、打包、对账、复盘、短视频、粉丝群、选品和数据分析。即使没有实际操作，也会持续想着账号、流量、货品和竞争。劳动不再只是某个时段，而成为一种全天候压力。休息时间表面上存在，实际上不断被工作侵入。

这就是资本对生活时间的占有。资本主义最初通过延长劳动日来增加剩余劳动；到了平台零工经济中，它进一步通过模糊劳动边界来吞噬整个生活日。劳动者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工作，但她却很难真正决定什么时候不工作。因为一旦不工作，就意味着可能错过流量、错过订单、错过粉丝、错过平台推荐。所谓自由安排时间，最后变成随时都可能被劳动召唤。

这种生活时间的异化，会使劳动者长期处在紧绷状态。她看似没有固定老板催促，实际上时时刻刻被账号牵引；看似没有固定上下班，实际上劳动无处不在；看似可以在家工作，实际上家也被改造成工作场所；看似生活和工作融合，实际上是工作吞并生活。资本不再满足于占有工人在车间里的时间，而是试图占有劳动者的整个生命节奏。

在直播带货中，身体、情绪、人格和时间的异化互相交织。身体要为商品展示服务，情绪要为销售转化服务，人格要为账号黏性服务，生活时间要为平台活跃服务。人的各个方面都被拆开、加工、利用，最后统一服从商品流通和资本增殖。劳动者不再只是“做一份工作”，而是在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活动交给资本支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类劳动常常让人感到极度疲惫。因为它不是单一维度的劳动，而是复合剥削。体力被消耗，情绪被消耗，注意力被消耗，睡眠被压缩，生活被打断，人格被表演化。劳动者无法简单通过“下班”恢复自己，因为下班之后账号还在、订单还在、数据还在、粉丝还在、竞争还在。她想休息，但资本关系不让她真正休息。

资本主义异化在这里达到一种非常现代的形式：劳动者不只是失去劳动产品，也失去自身。她失去对身体的支配，失去对情绪的支配，失去对人格表现的支配，失去对生活时间的支配。她越把自己投入劳动，越发现自己被劳动吞没。她越努力通过直播谋生，越发现自己的生命被直播节奏改造。劳动本来应当是人的生命活动，却在资本主义下变成反对人的力量。

这正是马克思所说异化劳动的现实表现。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发挥体力和智力，而是消耗自己；不是感到自主，而是感到被迫；不是把劳动当成人的生命表现，而是把劳动当作生存的强制。直播劳动表面上充满热闹、互动、笑声和消费气氛，但这种热闹背后，是劳动者身体和精神的持续被占有。

资产阶级叙事会把这种状态美化为“热爱事业”“努力奋斗”“新职业女性”“靠自己打拼”。这种叙事极其虚伪。它把被迫的劳动浪漫化，把异化的自我消耗说成自我实现，把资本对身体和生活的占有包装成个人成长。一个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把身体、情绪和时间投入高强度直播，却被说成“追梦”；一个人被流量和竞争逼迫着不能停下，却被说成“有事业心”。这不是赞美劳动者，而是替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涂脂抹粉。

修正主义叙事也会用“新就业形态”“数字经济”“灵活就业”来掩盖这种异化。它只看到平台创造了就业岗位，却不问这些岗位如何消耗人的身体；只看到直播带动消费，却不问消费背后是谁在透支情绪；只看到个体经营活跃，却不问这种活跃是否建立在去保障化和无休止竞争之上。它把人的世界的贬值隐藏在物的世界的繁荣之后。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反过来指出：一个社会的进步，不能用商品成交额、平台活跃度和流量规模来衡量，而要看劳动者是否真正成为自己劳动和生活的主人。如果一个所谓新经济要求劳动者用身体换流量、用情绪换订单、用人格换账号、用生活时间换平台繁荣，那么这种经济不是解放劳动者，而是以新形式奴役劳动者。

在这里，党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异化，并把劳动者从自责和孤立中解放出来。主播不应把自己的疲惫理解为个人不够坚强，不应把身体崩溃理解为个人管理失败，不应把无法停下理解为自己选择的代价。她们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情绪、人格和时间之所以被如此压榨，是因为它们已经被平台资本纳入商品流通和资本增殖过程。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劳动者才可能从“我要更努力适应平台”转向“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反抗这种平台资本统治”。

工会在这里也必须承担相应任务，但工会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一个服务型工会可能只会提醒主播注意休息、提供心理咨询、组织体检、发放慰问；这些措施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如果停留在这里，就等于把异化劳动的问题降低为健康管理问题。真正的工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把休息权、健康权、社保权、收入权和组织权联系起来，把个体身体问题上升为阶级劳动问题，把“注意身体”上升为“反对资本把身体变成流量工具”。

因此，这一部分的核心结论是：直播劳动的异化，不只是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而是劳动者自身也被资本占有。身体成为展示工具，情绪成为销售材料，人格成为账号资产，生活时间成为平台燃料。劳动者越努力把自己投入直播，越可能失去对自己的支配。

这名主播的离世之所以具有沉重意义，正在于她用生命中断了这种异化劳动的连续性。资本希望直播继续，商品继续，流量继续，订单继续；但人的身体以最残酷的方式宣告：劳动者不是无限可用的资本材料。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这个事实转化为阶级教育：直播间里的劳动者不是孤立的“创业者”，而是被平台资本支配的劳动群众；她们的身体、情绪和时间不应继续作为资本增殖的燃料，而应在组织和斗争中重新回到劳动者自己手中。

八、“她越辛苦，得到的越少”：零工劳动中的贫困化不是简单工资问题

在直播带货和零工经济中，“劳动者越辛苦，得到的越少”这个判断，必须从资本主义异化和贫困化的角度来理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命题，不是说主播每多播一小时，银行卡里的钱就一定减少；也不是说她每多卖一件衣服，眼前收入就一定下降。它真正揭示的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劳动者越把自己的生命力量投入资本增殖，越会失去对自己身体、时间、劳动成果和生活世界的支配。

资产阶级最喜欢把劳动者的收入问题缩小为“努力程度”和“个人能力”。它会说：你努力就能赚得多，你拼命就能翻身，你坚持直播就会有流量，你经营账号就会有回报。可是，马克思主义要追问的是：即使劳动者真的通过更长时间、更高强度的劳动获得了一些收入，她为此失去了什么？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睡眠、健康、休息、情绪稳定、家庭生活和人的尊严，那么这种“收入增加”本身就是以人的世界被掏空为代价的。

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己越贫穷；物的世界越增值，人的世界越贬值。这句话不能狭隘地理解成工资数字永远下降，而应理解为：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商品、平台、数据和市场力量越大，这些东西越不属于劳动者，越会作为外在力量统治劳动者。劳动者越劳动，越使资本世界膨胀；资本世界越膨胀，劳动者自己的生活世界越被压缩。

这正是直播带货中的现实。主播越辛苦，平台越繁荣；主播越努力，账号体系越牢固；主播越投入情绪，粉丝黏性越强；主播越延长直播时间，平台获得的用户停留和数据越多；主播越牺牲休息，整个行业的竞争强度越被抬高。

她眼前可能得到一点订单、佣金或销售额，但她同时失去的是健康，是自主时间，是身体完整性，是不被流量支配的生活。

所以，这里的“少”，首先是指劳动者对自身生活的掌握越来越少。她工作越努力，越没有真正的下班；账号越做起来，越不敢停播；粉丝越多，越要维护；订单越多，售后越多；数据越重要，焦虑越强。她越想通过劳动获得稳定生活，越被这种劳动形式拖进不稳定的循环。她不是因为懒惰而贫困，而是因为过度劳动仍然不能摆脱资本关系的支配。

其次，“得到的越少”还意味着她得到的越来越不是人的发展，而是资本所允许的生存条件。劳动本来应当是人的自由生命活动，是人改造世界、发展能力、丰富社会关系的方式。可在资本主义下，劳动变成谋生的强制。主播不是因为自由创造而直播，而是因为收入、流量、竞争和生活压力不得不直播。她越劳动，越不是在自由地发展自己，而是在适应平台、适应市场、适应观众、适应商品销售节奏。

这种劳动并没有使她成为更完整的人，反而把她分裂成多个被资本使用的部分：身体用来展示，声音用来销售，表情用来留人，情绪用来转化，人格用来运营，时间用来周转。她越努力劳动，越不是在恢复自己，而是在把自己拆开交给资本使用。她得到的也许是短期收入，失去的却是作为完整人的自己。

第三，“得到的越少”还表现为劳动者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多。零工经济最残酷的地方在于，资本把收益集中起来，却把风险分散给个人。平台掌握流量、规则、数据、推荐和市场入口；劳动者承担健康风险、库存风险、退货风险、收入波动风险、账号封禁风险、作息紊乱风险和家庭压力。主播越辛苦地工作，越深地卷入这套风险结构。

如果她不播，她没有收入；如果她播得太久，她损害健康。

如果她不维护账号，她失去流量；如果她过度维护账号，她失去生活。

如果她不压低价格，她失去订单；如果她压低价格，她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

如果她不参与竞争，她可能被淘汰；如果她参与竞争，她就成为加剧竞争的一部分。

这就是资本主义关系中的死循环。劳动者无论怎么选，都在资本规定的框架内行动。她似乎有选择，但每一种选择都带着损耗。资产阶级把这种状态称为“自由竞争”，实际上这是被迫在不同形式的损失之间选择。

第四，“得到的越少”还意味着劳动者的集体力量被资本夺走。无数主播、骑手、司机、客服、物流工人、服装工人共同创造了平台经济的繁荣。但这种共同劳动没有转化为劳动者共同掌握的社会力量，而是转化为平台资本的力量。平台越大，劳动者越依赖平台；平台越有数据，劳动者越被数据评价；平台越完善，劳动者越难脱离平台体系。

在这里，贫困化不是个体层面的单纯低收入，而是阶级力量的贫困化。劳动者越共同劳动，越没有共同控制权；劳动者越创造社会财富，越不能决定财富如何使用；劳动者越支撑平台，越被平台支配。这就是资本主义把劳动者的集体力量异化为资本力量的过程。

第五，“得到的越少”还表现为休息权的消失。直播带货和零工经济中，休息不再被视为人的正当需要，而被视为流量损失、收入损失、竞争劣势。一个劳动者休息，另一个劳动者继续播；一个账号停下，另一个账号补上；一个人退出竞争，无数人继续进入竞争。资本正是利用这种替代性，把每个人都逼到“不敢休息”的位置。

这比传统加班更隐蔽。传统加班至少可以被识别为加班，劳动者知道自己的劳动日被延长了。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常常把延长劳动日理解为“自己多努力一点”。她没有加班费，因为她似乎不是在给别人加班；她没有下班时间，因为她似乎是在经营自己的事业；她没有休息保障，因为她似乎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可是这种“自由”恰恰意味着资本可以不承担规定工时和保障休息的责任。

所以，零工经济中的贫困化，是一种去保障化的贫困化。劳动者可能有收入，但没有稳定；可能有订单，但没有保障；可能有账号，但没有权利；可能有客户，但没有休息；可能有短期机会，但没有长期安全。她越辛苦，越不是走向稳定和自由，而是越深地卷入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六，“得到的越少”还表现为人的需求被压低。资本主义会告诉劳动者：你要先赚钱，先熬过去，先把账号做起来，先抓住流量，先把订单完成。于是，睡眠可以推迟，吃饭可以将就，生病可以忍耐，情绪可以压下去，家庭可以先放一边，个人生活可以以后再说。人的需要被不断延期，资本的需要被不断优先。

这就是人的世界贬值。人的身体、休息、情感、家庭、精神和尊严，都被排在流量、商品、订单和收入之后。资本主义不是公开说“人不重要”，它只是通过市场和竞争让劳动者每天都不得不得把自己放在最后。久而久之，劳动者自己也会接受这种颠倒：只要今天数据好，累一点也值得；只要卖出去货，身体先忍一忍；只要账号有起色，生活可以以后再补回来。

可是，人的生命不能无限延期。身体不会等到资本允许你休息时才发出警告，疾病不会按照平台节奏安排时间，精神崩溃也不会等到账号稳定之后再发生。直播间里的突发疾病，正是这种长期颠倒的残酷提醒：资本可以把人的需要压到最后，但身体迟早会用自己的方式宣告极限。

第七，“得到的越少”还体现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越来越陌生。主播每天卖货、维护粉丝、创造内容、形成数据，但这些劳动成果并不真正属于她。平台可以改变规则，账号可以被限流，流量可以突然消失，客户关系依赖平台中介，数据掌握在平台手里。她投入了大量劳动，但这种劳动沉淀下来的东西，并不稳稳地掌握在她自己手中。

这正是异化劳动的典型表现。劳动者创造的对象不归劳动者，而作为独立力量站在劳动者对面。主播经营账号，账号反过来支配她；她创造流量，流量反过来评价她；她维护客户，客户关系却被平台系统中介；她创造内容，内容生态却成为平台资本的资产。她越劳动，越是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凝结成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数字化体系。

第八，“得到的越少”还意味着劳动者被迫降低对未来的想象。资本主义零工经济让人只盯着今天的订单、今天的数据、今天的流量、今天的收入。它把劳动者困在即时反馈中，使人很难思考长期生活、长期健康、长期组织和长期解放。人越被短期生存压力追赶，越难形成完整的阶级意识。

这也是资本希望看到的结果。一个每天被订单和流量追赶的人，很难有时间去思考制度；一个被竞争逼着不断自我改造的人，很容易把问题归结为个人能力；一个孤立的账号，很难意识到自己和其他账号具有共同命运。资本通过短期压力消耗劳动者的长期意识，通过个体竞争阻断阶级联合，通过即时收入诱导劳动者继续投入。

所以，贫困化不仅是物质贫困，也是政治贫困、组织贫困和时间贫困。劳动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没有足够的组织互相支持，没有足够的阶级语言解释痛苦。她越辛苦，越疲惫；越疲惫，越难组织；越难组织，越只能继续个体挣扎。这就是资本主义想要的状态。

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工人越辛苦，他得到的越少”，其实是在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辛苦并不会自然积累成自由，而常常积累成资本的力量；劳动者的努力并不会自然带来解放，而常常加固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劳动者创造的商品世界越繁荣，人的世界就可能越被压缩、掏空和贬值。

这名主播的悲剧，正可以这样理解。她长期从事服装直播，承担选品、展示、销售、打包、售后等多重劳动。她的辛苦不是没有产出：她一定卖出了商品，服务了消费者，支撑了平台流量，推动了商品流通。可是，这些产出并没有保护她的身体，没有保障她的休息，没有使她摆脱高强度劳动，最终也没有阻止她倒在直播过程中。这就是资本主义异化的冷酷现实：劳动者为商品世界付出一切，商品世界却不能守护劳动者作为人的生命。

资产阶级会把这种矛盾解释为“创业风险”。但我们必须指出：所谓创业风险，在这里不过是资本责任外包给劳动者个人的说法。平台享受低成本活跃生态，商家享受流量销售，消费者享受即时购物，整个商品世界享受直播经济的繁荣；而劳动者承担身体损耗、收入波动和生命危险。这不是公平交换，而是资本主义零工经济的结构性的不平等。

自由派会说，要加强平台监管，要保障劳动者权益。这些要求可以提出，但不能停留于此。因为只要平台资本仍然掌握劳动过程的规则，只要劳动者仍然被迫在竞争中自我压榨，只要社会化劳动成果仍然表现为资本力量，劳动者就仍然会越辛苦越被支配。监管可以减轻某些后果，却不能取消资本主义异化的根源。

修正主义则会说，灵活就业扩大了就业渠道，直播带货提供了致富机会。我们必须批判这种说法。它只看到少数成功故事，看不到普遍劳动压力；只看到商品成交额，看不到劳动者生命损耗；只看到就业形式多样化，看不到保障责任被取消；只看到平台经济发展，看不到人的世界被商品世界压倒。修正主义所谓发展，实际上是让资本主义异化披上“新经济”的外衣。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提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党要告诉劳动者：你们的辛苦不是天然命运，你们得到的少不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们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占有，你们的集体力量被资本异化，你们的身体和时间被商品世界吞噬。你们不是孤立失败者，而是同一资本主义零工体系中的劳动群众。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把这种被资本夺走的社会力量重新变成自己的力量。

工会作为党的附属群众组织，也必须围绕这一点开展工作。不能只说“注意休息”，而要争取休息权；不能只说“合理安排时间”，而要反对平台用竞争惩罚休息；不能只做慰问和服务，而要组织劳动者认识共同处境；不能只谈个体健康，而要谈劳动制度；不能只谈平台优化规则，而要揭露平台资本占有社会化劳动成果的本质。

这一部分可以这样收束：

零工劳动中的贫困化，不只是钱少，而是人的生活世界越来越少；不只是收入不稳定，而是身体、时间、情绪、未来和组织能力都被资本吞噬。主播越辛苦，平台越繁荣；劳动者越拼命，竞争标准越高；商品世界越增值，人的世界越贬值。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异化规律在平台时代的表现。

所以，这名主播的离世不应被资本主义社会迅速消化成一句“创业不易”或“注意身体”。她的倒下揭示了一个根本事实：当劳动者必须用身体去追赶流量、用健康去换取订单、用生命时间去维持平台繁荣时，所谓“新经济”不过是旧剥削的新形式。真正的出路，不是让劳动者更加聪明地适应这种剥削，而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把分散的零工劳动者组织起来，反对这种让人越辛苦越失去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

九、自由职业幻象：劳动者越“自主”，资本支配越隐蔽

零工经济最善于制造一种幻象：劳动者似乎不再受雇于老板，不再被关在车间，不再被固定工时束缚，而是可以自己选择时间、地点、商品、节奏和收入方式。主播有自己的账号，骑手有自己的手机，司机有自己的车辆，短视频创作者有自己的页面，接单劳动者有自己的平台后台。于是，资产阶级舆论便宣称：这是自由职业，这是个人创业，这是劳动者获得了自主性。

但是，马克思主义看问题不能停留在法律形式和表面身份上。一个劳动者是不是自由，不取决于她表面上有没有老板，而取决于她是否真正掌握劳动条件、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一个主播即使没有传统雇主，仍然可能被平台资本支配；一个骑手即使没有固定工厂，仍然可能被算法派单支配；一个司机即使拥有自己的车，仍然可能被平台价格体系支配。资本主义可以改变劳动者被支配的形式，却不会因此取消支配本身。

所谓自由职业，在零工经济中首先是一种形式自由。主播确实可以选择几点开播，可以选择卖什么衣服，可以选择如何布置直播间，可以选择自己的话术和风格。可是，这些选择都发生在平台资本已经规定好的框架之内。她不能决定平台如何分配流量，不能决定算法如何推荐，不能决定平台如何改变规则，不能决定消费者被怎样引导，不能决定同行竞争是否会进一步压低价格和延长劳动时间。她可以在笼子里选择姿势，却不能选择是否进入这个笼子。

这种形式自由恰恰掩盖了实质从属。传统工厂里，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的厂房、机器和管理制度；零工经济里，劳动者从属于平台的流量入口、数据系统和市场规则。传统工人害怕被开除，零工劳动者害怕被限流、降权、封号、差评、失去订单。传统工人依赖工资，零工劳动者依赖平台分发和市场曝光。依赖关系没有消失，只是从厂房依赖变成了平台依赖，从劳动合同依赖变成了账号依赖。

在直播带货中，这种依赖非常明显。一个主播可以说账号是自己的，但账号能不能活下去，取决于平台推荐、粉丝停留、成交转化和规则变化。她可以说直播间是自己的，但直播间有没有人进来，取决于平台流量。她可以说商品是自己选的，但商品能不能卖出去，取决于价格战、同行竞争、消费者预期和平台生态。她可以说时间是自己安排的，但收入不稳定和流量惩罚会迫使她不断延长劳动时间。

所以，这种“自主”是被资本规定过的自主。它不是劳动者真正掌握自己命运，而是劳动者在资本提供的狭窄空间内自我调节、自我加压、自我负责。资本不再直接告诉她“你必须这样做”，而是设置一个环境，让她自己得出结论：我必须这样做。资本不再每天站出来命令她劳动，而是让她在收入焦虑、流量焦虑和竞争焦虑中自己命令自己。资本支配越隐蔽，劳动者越容易把它误认为自己的选择。

这正是零工经济中“自己给自己打工”说法的欺骗性。表面上，她不是给老板打工，而是给自己打工；但实质上，她是在替平台生态、商品流通和资本增殖承担劳动成本。她自己承担设备成本、健康成本、时间成本、库存成本、情绪成本和风险成本，平台则掌握规则、流量、数据和市场入口。她看似成为自己的老板，实际上同时成了自己的工人、自己的监工和自己的风险承担者。

在这种结构中，资本完成了一次极其狡猾的转移：它把直接管理责任转移给劳动者本人，把劳动保障责任推给“个体经营”，把经营风险推给个人，把高强度劳动包装成自我奋斗。过去，资本家要延长劳动日，还需要面对工人的反抗；现在，平台只需要让流量和竞争惩罚休息，劳动者就会自己延长劳动日。过去，资本家要降低成本，还要直接压工资；现在，平台让劳动者自己承担设备、场地、时间和健康损耗，就能把成本外包出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零工劳动者常常比传统工人更难形成清晰的阶级意识。传统工人知道自己是在给老板干活，知道工资是老板发的，知道厂房和机器属于资本家。零工劳动者却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做自己的事业，失败是自己能力不足，收入低是自己运营不好，身体累是自己安排不合理，流量差是自己不够努力。资本主义关系被个人责任话语遮蔽了。

资产阶级最喜欢这种遮蔽。它不断讲“个人品牌”“自我管理”“时间管理”“创业精神”“努力变现”。这些词的作用，就是把劳动者从阶级关系中抽出来，变成一个孤立的自我负责的个体。你累，是因为你不会平衡；你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你失败，是因为你不懂运营；你病倒，是因为你没有照顾好身体。资本、平台、算法、竞争、去保障化，全部从解释中消失了。

这就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异化。劳动者不仅在劳动过程中失去自己，而且在思想上被迫用资本的语言理解自己的处境。她用“创业”解释自己的不稳定，用“自由”解释自己的无保障，用“奋斗”解释自己的过劳，用“竞争”解释自己的被迫内卷，用“个人选择”解释自己的结构性困境。她越接受这种解释，越难看到共同敌人，越难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必须把这种虚假自由撕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劳动者”本来就是双重意义上的自由：一方面，他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他又同生产资料相分离，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零工经济把这种双重自由推到新的形态：劳动者法律上更加“自由”，可以自己接单、自己开播、自己经营；但他们同平台流量、数据规则和市场入口相分离，因此不得不服从平台资本的条件才能生存。

这就是所谓自由职业的真实内容：形式上摆脱固定雇主，实质上进入更广泛、更无形、更难反抗的资本支配。劳动者不再只面对一个老板，而是面对平台、算法、市场、消费者、同行和收入不稳定构成的整体压力。她的自由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孤立了；她的选择不是更多了，而是每一种选择都被资本主义竞争预先规定了代价。

这种自由还伴随着保障的丧失。传统雇佣关系虽然也充满剥削，但至少还存在某些可识别的劳动关系、工时、工资和责任主体。零工经济则常常把劳动者变成“合作方”“个体户”“创作者”“商家”“服务者”。一旦出现疾病、过劳、收入波动、平台规则变化，责任就变得模糊。平台可以说你不是我的员工，消费者可以说我只是买东西，商家可以说你自己经营，政府可以说这是灵活就业。最后，所有风险都落到劳动者自己身上。

这种责任外包，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的实质。资本保留控制权，却逃避责任；劳动者获得形式自主，却承担损耗。平台可以控制流量，但不承认自己控制劳动过程；平台可以通过规则影响劳动时长，但不承担工时责任；平台可以从交易中获利，但不承担劳动者身体透支的后果。资本越隐身，劳动者越难追责；资本越平台化，劳动者越孤立。

在直播带货中，“小老板”幻象尤其强烈。有人会说，主播卖货当然是商人，是自己赚钱，不是工人。这个说法看见了她的生产者外壳，却看不见她的无产阶级化处境。确实，她可能拥有手机、灯光、衣架、货架、样衣、账号，甚至有少量库存。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她掌握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关键条件。关键条件在平台手里，在流量入口手里，在供应链价格手里，在市场竞争手里，在消费者评价体系手里。

真正的资本家，不只是拥有一些工具，而是能够支配劳动条件、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掌握市场和生产资料。中小主播往往不是这样。她们更多是用个人身体和时间承担商品流通成本，用个人情绪维护消费关系，用个人风险支撑平台繁荣。她们可能有一点经营形式，却没有真正的资本权力；可能承担老板的风险，却没有老板的控制力；可能被要求像资本家一样自负盈亏，却只能像劳动者一样出卖自己的生命时间。

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外壳下的无产阶级化。零工经济制造了大量看似小老板、实则被资本支配的劳动者。他们既不稳定，也不自由；既没有传统雇员的保障，也没有真正资本家的权力。他们夹在平台资本、市场竞争和生活压力之间，被迫把自己经营成一个商品节点。这个群体的痛苦，不能用简单的“小老板亏本”解释，而必须从资本主义关系和半无产阶级化处境中理解。

这也说明，党在分析零工劳动者时不能机械。不能只看是否有劳动合同，也不能只看是否自称创业，更不能只看是否拥有少量工具或账号。关键要看他们在生产和流通关系中的实际地位：他们是否掌握规则？是否控制市场入口？是否占有他人剩余劳动？是否能够决定自己的劳动强度？是否有保障？是否被平台资本和竞争压力支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们就不是自由的资本家，而是需要被组织和争取的新型劳动群众。

修正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舆论最喜欢把这类人包装成“创业者”，因为这样可以把劳动问题变成创业问题，把保障问题变成个人选择问题，把阶级矛盾变成市场竞争问题。既然你是创业者，那么累是应该的，风险是自担的，失败是正常的，平台只是提供机会，国家只是鼓励创新。这样一来，资本责任消失了，劳动者权利消失了，组织问题也消失了。

这就是为什么反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灵活就业”叙事。所谓灵活就业，看似给劳动者更多选择，实际往往是让资本更灵活地摆脱责任。对资本来说，灵活意味着不用承担稳定工资、固定工时、社保、职业健康、休息权和长期责任；对劳动者来说，灵活则意味着收入不稳定、劳动时间不稳定、保障不稳定、身体风险无人承担、未来难以规划。资本的灵活，是责任的灵活；劳动者的灵活，是生存的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会反过来加深资本支配。因为越是不稳定，劳动者越不敢休息；越没有保障，越必须拼命接单或直播；越担心未来，越愿意牺牲现在的身体；越孤立，越难反抗平台规则。所谓自由职业，最后成为一种更深的依赖：劳动者形式上不依赖某个老板，实质上更加依赖市场和平台。

因此，这一部分必须明确：自由职业幻象的本质，是资本支配的隐蔽化。劳动者看似获得自主，实际上失去保障；看似摆脱老板，实际面对更无形的资本；看似自己选择劳动，实际上被竞争和生存压力强制；看似为自己工作，实际上把自己的身体、情绪、时间和风险投入平台资本增殖。

这名主播的离世，正让这种幻象破裂。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应当被流量和订单逼到无法停下；一个真正自主的劳动者，不应当在身体发出危险信号之前长期被高强度劳动牵引；一个真正掌握自己劳动的人，不应当把健康、时间和生活都交给平台竞争。如果所谓自由职业最终让劳动者在镜头前透支生命，那么这种自由就是资本主义的虚假自由。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揭露这种虚假自由。党要告诉零工劳动者：你们不是孤立创业失败者，而是被平台资本组织起来、又被平台资本分散开来的劳动群众；你们的疲惫不是个人管理失败，而是资本主义竞争和去保障化的结果；你们的“自主”如果不能决定劳动条件、不能掌握劳动成果、不能保障身体和时间，那就只是资本支配的外衣。

工会在党的领导下，也必须把这类劳动者组织起来。不能因为他们没有传统雇主，就不把他们当劳动者；不能因为他们有账号和少量工具，就把他们推给市场；不能因为他们名义上灵活，就否认他们需要组织、保障和集体斗争。工会必须作为党的附属群众组织，把这些分散的“自由职业者”重新连接起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并不自由，认识到共同的资本支配，认识到组织的必要性。

这一部分可以这样收束：

零工经济的“自由”，不是劳动者摆脱资本的自由，而是资本摆脱责任的自由；不是劳动者支配自己劳动的自由，而是劳动者在平台规则和竞争压力下自我压迫的自由。主播看似拥有账号，实际被流量支配；看似自己安排时间，实际被收入不稳定支配；看似自己当老板，实际同时承担工人、监工和风险承受者的角色。资本越隐身，劳动者越孤立；劳动者越“自主”，资本支配越隐蔽。

所以，面对这名主播的悲剧，我们不能再重复“自由职业很辛苦”“创业要注意身体”这种空话。真正的问题是：所谓自由职业，为什么让劳动者失去对身体和时间的支配？所谓灵活就业，为什么让休息和保障变得更加脆弱？所谓个人创业，为什么最终强化了平台资本的力量？只有从这些问题出发，才能揭开零工经济自由幻象背后的阶级实质。

十、风险转嫁：资本占有成果，劳动者承担损耗

零工经济的另一个核心秘密，就是风险转嫁。平台资本把劳动者组织进一个巨大的社会化劳动体系之中，却又在法律形式和经营形式上把他们拆散成一个个“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创作者”“商家”“接单者”。这样一来，平台可以集中占有社会化劳动的成果，却把劳动过程中的风险、损耗和责任分散给每一个劳动者个人。

这正是平台资本主义最狡猾的地方：权力是集中的，责任是分散的；收益是资本化的，损耗是个人化的；规则由平台制定，后果由劳动者承担。

在直播带货中，平台掌握最关键的东西：流量入口、推荐机制、账号权重、数据系统、支付通道、评价体系、封禁权、限流权、规则解释权。一个主播能不能被看见，能不能被推荐，能不能进入更大的流量池，能不能维持账号活跃，很多时候都取决于平台规则。平台因此拥有巨大的支配权。

可是，当劳动者因为这种规则被迫延长劳动时间、承受情绪压力、承担退货风险、损害身体健康时，平台又会退到幕后，说自己只是提供技术服务、交易平台、内容分发和商业机会。它要控制劳动过程，却不愿承认自己在控制劳动过程；它要从劳动者的活跃中获利，却不愿承担劳动者因高强度活跃而产生的健康后果。

这种结构可以概括为：平台集中权力，劳动者分散承担风险。

主播承担什么风险？

首先是健康风险。长时间直播、频繁试穿、作息紊乱、精神紧张、持续情绪输出，都在消耗劳动者身体。尤其是中小主播，往往没有成熟团队分担工作，一个人或家庭小团队承担选品、直播、打包、售后、运营等多项任务。身体被长期透支，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主要由个人和家庭承担。

其次是收入风险。平台可以改变推荐机制，账号可能突然流量下降，消费者偏好可能变化，同行价格战可能加剧，退货率可能上升。主播收入不稳定，却很难要求平台保证收入。平台享受交易规模和用户活跃，劳动者则承受收入波动。

第三是时间风险。直播带货没有清晰的劳动日边界。开播、备货、剪视频、维护粉丝、售后、复盘、看数据，全都占用时间。平台不会说“你必须全天工作”，但它通过竞争和流量压力让劳动者很难真正停止工作。劳动者承担的是整个生活时间被吞噬的风险。

第四是库存和经营风险。许多带货主播需要备货、压货、承担退货和滞销压力。卖不出去，是自己的损失；卖得出去，平台和供应链也要从中分享收益。这里的关系非常不平等：劳动者承担经营失败的直接压力，资本体系却通过流量、抽成、货源和规则持续占据有利位置。

第五是账号风险。账号可能被限流、封禁、降权，规则可能突然变化，内容可能不被推荐，用户关系可能被平台中介。劳动者长期投入账号建设，但账号生存的关键条件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一旦账号出问题，过去积累的大量劳动可能瞬间贬值。

第六是情绪和精神风险。主播必须长时间维持亲和、热情、耐心、可信的人设，承受差评、退货、挑剔、辱骂、冷场、流量下滑和收入焦虑。平台经济把劳动者暴露在持续评价之下，让她们不断接受消费者、算法和同行竞争的审判。这种精神压力同样是劳动损耗的一部分。

这些风险不是偶然附带的，而是零工经济结构本身制造出来的。平台资本越不直接雇佣劳动者，就越可以逃避稳定工资、固定工时、职业健康、社保、休息权和劳动保护责任。平台资本越把劳动者说成“独立经营者”，就越可以把一切后果说成个人经营风险。

这就是所谓“灵活就业”的真实含义。对资本来说，灵活意味着可以灵活使用劳动、灵活规避责任、灵活调整规则、灵活转嫁风险；对劳动者来说，灵活意味着收入不稳定、休息不稳定、保障不稳定、身体风险不稳定、未来不稳定。资本的灵活，是摆脱责任的灵活；劳动者的灵活，是失去保障的灵活。

资产阶级舆论常常把这种风险说成“创业代价”。它会说：你既然选择做主播，就要承担风险；你既然自己经营，就不能要求别人负责；你既然想赚更多，就要比别人更拼。可是这种说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劳动者并不是在平等条件下自由承担风险。平台掌握规则，资本掌握入口，劳动者只是被迫在这些规则下谋生。

真正的问题不是劳动者有没有风险意识，而是为什么资本可以把系统性风险外包给个人。平台资本创造了一个高度竞争、高度不稳定、高度依赖流量的劳动环境，然后把这个环境造成的后果说成个人选择。劳动者身体被消耗，是她自己太拼；收入不稳定，是她自己经营不好；账号被限流，是她自己内容不够好；休息不足，是她自己不会安排时间。资本永远在场，却永远不负责。

这就是风险转嫁的意识形态形式：把结构性压迫解释成个人责任。

这名主播的离世，正应放在这个结构中理解。我们不能武断地把具体病因完全归结为劳动强度，但我们必须看到，长期高强度直播劳动、作息不稳、情绪压力和生存竞争，构成了许多零工劳动者的现实处境。她的身体承担的是个人后果，但这种后果背后是平台资本主义普遍制造的高压劳动环境。

资本主义最冷酷的地方就在于：当劳动者还活跃在直播间里时，她是平台生态的一部分，是交易额、流量、内容供给、粉丝互动和商品流通的贡献者；当她倒下时，她又立刻被还原为一个“个人健康事件”。劳动者创造价值时，平台从社会化劳动中受益；劳动者承担损耗时，资本又把她推回孤立个人。

这就是社会化成果和个人化风险之间的矛盾。

劳动者的劳动是社会化的。无数主播共同维持平台内容生态，无数物流工人保障商品配送，无数服装工人生产商品，无数客服处理售后，无数消费者互动形成数据。这一切共同创造出平台经济的繁荣。

但劳动者的风险却被个人化。某个主播病倒，是她自己的身体问题；某个骑手受伤，是他的交通事故；某个司机过劳，是他的个人安排；某个小商户亏损，是他的经营失败。资本把社会化劳动的成果集中为平台价值，却把社会化劳动的损耗拆散为个体悲剧。

这正是资本主义异化的进一步表现。劳动者共同创造的力量不属于他们；共同承担的压力也不能以共同的方式被解决。每个人都被迫独自面对风险，独自承受失败，独自消化痛苦。资本把劳动者共同的阶级处境，拆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命运。

因此，风险转嫁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只要劳动者被孤立成一个个个体，他们就很难把自己的痛苦理解为共同处境。主播会觉得自己身体不好，骑手会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司机也会觉得自己平台分不够，快递员会觉得自己路线不熟。每个人都在个人层面找原因，而资本主义关系就这样逃脱了批判。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被分散的风险重新揭示为共同的阶级问题。党要指出：主播的健康风险、骑手的交通风险、司机的过劳风险、快递员的工伤风险、自由接单者的收入风险，本质上都同平台资本主义的责任外包有关。它们不是孤立意外，而是同一种去保障化劳动制度的不同表现。

工会作为党的附属群众组织，也必须围绕风险转嫁开展工作。它不能只是事后慰问，不能只是提醒注意安全，不能只是组织体检和送温暖。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把劳动者的具体风险转化为集体诉求：合理工时、休息权、社保、职业健康保护、平台规则透明、收入保障、反限流申诉机制、对高强度劳动的限制、对平台责任的追究。

但更重要的是，工会不能把这些诉求停留在技术调整层面。它必须揭示：为什么平台总能集中权力却分散责任？为什么劳动者承担风险而资本占有成果？为什么所谓灵活就业总是让资本更灵活、劳动者更不稳定？这些问题只有在党的政治领导下，才能从权益问题上升为阶级问题。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立场看，所谓“新业态就业”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它把资本主义责任外包制度化、合法化、意识形态化。修正主义国家把这种就业形式包装为创新和活力，却不愿正视劳动者保障的消失；它宣传平台经济创造岗位，却回避这些岗位的风险结构；它赞美个人奋斗，却不问奋斗背后是谁在占有成果、谁在承担损耗。

这正是修正主义的虚伪。它用“发展”掩盖剥削，用“就业”掩盖不稳定，用“灵活”掩盖无保障，用“创业”掩盖风险转嫁。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应当让劳动者独自承担资本扩张的代价，不应当把人的身体和生命时间作为平台繁荣的燃料，更不应当把集体性劳动风险伪装成个人命运。

这名主播的事件之所以有批判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看到：平台经济的光鲜表面之下，劳动者承担着被遮蔽的身体风险。直播间里是商品、笑容、互动和消费热闹；直播间外是熬夜、焦虑、备货、售后、流量压力和健康透支。资本看到的是交易额，劳动者承担的是身体账。

这种身体账，平台不会主动计算；这种健康损耗，算法不会显示；这种生命风险，交易报表不会记录。资本主义只计算商品和利润，不计算人的耗损；只计算平台活跃，不计算劳动者疲惫；只计算转化率，不计算情绪崩溃；只计算销售额，不计算生命被掏空的程度。

所以，风险转嫁的最深层含义是：资本主义把劳动者的生命损耗从账本上抹掉了。它把人的损耗变成私人问题，把身体崩溃变成偶然事故，把结构性过劳变成个人不幸。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把这笔被资本抹去的账重新写回来，告诉劳动者：你们的身体、时间、情绪和生命，不是平台可以免费消耗的资源。

这一部分可以这样收束：

平台资本主义的风险结构是：资本集中权力，劳动者承担后果；资本占有社会化协作的成果，劳动者独自承担身体和生活的损耗；平台获得流量、数据和交易额，主播承担健康风险、收入风险和时间风险。所谓灵活就业，不过是资本把责任灵活地甩给劳动者，把风险灵活地拆散成个人命运。

因此，面对这名主播的离世，我们不能只说“个人要注意身体”，而要问：为什么身体风险要由个人独自承担？为什么平台可以通过流量和竞争影响劳动强度，却不承担相应责任？为什么社会化劳动创造的平台繁荣，不能转化为劳动者共同的保障？为什么一个人倒下之后，资本机器仍然可以继续运转？

这些问题指向同一个答案：在资本主义零工经济中，劳动者不是风险的制造者，却是风险的承受者；资本不是唯一的劳动组织者，却是成果的占有者。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把分散的零工劳动者组织起来，才能把被个人化的风险重新转化为集体斗争的问题，才能迫使平台资本的隐形责任暴露出来，才能使劳动者不再作为孤立个体承担资本主义制度制造的损耗。

十一、修正主义批判：所谓“灵活就业”就是异化劳动的制度化

围绕这名主播的离世，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话语一定会尽力把问题说得温和一些。它们会说，这是新业态发展中的个别悲剧；会说，灵活就业确实压力大，但也创造了机会；会说，直播带货帮助许多人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带动消费；会说，平台经济是数字时代的新生产力，不能因为个别事件否定整体发展。所有这些说法，表面上理性，实质上都是在遮蔽一个根本问题：所谓“灵活就业”，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往往就是劳动保障被拆除、资本责任被外包、异化劳动被制度化。

修正主义最擅长的，就是用“发展”的词汇掩盖阶级关系。它不说劳动者被迫进入无保障竞争，而说“就业形式更加多元”；它不说平台资本逃避雇佣责任，而说“劳动者有了更多自主选择”；它不说劳动日边界被打碎，而说“工作时间更加灵活”；它不说资本把风险甩给个人，而说“创业者要承担市场风险”；它不说人的身体和生活被平台吞噬，而说“数字经济释放活力”。

这种语言不是中立的。它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外衣。所谓“灵活”，对资本来说，是用工灵活、成本灵活、责任灵活、裁撤灵活、规则调整灵活；对劳动者来说，则是收入不稳定、休息不稳定、保障不稳定、健康不稳定、未来不稳定。资本的灵活，是摆脱责任的灵活；劳动者的灵活，是被迫承受不确定性的灵活。

直播带货正是这种“灵活就业”的典型形式。主播看似不受固定老板约束，看似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看似拥有账号和直播间，但她的劳动条件其实被平台、流量、竞争和市场共同规定。她没有稳定工资，没有明确工时，没有足够休息权，没有充分社保，没有职业健康保护，没有真正的组织保障。她不是从雇佣劳动中获得了解放，而是从传统雇佣关系的某些保护中被甩了出去，同时继续受资本主义市场和平台规则支配。

修正主义会把这叫作“新就业形态”。但我们必须问：新在哪里？如果所谓“新”，只是让劳动者自己承担设备、时间、健康、库存、流量和收入波动风险；如果所谓“新”，只是让资本不再以老板的面目出现，而以平台、算法和规则的面目出现；如果所谓“新”，只是让劳动者在没有固定工时和保障的情况下被迫全天候劳动，那么这种“新业态”不过是旧剥削的数字化升级。

真正的社会主义，应当使劳动者越来越掌握自己的劳动和生活，而不是使劳动者越来越被市场、平台和竞争支配。真正的社会主义，应当通过社会化生产的高度发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劳动者的生活保障，使人有更多时间用于全面发展。可是修正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把劳动者推向零工化、个体化、平台化、去保障化，再用“创业创新”包装这种倒退。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扩大。

在这里，反修正主义的批判必须非常明确：问题不只是平台监管不足，也不只是劳动法没有跟上新业态，而是整个修正主义路线已经把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合法化、正常化、美化了。它承认资本逻辑，承认市场竞争，承认平台支配，承认劳动者自负盈亏，然后再用一些福利性、服务性、调解性的措施来掩盖根本矛盾。它不会真正触动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只会试图让这种统治看起来更温和、更可管理。

官方叙事经常喜欢宣传某些头部主播的成功故事：谁通过直播致富，谁通过带货翻身，谁借助平台实现创业梦想。这些故事的功能，就是用少数成功案例遮蔽大多数劳动者的处境。资本主义永远需要这样的神话：只要你足够努力，你也能成功；只要你够拼，平台就会奖励你；只要你不怕苦，你也能改变命运。可是它不告诉你，平台经济的结构正是少数人获得曝光，多数人被淘汰；少数账号被推成样板，多数劳动者在低利润、高竞争、高压中消耗自己。

成功神话的作用，是让失败者自责，让疲惫者沉默，让被压迫者继续相信自己只是还不够努力。它把结构性问题转化为个人差距，把资本主义竞争转化为个人奋斗，把平台资本对劳动者的筛选转化为“机会公平”。这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毒的地方：它不仅剥削劳动者，还要求劳动者相信自己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

修正主义则把这种成功神话国家化、政策化、发展叙事化。它会说，直播带货带动地方经济，带动消费，带动就业，带动乡村振兴，带动数字经济。可是它不问：这种“带动”是以谁的身体为燃料？是谁在长时间直播？是谁在打包售后？是谁在承担退货？是谁在焦虑流量？是谁在失去休息？是谁在身体不适时还担心直播不能停？如果所谓发展必须以劳动者长期透支为条件，那么这种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不是无产阶级的发展。

这里必须批判“就业数量崇拜”。修正主义会说平台经济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好像只要有人有事做，就说明制度合理。可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有工作”本身当成解放。奴隶也有工作，雇佣工人也有工作，过劳死的劳动者也在工作。问题不只是有没有工作，而是劳动者在怎样的关系中工作，劳动成果归谁，劳动过程由谁支配，劳动者是否有保障，劳动是否服务于人的发展，还是服务于资本增殖。

所谓“灵活就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它使劳动者从组织化的阶级成员退回到孤立的个体。传统工厂劳动虽然剥削严重，但工人至少在同一工作场所中相互接触，容易形成共同处境和集体意识。零工经济则把劳动者拆成一个个账号、一个个接单者、一个个小店、一个个直播间，使他们彼此隔离、彼此竞争、彼此替代。资本最喜欢这种状态，因为孤立的劳动者更容易被管理，更难组织起来。

修正主义不仅不反对这种个体化，反而把它美化为“自主择业”。可是这种自主择业，实质上是组织瓦解后的孤立谋生。劳动者不再作为阶级共同面对资本，而是作为个体进入市场，被平台评分、排序、分发、淘汰。她们没有集体合同，没有集体工时，没有集体保障，没有集体谈判，甚至很难形成稳定的共同身份。她们被要求独自承担资本主义市场的一切风险。

这就是异化劳动的制度化。不是某个主播偶然异化，而是整个制度把异化劳动规定为常态：劳动者必须把自己账号化、商品化、情绪化、全天候化；必须把身体和生活时间投入市场竞争；必须把资本压力理解为自我奋斗；必须把无保障理解为灵活；必须把风险转嫁理解为创业代价。异化不再只是劳动过程中的结果，而被上升为一种就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官方鼓励的生活方式。

这种制度化异化，比传统工厂剥削更加隐蔽。传统工厂剥削至少还容易让工人看到资本家和机器；平台经济则让劳动者看到的是手机、账号、流量、粉丝、订单、同行、数据。资本隐身了，剥削柔性化了，劳动者自我管理了，风险个人化了，意识形态也更漂亮了。于是，劳动者即使痛苦，也常常不知道该反抗谁；即使疲惫，也常常以为只是自己没做好。

因此，反修正主义必须把矛头指向这种漂亮话。我们不能接受“灵活就业就是进步”的说法。我们要问：灵活的是谁？谁获得了更多控制权？谁承担了更多风险？谁掌握平台规则？谁承担健康损耗？谁占有社会化协作的成果？谁在身体崩溃后被说成个人不幸？这些问题一问出来，所谓灵活就业的阶级实质就暴露出来了。

真正的无产阶级立场应当从劳动者的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平台交易额出发。判断直播带货经济，不能只看卖了多少货、平台赚了多少钱、地方经济增长多少，而要看劳动者是否有休息，是否有保障，是否能组织，是否能掌握劳动节奏，是否能在劳动中保持人的尊严。如果一个产业越发展，劳动者越焦虑、越孤立、越无保障、越把身体交给平台，那么这个产业的发展就是资本的发展，不是人的发展。

官方工会在这里的局限也必须指出。面对新业态劳动者，官方工会常常停留在形式覆盖、会员登记、节日慰问、法律咨询、服务站点、送水送药之类工作。这些东西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如果没有阶级斗争方向，就是把工会变成社会服务机构。它不会真正触动平台资本的规则权，不会组织劳动者反对去保障化，不会把分散劳动者变成阶级力量。

这正是为什么必须强调：工会必须是党的附属群众组织，而不能成为独立的服务机关或调解机关。工会如果不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容易把零工劳动者的问题降格为“服务不足”“保障不足”“沟通不足”，而不是上升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修正主义劳动路线的问题。工会可以帮助劳动者争取休息权、社保、收入保障、平台规则透明，但这些经济和权益诉求必须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必须服务于阶级意识的提高。

在反修正主义立场上，我们还要指出：所谓“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如果不触动资本权力，就很容易变成修补资本主义的工具。平台可以设立热线，可以提供保险，可以搞公益活动，可以参与工会服务站，可以宣传关爱劳动者，但只要平台仍然掌握流量规则，仍然用竞争驱使劳动者延长工时，仍然把风险和损耗推给个人，这些措施就只是给异化劳动贴上温情标签。

资本主义很擅长这种温情统治。它先制造高压劳动环境，再提供一点心理关怀；先使劳动者无保障，再发一点慰问礼包；先用算法逼人奔跑，再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先把劳动者孤立成个体，再给他们建服务驿站。它不改变支配关系，只改善支配的外观。修正主义国家和官方工会如果只做这些工作，就不过是在帮助资本主义稳定这种新型劳动秩序。

所以，面对这名主播的离世，反修正主义者不能只要求“平台关爱主播”。我们必须要求揭露平台资本对劳动者的真实支配，揭露灵活就业对劳动保障的拆除，揭露零工经济中资本责任的外包，揭露官方发展叙事对劳动者身体损耗的遮蔽。更重要的是，必须提出组织问题：没有组织，零工劳动者永远只能作为个体面对平台；没有党的领导，组织也容易被工联主义、服务主义和改良主义限制。

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让社会短暂同情一个倒下的主播，而在于迫使我们看清：她不是一个孤立的创业者，而是平台资本主义劳动体系中的一名劳动者；她的倒下不是“新业态”中的偶然事故，而是异化劳动制度化之后的残酷显影。她的身体崩溃，揭开了所谓数字经济光鲜表面下的阶级真相。

这一部分可以这样收束：

修正主义所谓“灵活就业”，本质上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下把劳动者去组织化、去保障化、个体化，并把这种状态美化为自由和机会。它用“新业态”掩盖旧剥削的升级，用“创业创新”掩盖资本责任外包，用“就业活力”掩盖人的世界被商品世界吞噬。直播间里的死亡，正是这种叙事的破产：所谓灵活，并没有让劳动者成为主人，而是让资本更灵活地支配劳动者。

因此，我们必须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立场出发，拒绝把平台经济看成中立进步，拒绝把灵活就业看成天然解放，拒绝把劳动者的身体损耗解释成个人代价。真正的任务，是揭露修正主义发展叙事背后的资本主义劳动现实，把零工劳动者从“自由创业者”的幻象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反对平台资本统治，才能真正摆脱这种被包装成自由的异化劳动。

这种制度化异化，比传统工厂剥削更加隐蔽。传统工厂剥削至少还容易让工人看到资本家和机器；平台经济则让劳动者看到的是手机、账号、流量、粉丝、订单、同行、数据。资本隐身了，剥削柔性化了，劳动者自我管理了，风险个人化了，意识形态也更漂亮了。于是，劳动者即使痛苦，也常常不知道该反抗谁；即使疲惫，也常常以为只是自己没做好。

因此，反修正主义必须把矛头指向这种漂亮话。我们不能接受“灵活就业就是进步”的说法。我们要问：灵活的是谁？谁获得了更多控制权？谁承担了更多风险？谁掌握平台规则？谁承担健康损耗？谁占有社会化协作的成果？谁在身体崩溃后被说成个人不幸？这些问题一问出来，所谓灵活就业的阶级实质就暴露出来了。

真正的无产阶级立场应当从劳动者的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平台交易额出发。判断直播带货经济，不能只看卖了多少货、平台赚了多少钱、地方经济增长多少，而要看劳动者是否有休息，是否有保障，是否能组织，是否能掌握劳动节奏，是否能在劳动中保持人的尊严。如果一个产业越发展，劳动者越焦虑、越孤立、越无保障、越把身体交给平台，那么这个产业的发展就是资本的发展，不是人的发展。

十二、党的任务：把异化的个体重新组织为自觉的阶级力量

前面已经说明，直播带货和零工经济并不是自由劳动的天堂，而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新车间；主播也不是完全自主的小老板，而是被平台、算法、流量和竞争支配的新型劳动者。既然问题的根源不是个人不够努力，也不是个人不会休息，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平台资本指挥和修正主义“灵活就业”叙事，那么解决问题的方向也就不能停留在个人层面。真正的问题不是劝每一个主播“注意身体”，而是要把这些被资本拆散成孤立账号的劳动者重新组织起来。

平台资本最希望劳动者保持孤立。一个主播面对平台时是弱小的，一个骑手面对平台时是弱小的，一个司机面对平台时是弱小的，一个快递员面对平台时也是弱小的。平台掌握规则、数据、入口和分配权，而劳动者面对的是自己的账号、自己的订单、自己的收入、自己的身体。只要劳动者作为孤立个体存在，他们就只能在平台规定的规则里挣扎，最多争取一点个案性改善，很难改变整体结构。

因此，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揭露个体化的骗局。资本主义零工经济把劳动者分散成一个个账号、一个个直播间、一个个接单者，然后告诉他们：你的命运取决于你自己。你成功，是你会经营；你失败，是你不努力；你过劳，是你不会安排；你没有流量，是你内容不好；你身体透支，是你没有平衡好工作和生活。党必须指出，这种说法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把结构性压迫伪装成个人责任。

党要告诉零工劳动者：你们不是孤立失败者，你们不是单独面对命运的人，你们不是一个个分散的“创业个体”。你们共同面对平台资本、市场竞争、去保障化、收入不稳定和劳动异化。你们的困境具有共同根源，你们的痛苦具有共同性质，你们的出路也只能通过共同组织来寻找。只有当劳动者从“我一个人不行”转向“我们共同受压迫”，阶级意识才开始产生。

党的第二项任务，是把竞争中的劳动者重新联系起来。平台资本通过竞争分裂劳动者，使主播同主播竞争，骑手同骑手竞争，司机同司机竞争，店铺同店铺竞争。每个人都被迫把另一个劳动者看成威胁。别人播得更久，我就必须更久；别人价格更低，我就必须更低；别人更快送达，我就必须更快；别人在线时间更多，我就必须牺牲更多休息。资本就躲在这种互相追赶背后，坐收劳动者自我压榨的成果。

党必须反过来说明：真正的敌人不是另一个同样疲惫的劳动者，而是把所有劳动者都推入竞争场的资本主义关系。主播之间不应互相敌视，而应认识到她们共同受平台流量规则支配；骑手之间不应只为订单互相争夺，而应认识到算法和派单机制共同压迫他们；司机之间不应只为价格和评分互相竞争，而应认识到平台把收入风险和劳动强度转嫁给他们。资本用竞争分裂劳动者，党要用阶级路线重新统一劳动者。

党的第三项任务，是把劳动者的痛苦解释为制度问题。没有理论解释，痛苦会变成自责；没有阶级分析，疲惫会变成命运；没有组织引导，悲剧会被资本主义社会迅速遗忘。一个主播倒下后，舆论可能只会说“注意身体”；一个骑手出事故后，社会可能只会说“交通安全”；一个司机过劳后，平台可能只会说“合理安排时间”。党必须把这些分散事件联系起来，说明它们背后都是资本主义零工经济对劳动者身体、时间和生活的系统性榨取。

这就要求党掌握解释权。平台会解释为个人选择，自由派会解释为监管不足，成功学会解释为不会平衡，修正主义会解释为新业态发展中的阵痛。党必须提出自己的解释：这是平台资本主义对社会化劳动成果的占有，是竞争作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外化对劳动者的强制，是资本主义异化在身体、情绪、人格和生活时间中的体现，是修正主义“灵活就业”叙事对去保障化劳动的美化。

党的第四项任务，是把经济诉求提升为政治诉求。零工劳动者当然有直接诉求：合理工时，收入保障，社保覆盖，职业健康保护，平台规则透明，反限流申诉机制，休息权，事故保障，劳动关系认定，集体谈判权。这些诉求必须支持，不能轻视。谁轻视劳动者的眼前利益，谁就不可能真正组织劳动者。

但是，党不能停留在这些直接诉求上。党必须指出：为什么工时会无限延长？为什么收入会如此不稳定？为什么平台规则不透明？为什么劳动者没有充分保障？为什么休息权总是被竞争破坏？为什么所谓自由职业最终变成资本摆脱责任的形式？这样，劳动者才能从“我要更多保障”进一步认识到“平台资本为什么能够剥夺保障”；从“我要合理规则”进一步认识到“谁掌握规则制定权”；从“我要休息”进一步认识到“为什么资本主义竞争惩罚休息”。

这就是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提升。不是抛弃经济诉求，而是通过经济诉求揭露资本主义关系；不是用抽象口号代替实际权益，而是把实际权益同阶级统治联系起来；不是只说“改善平台规则”，而是指出平台规则本身体现资本权力。党必须把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变成阶级教育的入口。

党的第五项任务，是把工会建设纳入党的领导之下。面对零工经济，工会当然有必要。没有工会或类似群众组织，劳动者就会更加分散，更难形成共同诉求。但是，工会不能成为独立政治中心，更不能停留在服务型、调解型、登记型组织。工会必须是党的附属群众组织，是党联系零工劳动者、组织群众、收集诉求、开展教育和培养骨干的工具。

如果工会不接受党的领导，它很容易被改良主义和服务主义吸收。它可能只会提供法律咨询、健康体检、休息站、心理关怀、节日慰问，却不敢揭露平台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它可能只会推动平台改善一点规则，却不敢指出平台规则本身是资本权力；它可能只会要求“关爱新业态劳动者”，却不敢组织劳动者反对去保障化劳动制度。这样的工会，最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缓冲器，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真正的工会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三项工作：第一，联系分散劳动者，把孤立账号变成有联系的群众；第二，围绕具体权益组织斗争，把劳动者的分散不满集中起来；第三，进行阶级教育，使劳动者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处境和资本主义根源。工会做群众工作，党掌握政治方向；工会组织直接诉求，党把握阶级路线；工会联系劳动者，党培养先进分子。

党的第六项任务，是从零工劳动者中发现和培养先进分子。每一个劳动群体中，都会有更有组织能力、更能联系群众、更能表达共同不满、更愿意承担责任的人。主播中会有这样的人，骑手中会有这样的人，司机和快递员中会有这样的人。党必须通过群众工作发现他们，教育他们，团结他们，使他们从个体维权者成长为阶级骨干。

先进分子不是天生完成的。他们可能一开始只是因为自己受苦而不满，只是因为某次事件而站出来，只是因为某个平台规则而愤怒。党要做的，就是把这种直接愤怒提升为理论认识，把个别经验提升为阶级经验，把临时积极分子培养为长期骨干。没有这一步，零工劳动者每一次斗争都会随着事件结束而消散；有了这一步，每一次斗争都可以留下组织、经验和干部。

党的第七项任务，是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自由派和改良主义倾向，只要求平台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政府加强监管、工会提供服务，却不触及平台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另一种是空洞激进倾向，只会高喊反资本口号，却不深入劳动者的具体生活，不关心收入、休息、社保、身体和平台规则这些现实问题。前者把斗争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后者则脱离群众实际。

马列毛主义路线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倾向。党要从劳动者的直接痛苦出发，但不能停留在直接痛苦；要支持具体权益斗争，但不能把斗争降格为权益服务；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但不能脱离劳动者当下最关心的问题。正确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分散的经验集中起来，经过理论提升，再回到群众中，成为群众自己的自觉行动。

党的第八项任务，是揭露修正主义“灵活就业”叙事。修正主义会继续把平台经济说成就业机会、数字经济、创业创新、社会活力。党必须指出：这种说法掩盖了劳动者去组织化、去保障化和异化劳动制度化。所谓灵活就业，如果不能保障劳动者休息、健康、收入和组织权，如果只是让资本更方便地逃避责任，那就不是解放，而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

党要把这一批判带入劳动者中。许多零工劳动者一开始也会相信自己是在创业、是在自由选择、是在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党不能简单嘲笑这种意识，而要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说明：为什么越努力越累？为什么越自由越没保障？为什么越经营账号越被账号捆住？为什么越竞争越没有生活？通过这种方式，劳动者才能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逐步摆脱出来。

党的第九项任务，是把分散的零工劳动同产业工人路线联系起来。零工劳动者不能替代产业工人阶级的核心地位，但也不能被排除在无产阶级政治工作之外。平台经济、物流体系、直播电商、外卖配送、网约车运输，都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化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必须既坚持产业工人路线，又把这些新型劳动群众纳入阶级工作范围。

特别是直播带货，并不是孤立的服务业活动，而是连接服装生产、供应链、仓储物流、平台技术、销售服务和消费市场社会化劳动节点。组织主播、骑手、司机、快递员等零工劳动者，不是背离产业工人路线，而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劳动结构的具体把握。党要把他们同更广泛的工人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而不是让他们被平台资本孤立起来。

党的第十项任务，是把异化的个体重新变成自觉的主体。资本主义异化让劳动者失去自己：身体属于商品展示，情绪属于销售转化，人格属于账号运营，时间属于平台活跃。党要做的，就是帮助劳动者重新认识自己不是商品机器，不是流量节点，不是孤立账号，而是有共同利益、有组织潜力、有历史地位的劳动群众。

这不是精神安慰，而是政治任务。劳动者只有在组织中，才能重新获得对自身处境的解释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突破资本强加的孤立；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把自己的痛苦上升为阶级斗争，把自己的劳动重新理解为社会力量。资本把人变成账号，党要把账号背后的人重新组织成阶级。

因此，这一部分可以这样收束：

平台资本把劳动者变成孤立账号，党要把他们重新组织为阶级力量；资本用竞争分裂劳动者，党要揭示他们共同受压迫的根源；资本把异化劳动说成自由职业，党要揭露这种自由背后的资本支配；资本把个人悲剧变成新闻碎片，党要把它转化为阶级教育材料。

这名主播倒在直播间里，不应只是让社会短暂叹息，而应成为组织零工劳动者的警钟。她的悲剧说明，劳动者如果继续作为孤立个体面对平台资本，就只能独自承担身体和生活的损耗；如果他们组织起来，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认识共同处境、提出共同诉求、形成共同力量，才可能真正反抗这种把人的身体、情绪和时间变成资本燃料的制度。

所以，党的任务不是旁观，不是哀悼之后遗忘，也不是把问题交给平台自律和官方服务。党的任务是进入这些劳动群众之中，解释他们的痛苦，组织他们的力量，培养他们的骨干，把经济诉求提升为政治斗争，把异化的个体重新塑造成自觉的阶级主体。只有这样，直播间里的劳动者才不会继续作为一个个孤立账号被资本吞噬，而能够作为有组织的劳动群众站起来反抗平台资本主义。

十三、结论：直播间是平台资本的新车间，异化劳动必须被组织起来反抗

这名女装带货主播在直播中突发疾病离世，不应被轻轻放进“个人悲剧”的抽屉里。她的倒下，固然首先是一个具体生命的逝去，是一个家庭的痛苦，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被生活和工作长期挤压后的悲剧；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同情和叹息，就会错过这件事所暴露出的深层阶级问题。她倒下的地方，不只是一个直播间，而是平台资本的新车间；她面对的，不只是镜头和商品，而是算法、流量、竞争、订单和资本增殖逻辑共同构成的劳动机器。

直播间看似没有厂房，没有流水线，没有传统监工，没有固定工时，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统治消失了。恰恰相反，资本统治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柔性、更加深入。过去的监工站在工人身后，今天的监工隐藏在后台数据里；过去的工时表挂在墙上，今天的劳动日被流量和订单无限延长；过去的资本家直接发号施令，今天资本家的命令变成算法推荐、账号权重、停留时长、转化率和同行竞争。老板似乎消失了，但资本无处不在。

零工经济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经济，而是资本家隐身为平台、算法、流量和竞争的经济。主播们看似分散在一个个直播间里，骑手分散在城市道路上，司机分散在车辆中，快递员分散在网点和街巷中；但这种空间上的分散，并不等于劳动关系上的自由。相反，他们都被纳入平台资本组织起来的社会化协作体系。平台掌握规则、数据、入口和分配权，劳动者承担身体、时间、情绪、收入和风险。劳动者是分散的，资本指挥却是集中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从许多劳动者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协作开始。今天的零工经济只是把这种协作从工厂车间中打散到手机、账号、直播间、道路和平台系统之中。协作没有消失，资本指挥没有消失，剥削也没有消失；消失的只是旧形式，出现的是更隐蔽的新形式。传统工厂把工人集中起来剥削，平台资本把劳动者分散开来剥削；传统资本通过厂规和监工组织劳动，平台资本通过算法和竞争组织劳动。

更重要的是，这种平台劳动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者越辛苦，平台越繁荣；主播越努力，账号和流量体系越强大；劳动者越把身体、情绪和生活时间投入直播间，越发现这些东西不再属于自己，而是作为平台数据、商品销量、粉丝关系和账号权重反过来统治自己。她创造了流量，却被流量追赶；她经营了账号，却被账号绑架；她促进商品流通，却被商品周转节奏吞噬；她通过劳动谋生，却在劳动中失去生活。

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异化规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自己越贫穷；物的世界越增值，人的世界越贬值。在直播带货中，这句话获得了新的现实形式。商品世界在直播间里膨胀，人的世界却在后台被压缩；平台交易额上升，劳动者的睡眠、健康和休息下降；数据越来越精细，劳动者越来越透明；账号越来越活跃，人越来越疲惫。资本主义所谓“新经济”，不过是旧异化的数字化升级。

所谓“她越辛苦，得到的越少”，不是一句简单的工资计算，而是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概括。她可能通过多播一场多卖一些货，但她失去的是身体、休息、时间、情绪和对生活的支配。她越拼命适应平台，平台越强；平台越强，她越必须适应平台。她越努力战胜竞争，竞争标准越被抬高；竞争越激烈，她越难停下。劳动者的努力不是自然通向解放，而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不断被转化为资本的力量。

这件事也暴露了所谓“自由职业”和“灵活就业”的虚伪。主播看似自己安排时间，实际上被流量和收入压力安排；看似自己经营账号，实际上被平台规则支配；看似自己当老板，实际上承担了工人、监工、客服、销售、运营和风险承受者的多重角色。所谓自由，变成资本摆脱责任的自由；所谓灵活，变成劳动者失去保障的灵活；所谓创业，变成资本把风险和损耗甩给个人的漂亮说法。

修正主义叙事最喜欢用“新业态”“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就业机会”来粉饰这一切。它只看见平台经济带来的交易额，看不见劳动者身体的损耗；只看见直播带货的热闹，看不见镜头背后的焦虑、熬夜、售后、退货和竞争；只看见少数头部主播的成功故事，看不见大多数中小主播的高压生存。它把去保障化说成灵活，把自我压迫说成奋斗，把异化劳动说成新机会。

但无产阶级立场必须拒绝这种叙事。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把劳动者推入无保障的市场竞争，再用“个人奋斗”包装他们的疲惫；不能让人的身体和情绪成为平台资本的燃料，再把平台繁荣称为社会进步；不能让劳动者越劳动越失去自己，再把这种状态说成自由选择。衡量一种经济形式是否进步，不是看商品卖得多快、平台增长多快、数据多漂亮，而是看劳动者是否真正掌握自己的劳动、时间、身体和生活。

因此，面对这样的事件，我们不能只呼吁“注意身体”。这句话当然没错，但它远远不够。问题不是劳动者不知道身体重要，而是资本主义劳动制度不断迫使劳动者把身体放在订单之后、流量之后、竞争之后、收入之后。我们也不能只说“平台应当更人性化”。平台资本的根本目的不是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流量、交易、利润和资本增殖。只要求平台人性化，而不揭露平台资本的阶级本质，就会把结构性压迫降格为管理问题。

更不能只满足于一般工会主义的解释。建立工会、争取保障、反映诉求当然必要，但如果工会脱离党的领导，只做登记、服务、慰问和调解，就无法突破平台资本的统治。工会必须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附属群众组织，是党联系零工劳动者、组织群众、培养骨干、开展阶级教育的工具。工会不能替代党，权益服务不能替代政治领导，经济诉求不能替代阶级斗争。

平台资本把劳动者变成孤立账号，党必须把他们重新组织为阶级力量；资本用竞争分裂劳动者，党必须揭示他们共同受压迫的根源；资本把异化劳动包装成自由职业，党必须揭露这种自由背后的实质从属；资本把个人悲剧变成短暂新闻，党必须把它转化为阶级教育材料。只有这样，零工劳动者才能从自责、孤立和互相竞争中走出来，认识到自己共同面对的是平台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这名主播的离世，应当成为一个警钟。它告诉我们：平台经济的光鲜外表之下，是劳动者身体和生活的持续消耗；零工经济的自由外衣之下，是资本责任的外包和劳动保障的拆除；直播间的热闹气氛之下，是人的世界被商品世界压倒的现实。一个人倒下了，平台还会继续运转，商品还会继续流通，流量还会继续分配，竞争还会继续加剧。资本不会因为个体的死亡而自动停止，除非劳动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反抗它。

所以，文章最终必须落到组织和斗争上。个体无法单独对抗平台资本，孤立账号无法改变流量规则，个人养生无法解决制度性过劳，平台自律无法取消资本增殖冲动。真正的出路，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把分散的主播、骑手、司机、快递员、客服、仓储工、生产工人和其他零工劳动者重新联系起来，把个体痛苦提升为阶级认识，把经济诉求提升为政治斗争，把被资本异化的社会劳动重新组织为劳动者自己的力量。

可以用这样一段收束全文：

直播间不是自由创业的舞台，而是平台资本的新车间；算法不是中立技术，而是资本命令的数字化形式；竞争不是自然规律，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外化为劳动者之间的互相压迫；灵活就业不是解放，而是资本责任外包和劳动保障拆除后的新奴役。她倒在直播间里，照出了一个残酷事实：劳动者越把生命投入商品世界，商品世界越作为异己力量反过来吞噬劳动者。面对这种异化劳动，不能只靠个人保重，不能只靠平台自律，不能只靠服务型工会。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把分散的零工劳动者组织起来，反对平台资本的统治，才能使劳动者不再作为孤立账号被流量吞噬，而重新成为有组织、有意识、有力量的阶级主体。

格瓦拉主义批判

一、格瓦拉主义的形成背景

要批判格瓦拉主义，首先必须说明一点：格瓦拉主义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反帝斗争高涨的历史环境中，尤其同古巴革命的胜利密切相关。正因为古巴革命在美帝国主义后院取得了胜利，格瓦拉及其游击战争经验才在拉丁美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古巴革命的胜利有其特殊历史条件。如果把这种特殊经验抽象成普遍革命道路，把古巴革命的某些局部经验提升为所有被压迫国家都应照搬的战略原则，就会从革命经验滑向经验主义，从反帝斗争滑向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

（1）古巴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

古巴革命爆发的背景，是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腐朽统治。

巴蒂斯塔政权依附于美帝国主义，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经济上维护美国资本和古巴买办阶级的利益。古巴表面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长期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成为美国资本在加勒比地区的重要据点。

当时的古巴社会存在尖锐矛盾：

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经济的控制；
巴蒂斯塔政权的腐败和高压统治；
城市群众对独裁的不满；
农村贫困和土地问题；
民族独立要求与反美情绪的增长。

在这种条件下，七二六运动发动武装斗争，并逐步在山区建立游击队。后来，游击战争、城市地下斗争、群众反独裁运动相互配合，最终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

但是必须指出：

古巴革命的胜利，并不是单纯由少数游击队“创造”出来的。

它能够胜利，是因为巴蒂斯塔政权已经极端腐朽，群众不满广泛存在，城市地下组织和农村游击斗争之间存在一定联系，美帝国主义在当时也并未直接进行全面军事干涉。

也就是说，古巴革命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条件。

如果脱离这些具体条件，只把古巴革命概括为“少数革命者上山打游击，最后唤醒群众并夺取政权”，这就不是科学总结，而是神话化。

（2）古巴经验被抽象化的问题

格瓦拉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就在于把古巴革命经验过度抽象化。

古巴革命确实证明了，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拉丁美洲，武装斗争有其重要意义。它也证明了，依附性独裁政权并非不可推翻。

但是，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一个革命经验能否成为普遍路线，不能只看它是否曾经成功过，而要看它是否正确揭示了革命的一般规律。

古巴革命的胜利，并不能自动证明“焦点理论”就是普遍真理。

因为不同国家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土地制度、民族矛盾、政权稳定性、群众组织基础、共产党力量、帝国主义干预方式，都存在巨大差异。

在一个国家成功的经验，如果被机械照搬到另一个国家，就可能变成灾难。

这正是主观主义的问题。

主观主义者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自己已经认可的模式出发。他们先认定“游击焦点可以创造革命条件”，然后再把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硬塞进这个公式里。

但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是：

具体分析具体情况。

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不是抄作业，不是把别国经验剪贴过来，而是要在阶级分析、群众调查和长期斗争中形成正确路线。

格瓦拉主义的问题，正在于它容易把一种特殊历史经验上升为普遍革命公式。

（3）“焦点理论”的基本内容

格瓦拉主义最核心理论，通常被称为“焦点理论”。

所谓“焦点”，就是认为少数坚定的革命者可以首先建立游击根据地，通过军事行动形成革命示范，逐步吸引群众加入，并由此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发展。

这一理论大致包含几个判断：

第一，不一定要等到所有客观条件成熟，革命者可以通过行动创造条件。

第二，少数革命先锋可以先行发动游击战争，以此点燃群众斗争。

第三，农村游击队可以成为革命的中心力量。

第四，军事行动可以推动政治觉醒和群众动员。

表面上看，这种理论非常激进，似乎强调革命者的主动性、勇气和牺牲精神。

但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看，它的危险也正在这里。

它把革命发动的重心，从党和群众转移到了少数游击队身上；把长期群众工作、阶级组织、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这些根本问题，简化为军事行动的扩散效果。

这就很容易导致一种错误认识：

似乎只要有一批坚定的人拿起武器，革命就可以被“点燃”。

但真正的革命不是点火表演。

革命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群众通过长期组织、斗争和政治觉悟提高而形成的历史运动。

游击战争本身并不是错误。

毛主义同样强调武装斗争，强调人民战争，强调农村根据地和革命武装。

但问题在于：

武装斗争必须服从政治路线，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战争必须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

如果脱离党、脱离群众、脱离阶级分析，单独强调少数游击队的能动性，那么武装斗争就会从人民战争滑向军事冒险主义。

（4）格瓦拉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

格瓦拉主义之所以有影响，并不只是因为古巴革命胜利了，也因为很符合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青年的心理状态。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真诚痛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也愿意牺牲，甚至非常勇敢。

但是，他们也容易产生几个问题：

关于我们：

我们是中国的一个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政党，于2024年7月4日在浙江杭州成立，我们的目标就是打倒中修社会帝国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组织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我们的官网：

<https://cpcmlofficial.com/>

订阅我们的报纸：

<https://t.me/CPCMarxismLeninism>

有意者可通过以下邮箱来申请加入我们（一旦审核通过，便会成为我们的成员）

投稿邮箱：cpcmlofficial@gmail.com

联系邮箱：CPCMLOfficial@proton.me

急于求成；
崇拜英雄行动；
轻视长期组织建设；
厌烦群众工作的复杂性；
希望通过少数人的果断行动迅速打开局面。

格瓦拉主义正好迎合了这种心理。

它把革命描绘成一种充满激情、牺牲、山地游击和英雄传奇的事业，却容易淡化革命中最艰苦、最枯燥、最长期的部分：

群众调查、组织建设、路线斗争、党内纪律、土地工作、阶级分析、根据地政权建设。

而真正的马列毛主义革命，恰恰不能绕开这些问题。

革命不是浪漫主义。

革命是一门科学。

它需要勇气，但不能只靠勇气；
它需要牺牲，但不能把牺牲本身神圣化；
它需要武装斗争，但不能把枪置于党和群众之上。

因此，批判格瓦拉主义，不是为了否定格瓦拉个人的反帝精神，而是为了指出：

如果把个人英雄主义、游击焦点和主观意志放在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之上，那么这种路线最终就会偏离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道路。

二、格瓦拉主义的核心错误之一：以游击队代替党

格瓦拉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真正解决党的领导问题。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立场来看，任何革命如果不能首先回答“由谁领导”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回答“如何革命”的问题。因为革命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也不是少数人的英勇牺牲，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取代旧社会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必须有明确的阶级领导、政治路线、组织原则和战略目标。

而这些东西，只能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承担。

（1）马列毛主义强调党的领导

列宁主义的核心贡献之一，就是建立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

列宁反复指出，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革命理论和革命组织的领导，就容易停留在工联主义、经济主义和改良主义层面。工会反抗资本家，会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但这种斗争本身并不会自动发展为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革命必须有党。

这个党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也不是松散的政治俱乐部，而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

毛泽东进一步把这一原则发展为：

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这句话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触及了革命路线的根本问题。

枪当然重要。没有革命武装，被压迫人民就无法对抗旧国家机器；没有武装斗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革命就无法真正夺取政权。

但枪不能成为革命的最高原则。

军队必须服从党的政治路线。武装斗争必须服务于群众发动、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新政权建设。否则，枪就会从革命工具变成独立力量，军事行动就会脱离政治领导。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主义人民战争从来不是“游击队主义”。

人民战争是党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是政治统帅军事的战争。

——

（2）格瓦拉主义模糊党与军队的关系

格瓦拉主义的问题，正在于它容易把游击队推到革命中心的位置上。

在“焦点理论”中，少数革命者可以先建立游击焦点，通过军事行动形成示范效应，再逐步吸引群众、扩大斗争、创造革命条件。

这个逻辑表面上很激进，但它实际上削弱了党的地位。

因为在这里，革命的出发点不是先建设一个扎根工农群众、具有明确阶级路线和组织纪律的共产党，而是先形成一支能够行动的游击队。

于是，游击队就容易取代党，军事行动就容易取代政治路线，少数人的英勇行动就容易取代群众的长期组织。

这样一来，革命就会出现几个危险倾向：

第一，军事主义。

革命问题被简化成军事问题，似乎只要打得起来、打得勇敢、打得有影响，就能够推动革命发展。但实际上，军事行动如果没有政治路线，就无法判断打击对象、斗争节奏、群众关系和战略方向。

第二，个人英雄主义。

格瓦拉主义很容易制造英雄神话，把革命理解为少数坚定者用牺牲精神唤醒人民。这种叙事很动人，但它会遮蔽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

第三，小集团主义。

如果游击队不是在党领导和群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容易变成少数人的封闭军事集团。它可能非常勇敢，也可能非常纯洁，但仍然难以承担领导整个社会革命的任务。

第四，路线问题被军事问题掩盖。

一个组织可以很能打，但路线仍然可能是错误的。能打不等于正确，牺牲不等于科学，勇敢不等于无产阶级领导。

这正是格瓦拉主义最容易迷惑人的地方。

(3) 没有党，就没有稳定的革命方向

革命最怕的，不只是敌人的镇压，也包括自身路线不清。

没有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就很难保持稳定方向。

因为革命过程中会不断出现复杂问题：

谁是主要敌人？

谁是可以联合的对象？

土地问题如何解决？

如何建立根据地政权？

如何处理民族资产阶级？

如何对待城市小资产阶级？

如何组织工人阶级？

如何防止军队脱离群众？

如何进行路线斗争？

如何防止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

这些问题不可能靠游击队的勇气来回答。

它们需要阶级分析，需要理论路线，需要民主集中制，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需要长期的组织积累。

也就是说，它们需要党。

没有党，武装斗争很容易陷入两种结局。

一种是失败：因为群众基础不足，敌人一围剿，游击队就被孤立、消耗、消灭。

另一种是变质：即使武装力量扩大了，也可能形成军事集团或民族主义集团，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

这也是为什么马列毛主义必须强调党的领导。

共产党不是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而是革命的司令部。

(4) 毛主义人民战争不是格瓦拉式游击主义

必须特别强调：

批判格瓦拉主义，不是批判武装斗争，也不是批判游击战争本身。

恰恰相反，马列毛主义坚持武装斗争，尤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坚持人民战争是革命的基本道路。

但毛主义人民战争和格瓦拉主义游击焦点论有根本区别。

毛主义人民战争的基础是：

共产党领导；
群众路线；
土地革命；
根据地建设；
革命政权建设；
统一战线；
持久战略；
政治统帅军事。

而格瓦拉主义倾向于强调：

少数革命者先行动；
游击焦点创造条件；
军事行动唤醒群众；
主观意志推动革命形势。

两者看起来都谈游击战争，但实质完全不同。

毛主义的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一部分；
格瓦拉主义的游击战争，则容易变成少数先锋的军事示范。

毛主义强调群众是战争的主体；
格瓦拉主义容易把群众放在被唤醒、被带动的位置上。

毛主义强调党指挥枪；
格瓦拉主义容易让枪成为革命的中心。

这就是根本区别。

（5）以游击队代替党的后果

如果一个革命运动长期以游击队代替党，就会产生严重后果。

首先，政治路线会贫弱化。

组织可能非常强调战斗、牺牲和纪律，却缺乏对社会阶级结构、革命阶段、群众利益和未来政权形式的系统分析。

其次，群众工作会表面化。

群众可能支持游击队，甚至保护游击队，但这不等于群众已经被真正组织起来。真正的群众路线，不只是获得群众同情，而是让群众通过组织、斗争和政权建设成为革命主体。

再次，革命容易军事化。

军事行动一旦成为中心，组织内部就容易形成命令主义、冒险主义和对政治讨论的不耐烦。路线斗争会被视为“拖后腿”，群众意见会被视为“不够坚决”，最后革命组织就可能脱离群众。

最后，失败以后容易造成悲观主义。

因为格瓦拉主义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人的牺牲和主动行动上，一旦这些行动失败，就容易出现“人民没有觉醒”“群众不配革命”之类的错误情绪。实际上，问题不是群众不行，而是路线不对。

马列毛主义从不把失败归咎于群众。

真正的共产党必须首先检查自己的路线、组织和群众工作。

（6）小结：革命必须有司令部

因此，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看，格瓦拉主义以游击队代替党的倾向，是其根本路线错误之一。

它不是“不够勇敢”，而是不够科学。

革命当然需要勇敢的人，但更需要正确路线；
革命当然需要枪，但枪必须服从党；
革命当然需要先锋，但先锋必须扎根群众；
革命当然需要行动，但行动必须服从战略。

真正的革命不是少数游击者替人民创造历史，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

一句话：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战争；没有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就会滑向军事冒险主义。

三、格瓦拉主义的核心错误之二：以少数英雄代替群众路线

格瓦拉主义的第二个核心错误，是它在革命主体问题上发生了偏移。

它并不是完全否认群众的重要性。格瓦拉本人也讲人民、讲反帝、讲被压迫者。但是，在其革命战略中，群众往往不是作为已经组织起来的历史主体出现，而是作为被少数游击队“唤醒”“带动”“点燃”的对象出现。

这就和毛主义的群众路线发生了根本区别。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的立场看，革命的主体不是少数英雄，而是人民群众。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作用，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武装群众、领导群众，而不是代替群众完成革命。

（1）毛主义的根本是群众路线

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把群众路线发展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所谓群众路线，不是简单地说“群众重要”，也不是把群众当成宣传对象，更不是革命组织单方面对群众发号施令。

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意味着，共产党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真实处境、真实要求和真实经验，把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认识集中起来，上升为路线、政策和口号，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能够理解、接受、掌握，并在斗争中加以实践。

所以，群众路线包含几个关键环节：

深入群众；
调查研究；
总结群众经验；
提出正确路线；
回到群众中宣传、组织和实践；
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路线。

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革命方法。

它反对两种错误：

第一，反对尾巴主义。

即群众暂时想到哪里，党就跟到哪里；群众暂时落后，党就迎合落后；群众只提出经济要求，党就不敢讲政治斗争。

第二，反对命令主义。

即党脱离群众实际，不做调查研究，只凭少数人的主观愿望强迫群众接受某种路线。

真正的毛主义群众路线，既不是跪拜群众自发性，也不是少数人代替群众，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把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组织起来、提高起来、集中起来。

这和格瓦拉主义的焦点理论有明显区别。

（2）格瓦拉主义的英雄主义倾向

格瓦拉主义最吸引人的地方，恰恰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

它极富英雄主义色彩。

少数坚定革命者进入山区，拿起武器，坚持战斗，用自己的牺牲精神震动社会，唤醒沉睡的人民，最终推动革命高潮到来。

这种叙事非常有感染力。

它容易激发青年人的反抗激情，也容易让人相信：只要有足够勇敢、足够纯洁、足够坚定的革命者，就可以突破一切困难。

但是，革命不能建立在英雄主义叙事上。

英雄主义可以鼓舞人，但不能代替阶级分析；
牺牲精神可以感动人，但不能代替群众组织；
个人勇敢可以打开局部局面，但不能代替长期政治路线。

格瓦拉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它容易把革命的中心放在少数先进分子的行动上，而不是放在广大群众的组织化斗争上。

于是，群众就被放到了一个被动位置：

群众似乎需要被游击队唤醒；
群众似乎需要被战斗示范感动；
群众似乎需要少数人先用鲜血证明革命可能性，然后才会加入。

这种理解，表面上尊重群众，实际上低估了群众。

因为群众并不是等待外部火种点燃的干柴。群众有自己的斗争经验、阶级矛盾、组织需求和政治成长过程。

如果革命者不能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而只是希望通过少数人的战斗行动来“震动群众”，那就很容易变成用主观激情代替群众工作。

（3）群众不是被“点燃”的柴火

从毛主义立场看，群众不是被动材料，而是历史创造者。

革命不是少数人把火扔进群众之中，群众就自动燃烧起来。群众能不能起来，取决于现实阶级矛盾的发展，也取决于革命组织是否能够把群众真实利益和革命目标结合起来。

比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民为什么参加革命？

不是因为他们看见几个游击队员很勇敢，就被感动了。

更根本的是：

他们被地主压迫；

他们没有土地；

他们被高利贷剥削；

他们被军警和地方恶霸欺压；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反抗的需求。

共产党要做的，是把这些分散的痛苦和不满组织成阶级斗争，把个别反抗提升为集体斗争，把经济要求提升为政治革命。

这需要大量艰苦工作：

土地调查；

阶级划分；

农民协会建设；

政治教育；

地方政权建设；

群众武装；

生产组织；

纪律建设；

文化宣传；

反奸防特；

处理群众内部矛盾。

这些工作没有英雄传奇那么浪漫，但它们才是革命真正的根基。

没有这些基础，游击队可能暂时存在，却很难变成真正的人民战争。

（4）脱离群众的武装斗争会走向孤立

武装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就会出现一个致命问题：

它会被敌人孤立。

旧国家机器拥有军队、警察、情报系统、交通网络、财政资源和宣传机器。少数游击队如果没有群众保护，没有群众情报，没有群众供给，没有群众政治支持，就很容易被围剿、分割、消灭。

毛泽东讲人民战争，核心不是“游击队会打仗”，而是军队和人民群众结合成一个整体。

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的海洋。

没有这个海洋，游击队就会变成离水之鱼。

格瓦拉主义则容易低估这一点。

它强调游击队本身的示范力量，却容易忽视群众基础形成的长期过程。结果就是，革命者可能非常英勇，但周围群众还没有被充分组织起来，政治条件还没有成熟，阶级力量还没有凝聚，敌人一来，游击队就陷入孤立。

这不是勇气问题，而是路线问题。

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最常见的悲剧，就是把牺牲当作路线正确的证明。

但牺牲不能证明路线正确。

错误路线下的牺牲，只能说明革命者勇敢，不能说明革命道路科学。

（5）群众路线与自发性的区别

这里还必须说清楚一个问题：

批判格瓦拉主义，不是说群众自发性天然正确。

毛主义不是民粹主义。共产党不能把群众当前的所有想法都当成真理。

群众在旧社会中生活，当然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宗教思想、家族观念、地方主义、保守意识和各种落后习惯影响。

所以党必须领导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

但是，这种领导不能脱离群众实际，更不能由少数人代替群众行动。

正确的关系应该是：

党领导群众，但党必须从群众实践中汲取力量；
党提高群众，但党必须理解群众的现实处境；
党组织群众，但党不能把群众当成被动工具；
党发动战争，但战争必须成为人民自己的战争。

这就是毛主义群众路线和格瓦拉主义英雄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别。

——

（6）格瓦拉主义为什么容易吸引小资产阶级青年

格瓦拉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吸引力，尤其容易吸引小资产阶级青年，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非常直接的革命想象：

不必长期扎根群众；
不必长期做基层组织；
不必忍受复杂的群众矛盾；
不必一点一点建设党；
不必长期进行路线斗争；

只要一批坚定的人拿起武器，就能用行动改变历史。

这种想象对痛恨现实、急于行动的人来说，非常有诱惑力。

但革命恰恰不能被急躁情绪支配。

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的特点，就是受不了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它希望迅速突破，希望用一次行动解决长期矛盾，希望用个人意志压倒客观条件。

这在精神上可能很激烈，在政治上却往往很脆弱。

一旦现实没有按想象发展，群众没有迅速响应，敌人镇压比预期更强，斗争进入低潮，这种急性病就容易转向悲观主义，甚至转向投降主义。

所以，毛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也反对“左”倾冒险主义。

两者看似相反，实际上都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唯物主义。

——

（7）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属于群众

马列毛主义并不否认英雄。

革命当然需要英雄，当然需要牺牲，当然需要敢于斗争的人。

但是，真正的革命英雄主义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群众英雄主义。

个人可以英勇牺牲，但只有群众组织起来，革命才有历史力量。

个人可以打响枪声，但只有群众成为战争主体，枪声才不会变成孤立回响。

个人可以鼓舞一时，但只有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组织、政权和武装，革命才能持续。

因此，毛主义所讲的英雄，不是站在群众之上的英雄，而是从群众中产生、服务群众、服从党的路线、融入人民战争的英雄。

这和格瓦拉主义的英雄叙事有本质区别。

格瓦拉主义容易把革命塑造成少数人的史诗；
毛主义则把革命理解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长期过程。

——

（8）小结：群众路线是革命的生命线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看，格瓦拉主义以少数英雄代替群众路线，是其第二个根本错误。

它的问题不是不反帝，也不是没有牺牲精神，而是没有真正把群众作为革命主体来理解。

革命不能靠少数人替群众完成。
革命不能靠英雄主义替代群众组织。
革命不能靠军事示范替代阶级发动。
革命不能靠感动群众替代组织群众。

真正的革命必须回到群众路线：

深入群众，调查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武装群众，使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

一句话：

人民群众不是革命的观众，而是革命的主人；共产党不是替人民革命，而是领导人民自己革命。

四、格瓦拉主义的核心错误之三：主观主义地理解革命形势

格瓦拉主义的第三个核心错误，是它对革命形势的理解带有明显主观主义倾向。

它强调革命者的意志、行动和牺牲精神，认为少数革命者可以通过建立游击焦点来“创造革命条件”。这种说法看似主动、进取、反对等待主义，但如果脱离群众基础、阶级分析和客观形势，就会滑向冒险主义。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看，革命既不是消极等待，也不是主观蛮干。革命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矛盾、阶级力量、群众觉悟、组织基础和敌我关系的科学分析之上。

——

（1）革命形势不能由少数人任意创造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唯物主义。

这意味着，革命不是由少数人的愿望直接决定的，也不是由一批人的勇气凭空制造出来的。

革命形势的形成，必须有其客观基础：

统治阶级内部危机加深；
被压迫阶级生活状况恶化；
旧制度无法照旧维持；
群众不愿照旧生活；
革命组织具备一定领导能力；
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
群众斗争从分散走向集中。

列宁曾经强调，革命形势的出现，并不是革命者主观宣布出来的。只有当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被压迫阶级不愿照旧生活、群众行动显著增强时，革命才真正进入尖锐阶段。

这并不是说革命者只能被动等待。

恰恰相反，革命党必须积极工作，长期组织群众，发展斗争，积累力量，推动矛盾发展。

但这种主动性，必须建立在客观条件之上。

如果离开客观条件，只凭少数人的意志去“制造革命”，那就不是革命主动性，而是主观主义。

格瓦拉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它容易把革命者的主动行动夸大为革命形势的决定性因素，似乎只要有少数人率先行动，群众就会被唤醒，局势就会被推动，革命就会展开。

这种思路，实际上低估了革命的复杂性。

——

（2）“创造革命条件”的片面性

格瓦拉主义常常强调：

革命者不必等待所有条件成熟，而可以通过武装行动创造革命条件。

这句话有合理的一面。

如果理解为反对消极等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那当然是有意义的。革命党不能等到所有条件完美成熟才行动，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完美条件”。革命者必须通过斗争改变条件，而不是坐等条件自动成熟。

但是，问题在于：

改变条件，不等于任意创造条件。

主观能动性必须通过现实的阶级关系发挥作用，而不是凌驾于现实之上。

共产党可以通过宣传、组织、斗争、罢工、农民运动、政治教育和群众工作来推动形势发展；但如果把少数军事行动看作创造条件的主要方式，就容易犯严重错误。

因为群众是否响应，不取决于游击队是否英勇，而取决于群众自身的阶级处境是否被组织起来、群众利益是否与革命路线结合起来、群众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

没有这些基础，军事行动可能制造震动，却不一定能够制造革命。

甚至有时，它还可能给敌人提供镇压借口，使群众组织在尚未成熟时遭到破坏。

这就是冒险主义的典型危险。

它不是没有行动，而是行动脱离了群众基础和战略节奏。

——

（3）主观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急性病

格瓦拉主义的主观主义，背后有深刻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

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往往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牺牲精神。他们看到压迫，感到愤怒；看到人民受苦，急于改变现实。这种情感本身并不是坏事。

但是，如果这种情感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所改造，就容易变成急性病。

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的特点是：

厌恶长期积累；
不耐烦群众工作的复杂性；
急于看到结果；
崇拜突击行动；
高估主观意志；
低估敌人力量；
低估群众组织所需时间。

这种思想往往看不起“慢工作”。

它觉得调查研究太慢，基层组织太慢，政治教育太慢，党内路线斗争太慢，群众觉悟提高太慢。

于是，它就把希望寄托在一次震撼性的行动上，幻想通过少数人的牺牲迅速打开局面。

但革命不是戏剧。

革命不是靠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把历史突然推向高潮，而是长期矛盾积累、群众组织成长、阶级力量变化和正确路线坚持的结果。

（4）毛主义的主动性不是冒险主义

这里必须区分两种“主动性”。

一种是毛主义的革命主动性。

它要求共产党积极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斗争中积累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它不是等待主义，而是长期主义、群众主义、唯物主义。

另一种是格瓦拉主义式的主观主动性。

它容易把少数人的行动当作革命形势的发动机，把勇气当作条件，把牺牲当作路线，把军事行动当作群众觉醒的主要来源。

这两者完全不同。

毛主义的主动性表现为：

在群众中长期扎根；
根据实际条件确定斗争形式；
通过阶级斗争提高群众觉悟；
通过组织建设积累力量；
通过根据地建设形成新政权萌芽；
通过持久斗争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格瓦拉主义的主动性则容易表现为：

先建立小规模军事焦点；
通过战斗制造政治影响；
期待群众受到鼓舞后加入；
以少数人的牺牲推动形势升温。

前者是唯物主义的主动性；
后者则容易滑向主观主义的冒险性。

（5）持久人民战争不是“慢”，而是科学

有些人批评毛主义人民战争“太慢”，认为格瓦拉主义更直接、更有激情、更能迅速打破局面。

这种看法本身就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急躁性。

持久人民战争之所以“持久”，不是因为革命者胆小，也不是因为革命者缺乏行动力，而是因为革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敌强我弱的局面不是靠一句口号改变的。
群众组织不是靠一次行动建立的。
政权建设不是靠激情完成的。
阶级觉悟不是靠震撼自动生成的。

人民战争的“持久”，恰恰是为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它通过长期斗争，使群众从分散走向组织，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受压迫者变成革命主体。

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力量逐步发展，敌人力量逐步削弱，局部政权逐步形成，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斗争逐步结合。

这不是拖延，而是科学。

(6) 错误路线下的牺牲不能证明路线正确

批判格瓦拉主义时，还必须指出一个常见误区：

很多人认为，格瓦拉及其追随者敢于牺牲，所以他们的路线就一定具有革命性。

这是把道德评价和路线评价混在一起。

一个人勇敢，不等于其路线正确；
一个人牺牲，不等于其战略科学；
一个人反帝，不等于其理论完整；
一个人真诚，不等于其政治路线符合无产阶级利益。

马克思主义评价一条路线，不能只看它是否激进、是否感人、是否悲壮，而要看它是否正确解决了：

阶级领导问题；
群众路线问题；
党军关系问题；
革命阶段问题；
国家政权问题；
长期战略问题；
反修正主义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再大的牺牲也不能弥补路线错误。

革命不是献祭。

革命的目的不是制造烈士，而是组织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

(7) 反对等待主义，也反对冒险主义

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右倾等待主义当然是错误的。

有些人总说“条件不成熟”，以此为借口不组织、不斗争、不宣传、不建设党，最后把自己变成合法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附庸。

这种路线必须反对。

但是，反对等待主义，不等于拥护冒险主义。

“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等待主义，看似相反，实际上都不是科学路线。

右倾等待主义的问题是：
看见困难，就不敢行动。

“左”倾冒险主义的问题是：
看不见困难，就盲目行动。

前者低估主观能动性；
后者夸大主观能动性。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路线，是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革命主动性。

它既不等待历史自动成熟，也不幻想少数人凭意志创造历史，而是通过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把客观矛盾转化为现实革命力量。

(8) 小结：革命必须服从客观规律

格瓦拉主义主观主义地理解革命形势，是它走向冒险主义的重要根源。

它的问题不在于重视行动，而在于把行动同群众基础、阶级分析和党的建设割裂开来；不在于强调主动性，而在于把主动性理解成少数人的军事示范；不在于反对等待，而在于把反等待变成反唯物主义。

真正的革命路线必须坚持：

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政治路线与斗争形式的统一；
长期积累与关键突破的统一；
革命勇气与科学分析的统一。

一句话：

革命不能靠主观意志凭空制造，革命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把群众中已经存在的阶级矛盾组织成自觉的历史力量。

五、格瓦拉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急性病

格瓦拉主义之所以必须被批判，不只是因为它在理论上存在偏差，更因为它在实践中很容易表现为小资产阶级急性病。

这种急性病，表面上十分革命，甚至比许多改良主义者更勇敢、更激进、更愿意牺牲；但它的问题恰恰在于：它用激情代替科学，用主观愿望代替阶级分析，用少数人的冒险行动代替群众的长期组织。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看，革命必须既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也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二者看似方向相反，实质上都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现实、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路线。

（1）小资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

小资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并不是简单的“热血”或“勇敢”。

它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心理。

这种心理通常来自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城市青年以及部分脱离生产斗争的激进分子。他们往往真诚痛恨压迫，也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独裁、反对剥削，甚至愿意为革命牺牲生命。

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位置和生活经验，他们也容易产生一些问题：

急于求成；
崇拜英雄；
厌恶长期群众工作；
不耐烦组织建设；
轻视阶级分析；
把个人意志看得过高；
把牺牲精神看成路线正确的证明。

这种倾向在格瓦拉主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格瓦拉主义的叙事中，革命常常呈现为一幅浪漫图景：

少数坚定者进入山林，背负武器，过艰苦生活，在敌人围剿下坚持战斗，用自己的牺牲唤醒人民，最终把革命火焰扩散到全国。

这种图景很有感染力。

但革命不能被浪漫图景支配。

真正的革命，并不总是壮烈的冲锋和枪声。更多时候，它表现为艰苦、重复、细致、缓慢甚至枯燥的工作：

发展组织；
教育群众；
写传单；
开会议；
做调查；
处理矛盾；
建立纪律；

纠正错误；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群众中一点点积累信任。

这些工作没有英雄主义叙事那么耀眼，却是革命真正的基础。

小资产阶级急性病最容易轻视的，正是这些基础工作。

（2）冒险主义的典型逻辑

格瓦拉主义容易导致冒险主义。

所谓冒险主义，不是说革命者“敢冒险”就是错误。革命本身当然充满危险。任何真正反对旧制度的斗争，都不可能完全安全。

问题在于：

冒险主义不是勇敢，而是脱离条件的盲动。

它通常有这样一种逻辑：

第一，现实太黑暗，必须立刻行动。

第二，群众暂时还没有起来，所以需要少数人先行动。

第三，只要少数人打响第一枪，群众就会被唤醒。

第四，只要我们足够坚定，敌人的优势就可以被意志突破。

第五，即使失败，也能用牺牲证明革命精神。

这套逻辑看似激烈，实际上有严重问题。

它没有真正回答：

群众为什么会响应？
群众如何被组织起来？
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何同革命路线结合？
党在哪里？
阶级分析在哪里？
根据地在哪里？
革命政权的萌芽在哪里？
失败之后群众组织会不会被敌人摧毁？
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改变？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所谓“行动”就很可能变成孤立行动。

冒险主义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它把“敢不敢”代替了“对不对”。

但马列毛主义不是单纯问敢不敢，而是要问：

路线是否正确？
群众是否发动？
组织是否稳固？
战略是否清楚？
敌我力量是否被科学估计？

（3）“左”倾冒险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可以互相转化

从表面上看，“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完全相反。

右倾机会主义说：不要急，条件不成熟，先合法斗争，先议会斗争，先等待变化。

“左”倾冒险主义说：不能等，马上打，马上行动，马上突破。

但从辩证法来看，二者往往可以互相转化。

为什么？

因为它们都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群众路线和阶级分析之上。

“左”倾冒险主义在高涨时极端激进，认为只要少数人行动就能改变历史；一旦遭受挫折，群众没有迅速响应，组织遭到打击，它又很容易迅速滑向悲观主义。

这种悲观主义继续发展，就可能变成右倾投降主义：

既然行动失败了，那就说明革命不可能；
既然群众没有起来，那就说明群众落后；
既然武装斗争失败了，那就不如改良；
既然革命太难，那就回到议会、NGO和合法主义。

所以，“左”倾冒险主义并不稳定。

它看似最激进，实际却可能为右倾投降主义准备心理基础。

真正坚定的革命路线，不是这种忽左忽右的摇摆，而是长期坚持群众路线、党的建设和人民战争的科学路线。

（4）格瓦拉主义为什么容易制造失败主义

格瓦拉主义如果失败，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误解释：

不是路线错了，而是群众不够觉悟。

这种解释非常危险。

因为它把失败责任推给群众。

少数革命者去行动，群众没有立刻响应，于是他们就认为群众麻木、落后、胆小、没有革命精神。

但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反群众路线的。

群众不是天然就会按照革命者的主观设想行动。群众需要通过现实利益、组织过程和政治教育逐步成长。群众是否行动，取决于他们是否被真正组织起来，取决于革命路线是否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取决于他们是否看到斗争的现实可能性。

如果革命者没有深入群众，没有建立组织，没有形成稳定政治领导，只是希望通过少数人的行动来唤醒群众，那么群众没有响应，并不是群众的罪过，而是革命者路线的问题。

真正的共产党在失败之后，首先要总结自己的错误，而不是抱怨群众。

毛主义要求共产党人向群众学习，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上指责群众。

（5）小资产阶级急性病轻视党的长期建设

革命最难的事情之一，不是喊口号，也不是一次行动，而是长期建设党。

建设党意味着：

建立政治路线；
培养干部；
建立纪律；
发展组织；
进行路线斗争；
反对自由主义；
反对宗派主义；

防止特务渗透；
深入群众；
形成稳定领导核心；
保持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

这些工作极其艰苦。

它没有浪漫主义色彩，也不容易立刻看到成果。

但没有这些工作，革命就没有司令部。

格瓦拉主义容易轻视这一点。它把游击队的建立看得过重，把共产党的建设看得不足。结果就是，革命可能有武装小组，有牺牲精神，有反帝口号，却缺乏无产阶级政党所必须具备的长期政治领导能力。

而从列宁主义到毛主义，党的建设始终是革命的中心问题之一。

没有党，就没有真正的革命方向；
没有党，就没有群众斗争的集中；
没有党，就没有人民战争的政治统帅；
没有党，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

（6）小资产阶级急性病轻视群众的复杂性

群众不是抽象的“人民”二字。

群众内部有差别，有矛盾，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有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关系。

真正的群众工作，必须面对这些复杂性。

比如在农村，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间关系不同；在城市，产业工人、服务业工人、小店主、学生、失业者、知识分子之间情况不同；在民族地区，阶级矛盾还可能同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

如果不做具体分析，就不可能制定正确政策。

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往往不愿意处理这些复杂问题。

它喜欢简单化：

人民都是好的，敌人都是坏的；
只要打响斗争，人民自然会跟上；
只要革命者牺牲，群众自然会觉醒。

这种简单化看似激进，实际却是对群众现实生活的粗暴处理。

毛主义之所以强调调查研究，正是因为革命必须从实际出发。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群众调查，就没有群众路线。

（7）真正的革命坚决性，不是急躁

这里必须区分“坚决性”和“急躁性”。

真正的革命坚决性，是长期坚持正确路线，不因困难而动摇，不因低潮而投降，不因暂时失败而放弃群众。

而小资产阶级急躁性，是急于求成、急于证明自己、急于通过一场行动显示革命性。

两者完全不同。

坚决性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
急躁性是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表现。

坚决性能够承受长期斗争；
急躁性只追求短期爆发。

坚决性建立在科学分析上；
急躁性建立在主观愿望上。

坚决性会认真组织群众；
急躁性会嫌群众太慢。

坚决性会重视党的纪律；
急躁性会嫌组织太束缚。

所以，批判格瓦拉主义，不是批判革命坚决性，而是批判小资产阶级急躁性。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既有坚定意志，又有科学头脑；既敢斗争，又懂得长期建设；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

（8）马列毛主义反对两种错误路线

从马列毛主义立场看，革命路线必须同时反对两种错误。

第一，右倾投降主义。

它表现为：

放弃革命；
迷信议会；
害怕国家机器；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把群众斗争限制在合法范围内；
把共产党变成改良主义组织。

第二，“左”倾冒险主义。

它表现为：

脱离群众；
轻视党的建设；
盲目行动；
高估主观意志；
把少数人的牺牲当成革命中心；
用军事行动代替政治路线。

真正的革命路线，必须反对这两者。

它既不是缩在合法主义里等待，也不是脱离群众去冒险；既不是议会主义，也不是游击队主义；既不是尾巴主义，也不是命令主义。

真正的路线是：

在共产党领导下，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长期阶级斗争，并根据具体条件采取正确斗争形式。

（9）小结：革命不是小资产阶级激情的投射

格瓦拉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革命热情，而在于它把革命热情放在了不科学的路线之上。

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看似猛烈，实际上经不起长期斗争考验；看似英勇，实际上容易轻视群众；看似反对投降主义，实际上可能在失败后滑向另一种投降主义。

因此，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看，必须明确指出：

革命不是小资产阶级激情的投射。

革命不是英雄主义的舞台。

革命不是用牺牲来证明纯洁性的仪式。

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科学实践。

一句话：

真正的革命精神，不是急于燃烧自己，而是长期扎根群众，把人民组织成能够推翻旧世界的历史力量。

六、格瓦拉主义与毛主义人民战争的根本区别

批判格瓦拉主义，最重要的不是停留在“格瓦拉失败了”这种表面结论上，而是要从路线高度说明：格瓦拉主义与毛主义人民战争虽然都讲武装斗争、农村游击、反帝革命，但二者在阶级主体、组织原则、战略基础和政治路线方面存在根本区别。

如果只看到二者都使用游击战争形式，而看不到背后的路线差异，就会把毛主义人民战争庸俗化为一般游击主义，甚至把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根据地建设和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全部抽空。

这正是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

（1）主体不同：少数游击队，还是人民群众

格瓦拉主义的革命主体，容易在实践上落到少数游击队身上。

它相信少数坚定革命者可以先建立游击焦点，通过战斗制造影响，带动群众觉醒，最终把革命形势扩展开来。这里群众当然不是被完全否定的，但群众往往处于“被唤醒”“被鼓舞”“被吸引”的位置。

也就是说，革命的发动中心是游击队。

而毛主义人民战争则不同。

毛主义认为，革命战争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武装工具，而群众才是战争最深厚的基础。

毛泽东讲人民战争，核心不在于“少数人上山打游击”，而在于把群众组织起来，使战争成为群众自己的战争。

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差别：

格瓦拉主义容易把群众理解为被游击队点燃的对象；
毛主义则把群众理解为革命战争的主体。

在毛主义那里，人民不是游击队的背景，不是革命英雄的观众，不是等待被唤醒的沉睡者，而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2）领导不同：游击焦点中心，还是共产党领导

第二个根本区别，是领导问题。

格瓦拉主义的焦点理论中，游击队往往成为革命的中心。革命路线、政治影响和群众动员，都围绕这个军事焦点展开。

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倾向：

军事中心压倒政治中心。

游击队越是承担革命发动的主要任务，党建设就越容易被弱化；战斗越是成为主要证明方式，政治路线和群众组织就越容易退居其次。

而毛主义人民战争的根本原则是：

党指挥枪。

不是枪创造党，不是游击队代替党，不是军事行动决定路线，而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服从党的政治任务。

在毛主义人民战争中，军队首先是政治工具。它不是单纯作战机器，而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

如果离开党的领导，枪就可能变成军事主义工具；
如果离开政治路线，战争就可能变成单纯暴力行动；
如果离开群众路线，军队就会从人民军队变成孤立武装。

因此，毛主义人民战争和格瓦拉主义的区别，不是有没有枪的问题，而是谁领导枪的问题。

（3）基础不同：军事示范，还是群众组织与土地革命

格瓦拉主义强调游击焦点的示范作用。

它认为，少数游击队通过军事行动，可以向群众证明革命是可能的，从而推动群众加入斗争。

但毛主义人民战争的基础，不是单纯军事示范，而是群众组织和土地革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民为什么参加革命？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被某次战斗感动，而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地主、买办、官僚和反动国家机器的压迫。

他们需要土地，需要生存，需要尊严，需要摆脱封建剥削和国家暴力。

共产党必须把这些现实利益组织成革命斗争。

因此，毛主义人民战争必须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

土地革命不是附属品，而是发动农民群众的根本环节。没有土地斗争，农村根据地就缺乏阶级内容；没有农民组织，游击战争就缺乏群众基础；没有群众政权，武装斗争就不能转化为新社会的萌芽。

格瓦拉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容易把军事行动放到土地革命和群众组织之前。

毛主义则相反：

军事斗争必须扎根于群众利益之中，必须服务于土地革命、群众组织和政权建设。

（4）根据地不同：临时游击区，还是新政权萌芽

格瓦拉主义也讲山区、讲游击区、讲农村斗争。

但它往往更强调游击队活动区域，而不是根据地政权建设。

毛主义人民战争所讲的根据地，不只是军队可以活动的区域，而是新政权的萌芽。

根据地意味着：

群众被组织起来；
土地问题开始解决；
反动政权被削弱或清除；
革命政权开始建立；
群众武装得到发展；
生产、教育、文化、治安、司法等新社会因素逐步出现；
党、军队、群众组织形成统一的革命结构。

这就说明，毛主义根据地不是军事藏身处，而是革命政权的初级形态。

游击队如果只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者只是在山区保持军事存在，而不能建立群众政权，就难以形成真正的人民战争。

格瓦拉主义容易停留在“游击队存在”这个层面；
毛主义则要求建立能够长期生长的新政权基础。

这是本质区别。

——

（5）战略不同：焦点扩散，还是持久人民战争

格瓦拉主义的战略倾向，是从一个或几个游击焦点出发，通过战斗影响群众，形成扩散效应，推动全国革命局势升温。

这种战略很容易带有突击性。

它希望通过少数核心力量的行动，使革命从局部迅速走向全国。

而毛主义人民战争则强调持久性。

为什么要持久？

因为在革命初期，敌强我弱是基本现实。反动国家掌握军队、警察、财政、交通、宣传、外交和行政机器。革命力量不可能一开始就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

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从分散到集中；
从游击战争到运动战；
从局部政权到全国政权；
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

这个过程不是主观拖延，而是客观规律。

持久人民战争通过长期斗争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而不是幻想通过几个焦点迅速引爆全国形势。

格瓦拉主义容易高估革命扩散速度；
毛主义则强调根据实际力量逐步发展。

前者更像火花式扩散想象；
后者则是有组织、有阶段、有战略纵深的阶级战争。

——

（6）政治路线不同：反帝民主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格瓦拉主义通常具有强烈反帝色彩，尤其反对美帝国主义。

这一点当然有进步意义。

但是，仅仅反帝并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革命必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但关键在于：谁来领导这个革命？革命胜利后走向哪里？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反帝斗争可能滑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武装斗争可能只完成政权更替，而不能走向社会主义；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革命就可能停留在民族解放或激进民主阶段。

毛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清楚回答了这个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这就比一般反帝民族主义更高。

格瓦拉主义的局限在于，它常常强调反帝牺牲与革命道德，却没有充分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革命连续性的问题。

——

（7）组织路线不同：军事先锋，还是党、军、统战、群众组织整体结构

毛主义人民战争不是单纯军事路线，而是整体革命路线。

它包括：

共产党建设；
人民军队建设；
革命统一战线；
根据地政权建设；
群众组织建设；
土地革命；
文化宣传；
经济建设；
反修正主义路线斗争。

也就是说，人民战争不是孤立的“打仗”，而是建立新社会的全过程。

格瓦拉主义则容易把重心压缩到军事先锋身上。

这就导致组织结构单薄。

有游击队，但党不强；
有战斗，但群众组织薄弱；
有牺牲精神，但根据地建设不足；
有反帝口号，但阶级路线不够清晰。

这种结构很难承受长期战争和复杂政治斗争。

毛主义人民战争之所以能够持久，就是因为它不是一条单线，而是一个整体结构。

党是领导核心；
军队是武装工具；
统一战线扩大社会基础；
根据地提供战略纵深；
群众组织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土地革命提供阶级动员基础；
路线斗争保证革命方向。

这才是科学革命路线。

——

（8）对失败的理解不同：英雄牺牲，还是路线总结

格瓦拉主义叙事中，失败常常被浪漫化为英雄殉难。

失败者被塑造成纯洁、勇敢、悲壮的革命象征。

这种纪念当然可以理解，但如果停留在悲壮叙事上，就会回避路线总结。

毛主义则要求对失败进行路线分析。

一次失败，不仅要问谁牺牲了，还要问：

为什么失败？
群众基础是否足够？
党的领导是否正确？
敌我力量是否估计准确？
斗争形式是否适合条件？
路线是否存在主观主义？
是否有冒险主义或右倾保守主义？
群众是否真正组织起来？

革命不是宗教殉道。

牺牲必须被总结为经验，失败必须转化为路线认识。

如果只是歌颂牺牲，而不批判错误，那么革命运动就会不断重复同样的悲剧。

——

（9）小结：二者不是战术差异，而是路线差异

因此，格瓦拉主义与毛主义人民战争的区别，绝不是“打法不同”这么简单。

它们的差别是路线差别。

格瓦拉主义倾向于：

以游击焦点发动革命；
以少数革命者示范群众；
以军事行动创造形势；
以英雄牺牲凝聚精神；
以反帝激情推动斗争。

毛主义人民战争则强调：

共产党领导；
群众是主体；
土地革命是基础；
根据地是新政权萌芽；
持久战争改变敌我力量；
政治统帅军事；
党、军、统战、群众组织整体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向社会主义革命。

所以，毛主义人民战争不是格瓦拉主义的“中国版本”，更不是更成功的焦点主义。

毛主义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长期革命战争的科学路线，而格瓦拉主义则容易滑向小资产阶级军事冒险主义。

一句话：

毛主义人民战争的核心不是游击队，而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不是少数人点燃革命，而是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己成为革命的火海。

七、为什么格瓦拉主义容易被现代修正主义利用

格瓦拉主义本身带有强烈的反帝色彩，格瓦拉本人也确实具有牺牲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

但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格瓦拉的形象反而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更容易被主流文化“接受”。

这不是偶然的。

资产阶级当然不会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革命。但它可以把某些革命人物抽象化、浪漫化、商品化，剥掉其具体政治路线，只留下一个“反叛者”“理想主义者”“青年偶像”的空壳。

格瓦拉主义之所以容易被现代修正主义利用，正是因为它本身存在路线上的模糊性：它有革命激情，但缺乏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有反帝姿态，但容易弱化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

（1）把革命变成符号消费

今天，格瓦拉的头像被印在无数T恤、海报、徽章、杯子和商品上。

这本身就很讽刺。

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人，最后却被资本主义市场变成了可以出售的商品符号。

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资产阶级可以接受被去政治化的革命符号。

他们可以接受一个“酷”的格瓦拉，一个“叛逆”的格瓦拉，一个“浪漫”的格瓦拉，一个年轻人房间墙上的格瓦拉海报。

但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政党。

他们可以把格瓦拉变成消费品，却不会把“无产阶级专政”印成商品口号；他们可以出售革命者头像，却不会允许群众真正组织起来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这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工业的厉害之处：

它不是简单禁止革命符号，而是把革命符号商品化，从而抽空其政治内容。

革命一旦变成风格，就不再危险；
革命一旦变成消费，就不再指向政权；
革命一旦变成青春叛逆，就不再是阶级斗争。

因此，格瓦拉形象的流行，并不一定说明革命思想的流行。

很多时候，它说明的是资产阶级已经成功把革命形象转化成了无害的文化符号。

——

（2）用个人英雄遮蔽阶级路线

现代修正主义喜欢谈格瓦拉的勇敢，谈他的理想主义，谈他的牺牲，谈他的国际主义。

这些当然可以谈。

但是，他们往往回避更关键的问题：

他的路线是否正确？
他的战略是否符合群众路线？
他是否真正解决了党的领导问题？
他是否真正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他的焦点理论为什么在许多地方失败？
这种失败是否反映了路线问题？

修正主义者最喜欢的，就是把革命变成个人道德故事。

他们会说：

格瓦拉是一个高尚的人。
格瓦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格瓦拉为了穷人牺牲。
格瓦拉反对不公正。

这些话本身不一定错，但它们把政治路线问题变成了道德赞美问题。

而马克思主义评价革命人物，不能停留在道德层面。

（3）“安全化”的革命人物

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会选择性地处理革命人物。

他们害怕列宁，因为列宁意味着建党、夺权、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旧国家机器。

他们害怕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业化、阶级斗争、国家机器和对反革命的镇压。

他们更害怕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不仅意味着人民战争，而且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意味着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意味着群众起来监督和冲击官僚资产阶级。

相比之下，被抽象化之后的格瓦拉更容易被“安全化”。

只要不谈焦点理论的错误，不谈党的领导问题，不谈群众路线问题，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就可以把格瓦拉塑造成一个无害的反叛符号。

于是格瓦拉变成了：

青年反叛的象征；
理想主义的象征；
反消费主义的消费品；
温和左翼可以接受的革命浪漫图像；
不需要组织、不需要纪律、不需要路线斗争的“自由革命精神”。

这种处理方式对现代修正主义非常有利。

因为它既可以保留一点“革命气息”，又不必真正面对革命问题。

它可以让人感觉自己很激进，但不要求人真正加入群众组织；
它可以让人赞美牺牲，但不要求人建立共产党；
它可以让人反对帝国主义，但不要求人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它可以让人纪念革命者，但不要求人进行路线斗争。

这就是“安全化”的本质。

（4）修正主义如何用格瓦拉反对毛主义

更进一步说，有些修正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还会有意无意地用格瓦拉主义来反对毛主义。

他们会说：

毛主义太强调党；
毛主义太强调纪律；
毛主义太强调路线斗争；
毛主义太强调持久战争；
毛主义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
格瓦拉更纯粹、更自由、更有人道精神。

这种说法表面上是在赞美格瓦拉，实际上是在攻击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原则。

他们喜欢没有党的革命；
喜欢没有纪律的反抗；
喜欢没有专政的社会主义；
喜欢没有群众路线的英雄主义；
喜欢没有路线斗争的“左翼团结”。

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本质。

他们害怕的不是“教条主义”，而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
他们反感的不是“官僚主义”，而是革命组织对个人自由主义的约束；
他们批评的不是“僵化路线”，而是马列毛主义要求他们真正接受群众路线和阶级纪律。

所以，格瓦拉主义常常成为一种方便的替代品：

既能显得革命，又不用真正接受马列毛主义；
既能反帝，又不用真正建设共产党；
既能谈牺牲，又不用长期扎根群众；
既能保持浪漫姿态，又不用进入艰苦的阶级斗争实践。

这正是现代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最喜欢的地方。

（5）格瓦拉形象的商品化说明了什么

格瓦拉头像被资本主义商品化，本身并不能简单归罪于格瓦拉个人。

真正应该批判的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以及修正主义对革命符号的阉割。

但是，这也说明：

如果一条革命路线缺乏完整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国家理论和群众路线，那么它就更容易被抽象化、符号化和消费化。

列宁不容易被彻底商品化，因为列宁的名字太直接地指向布尔什维克党和十月革命。

毛泽东不容易被安全化，因为毛泽东的名字直接指向人民战争、文化大革命和反修正主义斗争。

而格瓦拉更容易被处理成“反叛美学”，正是因为主流文化可以有选择地抹去他的具体政治路线，只保留他的面孔、贝雷帽和牺牲故事。

这样一来，革命就被压缩成一种图像。

图像可以被消费，路线却不能被消费；
图像可以被挂在墙上，党却必须被组织起来；
图像可以让人感动，群众路线却要求人真正工作；
图像可以让人自我感动，阶级斗争却要求人改变世界。

所以，批判格瓦拉主义，也必须批判这种把革命符号化、审美化、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机制。

（6）现代修正主义害怕真正的反修正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可以纪念格瓦拉，但它害怕真正的反修正主义。

因为真正的反修正主义会追问：

为什么那么多共产党变质了？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资本主义复辟？
为什么党内会产生资产阶级？
为什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为什么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为什么必须继续革命？
为什么群众必须监督党和国家机关？

这些问题，格瓦拉主义并没有系统回答。

而毛主义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所以，现代修正主义愿意谈一个被浪漫化的格瓦拉，却不愿真正谈毛主义。

因为毛主义不仅要求反帝，还要求反修正主义；不仅要求武装斗争，还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求革命胜利，还要求防止革命胜利后的资本主义复辟。

格瓦拉主义如果被抽空，就可以成为一种安全的左翼符号；
毛主义如果被认真坚持，就必然成为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战。

——

（7）真正纪念革命者，必须批判其路线局限

这里必须说清楚：

批判格瓦拉主义，并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污蔑格瓦拉。

资产阶级批判格瓦拉，是因为他们痛恨反帝斗争，痛恨任何反抗美国霸权的革命精神。

马列毛主义批判格瓦拉主义，则是从革命内部进行路线批判。

二者完全不同。

我们可以承认格瓦拉有勇气，有反帝精神，有国际主义情怀，也有对革命事业的献身。

但正因为 we 认真对待革命，才必须指出其路线局限。

革命不是宗教。

革命人物不是圣像。

真正的纪念，不是把一个人神圣化，而是总结其历史经验，包括积极方面和错误方面。

如果只歌颂，不批判；只纪念，不总结；只谈牺牲，不谈路线，那么这种纪念最终也会变成修正主义纪念。

（8）小结：反对把革命变成无害图像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看，格瓦拉主义容易被现代修正主义利用，正是因为它可以被包装成一种去阶级化、去组织化、去专政化的“革命浪漫主义”。

资产阶级可以把它商品化；
修正主义可以把它道德化；
小资产阶级可以把它英雄化；
自由派左翼可以把它安全化。

但真正的革命不能停留在图像、口号和情绪里。

真正的革命必须回答：

哪个阶级领导？
依靠什么群众？
建立什么政党？
进行什么战争？
夺取什么政权？
实行什么专政？
如何防止复辟？
如何继续革命？

这些问题，只有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才能给出科学回答。

一句话：

资产阶级可以消费一个被抽空的格瓦拉头像，但它无法消费真正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可以赞美浪漫反叛，却无法接受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路线。

八、如何正确评价格瓦拉

批判格瓦拉主义，并不等于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否定格瓦拉本人。

资产阶级否定格瓦拉，是因为它仇恨反帝斗争，仇恨一切试图反抗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人。资产阶级要把格瓦拉说成“暴徒”“狂热分子”“失败者”，目的是否定革命本身。

而马列毛主义批判格瓦拉主义，则完全不同。

我们不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否定革命，而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路线出发，总结格瓦拉的历史作用、积极方面和路线局限。

这两者必须严格区分。

（1）承认格瓦拉的积极方面

首先，必须承认，格瓦拉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政客，也不是单纯的投机分子。

他确实具有鲜明的反帝精神。

在拉丁美洲长期遭受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历史条件下，格瓦拉反对美国霸权，反对买办统治，反对拉美国家被帝国主义支配，这具有明确的进步意义。

他不是那种口头反帝、实际妥协的人。

他确实愿意为反帝事业付出代价。

其次，格瓦拉具有国际主义精神。

他并没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安于已有地位，而是试图把革命扩展到其他被压迫国家和地区。他前往刚果，后来又前往玻利维亚，试图推动当地革命斗争。

这种精神，和许多一旦掌权便迅速官僚化、保守化、民族狭隘化的人相比，当然有其积极意义。

再次，格瓦拉反对安逸化和官僚化。

他不满足于成为革命胜利后的官员，不愿意把革命变成享受地位和权力的工具。这一点，对于后来许多蜕变为官僚集团的“革命者”而言，是一种明显对照。

最后，格瓦拉确实具有牺牲精神。

他不是那种只会鼓动别人牺牲、自己躲在后方的人。他本人走上了危险的道路，并最终死于斗争之中。

这些方面，都应当如实承认。

马列毛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不应当因为批判格瓦拉主义路线错误，就否定格瓦拉个人身上的反帝精神和牺牲品质。

(2) 但积极精神不能代替正确路线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

一个人的精神品质，不能代替其政治路线。

革命者可以勇敢，但路线可能错误；
革命者可以真诚，但战略可能错误；
革命者可以牺牲，但理论可能不科学；
革命者可以反帝，但并不一定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整道路。

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停留在道德评价。

如果只说格瓦拉“勇敢”“纯洁”“高尚”，那仍然不够。因为革命不是单纯道德事业，而是阶级斗争和社会改造的科学实践。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

格瓦拉主义是否正确解决了革命的基本问题？

这些基本问题包括：

谁领导革命？
依靠哪个阶级？
如何建设共产党？
如何发动群众？
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
如何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政权？
如何把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如何防止革命胜利后的官僚化和修正主义？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科学解决，那么格瓦拉个人再勇敢，也不能使格瓦拉主义成为正确路线。

(3) 格瓦拉主义没有真正解决党的领导问题

从列宁主义到毛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党的领导。

列宁建立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强调必须有一个有纪律、有理论、有组织的革命党来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

党指挥枪。

也就是说，军队必须服从党的政治路线，武装斗争必须服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战略。

而格瓦拉主义的焦点理论，恰恰容易把游击队置于革命中心。

它不是从建设共产党、扎根群众、建立阶级组织出发，而是从少数革命者建立游击焦点出发。

这就会导致一个严重后果：

军事行动压倒政治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队伍可能很勇敢，也可能很有牺牲精神，但未必具备无产阶级政党所必须具备的路线能力和组织能力。

没有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就容易变成军事冒险；
没有无产阶级路线，反帝斗争就可能停留在民族民主层面；
没有民主集中制，革命队伍就难以承受长期复杂斗争。

因此，格瓦拉主义最大的局限之一，就是没有把党的建设放在革命路线的中心位置。

(4) 格瓦拉主义没有真正解决群众路线问题

格瓦拉主义也没有真正解决群众路线问题。

它相信少数游击队能够通过战斗示范唤醒群众，推动群众加入革命。这种想法表面上承认群众重要，但实际上群众处于被动位置。

群众被理解为等待点燃的力量，而不是已经具有自身阶级经验、斗争要求和组织过程的历史主体。

毛主义则完全不同。

毛主义强调：

群众不是被少数英雄唤醒的对象，而是革命的主人。

共产党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群众分散的经验上升为路线，再回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不是宣传技巧，而是革命的根本方法。

没有群众路线，武装斗争就没有生命。

游击队可以暂时存在，但如果群众没有被真正组织起来，没有自己的组织、武装和政权萌芽，那么战争就很难成为人民战争。

因此，格瓦拉主义的另一个重大局限，就是用少数人的英雄行动替代了群众长期组织过程。

这不是说格瓦拉完全不重视群众，而是说他的理论没有把群众路线提高到毛主义意义上的根本路线高度。

(5) 格瓦拉主义没有真正解决根据地与政权建设问题

革命战争不是单纯军事斗争。

从毛主义立场看，根据地建设是人民战争的核心环节之一。

根据地不是游击队藏身的地方，而是新政权的萌芽。它必须包括：

群众组织；
土地革命；
基层政权；
群众武装；
政治教育；
生产组织；
革命文化；
新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根据地本身就是新社会在旧社会内部的生长点。

格瓦拉主义虽然也讲山区和游击区，但它更强调游击焦点的军事存在和扩散作用，而不是系统的根据地政权建设。

这就使其革命战略缺乏稳定社会基础。

一支游击队如果没有根据地政权，没有群众组织，没有土地革命，没有新社会因素，就很难长期生存和发展。

毛主义人民战争之所以不是一般游击主义，正因为它把战争、群众、土地、政权和党的建设结合为一个整体。

格瓦拉主义在这一点上明显不完整。

(6) 格瓦拉主义没有真正解决革命连续性问题

格瓦拉主义还存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它没有系统解决革命胜利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反帝斗争胜利之后，是建立民族主义政权，还是走向社会主义？

建立新政权之后，如何防止官僚化？

如何防止新资产阶级产生？

如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如何处理党内修正主义？

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这些问题，是毛主义继续革命理论所要回答的。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苏联后来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说明夺取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终点。

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经验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必须继续革命。

格瓦拉主义的理论重心主要在如何发动游击斗争和反帝革命，而没有形成关于社会主义过渡、反修正主义和继续革命的完整理论。

因此，它即使有反帝激情，也不能替代毛主义。

(7) 区分格瓦拉个人与格瓦拉主义路线

所以，必须区分两个问题：

一个是格瓦拉个人；

一个是格瓦拉主义路线。

对格瓦拉个人，可以承认其反帝精神、牺牲精神和国际主义情怀。

但对格瓦拉主义路线，则必须进行严肃批判。

如果不作这种区分，就会出现两种错误。

第一种错误，是资产阶级式否定。

即因为格瓦拉路线有错误，就把他本人完全说成坏人、暴徒、失败者，从而否定反帝斗争本身。

第二种错误，是修正主义式神圣化。

这不是说格瓦拉完全不重视群众，而是说他的理论没有把群众路线提高到毛主义意义上的根本路线高度。

（5）格瓦拉主义没有真正解决根据地与政权建设问题

革命战争不是单纯军事斗争。

从毛主义立场看，根据地建设是人民战争的核心环节之一。

根据地不是游击队藏身的地方，而是新政权的萌芽。它必须包括：

群众组织；
土地革命；
基层政权；
群众武装；
政治教育；
生产组织；
革命文化；
新的社会关系。

也就是说，根据地本身就是新社会在旧社会内部的生长点。

格瓦拉主义虽然也讲山区和游击区，但它更强调游击焦点的军事存在和扩散作用，而不是系统的根据地政权建设。

这就使其革命战略缺乏稳定社会基础。

一支游击队如果没有根据地政权，没有群众组织，没有土地革命，没有新社会因素，就很难长期生存和发展。

毛主义人民战争之所以不是一般游击主义，正因为它把战争、群众、土地、政权和党的建设结合为一个整体。

格瓦拉主义在这一点上明显不完整。

（6）格瓦拉主义没有真正解决革命连续性问题

格瓦拉主义还存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它没有系统解决革命胜利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即因为格瓦拉有牺牲精神，就拒绝讨论其路线错误，把他变成不可批判的革命圣像。

这两种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既看到其积极作用，也指出其局限；
既反对资产阶级污蔑，也反对修正主义神化；
既尊重牺牲精神，也坚持路线批判。

（8）不能把格瓦拉当作反对毛主义的旗帜

今天，一些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喜欢用格瓦拉反对毛主义。

他们认为毛主义太重视党、纪律、群众路线和长期战争，而格瓦拉似乎更自由、更浪漫、更个人化、更有“纯粹革命精神”。

这种看法必须批判。

所谓“纯粹革命精神”，如果脱离党、脱离群众、脱离阶级分析、脱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革命幻想。

他们不是在捍卫格瓦拉，而是在利用格瓦拉逃避毛主义对他们提出的纪律要求和群众工作要求。

他们喜欢革命的激情，却不喜欢革命的组织；
喜欢牺牲的神话，却不喜欢长期基层工作；
喜欢山林游击的浪漫，却不喜欢群众路线的复杂；
喜欢反帝口号，却不喜欢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

因此，必须明确：

格瓦拉不能被用来反对毛主义。

如果真的要总结二十世纪革命经验，就必须承认，毛主义比格瓦拉主义更完整、更科学、更能够回答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人民战争和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问题。

(9) 正确评价的标准：路线高于个人

最后，评价革命人物的根本标准，不应当是个人魅力，而应当是政治路线。

个人魅力可以鼓舞一时，正确路线才能指导长期斗争。

格瓦拉的形象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他身上有反帝、牺牲和国际主义的光芒。但如果这种光芒被用来遮蔽其路线局限，那就会变成对革命的不负责任。

马列毛主义者必须坚持：

路线高于个人；
群众高于英雄；
党高于游击小组；
人民战争高于焦点冒险；
继续革命高于一次性胜利；
科学社会主义高于革命浪漫主义。

这不是冷酷，而是对革命负责。

因为革命不是为了制造英雄，而是为了真正解放人民。

——

(10) 小结：尊重其精神，批判其路线

因此，对格瓦拉的正确评价应当是：

他是一个具有反帝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革命者，但格瓦拉主义不是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们可以尊重他的个人勇气，但不能接受其焦点理论；
可以肯定他的国际主义情怀，但不能用它替代群众路线；
可以纪念他的反帝斗争，但不能把他神圣化为不可批判的偶像；
可以从他的失败中学习，但必须得出路线教训，而不是沉醉于悲壮叙事。

一句话：

格瓦拉值得作为反帝斗士被历史记住，但格瓦拉主义必须作为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路线被马列毛主义批判和超越。

九、结语：从格瓦拉主义回到马列毛主义

批判格瓦拉主义，最终不是为了停留在对某一个历史人物或某一种游击理论的否定上，而是为了重新回答一个根本问题：

什么才是真正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格瓦拉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不够激进”。

恰恰相反，它在表面上非常激进，充满反帝激情、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色彩。它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买办统治，反对剥削压迫，这些方面当然具有进步意义。

但是，革命路线不能只看激情。

真正的革命路线，必须看它是否能够科学回答：

谁领导革命；
谁是革命主体；
如何建设共产党；
如何发动群众；
如何建立人民军队；
如何建设根据地；
如何夺取政权；
如何防止修正主义；
如何把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

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格瓦拉主义是不完整的，甚至在若干关键环节上是错误的。

——

(1) 格瓦拉主义的问题在于不够科学

格瓦拉主义最容易迷惑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把革命浪漫化了。

它让人看到山林、枪声、牺牲、游击队、国际主义战士和悲壮结局，却容易让人忽视革命真正艰苦的部分：

长期群众工作；
党的建设；
路线斗争；
土地革命；
根据地建设；
民主集中制；
群众政权建设；
反修正主义斗争。

可是，这些恰恰才是革命的根本。

革命不是英雄个人的传奇，而是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

如果一个理论把少数游击队放在中心位置，把群众放在被唤醒、被鼓舞、被带动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已经偏离了群众路线。

如果一个理论把军事行动放在党的建设之前，把斗争形式放在政治路线之前，那么它就容易滑向军事主义。

如果一个理论把主观意志和牺牲精神看得过高，把客观阶级条件和群众组织过程看得过低，那么它就会走向冒险主义。

因此，格瓦拉主义的问题不是“不革命”，而是革命得不科学。

而不科学的革命路线，最终会让革命者付出沉重代价，也会让群众承受失败的后果。

（2）真正的革命不能以少数人代替群众

马列毛主义最根本的立场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共产党不是替人民革命，而是领导人民自己革命。

这句话非常重要。

因为许多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总是幻想：

只要少数人足够勇敢；
只要少数人率先行动；
只要少数人打响第一枪；
只要少数人作出牺牲；
群众就会被唤醒，历史就会被推动。

但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

群众不是等待点燃的柴火。群众有自己的阶级处境、现实利益、组织过程和政治成长。革命者必须深入群众，把群众真实的不满、要求和斗争经验集中起来，形成路线，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自己掌握革命。

这就是群众路线。

没有群众路线，所谓革命就容易变成少数人的自我感动。

格瓦拉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正在于它容易把群众放在英雄叙事的背景里，而不是把群众放在历史主体的位置上。

毛主义则正好相反。

毛主义讲人民战争，不是因为少数人会打游击，而是因为人民群众可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成战争的主体。

真正的人民战争，不是游击队的战争，而是人民的战争。

（3）真正的革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革命必须有党。

这不是一句组织口号，而是革命能否成功的根本问题。

没有党，群众斗争就容易分散；
没有党，武装斗争就容易军事化；
没有党，统一战线就容易被资产阶级牵引；
没有党，革命胜利也可能变成新的民族主义政权或军事集团；
没有党，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方向。

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建立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

毛主义进一步强调：

党指挥枪。

这就是毛主义人民战争和格瓦拉主义游击焦点论的根本分界线。

格瓦拉主义容易从游击队出发，以游击焦点打开局面；毛主义则必须从共产党领导、群众路线和政治路线出发，把军队作为执行党的路线的工具。

枪必须服务于党，党必须服务于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如果枪脱离党，枪就可能变成军事主义；
如果党脱离群众，党就可能变成宗派主义；
如果群众没有被组织起来，革命就不可能持久。

所以，真正的革命路线必须是：

党领导人民，人民支撑战争，战争服务政权，政权推进革命。

（4）真正的革命必须反对两种机会主义

批判格瓦拉主义，并不意味着倒向右倾机会主义。

这点必须讲清楚。

马列毛主义反对格瓦拉主义的“左”倾冒险主义，但同时也坚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

右倾投降主义表现为：

迷信议会；
放弃革命；
害怕群众斗争；
害怕国家暴力问题；
把共产党改造成合法主义组织；
把社会主义变成改良主义口号。

这种路线当然必须反对。

但是，反对右倾投降主义，不等于支持冒险主义。

“左”倾冒险主义表现为：

脱离群众；
轻视党的建设；
高估少数人的作用；
用军事行动代替政治路线；
用牺牲精神代替阶级分析；
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条件。

这同样必须反对。

因为这两种错误虽然表面相反，实质上都脱离群众、脱离唯物主义、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科学路线。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路线，是既反对投降，又反对冒险；既反对议会迷，又反对军事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命令主义。

革命不是退缩，也不是乱冲。

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根据具体条件进行长期、有组织、有纪律、有战略的阶级斗争。

（5）格瓦拉主义必须被毛主义超越

从历史发展来看，格瓦拉主义代表了一种反帝革命浪漫主义。

它曾经激励过许多人反抗帝国主义，也确实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发挥过鼓舞作用。

但是，仅仅鼓舞是不够的。

革命需要的不只是精神象征，而是科学路线。

毛主义之所以高于格瓦拉主义，正因为它系统回答了格瓦拉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

用共产党领导代替游击焦点中心；
用群众路线代替英雄主义；
用人民战争代替军事冒险；
用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代替单纯游击行动；
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代替抽象反帝民主主义；
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回答革命胜利后的复辟问题。

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格瓦拉主义可以产生英雄，但毛主义可以组织人民。
格瓦拉主义可以制造震动，但毛主义可以建设根据地。
格瓦拉主义可以鼓舞青年，但毛主义可以指导革命。
格瓦拉主义可以留下悲壮故事，但毛主义可以形成完整的夺权路线和继续革命路线。

所以，格瓦拉主义必须被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所批判、改造和超越。

（6）反对把革命变成符号和商品

今天，格瓦拉的形象已经被资本主义世界大量商品化。

他的头像出现在T恤、海报、徽章和各种消费品上。

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对革命的阉割。

资产阶级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危险的东西变成风格，把革命变成图像，把阶级斗争变成青春叛逆，把反帝战士变成消费符号。

这说明：

如果革命失去了组织、路线、阶级和群众，它就很容易被资本主义吸收。

一个被抽空的格瓦拉头像，资产阶级可以出售；
一个真正组织起来的共产党，资产阶级无法容忍。

一个浪漫化的革命形象，资产阶级可以安全化；
一条真正的毛主义群众路线，资产阶级必然恐惧。

所以，批判格瓦拉主义，也是在批判这种把革命消费化、审美化、无害化的现代修正主义倾向。

真正的革命不是挂一张海报，不是穿一件T恤，不是崇拜一个烈士形象，而是进入群众，建设组织，坚持斗争，改造世界。

（7）真正纪念革命者，就是总结路线教训

对格瓦拉，应该有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既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污蔑他，也不能像小资产阶级那样神化他。

我们可以承认他的反帝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

但同时必须指出：

他的路线不是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真正严肃的纪念，不是把革命者变成圣像，而是总结其经验和教训。

如果只谈格瓦拉的牺牲，不谈焦点理论的问题，那就是浪漫主义；

如果只谈格瓦拉的勇敢，不谈党的领导问题，那就是逃避路线斗争；

如果只谈格瓦拉的国际主义，不谈群众路线和人民战争，那就是把革命道德化；

如果只谈他的死亡，不谈为什么失败，那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

革命不是宗教，革命者也不是神。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敢于批判一切不科学的路线，哪怕这种路线披着最悲壮、最动人的外衣。

（8）回到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因此，本文的最终结论是：

格瓦拉主义的问题，不是没有革命热情，而是缺乏科学革命路线；不是没有反帝精神，而是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领导、群众路线、人民战争和继续革命的问题。

今天的革命者不能停留在格瓦拉式的浪漫主义里。

我们必须回到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这意味着：

坚持共产党领导；
坚持群众路线；
坚持人民战争；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反修正主义；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坚持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同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

革命不是少数人的史诗。

革命是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改造世界的历史运动。

革命不需要被浪漫化，而需要被组织起来。
革命不需要被商品化，而需要被阶级化。
革命不需要被英雄神话遮蔽，而需要被群众路线照亮。

一句话：

从格瓦拉主义回到马列毛主义，就是从小资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回到无产阶级革命科学；从少数英雄的焦点回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从悲壮的牺牲叙事回到真正能够夺取政权、建设新社会并继续革命的道路。

结尾口号

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冒险主义！
坚持共产党领导，反对游击队主义！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个人英雄主义！
坚持人民战争，反对焦点冒险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万岁！

论打入主义

一、格兰特主义的本质：以“接近群众”为名，长期寄生于改良主义政党

批判泰德·格兰特的打入主义，首先不能被它表面的“灵活性”所迷惑。

格兰特主义者常常把自己的路线包装成一种非常现实、非常聪明、非常“接近群众”的策略。他们会说：英国工人阶级长期受工党影响，工会同工党有深厚联系，大量工人仍然把工党看作自己的政治代表。因此，革命者不能脱离工人群众，不能站在工党之外空喊口号，而应当进入工党内部，在工党内部争取工人、影响青年、推动左翼化，并等待资本主义危机使群众转向马克思主义。

这套说法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

因为革命者当然不能脱离群众。共产党当然不能满足于在小圈子里自我欣赏，当然不能把受改良主义影响的工人简单骂成“落后群众”然后远离他们。革命者必须到工人所在的地方去，到工会、社区、罢工、群众组织、青年群体之中去，必须同那些暂时仍然相信工党、相信议会、相信改良的群众进行耐心工作。

但是，问题正在于：

到群众中去，不等于到工党机器中去；接触受改良主义影响的工人，不等于把革命组织长期寄生在改良主义政党内部。

格兰特主义的欺骗性就在这里。

它抓住了一个真实现象：工党确实长期影响英国工人阶级。但它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革命者必须长期留在工党内部。

而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的立场看，正确结论恰恰相反：

正因为工党长期影响工人阶级，革命者才必须揭露工党；
正因为工人群众仍然受改良主义束缚，革命者才必须帮助群众摆脱这种束缚；
正因为工党通过工会官僚和议会制度吸收工人斗争，革命者才必须建设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

如果群众受工党影响，革命者的任务不是把自己也塞进工党，而是以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身份去同群众对话，把群众从工党的影响下争取出来。

（1）工党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工人党

要批判打入主义，首先必须弄清楚工党的阶级性质。

工党虽然有工人阶级群众基础，虽然同英国工会有历史联系，虽然经常使用“劳动”“公平”“公共服务”“工人权利”等词汇，但它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党。

它不是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目标的党；
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党；
不是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党；
不是以打破议会制度、建立工人政权为目标的党。

它的实际功能，是把工人阶级的不满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之中。

工党给工人阶级提供一种幻想：似乎只要选出一个“更左”的政府，似乎只要通过议会改革，似乎只要改善福利、提高工资、调整税收，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逐步解决工人阶级的根本问题。

但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中立工具，议会民主不是超阶级制度，国家机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工党正是在这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内部运作的政党。

它不打碎旧国家机器，而是管理旧国家机器；
它不组织工人夺取政权，而是组织工人为资产阶级议会投票；
它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而是在资本主义秩序危机时修补它。

所以，工党的阶级性质不是由它的名字决定的，也不是由它的群众基础决定的，而是由它的纲领、领导、路线和实践决定的。

它是资产阶级工人党。

也就是说，它有工人群众基础，但执行资产阶级政治路线。

这正是它最危险的地方。

如果它只是一个公开的资产阶级保守党，工人群众对它的幻想也许不会那么深。但正因为它披着“工人党”的外衣，正因为它和工会有联系，正因为它会说一些左翼词汇，它才更能把工人阶级的反抗吸收进资产阶级政治体系。

——
(2) 格兰特主义把“群众在工党里”变成了取消独立建党的借口

格兰特主义的基本逻辑是：

既然群众在工党周围，那么革命者也必须进入工党。

这个逻辑看似现实，实则机会主义。

因为问题不是群众暂时在哪里，而是革命者以什么政治路线去面对群众。

群众可能在工党周围，群众可能在工会官僚影响下，群众可能暂时相信议会，群众可能暂时仍然幻想改良。但是，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顺着这些幻想走，而是通过耐心工作提高群众觉悟。

列宁主义从来不是迎合群众的自发意识。

列宁反对经济主义和尾巴主义，正是因为经济派只会跟在群众自发斗争后面，把工人现有的经济要求当作政治活动的上限。列宁主义的任务，是把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政治斗争，把群众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下争取出来。

而格兰特主义恰恰倒过来了。

它不是以独立革命党身份去提高群众，而是把群众现有的工党幻想当成自己存在方式的根据。

群众还相信工党，所以它也留在工党；
群众还相信议会，所以它也围绕议会；
群众还没有同改良主义决裂，所以它也不公开同改良主义彻底决裂。

这不是群众路线，这是尾巴主义。

真正的群众路线，不是群众在哪里，党就把自己溶解在哪里；而是党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并把群众从错误影响下带出来。

格兰特主义却把“群众在工党里”变成了取消独立建党的理由。

这就是它的根本问题。

——
(3) 打入主义不是进入群众，而是进入工党机器

格兰特主义者最喜欢说自己“不是宗派主义者”，因为他们愿意进入大党，愿意接触广大群众，愿意在现实运动中工作。

但是，这里必须问：

他们进入的到底是群众，还是工党机器？

群众存在于工厂、工会基层、街区、学校、失业者队伍、移民劳动者群体、罢工队伍和社区斗争之中。革命者要接触群众，完全可以通过这些现实斗争去接触。

可是打入主义选择的道路，是长期在工党组织结构内部活动。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革命组织的发展越来越依赖：

工党地方党部；
工党青年组织；
工党内部会议；
工党候选人机制；
工会官僚渠道；
议会职位；
党内派系平衡；
合法政治空间。

这样一来，革命组织的工作中心就发生了转移。

它不再首先思考如何在群众中建立独立组织，而是思考如何在工党内部取得位置；
不再首先思考如何揭露工党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思考如何在工党内部保持活动空间；
不再首先思考如何从改良主义手中争夺群众，而是思考如何在改良主义组织内部扩大派别影响。

这就不是进入群众。

这是进入工党机器。

而工党机器不是中立空间。它有自己的纪律、程序、选举逻辑和政治边界。一个组织长期在其中活动，必然要不断适应它。

一开始，打入主义者可能说自己是在利用工党。但长期来看，往往是工党机器改造了打入主义者。

他们的语言会变得更适合工党会议；
他们的活动会围绕党内议程转动；
他们的干部会习惯议会和选举逻辑；
他们的群众工作会变成党内影响力经营；
他们的革命纲领会被压缩成工党左翼政策。

这就是寄生路线的必然结果。

(4) 寄生于改良主义政党，必然削弱革命组织的独立性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公开地、独立地、直接地面对群众。

它要告诉群众：

工党不能解放你们；
议会道路不能解放你们；
工会官僚不能解放你们；
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被和平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
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治力量。

但是，如果一个组织长期寄生在工党内部，它就很难把这些话讲到底。

因为讲到底，就会同它自己的存在方式发生冲突。

它既要揭露工党，又要留在工党；
既要批判改良主义，又要在改良主义组织内部求生存；
既要说独立建党重要，又拒绝真正独立建党；
既要批判议会主义，又把议会和党内职位当成主要阵地。

这种矛盾不可能长期维持。

最终，组织要么被工党清洗，要么被工党驯化，要么在内部派系斗争中耗尽力量，要么在“是否公开转向”的问题上分裂。

这不是偶然结局，而是打入主义路线自身矛盾的表现。

因为寄生路线从一开始就把革命组织的命运交给了改良主义党机器。

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不能这样生长。

它不能靠寄生生长，必须靠独立群众工作生长；
不能靠工党内部空间生长，必须靠阶级斗争生长；
不能靠改良主义组织庇护生长，必须靠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力量生长。

(5) 打入主义把革命组织降格为工党左翼派别

打入主义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把革命组织降格为工党内部的左翼派别。

这意味着，革命组织不再以“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工党内部马克思主义者”“工党左翼”“党内社会主义派别”的身份出现。

这样一来，革命政治就被降低了。

独立纲领变成党内主张；
革命路线变成政策压力；
群众工作变成党内动员；
阶级斗争变成派系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变成工党内部影响力扩张。

这是对列宁主义的严重歪曲。

列宁主义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独立的政治组织，是领导阶级斗争的司令部。

而格兰特主义实际上把党变成改良主义党内的压力集团。

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是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它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实践上却不敢真正独立建党；
口头上讲革命，实践上却把革命组织藏在改良主义党内；
口头上讲争取群众，实践上却让群众继续停留在工党政治形式之中。

(6) 小结：格兰特主义不是走向群众，而是走向工党机器

因此，第一部分的结论必须明确：

格兰特主义的本质，不是“接近群众”，而是长期寄生于改良主义政党。

它把工党仍然影响工人群众这一事实，变成取消独立建党的借口；
它把群众路线歪曲成工党党内路线；
它把反宗派主义歪曲成对改良主义组织的依附；
它把策略灵活性歪曲成路线机会主义。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看，革命者当然要接触受工党影响的工人群众，但必须以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身份去接触他们，必须揭露工党，批判改良主义，把群众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工会官僚控制下争取出来。

一句话：

格兰特主义不是把革命者带到群众中去，而是把革命者带进工党机器；不是帮助工人阶级摆脱改良主义，而是让革命组织在改良主义内部求生存。它的本质，是以“接近群众”为名，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

二、打入主义的路线错误：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滑向合法主义、议会主义和尾巴主义

如果说第一部分要揭露格兰特主义的外壳，那么第二部分就必须进一步指出它的路线实质：

打入主义不是简单的组织策略，而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的系统取消。

它看似是在工党内部“争取群众”，实际上却把革命组织改造成改良主义政党内部的左翼派别；它看似是在“利用合法阵地”，实际上却逐步依附于合法主义空间；它看似是在“反对宗派主义”，实际上却陷入了尾随工党群众现有意识的尾巴主义。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看，这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1) 列宁主义的核心是独立建党

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理论，首先强调的就是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独立先锋队政党。

这个党不是一般的宣传小组，不是松散的政治社团，也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左翼压力集团。

它必须是：

有独立纲领的党；
有独立组织的党；
有独立报刊的党；
有独立纪律的党；
有独立干部体系的党；
有独立群众工作的党；
有能力在革命危机中争夺政权领导权的党。

为什么必须独立？

因为没有独立的党，就没有独立的路线；
没有独立的路线，就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权；
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权，工人运动就会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工会官僚牵着走。

列宁反对经济主义，正是因为经济派把工人运动限制在工资、工时、工会斗争之内，不敢把斗争提高到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政治斗争。列宁反对孟什维克，正是因为孟什维克在革命问题上向资产阶级自由派让步，取消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地位。

所以，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非常清楚：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独立存在，独立斗争，独立领导群众。

而格兰特主义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根本倒退。

它并不是公开说“不要党”，而是把党变成工党内部的派别；它并不是公开说“不要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降格为工党左翼政策；它并不是公开说“不要革命”，而是把革命组织的实际活动局限在工党内部空间。

这种取消主义更隐蔽，也更危险。

——

(2) 打入主义把党降格为派别

在打入主义路线下，革命组织不再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直接面对群众，而是作为工党内部的某种“马克思主义派别”出现。

这会产生一个根本变化：

党不再是党，而变成派。

派别和政党有什么区别？

政党要公开向整个阶级提出纲领，争夺政治领导权；
派别则在另一个政党的框架内争夺影响力。

政党以自己的旗帜组织群众；
派别则借用别人的旗帜活动。

政党直接揭露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派别则必须不断考虑自己在现有党内结构中的生存空间。

政党把群众引向同资产阶级国家决裂；
派别则容易把群众引向党内斗争、会议表决和政策修正。

这就是格兰特主义的根本问题。

它口头上讲建党，实际上却不敢独立建党；
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把革命组织藏进工党内部；
口头上讲争取工人，实际上把工人斗争重新带回工党形式之中。

结果是什么？

独立纲领变成党内文件；
革命路线变成左翼政策；
阶级斗争变成党内斗争；
群众路线变成党内拉票；
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工党左翼压力集团。

这不是革命党的建设，而是革命党的自我阉割。

——

（3）打入主义必然适应工党的组织边界

有人可能会说：

“我们虽然在工党内部，但我们仍然保持自己的理论和组织。”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硬气，但在实际政治中很难成立。

因为一个组织长期处在另一个组织内部，就不可能不受其结构支配。

工党不是一片空白空间。它有自己的组织制度、会议程序、党内纪律、候选人机制、选举周期、地方党部结构、议会逻辑和官僚体系。

打入主义组织如果想长期生存，就必须不断适应这些边界。

它不能把话说得太彻底，否则会被清洗；
不能公开同工党决裂，否则就失去打入的意义；
不能独立建立群众组织，否则会被指控破坏党纪；
不能完全揭露工党，否则会破坏自己在工党内的生存条件。

于是，组织会慢慢学会一种政治语言：

既要显得激进，又不能真正突破工党边界；
既要批判右派，又要保留“争取工党”的希望；
既要谈社会主义，又要把社会主义塞进工党政策框架；
既要讲阶级斗争，又要围绕选举、议会和党内会议运作。

这就是改良主义机器对革命组织的塑造。

一开始，打入主义者以为自己在利用工党；
最后，往往是工党结构在改造他们。

——

（4）合法主义的陷阱

打入主义必然滑向合法主义。

所谓合法主义，不是说革命者不能利用合法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不反对利用合法空间。问题在于：合法空间是否成为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依赖？

如果一个组织长期把主要活动放在工党内部，它就必然习惯于合法政治形式。

它的活动越来越围绕：

党内会议；
动议和修正案；
工会大会；
地方议会；
竞选活动；
候选人提名；
合法报刊发行；
公开社团活动；
合法集会和游行。

这些东西本身并非一律不能利用。

但是，如果它们成为主要工作方式，革命组织就会被合法主义驯化。

革命斗争本来必须准备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发生根本冲突；
而合法主义则让组织习惯于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革命党本来必须准备在危机时刻突破旧秩序；
而合法主义则让组织把旧秩序提供的缝隙当成永久空间。

革命干部本来必须具有地下工作、群众组织、反镇压和独立斗争能力；
而合法主义则培养出熟悉会议程序、竞选规则和党内派系操作的人。

这样一来，组织表面上可能很活跃，实际上却越来越远离革命能力。

(5) 议会主义的腐蚀

打入主义还必然滑向议会主义。

格兰特主义者当然会说，他们不是普通议会改良派，他们只是利用议会、利用工党、利用选举。

可是问题仍然是：

到底是谁利用谁？

列宁主义可以利用议会，但利用议会的目的，是揭露议会，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向群众说明国家机器的阶级本质，把群众引向革命斗争。

而打入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往往不是利用议会揭露议会，而是在议会和工党机器中积累“影响力”。

一旦议会席位、地方政府职位、党内职位、工会职位成为组织发展的重要标志，组织就会越来越重视这些合法政治资源。

于是，判断成功的标准会悄悄变化：

不是群众是否摆脱改良主义；
不是独立革命组织是否壮大；
不是工人阶级是否提高到革命政治；
而是我们在工党内有多少影响力；
有多少党内职位；
有多少议员；
有多少工会官员；
有多少动议通过；
有多少地方政策被采纳。

这就已经不是革命政治，而是议会主义逻辑。

议会主义的腐蚀不一定表现为公开背叛革命。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工作重心的转移：从夺取政权转向夺取席位，从组织群众转向经营选票，从揭露国家机器转向管理地方政府。

这正是打入主义无法摆脱的问题。

(6) 尾巴主义：把群众的现有意识当作路线根据

格兰特主义最常见的辩护是：

“群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独立革命党。群众仍然相信工党。所以我们必须留在工党。”

这种说法正是尾巴主义。

列宁主义从来不是迎合群众当前意识。

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必然受到资产阶级思想、改良主义传统、工会官僚影响和议会幻想的束缚。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把群众当前意识当作自己的最高边界，而是通过斗争和教育提高群众觉悟。

如果群众相信工党，革命者就要耐心揭露工党；
如果群众相信议会，革命者就要揭露议会民主的阶级实质；
如果群众只提出经济要求，革命者就要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
如果群众暂时害怕革命，革命者就要通过实践说明改良主义的死路。

这才是领导。

而打入主义的逻辑则是：

群众相信工党，所以我们留在工党；
群众相信议会，所以我们围绕议会；
群众还没有同改良主义决裂，所以我们也不彻底决裂；
群众还没有接受独立建党，所以我们也推迟独立建党。

这不是领导群众，而是跟在群众后面走。

更准确地说，是跟在群众的落后意识后面走。

当然，群众的落后意识不是群众的“罪”。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传统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期作用的结果。问题在于，共产党人不能把这种现实变成自己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据。

群众路线不是尾巴主义。

群众路线要求共产党深入群众，但也要求共产党提高群众。

群众路线要求共产党倾听群众，但也要求共产党集中群众先进经验。

群众路线要求共产党联系群众，但也要求共产党同群众中的落后意识作斗争。

打入主义把群众路线庸俗化为迎合群众现有政治形式，这正是它的反列宁主义之处。

（7）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的特殊表现

格兰特主义的打入主义不是偶然的孤立错误，而是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

托派常常有一种幻想：

资本主义危机会自动推动群众急剧左转；
群众会涌入传统工人党；
传统工人党会发生左翼化；
革命派只要提前埋伏其中，就可以在关键时刻夺取领导权。

这种逻辑看似重视群众运动，实际上充满自发论和机械论。

它高估危机自动产生革命意识的力量，低估资产阶级国家、改良主义政党和工会官僚吸收危机、分流危机、压制危机的能力。

资本主义危机当然会激化矛盾。
但危机不会自动产生革命路线。

群众左转也不自动等于走向共产主义。
群众愤怒也可能被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民粹甚至宗教保守力量吸收。

所以，关键仍然是有没有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

而格兰特主义恰恰把这个问题推迟了、模糊了、取消了。

它总是在等待工党危机，等待工党左转，等待群众涌入工党，等待党内斗争出现机会。结果，革命组织的战略主动权被交给了工党的发展节奏。

这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机会主义等待论。

（8）隐蔽宗派主义：以反宗派之名制造派别政治

格兰特主义还常常批判别人“宗派主义”，说独立建党是脱离群众，是小圈子自我孤立。

但是，打入主义本身其实是一种隐蔽宗派主义。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公开地以完整纲领面对群众，而是在大党内部作为小集团活动；

它不是公开争取工人阶级独立领导权，而是在工党内部经营派别；

它不是公开同改良主义路线斗争到底，而是在组织边界内进行有限斗争；

它不是把群众从工党带出来，而是把自己藏在工党里面。

这种宗派主义比公开宗派主义更复杂。

公开宗派主义至少承认自己是独立组织，只是脱离群众；

打入主义则一边隐藏自己的独立性，一边用“接近群众”掩盖自己对改良主义机器的依附。

它形成的是一种党内小圈子政治。

表面上它反宗派，实际上它把革命组织变成工党内部派别。

表面上它反孤立，实际上它把革命组织隔离在工党政治形式之内。

表面上它接近群众，实际上它接近的是工党组织机器。

所以，打入主义不是反宗派主义，而是隐蔽的机会主义宗派主义。

(9) 打入主义必然导致路线上的双重语言

长期打入党，必然产生双重语言。

对内部成员说：我们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最终要社会主义革命。

对工党群众说：我们是真正的工党社会主义者，我们要让工党回到工人阶级传统。

对内部说：工党领导层是改良主义官僚。

对外部说：我们要争取工党左转，重建工党。

对内部说：议会道路不可能真正带来社会主义。

对外部说：我们要通过工党政策争取社会主义措施。

这种双重语言最终会腐蚀组织本身。

因为语言不是外在形式。一个组织长期用什么语言面对群众，它的政治思维就会被这种语言塑造。

如果它长期用工党左翼语言说话，它最终就会越来越像工党左翼；

如果它长期用议会政策语言说话，它最终就会越来越像议会改良派；

如果它长期回避独立建党的必要性，它最终就会越来越不相信独立建党。

路线不是只藏在内部文件里的东西。

路线必须体现在公开宣传、组织形式和群众实践中。

打入主义的双重语言，正说明它的路线本身是不彻底的。

(10) 小结：打入主义是取消主义、合法主义、议会主义和尾巴主义的混合物

因此，第二部分的结论必须明确：

打入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组织策略，而是一条错误路线。

它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把党降格为工党内部派别；

它依附合法政治空间，使革命组织适应资产阶级国家允许的活动范围；

它滑向议会主义，把议会职位和党内影响力当成力量积累的标志；

它陷入尾巴主义，把群众当前的工党幻想当作自己路线的根据；

它披着反宗派主义外衣，实际上制造隐蔽派别政治；它用双重语言腐蚀革命组织，使组织无法公开彻底地同改良主义决裂。

从马列毛主义、主要毛主义立场看，真正的共产党必须独立建党、公开争夺群众领导权、揭露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议会迷和改良主义幻想。

一句话：

打入主义的实质，是以“策略灵活”为名取消独立建党，以“接近群众”为名适应群众的改良主义幻想，以“利用合法阵地”为名长期依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它不是革命路线，而是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

三、马列毛主义的回答：独立建党、群众路线与反修正主义，而不是寄生于工党

批判泰德·格兰特的打入主义，不能只停留在否定层面。

如果说格兰特主义的问题在于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把革命组织降格为改良主义政党内部的派别，那么马列毛主义的回答就必须是明确的：

独立建党，深入群众，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把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政治体系中争取出来。

真正的革命路线，不是进入工党等待它左转；不是在工党内部经营派别；不是把革命组织的命运寄托在工党危机、工党青年组织、地方党部或工会官僚渠道之上。

真正的革命路线，是公开地、独立地、长期地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中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

(1) 党的独立性高于一切策略便利

马列毛主义并不反对策略灵活性。

革命者当然可以利用合法阵地，可以参加工会，可以进入群众组织，可以在罢工、社区斗争、学生运动、反压迫运动中做工作，也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同改良主义者进行临时联合。

但是，一切策略都必须服从一个根本原则：

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不能取消。

这是底线。

没有这个底线，所谓策略就会变成机会主义；
没有这个底线，所谓统一战线就会变成投降主义；
没有这个底线，所谓接近群众就会变成适应群众落后意识；
没有这个底线，所谓反宗派主义就会变成对改良主义机器的依附。

共产党可以同其他力量联合，但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纲领、独立组织、独立宣传和独立纪律。

统一战线的原则不是“把自己溶解进去”，而是：

又联合，又斗争。

可以联合工党影响下的普通工人；
可以联合在具体斗争中愿意反对资本家的工会积极分子；
可以联合对现状不满的左翼群众；
甚至可以在具体议题上同改良主义者临时合作。

但是，联合不是取消自己。

共产党必须始终向群众说明：

工党不能解放工人阶级；
议会改良不能消灭资本主义；
工会官僚不能代替工人阶级自我组织；
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被和平改造成无产阶级政权。

如果为了维持在工党内部的活动空间而回避这些问题，那么这已经不是策略，而是投降。

——

（2）群众路线不是工党党内路线

格兰特主义把“到群众中去”理解成“到工党里去”。

这是对群众路线的严重歪曲。

群众路线不是党内路线，更不是改良主义组织内部的派系路线。

群众在哪里？

群众在工厂里，在仓库里，在外卖平台上，在建筑工地上，在清洁工队伍里，在医院后勤里，在铁路、公交、学校、社区、移民劳动者群体和失业者队伍中。

群众在罢工现场，在租房斗争中，在反解雇斗争中，在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在反帝斗争中，在一切现实阶级矛盾爆发的地方。

群众不是抽象地“在工党里”。

工党只是资产阶级政治体系吸收群众的一种形式。革命者如果把群众路线变成工党党内路线，就等于把群众现实生活中的阶级矛盾压缩成工党内部派系斗争。

真正的群众路线要求革命者：

深入工人实际生活；
调查群众受压迫的具体形式；
参加现实斗争；
总结群众经验；
提高群众觉悟；
建立群众组织；
发展先进分子；
把自发斗争提高为自觉政治斗争。

这同打入主义完全不同。

打入主义关心的是：如何在工党内部扩大影响？
群众路线关心的是：如何在群众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

打入主义关心的是：工党是否会左转？
群众路线关心的是：工人能否摆脱工党幻想？

打入主义关心的是：如何争取工党青年和地方党部？
群众路线关心的是：如何在现实斗争中培养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所以，马列毛主义必须明确指出：

群众路线不是在工党内部搞派系经营，而是在群众斗争中建设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

——

（3）独立宣传与独立组织是革命党的生命线

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必须有自己的独立宣传系统。

它必须有自己的报纸、刊物、传单、学习小组、工人教育、理论培训、群众宣传和组织网络。

为什么？

因为没有独立宣传，就没有独立思想；
没有独立思想，就没有独立路线；
没有独立路线，就没有独立组织；
没有独立组织，就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权。

打入主义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就是它会削弱组织公开独立宣传的能力。

因为一旦组织长期在工党内部活动，它的宣传就必须不断考虑工党纪律、党内气氛、群众接受程度和派系生存空间。结果，它的语言会逐渐变得暧昧。

它不敢彻底说：工党是资产阶级工人党。
它不敢彻底说：工党不能被改造成革命党。
它不敢彻底说：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
它不敢彻底说：议会道路是死路。

或者即使它在内部这样说，也无法长期在公开群众宣传中把这条线贯彻到底。

而革命党必须公开讲真话。

它可以根据群众觉悟水平选择表达方式，但不能为了保留合法位置而模糊路线。

所以，独立宣传必须服务于一个目标：

把群众从改良主义、议会主义和工会官僚影响下争取出来。

不是让群众继续留在工党幻想里，而是帮助群众一步步突破这种幻想。

（4）反对工党，不等于脱离受工党影响的工人

格兰特主义常常用一个假问题来吓唬别人：

“如果你们反对进入工党，那你们就是脱离工人群众。”

这是偷换概念。

反对工党，不等于反对受工党影响的工人；
反对打入主义，不等于拒绝同工党群众对话；
反对改良主义，不等于骂群众落后。

恰恰相反，正因为工人群众仍然受到工党影响，革命者才必须耐心地、具体地、现实地去做工作。

但这种工作必须有正确方向。

对普通工党支持者，革命者不能简单辱骂，而要通过现实经验揭露工党：

当工党政府镇压罢工时，要说明工党的阶级性质；
当工党地方政府执行削减政策时，要说明议会管理资本主义的本质；
当工党议员背叛工人承诺时，要说明改良主义的必然性；
当工会官僚和工党领袖压制基层斗争时，要说明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

这种工作才是真正争取群众。

而打入主义的问题是，它为了“接近”这些群众，自己也进入工党的组织形式，结果反而削弱了揭露工党的力量。

它害怕同群众的工党幻想发生正面矛盾，于是把自己变成工党内部左翼。

但革命者必须敢于同群众中的错误意识斗争。

这种斗争不是粗暴地骂群众，而是通过群众自己的斗争经验，使他们看清改良主义的局限。

（5）真正的反宗派主义是深入群众，而不是投靠改良主义

打入主义者喜欢把独立建党说成宗派主义。

但是，真正的宗派主义是什么？

真正的宗派主义，是脱离群众，自我封闭，拒绝进入现实斗争，只在小圈子里重复正确口号。

这种倾向当然必须反对。

但独立建党本身不是宗派主义。

相反，没有独立建党，就根本不可能长期深入群众并争夺领导权。

真正的反宗派主义，不是投靠工党；
不是隐藏在改良主义党内；
不是为了接近群众而取消自己的旗帜。

真正的反宗派主义是：

带着独立旗帜深入群众；
在群众中做长期工作；
把群众的现实要求同革命纲领结合；
在斗争中培养先进分子；
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
反对工会官僚和改良主义领导；
把群众从资产阶级政治体系中争取出来。

这才是反宗派主义。

打入主义表面上反宗派，实际上制造了另一种宗派主义：隐藏在工党内部的小派别主义。

它不是公开领导群众，而是在工党内部经营自己的圈子；
不是公开同改良主义决裂，而是在工党框架内争影响；
不是把群众带出工党，而是在工党内部等待机会。

这种“隐蔽宗派主义”比公开宗派主义更有欺骗性。

——

（6）反修正主义必须反对对改良主义政党的幻想

从反修正主义立场看，格兰特主义的问题尤其严重。

修正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用改良代替革命，用议会代替阶级斗争，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格兰特主义虽然自称革命马克思主义，虽然使用托洛茨基主义词汇，虽然批判资本主义，但它在实践中却长期把自己的组织建设依附于工党。

这就是对改良主义政党的幻想。

它幻想工党在危机中可以左转；
幻想工党内部可以产生革命突破；
幻想工人群众必须通过工党这个传统形式才能走向社会主义；
幻想革命组织可以在资产阶级工人党内部长期成长而不被腐蚀。

这种幻想本质上就是修正主义式的幻想。

真正的反修正主义，必须坚持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

不是说不接触改良主义影响下的群众，而是不能让改良主义组织形式支配革命组织。

不是说不利用合法斗争，而是不能让合法主义成为组织生存前提。

不是说不参加工会斗争，而是不能接受工会官僚的政治领导。

不是说不关心选举问题，而是不能把议会道路当成工人解放道路。

反修正主义必须落实到组织路线中。

如果一个组织口头上反修正主义，实践上却寄生于改良主义政党，那它的反修正主义就是空话。

——

（7）革命组织不能靠寄生生长

革命组织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成长。

它不能靠寄生在资产阶级工人党内部生长。

寄生生长看似省力，因为工党已经有群众基础、有组织网络、有会议结构、有合法空间、有工会联系。

但是，这种“便利”本身就是毒药。

因为它让革命组织养成依赖性。

依赖工党的群众基础；
依赖工党的合法空间；
依赖工党的会议机制；
依赖工党的青年组织；
依赖工会官僚的渠道；
依赖议会职位带来的影响力。

一旦离开这些东西，组织就会发现自己独立群众基础薄弱，独立宣传能力不足，独立干部体系不成熟，独立斗争经验不够。

这就是寄生路线的后果。

真正的革命组织必须自己扎根。

它要在工人中扎根，在社区中扎根，在斗争中扎根，在先进分子中扎根，而不是扎根在工党党章和会议程序里。

独立建党当然困难。

但革命本来就困难。

为了逃避困难而寄生于改良主义组织，只会让革命组织在未来付出更大代价。

（8）马列毛主义的正面路线：独立建党、群众组织、阶级斗争

那么，马列毛主义的替代路线是什么？

第一，独立建党。

必须建设具有明确纲领、组织纪律、理论路线和群众工作能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这个党不能是工党左翼，不能是工会官僚附属品，不能是议会压力集团。

第二，独立宣传。

必须用自己的报刊、传单、理论教育和群众宣传，持续揭露资本主义、工党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第三，深入群众。

必须进入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现实斗争中，而不是进入工党机器中。要在罢工、租房、反裁员、反压迫、反帝斗争和基层工会斗争中培养先进分子。

第四，建立群众组织。

不能把群众动员局限于投票和党内表决。要建立工人小组、斗争委员会、租户组织、青年组织、反压迫组织、学习组织和基层群众网络。

第五，反对工会官僚。

英国工人运动长期受工会官僚制约。革命者必须在工会内部做基层工作，但不能服从工会官僚的政治路线。必须推动基层民主、罢工委员会和工人自我组织。

第六，反对议会迷。

可以利用选举和议会作为揭露资产阶级制度的讲坛，但不能把选举作为革命中心，更不能围绕议会职位建设组织。

第七，进行反修正主义斗争。

必须批判一切把革命降格为改良、把党降格为派别、把群众路线降格为合法主义动员的路线。

这才是马列毛主义对格兰特主义的回答。

（9）从工党幻想中争取群众，而不是同群众一起留在幻想中

革命者面对受工党影响的群众，必须有耐心。

群众不会因为革命者一句话就立刻抛弃几十年的改良主义传统。工党影响的瓦解，必须通过现实斗争经验来完成。

但是，革命者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比如：

当工党背叛工人时，要组织群众讨论为什么背叛不是偶然；

当工会官僚压制罢工时，要推动基层工人建立自己的斗争机构；

当议会道路失败时，要说明国家机器的阶级性质；

当群众对工党左翼产生幻想时，要说明左翼语言无法改变工党的资产阶级性质；

当资本主义危机加深时，要把群众不满提高到反资本主义政治斗争。

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不是抽象讲大道理，而是在群众自己的经验中说明改良主义的破产。

但前提是：革命者必须保持独立性。

如果革命者自己也留在工党内部，以工党左翼身份说话，那他们就无法彻底完成这个任务。

你不能一边说工党是牢笼，一边把自己关在牢笼里；

不能一边说工党不能解放工人，一边要求工人同你一起改造工党；

不能一边说独立建党重要，一边无限期推迟独立建党。

这就是格兰特主义无法摆脱的矛盾。

(10) 结论：从打入主义回到独立建党和反修正主义

因此，批判泰德·格兰特打入主义，最终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治独立性。

格兰特主义的本质，是把革命组织降格为改良主义政党内部的派别；

马列毛主义的回答，是建设独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格兰特主义以“接近群众”为名，适应群众的改良主义幻想；

马列毛主义则要求深入群众，并把群众从改良主义幻想中争取出来。

格兰特主义以“利用合法阵地”为名，长期依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

马列毛主义则要求利用合法阵地揭露合法主义，而不是依赖合法主义。

格兰特主义以“反宗派主义”为名，制造隐蔽派别主义；

马列毛主义则要求公开旗帜、公开路线、公开争夺群众领导权。

真正的革命组织不能靠寄生生长，不能把工党当作孵化器，不能把党内派系扩张误认为阶级斗争深入，不能把议会职位误认为群众力量，不能把工党左翼语言误认为革命政治。

革命者不是工党机器里的左翼寄生物。

革命者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独立政治领导权的组织者。

一句话：

批判打入主义，就是批判一切把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溶解进改良主义政治形式的机会主义路线；坚持马列毛主义，就是坚持独立建党、群众路线和反修正主义，把工人阶级从工党、议会主义和工会官僚的束缚中争取出来。

结尾口号

反对打入主义，反对改良主义依附！

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机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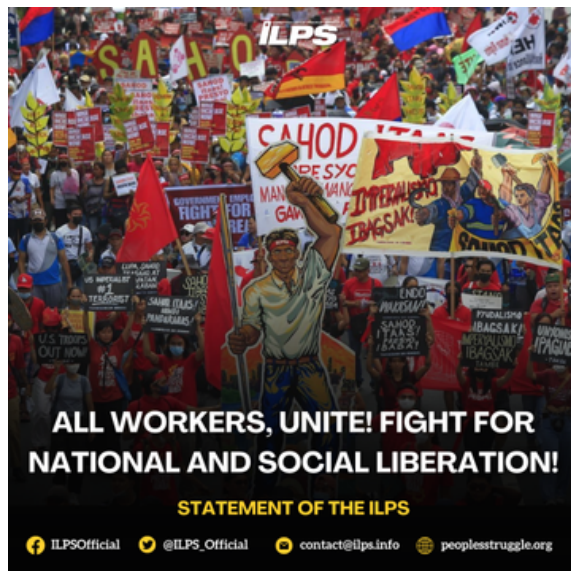
反对议会迷，反对合法主义幻想！

深入群众，独立建党，争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权！

坚持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

全体劳动者，联合起来！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

人民斗争国际联盟



人民斗争国际联盟声明

值此国际劳动节之际，国际人民斗争联盟与全世界所有劳动人民一道，高举工人阶级力量和团结的旗帜。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唯有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压迫者，才能终结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终结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其控制的每一个国家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全球经济危机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日益加深的全球经济危机，其特征是通货膨胀、低工资、债务上升和社会服务萎缩，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全球约有1.86亿人失业，15亿人就业不足，另有21亿人（至少占全球劳动力的60%）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收入极低，缺乏保障，工作条件恶劣。女性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她们的失业率比男性高出25%。全球市场日益依赖移民劳工来降低成本，这使得移民在危机、战争和流离失所时期成为最脆弱的群体之一。截至2026年，全球估计有2.81亿移民工人和3200万流离失所难民，随着战争加剧和多种危机的出现，这些数字还在持续上升。

在全球北方，去工业化、金融化和公共支出削减导致就业更加不稳定，工会力量削弱。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企业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哄抬物价，将通货膨胀率推高至8%，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尽管全球北方的正规就业岗位比全球南方更多，但其工会化率仅为15%。北约国家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军事开支，军费开支持续增长，而这却以大幅削减社会服务为代价，正如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明确表示的那样。在全球南方，债务危机、结构调整和环境破坏加剧了贫困和不稳定，迫使数百万人为生存而迁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非正规就业者都集中在全球南方，例如非洲等大洲，约90%的劳动力都从事这一行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在202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欠发达国家——的外债高达11.4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出口收入的99%。这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等掠夺性机构引发的债务危机，迫使全球南方国家平均将45%的政府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70%，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医疗保健、住房或任何其他社会服务的支出。因此，在所有地区，劳动者都面临着工资下降、就业不稳定、生活成本上升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困境。这场日益恶化的危机迫使数百万移民试图前往全球北方和富裕的帝国主义附属国，例如海湾国家。2023年至2024年汇款额增长4.6%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成为全球北方法西斯主义攻势的首当其冲，沦为自身社会经济困境的替罪羊，甚至连庇护申请都被拒绝；在美国，目前至少有30万寻求庇护者滞留。

自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发动致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攻势以来，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各国的执政政府都利用所谓的结构调整政策（SAPs），通过国际金融机构（IFIs）将基础设施、公共住房、能源、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国家资产私有化，以此作为垄断资本家阶级对抗全体劳动者的首选武器。美国通过与新殖民主义傀儡政权的关系，或通过对不屈服于其意志的国家使用武力，确保了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得到推行。这极大地加剧了全球经济危机，使工人阶级陷入更深的苦难之中。

如今，农民、原住民、渔民以及所有为社会生产粮食的人，大多都失去了土地，这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掠夺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土地和资源。美国霸权主义肆意维持着我们国家的无地状态，其中许多国家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统治之下。半殖民地国家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寄生关系，使它们得以获取和控制土地和自然资源，同时加深了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剥削。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也开始运用不同的帝国主义政策来巩固其对我们国家的土地与资源的控制。

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经济危机加剧政治危机，反之亦然。经济衰退助长不稳定，而战争、政治镇压和猖獗的政府腐败则加剧了移民和工人的困境。随着民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统治精英加剧剥削和掠夺，并不可避免地诉诸军事化和法西斯主义，以此作为应对经济衰退、确保市场安全和维持全球霸权的策略，而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固有特征。当前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已经对民众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影响，例如油价上涨、为增加军费开支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并耗资数十亿美元。美国强行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全球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都要经过这里），使全球经济陷入困境。由于汽油是生产和运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燃油价格上涨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些物价上涨对靠日薪或微薄工资度日的劳动阶级造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他们被迫承担更高的食品、药品、交通和能源价格。战区的移民工人不仅失去了生命，还失去了生计，经济状况也进一步恶化。在非直接战区，零工劳动者首当其冲地受到燃料短缺和价格上涨的影响。在印度，由于液化天然气短缺和/或价格高企，一些大型平台暂时关闭了餐厅；仅两个平台就导致约100万工人失业。工人们被要求自带食物。同样，据报道，巴基斯坦已有100多家纺纱厂和数百家轧棉厂关闭，这意味着数千名工人已经失业，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基本关闭，将有数百万人面临同样的困境。渔民也深受燃料价格上涨的打击。许多渔民依靠液化石油气（LPG）钢瓶为渔船提供动力。在菲律宾，LPG价格预计将上涨至多30比索/公斤，相当于每11公斤装的钢瓶价格上涨约330比索。在印度，政府已将钢瓶容量从14公斤减少到10公斤，而价格却上涨了60卢比，相当于孟买的115卢比，农村地区的近200卢比。粮食和能源危机蔓延 全球南方国家的农业部门也极易受到冲击。由垄断资本刻意推动的化肥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尿素等化肥。全球三分之一的尿素贸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海湾国家不仅生产尿素，还是尿素生产所需廉价液化天然气（LNG）的来源地。小麦、玉米和水稻等作物的高产高度依赖尿素，而且播种季节也受到时间限制。因此，如果尿素市场短缺，农民不仅将面临高昂的生产成本，还可能面临产量大幅下降的风险。这将导致作物减产和食品价格上涨的恶性循环，最终造成民众普遍饥饿和营养不良。此外，亚洲和非洲各地有数千家化肥生产厂，这些工厂的工人也面临失业风险。南亚和东南亚的燃油价格上涨了高达30%。然而，在许多国家，汽油价格分别上涨了50%和68%，例如越南和柬埔寨。尼日利亚的涨幅也达到了50%，而波多黎各的涨幅接近40%。在澳大利亚等国家，针对伊朗的帝国主义战争影响了所有地区的民众；石油和柴油价格上涨了32%至39%。囤积现象也加剧了这种情况；在美国和加拿大，汽油价格上涨了约40%。亚洲受灾最为严重，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来减少燃料消耗，包括关闭学校、学生上网课以及强制居家办公等。战争投机者火上浇油 尽管资产阶级媒体评论员声称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供应短缺是全球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这种做法很容易将责任推卸给伊朗，因为伊朗在面对美国-犹太复国主义侵略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御性控制，但真正的经济操纵者——政府决策者和投资公司——却隐藏在幕后。各国政府，尤其是新殖民主义国家的官僚资本家，大张旗鼓地向在烈日下排队等候一整天的工人发放微薄的援助（据报道，菲律宾至少有一名工人因此中暑身亡）。但这些援助对于工薪家庭来说，根本不够维持一周的生活。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政府维持着极高的增值税（VAT）。

政府以石油和基本商品换取服务，将税收收入收入囊中，却不提供本应由税收支付的政府服务。这种明目张胆的政府腐败，加上国内能源和其他行业的监管放松，才是当今致命通货膨胀的真正根源。与此同时，华尔街交易员们押注全球石油市场，然后根据战争形势的快速变化以及特朗普（通常在股市开盘前）关于战争走向（进而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状况）的反复无常的公开言论撤出投资。金融公司通过这种方式从石油市场的投资和期货交易中赚取了巨额利润，据报道，摩根士丹利获利55.7亿美元，高盛获利56.3亿美元，而摩根大通的利润更是高达164.9亿美元。与此同时，武器公司的利润增长超过25%。这些事实暴露了垄断资本家、金融精英和新殖民主义官僚资本家维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内在利益。当世界各地的民众和工人因物价飞涨和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短缺而苦不堪言时，他们的利润却暴涨。法西斯主义对移民和工人阶级底层民众的攻击 帝国主义战争，例如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加剧了工人阶级和移民工人社区的动荡，迫使他们及其亲人移居国外或沦为难民。这种情况，再加上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被垄断资本家利用，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是他们为保护资本主义制度而采取的最后手段。针对工人阶级社区，特别是移民的法西斯主义攻击愈演愈烈。在美国，特朗普的政策就是如此，他公开鼓励针对移民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暴力，并通过拘留和驱逐导致家庭破碎。特朗普为服务美国帝国主义利益而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加剧了多个地区的战争和政治危机。

在许多接收国，移民处于工人阶级的最底层，被安排在最不稳定的劳动部门，常常被当作替罪羊，以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从而掩盖了危机的根源。他们面临着最恶劣的法西斯镇压和赤裸裸的恐怖，包括拘留、暴力和国家种族主义迫害，使他们沦为可随意处置的劳动力。移民工人承担着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却遭受着所有劳动者中最不人道的待遇。他们集中在低工资、不稳定的行业，提供廉价且灵活的劳动力，却面临着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法律上的脆弱性，以及被排除在接收国工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和社会保障之外。由于本国的贫困和动荡，许多移民被迫负债累累才能出国工作，而这些输出国的政府则依赖他们的汇款，实际上维持着一个强迫移民和超级剥削的体系。正因如此，移民工人在当今世界工人阶级中真正处于底层。解放移民！全体工人，联合起来！移民和工人是能够改变社会的主要力量。移民工人是国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与东道国和原籍国都紧密相连，必须追究各国政府对剥削和强迫移民的责任。移民解放与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密不可分。这只有通过移民工人和东道国工人共同斗争才能实现，他们致力于解决剥削、劳动权利、住房和社会服务等问题，从而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通过联合斗争、罢工、组织和激进行动，可以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对抗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所有工人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我们获得解放的道路在于建立全体工人团结一致的坚实阵线，对抗并推翻造成我们苦难和困境的帝国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必须成为世界各国反帝运动的舵手和引擎。人民斗争国际联盟（ILPS）今日联合其他反帝组织和工人组织及网络，发起一项名为“释放移民！全体工人团结起来！”的新运动。这将是一场由移民和工人领导的基层运动，其中移民工人将发挥主导作用。该运动旨在为移民和非移民工人创造空间，让他们了解经济危机，理解其根源，并采取行动反对那些剥削他们的人，包括雇主、企业、移民系统和政府。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场所有工人都能通过其建立自身力量的运动。

反对那些靠剥削他人为生的人，争取建立一个团结、公正、和平的世界，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地生活、工作、迁徙，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返回家园。值此国际劳动节之际，联盟与所有工人站在一起，无论他们是否组织起来，无论他们是否从事正规或非正规的劳动，无论他们是否是移民。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劳动节一直是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斗争的象征。只有建立在反帝运动核心的全工人阵线，才能最终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全体工人，联合起来！释放移民！争取工人解放！打倒美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访问 <https://internationalssolidarity.org/allworkersunited/> 了解更多关于“释放移民！全体工人，联合起来！”运动的信息。

来源: 人民斗争国际联盟

<https://peoplesstruggle.org/en/all-workers-unite-fight-for-national-and-social-liberation/>

五一劳动节走上街头，反对对人民和自然的残酷剥削——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未来！

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
协调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REVOLUTIONARY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1. Mai

1886年5月1日，受工业家指使的武装暴徒在美国芝加哥干草市场残酷镇压了聚集在此的罢工工人。工人们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尽管遭到残酷镇压，最终还是实现了这一目标。1889年，第二国际呼吁工人每年将五一劳动节定为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解释说，在这一天，工人阶级还必须立誓“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只有在国际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广泛统一战线，阻止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使斗争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日益加剧且无法解决的危机的全部负担，正被转嫁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其他群体身上。裁员、减员、关闭企业和工厂、削减工资、限制工作场所安全等攻击手段，已成为所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特征。如今，我们看到的不是永久性就业，而是外包、临时工派遣、低薪且毫无就业保障的固定期限合同、日益恶化的工作条件、每天工作时间延长至12小时甚至14小时以上，以及在主要互联网平台上按任务付费的零工经济模式。此外，来之不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正遭到系统性的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技术的引入正在迅速摧毁就业岗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控制权的竞争日益激烈，不仅导致激烈的贸易战，还导致军事入侵市场和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以确保对整个地区以及石油、天然气、矿产和贵金属等资源的支配权。“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标志着美国帝国主义公开宣称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霸权。他们为了贪婪的利润，无情地牺牲人类生存的基础，并加剧了全球环境灾难。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中，美国帝国主义是主要的侵略者，犯下了种族灭绝和生态灭绝罪行。我们一视同仁地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五一劳动节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注定要在彻底废除人剥削人的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为此，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后现代主义、沙文主义和反共主义都与此相反。

席卷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并非仅仅是经济危机，而是波及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伦理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危机。卡尔·马克思早已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先改变自身，才能改变世界。为了在日益激烈的争夺统治地位和维护自身权力的斗争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统治者诉诸法西斯主义。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倾向如今已成为所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

在五一劳动节，列宁说道：“全世界的工人正在为……建立一个社会制度而斗争，在这个制度下，共同劳动创造的财富不是少数富人享有，而是全体劳动者享有。他们希望……劳动成果归劳动者所有，人类智力的一切成就，一切劳动方式的改进，都用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而不是用来压迫劳动者……”（列宁，《五一劳动节》，1904年，《列宁全集》第七卷，第199-202页）。今天，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经常进行激烈的斗争，包括像2026年2月印度那样的大规模总罢工。至少六个国家的码头工人举行政治罢工，声援巴勒斯坦，反对向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的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运送武器，声援巴勒斯坦，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这预示着……国际协调斗争。2026年3月28日，美国爆发了3300多场示威游行，超过800万人参与，其中许多游行打着“不要国王，不要法西斯”的口号，这表明：法西斯分子并非无所不能！越来越多的群众不愿落入法西斯野蛮的深渊。一系列政治事态的迅速发展——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军事侵略，导致了对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前所未有的残酷绑架行动、对古巴封锁的加剧以及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对伊朗和黎巴嫩的侵略战争——对妇女运动的攻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对社会、经济和民主成果的废除，以及其他许多相关事态的发展——所有这些都需工人阶级与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结成联盟，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反抗。这些斗争需要强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本着这种精神，国际工人委员会在五一劳动节呼吁：组织起来！加强工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力量和跨国国际劳工运动的协调！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作为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核心！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国际工人委员会及其成员组织！

来源: 革命政党和组织国际协调

<https://www.icor.info/en/en/2026/take-to-the-streets-on-may-day-against-the-ruthless-exploitation-of-people-and-nature-for-the-future-of-the-working-class-under-socialism>

雇佣劳动与资本（第五部分）

德国
K·马克思

这些同生产资本的增长分不开的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资的确定呢？

更进一步的分工使1个工人能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中间的竞争不只表现于1个工人把自己出卖得比另1个工人贱些，而且还表现于1个工人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而资本所实行的和经常扩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进行这种竞争。

其次，分工越细，劳动就越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需要投入紧张的体力或智力。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竞争者的排挤；我们还要提醒一下，一种工作越简单，越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越少，工资也就越低，因为工资像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总之，劳动越是不能给人以乐趣，越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越激烈，工资也就越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内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了贫困所迫，就越加重分工的极危险的后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资就越少，而且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工作得越多，他就越是同他的工友们竞争，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归根到底是自己给自己，即自己给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己造成竞争。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向街头，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我们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资本家相互间的产业战争。这种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制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

不错，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因采用机器而成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工作。

他们不敢干脆地肯定说，在新的劳动部门中找到栖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实最无情地粉碎了这种谎言。其实，他们不过是肯定说，在工人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面前，譬如说，在一部分已准备进入那种衰亡的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现了新的就业门路。这对于不幸的工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资本家老爷们是不会缺少可供剥削的新鲜血肉的，他们让死人们去埋葬自己的尸体。这与其说是资产者对工人的安慰，不如说是资产者对自己的安慰。如果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那么这对资本来说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成其为资本了！

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机器从工作岗位排挤出去的工人以及原来期待着这一工作的那一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报酬会和已失去的工作的报酬同样高呢？要是这样，那就是违反了一切经济规律。我们说过，现代产业经常是用更简单的和更低级的工作来代替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

那么，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一大批工人如果不甘愿领取更低更坏的报酬，又怎能在别的部门找到栖身之所呢？

有人说制造机器本身的工人是一种例外。他们说，既然产业需要并使用更多的机器，机器的数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机器生产、从事机器生产的工人也必然增加；而这个产业部门所使用的工人是熟练工人，甚至是受过教育的工人。

从1840年起，这种原先也有一半正确的论点已经毫无正确的影子了，因为机器制造也完全和棉纱生产一样，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机器，而在机器制造厂就业的工人，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机器的作用。

可是，在一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以后，工厂方面也许会雇用三个童工和一个女工！难道先前一个男工的工资不是应该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吗？难道先前最低工资额不是应该足够维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后代吗？资产者爱说的这些话在这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一点：现在要得到维持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资，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越来越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越来越消瘦。

不言而喻，小产业家在这种斗争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这种斗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生产的规模经常扩大，也就是说要做大产业家而决不能做一个小产业家。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用不着进一步说明的：资本的总量和数目越增加，资本越增长，资本的利息也就越减少；因此，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租金来维持生活，必须投身于产业，即扩大小产业家的队伍，从而增加无产阶级的候补人数。

最后，上述发展进程越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利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产业“地震”也就越来越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危机也就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但是，资本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要依靠劳动。这位尊贵而又野蛮的主人也要把他的奴隶们的尸体，即在危机中丧生的大批工人陪葬，同自己一起葬入坟墓。由此可见：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虽然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

导师语录

我们绝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绝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搜狐号@那些看得见的老照片